

巴尔扎克传

第一章 一个小说家的最初时光

第一节 家庭和学校

一个天才，一个象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蕴涵着无穷的想象力，让他得以建筑一座属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患得患失地去计较私生活中那些无关痛痒的所谓事件的真相。他非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纳入于他那创造意志的专制范畴之内。并且最可以看出他本性来的，乃是从他的世俗生活之中，对各种事件的近乎变态的专横，在一件一般市民看来几乎无法更改的事情中开始显现了出来——也就是说，关于他的姓氏问题。在他三十岁左右的一天，他公然宣布，说他的姓名并不是叫巴尔扎克·奥瑞利，而是德·巴尔扎克·奥瑞利；¹他还宣布说自己从来就拥有这个高贵门第的全部特权和名份，但事实上这只是他父亲偶然开过的一次小小玩笑，且仅仅局限于他最熟悉的几个家族亲戚的范围内，似乎说他和古代骑士德·昂特拉格尔·巴尔扎克有点儿沾亲带故。但是他儿子却展开富有力量的幻想，毫不犹豫地将这不经意的一次吹牛，夸大到一个毋庸置疑的不容分辨的真实地步。他在他的往来信件和著作中都认真地签署：“德·巴尔扎克”的姓氏，同时，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章漆绘在马车上，甚至乘上这辆引人注目的马车去维也纳旅行。每当那些知道真相的同行，揶揄他的这种妄自尊大时，他总是毫不脸红地告诉他们，早在他出世之前，他父亲就在政府的文书上明确表明了他的贵族身世，神情坦然自若。所以从他的出生证明书上所看到的关于他高贵门第的证明，其真实可信的程度和蒙田或孟德斯鸠的出生证明不相上下。

令人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缺乏同情心的世界，所有对事实不苟言笑的文书，全有着一一种十分可恶的性质，即对于由诗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极富炫耀性的传奇故事，显示出不屑一顾的敌意。这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个时常被人们赞誉为信仰真理的人而言，尤其是个尴尬，因为那份被他堂而皇之地称引着的出生证明书，至今仍旧躺在杜尔城市中的公文档案室里。显而易见的是其中根本没有一点贵族姓氏“德”的痕迹。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下面，杜尔的一个小村吏用淡漠的口吻记载得一清二楚：

“当天，法兰西共和国七年旧历第九月（牧月）初二，市民巴尔扎克：伯纳—佛兰苏，当事人，本城居民，住意大利军街，沙杜南地段二十五号，来到此间，向本人——都威·彼得·约克，出生、婚嫁、死亡注册者的签署人。——呈报产一子。上述之巴尔扎克声称，此子所承受之姓名为巴尔扎克·奥瑞利，为本日晨十一时，出生于家中。”

另外一些和他有关系的证件，例如关于他父亲的死亡，抑或他妹妹婚嫁的文书上，都丝毫不能提供有关贵族家世的证明，因而他的出身，及其所有出自巴尔扎克之口的有关谱系的言论和证明，都只是这位伟大的编谎者因为内心那渴慕的念头而臆造出来的东西罢了。

种种文件的证明，就严谨的法律字句来说，显然可以使它们的官司知赢巴尔扎克，但是他自己的威权的念头——那如熊熊烈焰燃烧着的，极富创造性的念头——终于战胜了现实，而获得羊皮纸上严峻的胜利。显然有不少事

¹ 德（de）：贵族的表征。

后的更正为了铁面般的真理而产生，但毕竟“诗”永远战胜了“历史”。尽管从来不曾有一个法国国王会把贵族的纹章赐与他或他以往的哪位祖先身上，可是当后人被问到这位最伟大的法国小说家的全名时，他们都自觉地遵从了他的愿望，回答说是“德·巴尔扎克·奥瑙利”，而下是“巴尔扎克·奥瑙利”，至于巴尔萨·奥瑙利，却简直不曾被人提起过。

但是千真万确，“巴尔萨”，（既非“巴尔扎克”，更非什么“德·巴尔扎克”了。）才是他祖先的真实姓名。他们毫无可资炫耀的饰品来为他们生性卓绝的这位后裔带来光荣。他们也从来没有穿上闪亮的胄甲驰骋疆场，或是体验过罗曼谛克似的决斗。他们不过将羊群赶进牧场，或是做些苦力活儿，去耕种郎格多克地方上的田地罢了。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佛兰苏，在一七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出世，生在靠近康奈扎克的奴该瑞耶村落的一间简陋的小石屋内。那里住着许多巴尔萨氏的人，他们中间始终没有涌现过出名的人物，倘若有可能为获得荣誉寻找到一个惟一的托词，它的性质恐怕也是极端不可靠的。一八一九年，也即奥瑙利离开大学时，他家乡的一名孕妇被人暗害了，做为嫌疑犯被逮捕的是他父亲的一位五十岁的兄弟。经过一次闻所未闻的审讯，在第二年被送上了断头台。这可能是巴尔扎克一个心愿的源头：希望在自己和自己那位臭名远扬的叔父的遗名之间，拉开一段尽可能远一点儿的距离。由于这个愿望，他自小就在内心暗暗发誓：要给自己的姓氏冠上一个贵族街头，并且给自己重新虚构一段另外的家世。

伯纳——佛兰苏，十一个孩子中的老大，早被他的父亲，一个平常种地的苦工命定为教会中的人物。村里的教士帮他识字读书，和最基本的一些拉丁文。但是这个精力充沛，强壮有力，野心勃勃的年青人，却毫无立志于剃度出家及独慎其身的打算。有一段时间，他在自己家乡的村落随意漂流，为本地的录事官帮忙做书记，或在葡萄园里做短工，或帮人种地。二十岁以后，他开始不干了。以乡下人那种特有的固执和不屈不挠的劲头，——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了他儿子的小说素材，而被多次描写过——他也竟然混进了巴黎的生活圈子，而且渐渐如鱼得水，对巴黎的生活游刃有余。刚开始，他只是不引人注目地消逝于不可胜数的青年人中间，（这些人都是满怀理想来到巴黎，但却对未来并不清晰，同时心中也没想到什么确定的职业）。许多年以后，当他已经成为本省小有名气的人士之后，他才谎说自己曾在路易十六手下干过王家议院的秘书，还出任过王家法律顾问。这假面具其实不堪一击，只是这位富于虚荣心的老谎言家兴之所至的玩笑罢了。因为在王家纪历上从来就不曾记录过任何一个姓巴尔扎克或是姓巴尔萨的人担任过这样重要的职位。

正象不少和他同类型的人们一样，这个外省的乡下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推上了浪尖，并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上获得一席之地，尽管对于自己平生最特殊的时期，他已经习惯于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但却使他拥有了许多有用的关系，加上他的那种谁有钱就朝谁那儿钻营的与生俱来的本领，竟然使他得以进入军队的一个部门。该部门是利润和油水都十分丰厚的地方，说得明白些，那儿是战时供应处和军粮处。很自然地，致富的途径从军粮处仿佛金色长线直直地伸向放债人和银行家的帐房里去了。在这种形迹可疑的谋生方式之下，生活了三十年以后，某一天，伯纳——佛兰苏又突然变换了一种活法，投入于另一种新的环境，给巴黎的杜麦尔·丹尼耶银行去做主任秘书。

五十岁知天命，老巴尔扎克总算完成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转变——正象他

儿子屡屡描写的——从一个一文不名，可却终日忙碌且野心勃勃的小伙子，终于成为了一个高尚的，受人尊敬的市民，“上流社会”中的堂堂正正的一员。直到此时，有了金钱和地位，总算到达人生一个久已期待的阶段；在此阶段，他又采取了次一种主要步骤；即：在达到最终的，也是他最渴望的结果——成为一位有私产的绅士——之前，他可以自小资产阶级转入更高一筹的资产阶级里去。他给自己找一位太太，一位有着良好的嫁妆，和高贵的布尔乔亚血统的太太，在他五十一岁时，身心仍很健康，仪态优雅，谈吐动人并是一位风流场中的老手，他看上了他的一位银行上司的女儿。萨郎比那·罗尔·莎洛特·安娜比她的求婚者小三十二岁，还有一些罗曼谛克的富于冲动的激情，但也是一位有着良好教养并十分有孝心的女儿。她顺从了父母亲的劝说，他们认为老巴尔扎克是一块肥肉。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理财的本能很健全，尽管他的年龄比之他们的女儿相差甚殊。

到结婚的时候，老巴尔扎克感到再继续为人作嫁未免有失身份。至于他并不十分上算，就权不去说了。由于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拿破仑的手上，人们的收入有可能因战事而增加，供给方面也会更快更丰富，因此他利用原来的关系，再加上他太太的嫁妆做为后盾，使他在即使危机来临时也无后顾之忧，于是又官复原职，移驻至杜尔城的军队，成为军粮处第二十二师的师部监督。

他的长子奥瑙利在此期间生了出来，巴尔扎克一家正处兴旺之际，杜尔城的有钱人都把其当作和他们同等的令人尊敬的人士加以厚待。他的军粮处的税收，可以提供给伯纳—佛兰苏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同时，因为家里花销很省，又富于投机，因此现在可以摆起谱儿来了。奥瑙利出生不久，他们就从狭小的意大利军街搬到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直到一八一四年，当拿破仑战役最紧张的时代，他们都过着比一般外省人更奢侈的生活：拥有一辆自用马车，和许多仆人、随从。最上流的人物，包括贵族，都和这位充当过巴黎参议会过激派议员的田舍翁之子过从甚密——在他们中间，有上议员德·瑞·克莱芒，（他那神秘的被绑架事件，后来被巴尔扎克详细地写于《一桩可怕的事情》中。还有德·庞眉若男爵和德·马尔冈先生，后者在许多年后，在这位拼命挣扎的作家走投无路时，曾帮过他的忙。老巴尔扎克也经常应邀去参加一些市政活动，每遇重大决定，他的意见时常被垂询，不管他有着如何卑微的家世，和贫贱的出身，在这个瞬息万变，全面更新的时代，终于上升到一个不再让那些都会中的知名人物所诟骂的地位。

德高众望的老巴尔扎克，是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的。他是个乐天派，体格魁梧，对自己，对别人，尤其是对自己的成功，无一感到得意。虽然有时有些粗俗像个骑兵，谈吐也没有太多贵族腔调，而且喜欢说一些妙趣横生的掌故——他儿子的《笑林》很有可能来源于此——他还是个喜欢编笑话的老手，老实话里也时常混杂着吹牛，并且永远兴高采烈。尤其在这动荡的岁月里，他的精明强干的性格，决定了他必须以一种破釜沉舟的气概去义无反顾地支持任何一方——国王，皇帝，或是革命——的勾当。虽然没有接受过健全的教育，但他却有着一种并不狭隘的兴趣，读书的口味也是多角度的，因此积累了不少包罗万象的知识，这批丰富的积累，帮助他应付一切。他竟然还写过一两本小书，用《偷窃及被杀之防范方法备忘录》及《有关被抛弃和被欺骗之少女的伤风败俗丑闻回忆录》这种荒唐的名称作书名。当然这种作品是不能和他那伟大的儿子的那些作品相提并论的，就象老歌德的《意大利日记》不能与服尔夫刚·约翰（大文豪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记》相提并

论一样。

由于精力充沛，加上生活中充满了许多欢愉的事情，他决定自己要活到一百岁。在他六十岁之后，他除了四个嫡出的孩子以外，又多了好几个私生子。更在八十岁那年，因为使一个不检点的少女怀孕，而受到应负责任的控诉。医生很少是因为要履行职责而跨进他的家门。另外，他要比他同时代的人活得更长的决心，来源于一件使他更坚定自己想法的事实——他成为了所谓“拉发惹养老金”里的一个年金受领人。该年金法规定：当别的年金领受人死去，他的年金可按比例增加。那种和他儿子同样的法力，对于他儿子，是用来描绘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之内色彩缤纷的典型；而对于父亲，却是以此来全力以赴自己肉身寿命的延长。在他八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越过了所有的“拉发惹养老年金”的受领人，一年可以得到八千法郎；也就在那一年，他竟死于一次愚蠢的非命。否则，和他儿子一样集中整个的意志，兴许可以实现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愿望呢？

倘若说奥瑙利在讲述故事方面的生动和愉快，是从父亲身上继承而来的，那么他在感觉上的敏锐，却是从母亲那儿承继来的。他的母亲是如此年轻，婚姻也说不上不美满，但总有一种红颜薄命的忧郁。他丈夫从来是踏踏实实，无烦无愁地过着日子，他不能容忍妻子吵吵闹闹、胡思乱想总怀疑自己有病的神情。影响了他从容若定的脾气。相反，巴尔扎克·罗尔·莎洛特·安娜仍是那种使人厌恶的典型：从各种各样突然爆发出来的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中，透露出她那总象是受到伤害的感觉。她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家里所有人百分之百的喜爱、恭敬和抬举。她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孩子们，对她伟大的自我奉献精神并没有感恩戴德。一直到她死去，她也从未放弃过用她“善意的”忠告，和满眶盈盈的泪水，去感化和苦恼那已经举世闻名的儿子。但她并非缺乏智慧和教育。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被银行家杜麦尔先生的女儿选为最好的闺中伴侣。这种体验使她从小就向往罗曼谛克。那些年，她对纯文学充满了一种浓烈的热情，乃至晚年，她对瑞登堡和其他一些玄学作家的作品依然一往情深。

但是，她那稍稍的唯心主义的气息，不过多久便被一种充满铜臭味的料理钱财的意志给淹没了。对于出身在典型的巴黎小布尔乔亚家庭的她来说，从一个小铁器作坊行业，一文一文的钱积累起来，结婚以后，也把她那个阶级特有的固执而狭隘的本能带了过来，尤其是那种假充阔绰其实小家子气的贪婪，和她丈夫的对大量投资及盈利的投机的饕餮渴望同气相投。照她的主张，教养儿女就是教他们知道花钱就是罪恶，只有挣钱才是所有美德中的美德。一开始，她就鼓励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长远打算，谋求稳固的“地位”，或者，倘若是女孩子，就找一个好配偶。她从来不愿意他们有过多的个人自由，并且总是时刻监视着他们一举一动。由于她的横加干涉和粗暴的苛责，以及她的近乎变态的热心，（那是所谓对孩子未来毫无边际的幸福着想的热心。）尽管她是出自所谓好心，但她所能做到的胜利，只是适得其反，使全家陷于瘫痪麻木的境地。一直到若干年后当巴尔扎克早已长大成人很久，他还是不时想到小时候的情景：一但听见母亲的声音，总会立即吓一大跳。

被她这位脾气不好又禁忌甚多的母亲——她曾冷酷地拒绝了孩子们的任何情爱的表示——强加到巴尔扎克身上的痛苦的程度，我们可以从他的一封信中的哀鸣里推测出来，他说：“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事隔多年，我们已经很难寻找到什么是促使巴尔扎克·罗尔·莎洛特·安娜本能地对两个更

大一点的孩子——奥瑙利和罗尔——冷淡的原因，尽管她对最小的两个孩子，劳伦斯和亨利，却又非常的宠爱。这可能是对她丈夫的一种退居守势的反动力。但不管怎么说，这总是毫无疑问的：很少有别的母亲象她那样对自己的孩子表示无关痛痒和缺乏怜爱。她的长子刚一出世，她就要人立刻将他从家里送走，仿佛他是个麻疯病人。那时他还没有满月。后来这个婴儿交给一个奶母——一个宪兵的妻子——看护着，直到四岁时他还和她同住一块儿。甚至在那时，尽管他父母的宅院是那么阔绰，但他的父母却不许他回家来，只允许每个星期天，才可以回家探视一次，仿佛他们的远房亲戚。父母从来不让他和较小的孩子一起玩，他从来没有自己的玩具，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礼物。生病时亲生母亲从来不在身边，也从来不曾在她的口中听到一个有关慈爱的字眼儿。每当他试图亲昵地靠近她的膝头，想要拥抱她的时候，一声严厉的呵叱声，便毫不犹豫地打断这种亲热的尝试，就象是有碍观瞻似的。七岁那年，这个没人要的孩子，便被强行送到王多姆的一个寄宿学校去。他母亲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离她更远一点儿，远到另外一座城市。又过了六年，当这个孩子几乎不堪忍受的教育终于告一段落之后，他才得以回到他父母亲的宅院中去，她母亲又使他的生活再次感到痛苦，（用他自己的话：“Laviesidure”）于是在他年满十八岁之后，他就发自内心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再也无法忍受的家庭而逃跑了。

不管他的心性多么温顺——这是他生性中最重要的部分，——一直到长大，他还是设法从过去所尝受到的苦痛中摆脱出来。过了很长时间，甚至他已经将他孩提时代折磨他的人接到自己的家中居住，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他还是无法在思想上，将许多年前由于她拒绝给予他的爱而对他施加的种种行为驱除殆尽。而且，在一种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呼唤声中，他曾对德·韩斯迎夫人倾诉过他的积愆：

“你真是无法知道我的母亲是怎样的一种人！她是一个可怕的妖精，同时又是妖精般的怪人。现在，在摧垮了我可怜的劳伦斯和祖母之后，她正在把魔爪伸向我的妹妹。她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仇视我，甚至在我还没有来到人世之前就仇视我。我和她已到达决裂的边缘，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但是我情愿继续忍受。那是一种无法治好的伤口。我们知道她肯定疯了，还请了一位和她打了三十二年交道的医生来诊断。但是他否认说：‘不，她并没有疯，她只是居心不良’……我母亲就是带给我生命一切灾难的根源。”

这些话，被他在很久以后突然地吐露出来，就意味着是他所身受的无数隐痛的答案。那些隐痛，是在他发育期间最敏感的时期，被他唯一的，从自然律上来说，应该是他最亲近的，向他表示最慈爱的专一的人，所赋予他的。但在事实上，她正是那使他承受痛苦打击的唯一的不可原谅的人。那痛苦，正象他自己所言：是“所有人的命运中从不曾遇见的最恐怖的童年。”

王多姆时期的巴尔扎克，仿佛消磨在精神监狱——欧瑞多教会学校——里的六年光阴，是写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文件上的：一种是学校注册课上刻板的官样文章；另一种是文学上名为《蓝柏尔·路易》的伟大名著。学校当局仅仅是如下这样枯燥严肃的记载：

“第四百六十号，巴尔扎克·奥瑙利，八岁零一个月。出过天花，但不曾留下残疾。体质是充血性的，有高血压倾向，体温往往上升。一八零七年六月二十日入学，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离校。信件寄其父亲巴尔扎克先生，住杜尔城。”

他的同学们只记得他是一个胖乎乎、脸蛋通红的大孩子。有关他那时候的情况，他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参考，仅仅是他的外表，和几件不太准确的逸事。所以，那本具有自传性质的《蓝柏尔·路易》的小说就更为动人了。那本书把一个有着天才气息的孩子的悲剧性的内心生活泄露给我们，同时，由于他是天才的原因，使得他具有双倍的痛苦。

巴尔扎克选用了双重描写的手法，来描述自己成长的历程。他自己既是诗人蓝柏尔·路易，又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正象少年歌德的个性存在于浮士德和曼斐斯脱菲斯的轮廊里一样，他将他的个性也分析开来，把他天才中孪生的两种基本形态，组合在两种不同的特性中。这两个基本形态一个是创造的要素，它依据以人间世界为参照的典范，形成了种种世相；另一个是支配的要素，它把要表现的日常生活的伟大舞台上的规律显示了出来。实际上，以真实性而论，蓝柏尔·路易之为巴尔扎克的小影，要比毕达哥拉斯真确得多。至少，这个看上去不太真实的人物的外在体验，就是他自己的体验。一些影射他自己的人物——象《驴皮记》中的拉发埃尔，《幻灭》中的阿尔太斯，《十三的故事》里的蒙泰若将军等等——都不象这个小孩的故事这样全面地、明确地，充满了他个人的体验。这孩子的命运，是被抛弃于一个教会所办的寄宿学校的斯巴达式校规之下的。

这所有着黝黑的高楼和厚大的墙垣的学校，位于王多姆的市中心，小罗瓦尔河从身边流过，从外表看，与其说是一所教育的建筑，不如说它更象监狱。从开学那天起，二三百名学生就开始经受严峻的苦修的训练。在那里没有放假日，家长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获准前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在整个的那些日子里，巴尔扎克似乎从来没有回家，为了加强故事情节，以谋求和自己童年的体验相同，他把蓝柏尔·路易写成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学校的花费还算便宜，不但学费，连吃用的费用也包括在内。但孩子们常连最低限度的供应品都过分地缺乏。那些父母不给捎手套，和暖和的内衣给孩子们——多谢巴尔扎克母亲的漠不关心。他既然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也就只好不使用这些舒服的东西了——于是手指冻裂，脚生冻疮，蜡曲着度过漫长的冬季。特别是巴尔扎克——蓝柏尔，他的肉体和精神一样敏感，因此他与他的那些乡下同学相比，一开始就分外受罪：

“他熟悉乡下的空气，熟悉了顺乎自然的自由教育，熟悉了被一个最爱他的老年人慈祥的照料，熟悉了在日光下躺着冥思，从而对服从校规，随行逐队的走路，生活于一间四面高墙的房屋里，（房子里有八十个少年人默坐在木凳上，每人面前一张书桌。）他感到非常难受。他全身的各种感官，都有一种敏锐的感觉程度，因而养成了它们脆弱的敏感，同时，身上的每一根纤维，在这种群居生活的重负之下，都异常地痛苦。那种连空气都中毒的臭气，混杂着总是秽恶的教室的味道，在教室里还零散地堆着孩子们剩下的食物，使他的嗅觉感到震悚。——而一个人的嗅觉，相对于其他的感觉，无疑和大脑组织联系的最密切，因而一旦损害加到它上面，势必就影响到思维的正常结构，虽然这种影响外人是无法洞悉的——除了多方面的影响，使空气混浊之外，还有那些从抽屉里散发出来的味道。抽屉是我们每人存放自己小宝贝的地方，仿佛因为节日而宰杀的鸽子，或者是从食堂里偷偷弄来的吃食，都藏在这里面。还有一大块石头，上面老是盛放着两个装水的水桶，作成了一种水槽，我们每天清晨，都要一个挨一个，在教师的监视之下，到那个地方去洗头洗脸。从那里我们再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女人为我们梳头抹粉。

我们的宿舍，除了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前打扫一次以外，其他时间都是脏的，尽管有许多窗户和高高的门洞，但是从洗脸的地方，从我们梳头的角落，从那些抽屉，从凡是每个孩子所占据的一千处领域，最后——但不会最少——还有我们八十个身体群聚到一块儿而生的臭气，使空气永远是混浊的……由于郊外那种干净新鲜空气的缺乏——他一直住在郊外，——和习惯的变化，还有严格的操练，这一切都使蓝柏尔充满了忧伤。他用左手托腮，臂肘趴在书桌上，以眺望天井里的绿树和天空里的云彩来排遣他在教室里的时间。他外表似乎是在专心用功，但是每当教师发现他的笔并没有动静，面前仍是一张白纸时，他就会大喊道：“蓝柏尔，你又偷懒了！”

教师们下意识地发觉，当他们试图对他加以引导时，他内心仿佛有一种抵触他们的情绪。但他们却没有用正常的方法去体会他内心的特殊变化，只知道他不会用心去读书和学习。他们觉得他是笨拙或者懒惰的，刚愎自用或是富于幻想，因为他不同于其他的孩子，只带着那种迟钝缓慢的步伐。他时而落在大家后面，时而一狠劲又把他们超过。不管怎样，反正再没有一个孩子比他挨打挨得更厉害了。他总是不断面临惩罚，所以他几乎没有游戏或闲暇的时间。没完没了的申斥，而且时常被禁锢起来，以致在某一个两年的时期里，他没有一星期以上的自由日子。更频繁也更残忍的乃是体罚，——这是他那残忍的老师的最后手腕，也是这位最伟大的天才在当时所感受到的：

“这个孩子，如此脆弱，又如此坚强……他尝够了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像古代船上的奴隶似的。他被拴在书桌上，忍受着鞭子的抽打，经历着疾病的折磨，所有官能都遇到过迫害，对他来说周遭事物都令人讨厌，仿佛一支老虎钳子紧紧钳住他。他被迫将自己的身体放弃，听凭它去承受学校的种种虐刑暴政，他简直已无法再过问自己的肉体了。我们肉体上全部的最剧烈的痛苦，无疑得算是经受皮鞭的抽打了。皮鞭约有两指厚，教师用全身心的力量和暴躁，狠命地朝我们伸出来的掌心飏飏抽下。为了迎接这种惩罚，“犯人”从凳子上站起来之后，心须在同学们好奇的，并且经常带些侮辱的众目睽睽之下，来到教师的书桌跟前，而后在教室中间跪下。对于精神过份敏感的人来说，这样的开始，会更使他们感到痛苦。就象往日从囚牢中走向断头台去的前进行列，使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增加他的恐惧一样。许多人在挨打前后，都会有几声尖叫和啼哭的眼泪，另外一些人则按照每人不同的人性，用一种咬紧于关面不变色的表情来承受这份痛苦；但是，不管这孩子的意志多么强大，当他在等待第一声抽打的时候，他也不能镇压住他脸上的阵阵痉挛的抽搐。

“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殴打，蓝柏尔·路易每次都被单独地挑出来。这些殴打乃是因为在他的天性中，有一种他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特质所致。当他从自己的幻梦中，被他先生“蓝柏尔，你又偷懒了”的叫声中突然惊吓，他经常会对这位向他插嘴的人瞥上一眼，在这含有轻视的不驯服的目光下，贮藏着苦于隐秘的思想，正象蓄电池里贮藏着电一样。这种交换的眼光，肯定给他先生一阵不快的感觉，同时由于他学生眼中缄默的侮辱而使他生出怨恨，使他急着想要矫正这孩子的习性。当这位教士，首次感受到这轻视的眼光，仿佛闪电一样瞄准他的方向而来之时，他就说出了下面的警告，——正是我永身不忘的话——‘你要还这样子瞧着我，蓝柏尔，你可就要挨揍了！’”

整整这几年，这些严格的教士，在察觉巴尔扎克的内心秘密这一方面，是没有一个人做到了的。他们只是知道这是一个对拉丁文，或是生字的知识，

比别人更差的学生；而对他可能顿悟一些未经充分阐释的事物的天才，毫无发现。他们觉得他既懈怠而又漫不经心，实际上，他们却没有看穿他之所以被功课弄得焦头烂额，是由于功课太简单了；而他外表的游手好闲，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念头太多而使他精疲力尽。他的先生们并不知道这个面团团一样的孩子，早已被智慧的翅膀带走，飞到那不通风的教室之外的王国中去。在那些更小的学生中间，他是唯一在暗地里度着双重生活的人。

在他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他把书籍的世界看作了他真正归宿的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给他补习数学的工艺学院图书馆员，（这也是巴尔扎克一生之所以有一个最坏的算学头脑的原因，可能整个文艺界中，不论何处，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糟糕透顶的算学头脑了。）曾答应他，允许他把课余喜欢读的所有书籍都借出来，尽管他没有想过这个对书籍胃口很大的少年读者是如何无限度地利用他的承诺。这些书是巴尔扎克的救星。它们减缓了这些年在学校里始终压抑着他的私有苦难和耻辱。“倘若我们不可以从图书馆里得到书读，——只有读书才可以维持我们的头脑存活——这种体制将彻底推翻我们的生命。”他在教室里或广场上的实际的生活显然渐渐黯然失色，而他的书本正将他导向一个对他而言的唯一的真实世界。

“从这一刻开始，”他讲述着他的化身蓝柏尔·路易的情形，“他在吞食每一类书籍的时候，仿佛养成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无餍的饥饿。他用历史、哲学、科学、神学的作品来填满肚子。”在他上学时这些暗中读书的时间里，为他以后的无所不知奠定了深厚基础。无数的事实与繁琐，由于若有天助的机敏和快速的记忆力，都紧紧牢记在他的心里。他在描写蓝柏尔·路易暗中读书的纵情的欢乐时，就十分清晰地表明了巴尔扎克悟性的无双奇迹：

“由于阅读而使意念融会于体，在他，已达到非凡的高度。他一目可下七、八行，他的心，以一种可与他的目光的敏锐相匹配的速度。即时抓住书里的意义。一个单字常常就可以使他对整句话的意思了然。他的记忆力是太惊人了。他可以真切地把阅读所获得的意念牢牢记住，并不亚于记住那些他自己悟出来的或谈话时所倾听到的意念。说白了，他的记忆力并不是单一型的而是百型皆备——对于地域的记忆力，姓名的，说话的，事物的，以及表像的。不单是他可以记住他所要记住的任何东西，并且可以用他内在的视觉，把那些曾经真实呈现在面前的形态，姿势，色彩，全都触摸一遍。甚至于有关他理解能力方面的不可思议的发展过程，他也具有同等的奇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记忆力在回顾方面具有一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力量，用以回顾他的心灵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并且可以回顾到曾贡献给他心灵以完整意念的整个活动过程——从进到他内心的最初思想到他心灵所获得的最近的意念，有最丰富的，也有最单一的。他的大脑，从早年就熟悉了这种可以把人类能量集中起来的复杂功能，目前便从那个富庶的贮藏所里吸取了一大堆丰富的思想，——它们是如此的清晰和新鲜——来组成他心灵正在活跃地沉思时的一种滋养剂。十二岁时，他的想像力，因为不断使用的刺激，已发展到了顶峰，让他把所有仅从书本上得到的事物的概念，拟构得非常真确，以至于那些事物的影响呈现于心中，即使在事实上真看见了它们，也不见得会清楚。他可能会由举一反三而理解，或是天赐予他一种“天眼通”的本领，让他理解了大自然全部的奥秘。

“‘当我看到有关奥斯特里兹战役的描写时，’有一天他向我说道，‘我看见了所有发生过的事。连珠炮声和士兵的呐喊冲杀声震荡着我的耳鼓，一

直打动了我的心田深处。我能闻到火药味，听见马的疾驰，还有士兵们的各种声音。我注目着两个武装民族正在酣战着的平原，就象我在散登山上伫立，看到出现于我眼前的场景，仿佛读了默示录中的一节那样触目惊心。’ ”

“ 当他身上每一根纤维都集中于自己所读的书籍上面，就仿佛已把肉体存在的知觉失掉了似的，只任凭着他的内在智慧而活着，他这内慧的领域如此广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简直‘ 遗世而忘我 ’ 了！ ”

可是在他如此茫乎若迷地神游于永恒世界之后，偕带着精神狂欢之后的疲惫，这个困倦不堪的孩子仍然要穿上自己深恶痛绝的僧侣服饰与那些村童们为伍。（他们愚蠢的脑子，正在吃力地孜孜从事着追随的老师的讲道，正像他们尾随着犁耙。）在他的心灵依旧被自己个人问题兴奋着的时候，他早已被人期待着保持他的注意力，使之限定在“ mensa, mensam, mensal ” 的语尾变化和拉丁文法的规则上了。凭着他卓越的才识，他只要通读一遍就可以把一页课文记住，他就可以不用费神去听老师的多余功课，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寻找书里的意念了。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表示轻慢，这种轻慢使他花费了一笔巨大的代价：

“ 我们的记忆力真是太好不过了，所以我们从不为我们要准备的功课发愁。我们往往只要听同学们背诵法文或拉丁文的片段，或者背一背语法规则，就可以让我们去照样背下来了。但如果运气不好，有时候老师一念之下心血来潮，把经常叫号的顺序给更换了，不是先让别的同学来读，而是先把我们叫起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连功课是什么都一无所知。最巧妙的借口也抵挡不住迎面而来的呵斥，但是倘若这种呵斥不是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最后一刹那，我们是一般不太会去注意它的。如果有一本我们就要读完的书，或者让我们自己消失于幻想之中的时候，这场呵斥就会被遗忘，但是这样就会弄出更多的受处分的功课来。 ”

这个早慧的孩子一直有增无减地受到苛刻的惩罚，待到最后，竟然连木袴这样一种中古时代的枷架，是李尔王用来惩罚善良的坎特的家伙——都没有将他饶恕过去。一直到他的精神崩溃——这一使他以僧院式的学校里逃离苦海的病情，始终没有被人察觉——才促使他离开了他童年时代的监狱。在那儿，所有身心两方面所遭受到的苦难，他都一一未能幸免。

在他的精神奴役尚未解放之前，在蓝柏尔·路易的“ 智慧史 ” 上，曾有一段小插曲，此事极有可能确有其事。巴尔扎克描写他的第二个自我，这想像中的蓝柏尔·路易，在十二岁时就写下过一篇《意志论》。这是一篇有关“ 心理与肉体之间的关联 ” 的哲学论文。有一些喜欢恶作剧的同学，因为对他那种“ 贵族化的沉默 ” 怀有忌恨，就从他手中把论文抢走了。所有教师之中最令人害怕也最铁面无私的人——可怕的奥古尔神父，是他少年时代的太岁星——听到了喧哗，便把这份手稿缴了过去，交给了收购废纸的小贩，而“ 根本无法知道这科学宝藏的重要性，就这样将胚胎小产消灭在无知的手中。 ” 这一幕的详细过程，是写得很生动而且很真实的，还描写了这个受气的孩子无力的愤怒，看上去不可能是全部虚构的。但是，到底是巴尔扎克在童年的创作尝试里，曾经领教过这一体验呢？还是在他那样的小小年纪，真的写过这么一篇《意志论》，将里面的意念和法则阐述得如此详尽呢？还是他对作品的产生是如此早悟，以致于在那时，就敢着手于这一类的著作呢？到底是巴尔扎克，真有其人的那个称之为巴尔扎克的孩子，写出了这篇论文呢？或者只是他想像中的精神上的弟兄，那个虚构的蓝柏尔·路易写出来的

呢？

这一切如今都已无法寻找到圆满确实的答案。但可以断言的是，在巴尔扎克小时候——因为一个思想家基本意念的焦点，一般都是在他发育的年纪就可以看出的——他的确想过要撰写这样一篇论文。那是在他把自己的《人间喜剧》里的人物所描写的人类意志之组成以及强烈的冲动力的无数状态，给予定型之前的事情。否则，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驴皮记》里，也有一位全力以赴地写作《意志论》的主人公，就实在太巧合了。这个想要发现“将使我获得荣誉的一般法则之定律”的计划，肯定是支配巴尔扎克小时候的中心意念。而且我们只能靠比猜测更肯定的道理来设定它，他之所以要从事研究“精神物理学”在身心之间有所关系的第一个刺激力，也许就是在他上学时一开始就碰到的。

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的一个叫做戴赛因的先生，对于麦斯梅与高勒那种曲解的学说的魅力，十分倾倒。他是一本名为《建立在才能与身体组织的基础上，对精神人之探究》一书的作者。他时常将自己对该问题的意念告诉给他的学生们，并且把班上唯一有天赋的孩子试图成为一个心理学家的理想给唤醒了。那时流行一种“权威的有动能的物质”概念，是为了适应他要发现一个规律的不自觉的追求的。而这个规律，是处于表面上处于无序状态的宇宙背后的。巴尔扎克的一生，被无法遏止的无穷的心理现象搞得非常困惑，他在写作《人间喜剧》的很久以前，就试图将这个庞大的浑浊世界变为外表有秩序的制度，并将它的法则与成分编制成表格，用来把那些作为精神活动的基础的状态树立起来，仿佛居维尔所作的有关野兽的比较解剖学上的分类一样。但对于他是不是在这样小的令人无法相信的年龄，就已经决定了写作的志向，我们当然不能证实。因为在蓝柏尔·路易的《意志论》里所指出的那些令人费解的原理，并不是十二岁的巴尔扎克所说的那些原理，却已被事实证明：原先这一段东西是这本小说的初版（一八三二年印）里所没有的，只有后来再印时，才以一种临时增加的方式插写了进去而已。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目睹他父母的家庭，是在他十四岁突然离开学校之后。以前，他的父母亲只有在偶尔探亲时才接见他，但现在突然发现不论外表和内心他都彻底改变了。一个胖乎乎的，健壮的，脾气开朗的“又肥又大的孩子”，在经历六年多僧院式的苦修训练之后，竟成了一个形容枯槁，敏感而紧张的少年，有着一双大而惊惧的眼眸。他回到家中的神情仿佛一个受过一场怕人的而且一言难尽的经验，他的妹妹后来回忆他的举止，说他仿佛一个怔忡的梦游之人，在茫然的凝视中朝前摸索着行走。有人向他说话，他也似乎听不见，只是一如懵懂之人坐在那儿。由于他的这种将自己隐秘的优越感躲藏起来的拘束态度，使得他母亲极为恼火。可是，正象他一生之中所有的关键时刻一样，终于他在遗传上所获得的蓬勃生气，又一次占了上风。这样他就又重新成为了一个快乐而健谈的人，但是由于在事实上未免快乐而健谈得太过份了，使得他母亲还是大为恼火。

为了弥补他所受到的教育上的不够，他又去了杜尔的一所中学，直到一八一四年底，他的家庭从杜尔搬到巴黎，他就又转进了黎毕德先生的寄宿学校。黎毕德先生，是巴尔扎克父亲的朋友，当年大革命时代的同志，那时老巴尔扎克是巴黎过激派市参议会的参议员。而这位先生在历史上还有一定地位，他是当年设法从巴黎的公西那惹利监狱里搭救玛利·安他涅特王后的领导者之一。如今他只是一个教育机构的不负众望的首脑，致力于帮助青年学

子们通过他们的考试工作。在这个寄宿学校里，同样没有人对这孩子惠予他所渴望的爱怜，他就又一次被这种摈逐与弃绝的感觉给纠缠住了。他在《驴皮记》里将下面的话由另一个影射自己的人物拉发埃尔的口中吐出：

“在家里，我处于家人之间，和在学校所遭遇的痛苦，如今，当我寄宿于黎毕德学校的时候，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下，又一次感受到了。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的父母亲，以为我有吃有穿，脑子里堆满拉丁文与希腊文，他们就可以心满意足了。住在寄宿学校，我结识了很多同学，但我怎么都回想不起来有谁象我这样，有着一对从来不关心自己孩子的父母亲。”

在这所学校，巴尔扎克依然无法使自己出类拔萃，做为一个“好学生”，这当然完全是因为他内心的叛逆结果。没办法，他的伤神的父母又将他转到另外一所学校，在那里，他的成绩依然如故。一个班约有三十五个学生，他的拉丁文考试排在第三十二位，他母亲原先就疑心他是个废物，有可能成为一个无用之辈，现在她的疑心被证实。于是她对这年仅十七岁的孩子，使用一种泪眼婆娑的，感怀伤命的语调，（这语调一直使他心灰意冷，那怕他到了五十岁时还这样。）写了一封“十分标准的尺牒”给他：

“亲爱的奥瑙利：

我实在无法寻找更有份量的语言来表达因为你而给我造成的阴郁。你真是太不懂事了，尽管我为我所有的孩子耗尽了我所能作到的一切，而且我是多么渴望你们可以使我欣慰一些的！

那位令人尊敬的，善良的让赛尔先生对我说，你的拉丁文翻译课竟然降到第三十二名了！！！……他还说这些日子你还是很捣蛋。所以，全部的本来有所指望你带给我的未来的快乐，如今都将毁掉了……

本可以明天八点钟我们见见面。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而且可以认真地谈一谈，双方讲讲各自的事情。但你如此个思上进，毫不检点，荒芜学业，使得我只能任你去承受你自己应得的惩罚吧。我的内心如今是这样的空虚啊！我的生命旅程看上去又是多么遥远啊！你在学校有着如此不好的名声，可我至今还在瞒着你的父亲，如果他一旦知道，你星期一就不太可能出得来，尽管你离开学校是为了一个有益的目的，但决不是只为了你个人的快活。教跳舞的先生明天四点半来，我会派人去接你，只要学完跳舞再送你回去。倘若我不这样对待你，我就算是对你不尽责了，这责任是由于爱我的孩子而加到我自己身上的。”

但是，下管他母亲有多少不好的预感，不管她怎么样把呵斥堆到他身上，他却竟然可以差强人意地应付功课了。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四日，他以一个法学系学生的资格进入了大学。这一天，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四日，自然算是代表这位年青的大学生奴役期满，与透出了自由曙光的日子。他将可以用一种自主的意志去努力奋读，而且把余暇用在他所喜欢的事情上。但他的父母亲却颇有另一番想法，以为年轻人是不应该有空余时间的。在他的时间里，没有一分钟可以当作空闲的时间，他应该去挣钱。白天在大学里偶而听听课，晚上读读六法全书，已经足足有余了，白天他应该再找个职业做做。为了应付未来的生存，是一点点时间也不可以浪费的，一文不必要的钱也不要乱花。从此，他便边上课，边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做苦差事，当一个书记。这位律师，他的第一个雇主，德·麦尔维耶·居扬奈先生，却是一个令他满心佩服的人，也就是后来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把他写成戴尔维耶那样永垂不朽的人物。这是由于这位律师知道这位书记性格的才智，并巨慨然地和这位年青人

建立了友情的原因。

两年之后，巴尔扎克被人介绍到一个叫做巴赛的录事那儿去。（他是巴尔扎克家人的故友）在此为他将来成为一个遵循守法的公民作准备，看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一月四日那一天，奥瑙利总算如释重负，取得了学位。于是他马上要去担任这位才德孚望的律师的助手职务，一旦主人巴赛退休或去世，他的青年助手将可独揽此职。那样他还可以结婚，——当然，对偶必须是一个有优越地位的阔人家——最后就可以给他多疑的母亲，所有巴尔扎克和萨郎比那两家家族，还有他的所有亲眷等等，都加添光彩。在他的传记里的一些事情，作为一个惯常的资产阶级的表率人物，是决非弗罗拜尔不能写的。他也许会成为弗罗拜尔笔下的布瓦尔先生或白居晒先生第二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始终抑制着和压制着的反动的火焰，在巴尔扎克心中熊熊燃烧起来。一八一九年春天，有一天，他猛然从律师事务所的凳子上跳起来，将所有摊在桌上尘封的案卷全部弃捐不顾。对于没有一天自由和快乐生活的日子，他已经过够了。第一次在有生以来他昂起了头，毅然用他的意志去反抗家庭的意志，毫不费劲地宣布他不管怎样，都不打算再当一个录事，律师，审判官，或接受任何机关的职位；事实上，他已经不想再从事任何资产阶级的职业了。他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而且靠着他将来的伟大著作，去得到他的独立自主，财产，与荣誉了。

第二节 对命运过早的追问

“忧患足以催化人的衰老！……你是无法想像我从出生直到二十二岁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的！”——一八二八年致德·葛朗台公爵夫人书。

奥璁利突然宣布他想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去做律师，这一下沉重地打击了他的家庭。他竟然要扔掉一个有足够保障的职业！一个巴尔扎克家族的子孙，一个受人无限尊崇的萨郎比耶家族的外孙，居然要倾全力于写作——一个永远没有保障的手艺？他能从哪儿获得一笔安定的、可信的收入？文学！诗！这可以是夏多勃里昂子爵沉溺其中的无用废物，因为他在布列塔尼有美妙的房产；或者德·拉马丁先生或是雨果将军的后裔也可以从事这项工作；可是这绝不应该成为一个中产家庭的平常子孙的工作！无论如何，这个不肖子孙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显示出一丁点哪怕是蛛丝马迹那样的文学方面的才具？又有谁读过他发表的简洁的文章？地方报纸上可曾见过他的诗？不，从来没有，在他上过的任何一个学校，他的名次永远在垃圾堆中，拉丁文考个三十二名，至于数学的成绩根本拿不上桌面，更何况数学还是每一个愿意诚心干活的人所必须拥有的至关重要的——太重要了——学问！

同时，这个声明也生不逢时，因为老巴尔扎克正陷于连他自己也纠缠不消的财务危机中。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欧洲战争暂告中止；因此在整个拿破仑时代大发战争财的小吸血鬼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被荡涤干净。对他们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好日子。老巴尔扎克八千法郎的丰厚薪水被削减为极其微薄的低薪。杜麦银行清算事件，加上其他投机的失败，使他益发窘迫。但这个家庭生活得依然还够舒服的。而且，如后所闻，还有好几千款子是以备不虞的。但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他们严格遵守着一条超于任何国家法律之上的不成文法：“当任何一笔收入减少时，必须立即以加倍的俭省来夺回他。”因此，巴尔扎克家放弃了巴黎住所，搬到维尔巴的西——一个距巴黎约二十公里的小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尽量不显眼地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但这唯一的时机，居然被他们毫无头脑的儿子选中。他们本来希望他从此能够独立生活，但他现在居然使人大吃一惊，宣称他不仅要成为一个作家，还要求父母保障他这种游手好闲的作家生活。

那肯定不能迁就，这一点，他的父母是完全一致的，并且还联合了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来支持这一举动——当然，那些人也同样一致地公开对这个废物少爷出格狂想。老巴尔扎克算是对此最心平气和的一位了，他不喜欢被家庭琐事所困，所以他只是嘟吹了一声“什么不是随他”而已。他本人就是一位老牌冒险家，也是一个出奇制胜的人，他的职业走马灯似地变换了十几回，直到晚年，他才安居在布尔乔亚的舒坦生活中，所以他无法由这个特立独行的儿子和他的狂想上引起丝毫愤怒，奥璁利最钟爱的妹妹罗尔也悄悄地站到他这边来。她罗曼谛克地仰慕着诗歌，而且认为如果她拥有一位名人哥哥，其虚荣心就会得到满足。虽然女儿的梦中以此为荣，但在那位俗气的母亲看来这却是一件垢深莫大的耻事。一旦她的娘家人听到这个该死的消息，说是出于萨郎比那家族的巴尔扎克夫人的公子成了一个作家或是某报撰稿人了，那她如何在人前仰起那并不——从不低贱的头颅？资产阶级普遍地深深厌恶任何缺乏安定根基的生活方式，她正是带着这种念头加入争执中。不成！绝对不成！这个慵懒的下流种子，在学校里就是不成才的坯子，坚决不能允

许他沉面于这种无法填饱肚子的痴人怪梦中！决不能把血汗换来的金钱白白支付他学法律的学费，从现在起一切荒唐无稽之谈都结束，并且永不再提！

但是这时，她居然也第一回碰到了阻力，她无法想像她忠厚而慵懒的儿子身上竟会爆发出如此大的抵抗力——这种百折不挠，无法动摇的，为德·巴尔扎克·奥瑙利所特有的毅力！既然拿破仑皇帝已流放海外，那么在欧罗巴大地上就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他巴尔扎克要做，那么这件事的唯一道路就是成为他面前的现实。一旦他下定决心，任何不可能的事都可以做到。哭诉也罢，劝导也罢，哀求也罢，山崩地裂的震怒也罢，一切都不可能使他改变主意，他已决定成为一位大作家而决不是律师——那么，世界就是实现自己欲望的证人。

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这个家庭达成了小资产阶级独特的拆衷。这是一个建立在完备基础上的很好尝试。奥瑙利可以走他的路。他们愿意测试一下他的才干，看他是否能如他所想成为一个名声大噪而有深刻内涵的作家。但这条路怎么走法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家庭对这项前途未卜的投机生意只能下一个极小的赌注。父母可以在未来两年内向他未经证实的能力付一点补贴，倘若两年期满他未能如愿，那就请他毫不迟疑地回到律师事务所中去。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掐断这个浪荡子的生活来源——尽管很少。

父子们签订了奇特的合同。经过周密的计算，按最低生活标准，父母同意每月提供一百二十法郎即一天四法郎，作为他们儿子在未来跋涉中的给养。这应该是老巴尔扎克一生最得意的买卖，它比他曾经签订的任何军需合同或投机生意得利都要多的好事。

在比自己更为坚强的毅力面前，固执的母亲第一次被迫让步，我们可以想像她在作出这一让步时的巨大失望，因为她十二万分地认定儿子正把自己的一生往一辆奔向悬崖的马车上拴，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令人尊敬的萨郎比那家族隐瞒了奥瑙利丢弃高贵的职业而妄想自食其力的愚蠢事件，为了掩盖她将去巴黎的事实，她告诉亲戚们，出于健康的考虑，他已到南方和一个表兄弟暂住。她热切地希望他很快把这荒唐岁月当作过眼云烟轻轻抛却；或者，她的不肖子会迅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这就不必使任何人知道他的出走——这实在是一次可能损毁他的名节，影响他的终身大事，并会失掉律师事务所主顾的出走。

为了预防万一，她悄悄地执行她的计划。因为爱抚与哀求，都无法阻止她的犟儿子专心于这项有辱门风的手艺，一切都归于无效，所以她必须用狡黠与毅力来制服他，她必须使他忍饥受冻然后改变他的宗旨，使他体会到家庭的温馨逸乐而律师事务所的火炉又是如何的温暖，一旦他在巴黎揭不开锅，他狂妄计划的大厦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当顶楼寒冷空气冻麻他手指的时候，他立刻会停止那胡思乱想的所谓创作。于是，借口保护他的福利，她帮他在巴黎租了一间房子。正是她租的这间屋子，是全巴黎所有窄街狭巷中最破、最旧、最糟糕的住处。她明显的是要软化他的决定、摧垮他的毅力。

莱斯堤居尔街九号的房子很早就被拆除了。这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在巴黎再也没有更好的纪念物能比得上这凄苦的顶楼，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它——在纪念狂热的自我牺牲方面。在《驴皮记》的描写中还能找出它的影子。一间黑窟窿、充满怪味的楼梯间，爬过五层楼梯来到一扇早已朽坏，用几块木板拼成的门前。进门后，在黑暗中摸进一间冬寒夏热的低矮阁楼，没有任何人愿意住在这种“洞”里，尽管房东太太只要象征性的租金——五法郎

一个月，一天才三个苏。但是，未来作家的母亲为了使儿子厌恶他的职业，恰恰看中了“这间足以与威尼斯铅顶屋子相媲美的洞窟”。

“没有东西比这顶楼和它又脏又黄直冒穷酸气的墙皮更令人讨厌了。——屋顶差一点斜压在地板上，穿过这瓦缝就能清楚地看见天。……这破地方一天住掉我三个苏，而夜间的灯又烧掉另三个苏。我必须自己整理房间，因为洗衣一天要花两个苏，实在无法支付，所以只穿法兰绒衬衣。因为用煤升火；按一年煤钱平均计算，一天大约要烧掉两个苏……上述开支总计不超过十八苏，留两苏以备不虞。我不记得在寄居阿特斯桥的漫长的艰难时日中曾付过用水的钱。清晨，我从圣米切尔广场把水弄来。……在开头十个月的苦修生活中，我就这么在贫苦而孤独的生活中求活，我兼为自己的主人与奴仆，正是用无法描述的勇气，我过着戴俄金式的生活。”

巴尔扎克的母亲胸有成竹，当然不会把这间小屋布置得更为舒服，她巴不得这种艰难生活能在转瞬之间把她的儿子赶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她只是向巴尔扎克提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来充实他的顶楼，这都是些从杂物堆中淘出来的：一张平板硬床，“像个哀怨的支架。”一张盖着破烂皮革的橡木桌子，外加两把椅子。仅此而已。睡觉躺床上，工作坐桌旁，剩下的就那一点坐的地方，他最希望得到的是允许他租一架小钢琴，但遭到拒绝，几天之后，他只得向家中乞求袜子和手帕。但当他搞到一件雕刻和一面镀金的方镜时，他母亲就致信罗尔，要她责备哥哥的铺张行径。

然而，巴尔扎克的想像力却超过现实上千倍，他把强烈的观照聚焦到外观最不美妙的事物上，并且提高一切可嫌恶的事物的身价。乃至他从“洞”中见到的凄凉的巴黎景色都能使他大感欣慰。我们不妨再看一看《驴皮记》。

“我想起，我高兴地把面包在牛奶碗中蘸着，那时我在窗前自由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在我面前展现着一幅由那些覆盖着绿或淡黄苔藓的棕色，红色，浅灰色的瓦或石板的屋顶所造成的风景，首先投入我眼中的远景是如此单调，然而我还是很快发现了这当中蕴含的美，余辉闪烁的黄昏和不合扇的百叶窗勾勒成一个个黑洞留在奇特的风景中，或者路灯闪着无力的微光，穿过雾纱，把一丛丛凹凸的屋顶投影在便道上，画出一片建筑物垒出的隐隐的海。在这膝陇原野的中央不时浮现出几个独异的人影。我看见在一个屋顶花园的花间映着一个正在洗菜的伛偻老妇人瘦削的身影，一个正在梳洗的少女的剪影出现了，她大概没有想到会有人隔着一户顶楼破碎的窗根在注视着她吧。我只能隐约看见她美丽的前额，和动人的长辫子，它正被修长的玉臂引入亮处。我高兴地凝神注视着那些屋顶上旦生夕死的植物，那些只要一阵大风就被吹得这么高的乱草，我研究了那些苔藓和它们被雨滋润后的颜色，它们在阳光下变得象带着怪异阴影的干棕色天鹅绒：到了最后，那些充满诗意的，转眼即逝的，书中的印象，烟云的哀愁，日影的实现，夜色平静的变化，日出的神秘，屋顶的炊烟——所有的存在，一切自然界中奇妙变幻的事物，最终都为我熟悉使我欣喜，我居然爱上这囚室了。我之所以住了下来是因为我高兴，巴黎的荒原就这么由这些枯燥的屋顶构成，它伸展在生命的深渊之上，它是浩渺无垠的原野一直伸进我灵魂深处，与我的玄思在空中共舞。”

在晴天，他允许自己顺着布尔东大马路向圣·昂特纳镇踱去，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因为这是不必花钱的，并且是他唯一的快乐。这短暂的徜徉成了

一剂活跃剂，也是一种精神放松。在《卡因·法西诺》中，他写道：

“只有一种热情能把我从研究工作中拉出来——但这不恰好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吗？我开始观察城镇的行动，它的住户，它的角色。我象当地工人一样穿着破破烂烂，毫不在意自己的外表。这样混迹其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他们不向我隐瞒任何行动，我可以参加他们的组织，看他们购物，听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聊，很快我养成了观察的直觉，我把握住了她们的脉搏，这并不影响我观察他们的外表，或者干脆说，我完全掌握他们的外表，以至于我可以从内心把他们看清，我可以分享每一个被我研究着的人的生活，就如同我正像他们那样过着日子，这是观察赋予我的才能。这样，我就能轻易地立身于他人的地位，这就象《天方夜谭》中的托钵僧人一样，对谁一念咒语，他就可以从外貌到内心完全变成那个人。

“我理解这些人的行为，我偏护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感到肩头披着他们的破衣，脚上穿着他们的破鞋走路；他们的欲望与苦难渗入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灵魂走进他们的欲望与苦难中，这就像一场白日梦。我象他们一样对虐待他们的雇主勃然大怒，或者对那种恶劣的手段大发脾气——那是强迫他们付出若干倍于工资的代价的手段。我放弃自己的习惯而用狂热的精神力量把自己的性质变换为他人的，并且象做游戏一样随意玩弄这一切——我这样来娱悦自己，是谁给了我这样的天才？是“开天眼”呀？还是那种一旦被滥用就近乎疯狂的气质？我只是占有这种力量而且充分利用它，而从不考虑其来源。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把许多错综复杂的集群——所谓的“人民大众”——的若干因素分解而成众多成分。我分解他们，作出对他们气质好坏的判断。我很清楚这个镇子对我的重要性，这个革命的蕴蓄地的一切都陷于忧患之中，无论它的英雄，发现者，有实际经验有智慧的人，无赖与罪犯，美德与恶行，统统为贫困所压倒，沉溺于酒精中毁灭在白兰地里，你是无法想像在这苦难的城市里，有多少数也数不清的奇闻轶事自生自灭而未曾被人发觉！有多少被人转眼忘却的戏剧！空想是永远无法洞悉这些隐藏人间而极少被发觉的事实的。一个人必须深入其间才能发现这些卓越的戏剧，悲剧或是喜剧，这些时间造就的杰作！”

他自己的世界只需要房中的书，镇上的人，一副洞察一切——从内到外——的眼光就足够了。巴尔扎克一旦进入创作，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真实存在了，除了他自己在纸上创造的东西。

在他艰难然而总算是买到自由的头几天，巴尔扎克着手准备将供他创作用的可怜的住所。对于亲自动手粉刷糊纸装修破烂的墙壁，他并不介意，他把带来的几本书摆出来，又从图书馆借了几本。可能造就未来杰作的白稿纸堆成了精致的一叠，再削几支笔杆，为了给他未来辛苦工作的无边黑海照上一丝光，又买了一支蜡烛，烛台是一只空瓶子做的，还有一点可怜的灯油。

万事俱备——只有一件不能算根本不重要的小事恼人：他还没想到自己将要写什么，尽管他自认大有希望。在一个本能的念头中爆出了他那惊世骇俗，立志埋头创作，不出佳作不离“洞穴”的决定，到了现在，准备开始写作了，他却没有一个工作计划，或者说，他还倘佯在上百种正在酝酿着的计划中，直到二十一岁，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或者说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哲学家、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抑或是科学家，他认识到自身内在的力量，却不知道到底该在什么事上释放出来：

“我意识到自己心里有这么一种信念：我有一个要表达的意识，一个等待架构的系统，一种需阐述的学术。”

然而他的天才究竟该向什么意念，什么系统，什么文学流派，去志诚奉献呢？尚未发现心灵的磁极，那么意志的罗盘指针摇摆不定就是正常了。他带来的草稿没有一篇是完整的，全都是片断，细读下去，他怎么也没法从中找到走向永恒正确的大道。一部分讲义和读书札记是有标题的，叫做“关于灵魂不平的笔记”或者“关于哲学与宗教的札记”，还有一些草稿，到了今天，这当中唯一引人注目的话就是：“我将在我的悲剧结束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还有一些不成段的诗句，一首名叫《圣路易》的押韵史诗刚开了个头，还有悲剧《西拉》和喜剧《两个哲学家》的最原始的草稿。他曾计划写一部叫“Conqsigrue”的小说，一部叫“Sténieouleserreursphilosophiques”的书信体小说，一部叫“stella”的旧式小说。这中间，他曾一度起草一部滑稽歌剧，名叫“Iecorsaire”。对作品进行深入阅读后，留给他的只是失望，巴尔扎克对自己究竟该如何开始他的创作感到越来越糊涂。一个哲学体系，一部歌剧脚本，一首浪漫史诗，或是一部不朽的小说？到底是谁才能最终使巴尔扎克这个名字远布四方呢？无论如何，为了从依赖父母下解放出来，首先得写出些东西来，总要完成的什么使他成名，他以强烈的爱好——他天性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钻进无数图书之中，找一个题目去写，从前人那学一点技巧，这就是他的双重目的，他写信给罗尔说：“在我认为自己将要失去理智之前，除了深入研究并且不断发展的自己的风格以后，我不会做任何事。”

时间开始压迫他了。他在研究与发展自己的风格的尝试中花费了两个月而收获甚少。大概是担心事倍功半，他搁置了写一部哲学著作的计划，另外，他尚未发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写一部小说。那么只有戏剧一条路了。因此应该写出一部历史性的、新古典主义的本子，它必须迎合法兰西剧院的口味，就象席勒、阿尔费利、玛勒—约瑟夫、企尼埃所做的那样。于是又有几十本书被从图书馆中借了出来，放在案头研读。题目！题目！他必须找到一个题目！为此，他不惜牺牲一切！

他终于决定了！一八一九年九月六日，他写信给妹妹说：

“我终于决定以克伦威尔为题目，整个近代史，只有他能向我提供最合适的材料。我已经整个儿泡在其中，周围其他一切对我都毫无意义，自从我决定了这个题目，并且把它稍微思考了一下以后，意念充斥于大脑，思维不断被我缺乏诗情的能力所打断，妹妹，告诉你吧，你一定会吓得发抖！至少还要有七、八个月我才能把全部戏用韵文形式写下来，琢磨琢磨我的意思，然后还需要通篇考虑一下，……唉！这其中时时出现的无穷困难是你无法凭空体会的。不过，这是自然的，就是伟大如拉辛——必须给你一个正面的镜子——也花费了两年时间去推敲他的作品，任何一个诗人对此都是没有办法的。两年！整整两年呀！想想看吧，两年哪！”

不过，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缩之路：“如果没有天才，我将束手无策！”

他一定要有天才，巴尔扎克与生俱来头一次给自己规定了一件固定的工作，并且打算用他战胜母亲的意志去搏一回，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它，只要这种毅力发挥出来。巴尔扎克命令自己写完《克伦威尔》，因为他已下定了写完的决心，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个必须写完的原因：

“哪怕我在整个试验中失败，我也一定要写完我的《克伦威尔》。我必须做出一点成绩来，好让妈妈向我问询这些日子是如何消磨时，有所交待。”

疯魔一样的动力把巴尔扎克推进他的作品中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的动力就连他的死对头都该不置他词的。他第一次投身于僧院式，乃至像屈拉比教派那样的严格的隐居生活——终其一生，他总是在工作紧张的时候严守这样的隐居生活。他经常三四天不离开屋子，没日没夜地在案头笔耕。如果出门的话，那也只是给他疲劳过度的神经补充一点刺激——买些咖啡，添一点面包、水果。冬天步步逼近，他一向对寒冷敏感的手指，在这没有火炉、四面透风的顶楼上，很有冻僵麻木不能写字的危险，但他狂热的意念力是永不退却的，他坐在桌前，两脚盖着父亲的旧毛毯，一件法兰绒背心护着胸部，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工作岗位。而从妹妹那儿讨来的“旧披肩”，此刻就裹在肩头，又央求母亲织了一顶帽子。他能一连好几天不下床，继续写他伟大的悲剧，这样可以节省易贵的燃料。这些作家经常面临的困难当然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但灯油的开支却使他忧心冲冲。下午三点钟他就必须点灯，因为白天越来越短。不然的话，无论白天黑夜，对他的工作都是无所谓的。

整个创作季节里，快乐、女人、饭馆和咖啡馆都离他远远的。没有任何东西能稍微松弛一下他的过于紧张的神经。天生胆小（他很长时间摆不脱这阴影）使他不敢与女人为伍。因为知道自己笨手笨脚，在好几个寄宿学校里，他只和男孩子们来往，他不会跳舞，不清楚上流社会的生活法则。他的穿着过于低劣，因为父母对他太吝啬。虽然已经成年，可巴尔扎克的体型却和他不修边幅的外表一样糟糕。当年有个熟悉他的人。曾这么写他：

“巴尔扎克当时是特别地，非常惹眼地面目丑陋，虽然小眼睛里时常眨出点聪明，一副低矮肥硕的体型，乱蓬蓬的头发，骨架粗大的脸，一张大嘴里尽是参差不齐的牙齿。”

他恨不得一个苏当三个花，那么广交朋友的先决条件他就不具备。至于咖啡馆，他除了子立门外，对着店里的玻璃窗照见自己饥谨的面孔，只能看着青年作家与新闻记者在里面聊天，饭店当然也不允许他进去的。这个繁华都市所拥有的一切娱悦与华丽，每一件动人性情的东西，乃至最短的小憩，都与这位住在莱斯堤居尔街顶楼上的苦修士无缘。

只有“小达伯来恩”——对这位苦修作家偶尔有点兴趣。这位以批发铁器为业的可敬的商人是巴尔扎克家的老朋友，他常主动关怀这位可怜的文学人。渐渐地，他们结成了忘年交在孤独的作家和老人之间。这位可敬的市民对文学怀着崇高的敬意，尽管他只是位城郊小贩。他经常在结束了一天铁器买卖的刻板业务之后，领着年青的作家去看场戏，法兰西剧院就成了他的礼拜堂，每当这种晚上，总要饱吃一顿再去欣赏拉辛华美的诗剧，这无疑是对感恩戴德的作家的身心补充。

小达伯来恩每周都要艰难地爬上他的被保护人的阁楼，以陪着巴尔扎克浏览拉丁文练习来自修。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家庭中看到的只是一钱如命的吝啬本能，还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的小野心，在小达伯来恩身上，他看到的是无形的巨大道德伟力——像小达伯来恩这样的中产阶级平常人物是经常从这种伟力中找到活力的。这种活力，比任何一个职业演说家或者枪手们身上显现出来的，都纯洁得多。后来，巴尔扎克在《毕罗多·恺撒》中吟诵《群歌之歌》赞颂诚实的市民生活时，他满怀感激地向第一个支援他的人致敬，为此，他特加了一节。正是这位朋友理解与解决了他青年时踌躇不决的痛苦，以他

“既不纹饰又不夸张的实实在在的同情心”。在那位谦和平易的皮易诺尔律师的性格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小达伯来恩的影子。尽管日常琐事囿狭了小达伯来恩的眼界，但他比巴黎的人群、比文学批评家、比世上常人早了整整十年认识到巴尔扎克是个天才。

内在的犹疑使巴尔扎克痛苦万分，小达伯来恩虽然时常能够弛缓他表面的紧张性，对此却束手无策。巴尔扎克必须不顾一切，在几周以内完成《克伦威尔》。所以，他疯狂地写啊写，太阳穴悸动，手指发烧，迫不及待的疯狂爆发了。然而，每当他消除疯狂，清醒过来——这对一个缺乏良师益友、早创未就的青年是可怕的东西——他又会产生种种困惑，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才干，对于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作品。他经常扪心自问：“我的能力够吗？”他在一封信中恳求妹妹不要再给他任何赞美，以免使他迷惘：

“我以手足之情恳求你，今后再谈到我的作品时，千千万万不要再说‘挺好的’，收起一切赞美的话，只要指出我的缺点。”

年轻人的锐气决定了他不会生产任何平庸或陈旧的作品。“滚得远远的吧，油腔滑调。一个人只有成为拉辛或格莱彻那样的伟大人物才行！”

的确如此：每当他置身于自身文学才干如燃起的熊熊烈火中，他总认为他的《克伦威尔》是卓越不群的，而且他经常自豪的宣称：“我的悲剧将会成为国王和法兰西民族的传世之作。一定要用惊世的杰作打响我的头一炮，否则我的生命只有搁置在这试验的沙滩上！”

但是，另一种绝望转眼打来：“我已经发现自己缺乏足够才干。因为这个问题，我的困难就无法逾越了。”他的整日苦干的确能在转瞬之间归于灰灭。因为在艺术面前，苦干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个天才抵得上全世界的劳力！”越是悲剧近于完成时，他越是怀疑他是否能成为一部杰作或是一堆废纸，因此他也越苦恼。

不幸的是，《克伦威尔》变为杰作的希望是越来越小了。这位作家走错了路，他根本不知道天才该走什么道路，又没有良师益友为他指导，那更糟。他以自己一个不谙人情世故、不晓舞台技巧的人，再添上那份还没成熟的天才去写悲剧，尤其是诗体悲剧，那没有比这个更成为悲剧的事了。对于写韵文，他毫无天赋这一点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他的诗——包括残存至今的几首诗——糟得令人无法卒读，那就毫不足怪了，对于他热情奔放的天性来说，十二缀音诗的格律句法、整齐抑扬的节奏所要求的恬静、谨慎、隐忍的气质是最相违拗的了。这于僵化的形式凝固了他的灵感源泉，而他着力于追求的古典雅韵的悲剧也就变得死硬、重复与空乏了。他的构思和创作只有在笔跟不上他的语言和思维，即他灵魂高举之时才能喷涌。从一个形像跳到另一个意像，他的想像雄浑瑰丽，这远不是讲求格律声韵，讲求创意奇巧的诗体所能羁绊的。

巴尔扎克为了取得自由和名声，忙着写完他的悲剧，也就没有功夫去分析自己的气质，只是尽快涂完他那乱七八糟的十二缀音诗的诗句。他一心想着尽快结束这件事以便让命运给他做一个裁决：他究竟是一个天才，还是应该象家庭所希望的那样回到律师事务所的火炉房。经过四个月饱含艰辛的劳作，一八二一年的一月份，草稿终于完成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亚旦岛的朋友家中稍添一点、完成最后的修正、五月份，他回到维尔己的西，已经完成的稿本躺在羞涩的行囊中，只等向父母宣读它。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已经走到面前。巴尔扎克·奥瑙利的身上能否出现一个法兰西以至全世界的新天

才呢？

父母的“问题孩子”带着他押韵的悲剧来到充满无法压抑的好奇心的他们面前。情况已经有所转机。家庭财政状况略有好转，家庭间关系也稍为融洽。这应该归功于他所钟爱的妹妹，罗尔，结成了一门高贵的婚姻——一个姓德·苏维尔的家道小康的土木工程师，令人高兴的是，他还是贵族出身，他闯过层层难关，居然一分钱的债都没负，奥瑞利的坚忍使他虽道忍饥挨饿之苦而使家庭有所感动，这种成就本身就是巴尔扎克的特性的明证，奥瑞利放弃法律事业上大有前途的工作是源于偷懒的说法，在一部已经完工的，长达两千行的稿子面前，在他写作中消耗的纸张面前烟消云散。达伯来恩关于这位年青人的艰苦生活的诚挚描述，更使父母怀疑自己苛待儿子是否由于天知的臆测而产生的。倘若能在法兰西剧院进行一场首次演出的话，那么这也可算是巴尔扎克家族和萨郎比那家族的一种共同荣誉，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他倔犟的背后，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这样居然使他母亲对奥瑞利的剧本都产生了今非昔比的兴趣，她竟答应帮他认真抄写一遍，这样可以使他在公开阅读之时不为稿本上千头万绪的修改所累，以免丧失它所应有的动人心魄的巨大力量和效果。这是奥瑞利生平第一次在家中提高了地位。

五月里在维尔巴黎西略带家庭庆祝气氛中，举行了判定奥瑞利是否拥有那分天赋的公开朗诵。为了使评判结果更为广泛和客观公正。他的父母除了新女婿德·苏维尔，还邀请了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朋友，这当中有一位纳克卡尔大夫，他后来成为巴尔扎克的医生，也是巴尔扎克的生死之交和一个颂扬者。小达伯来恩当然不能放充他被保护人的首次表演，为此他特地从巴黎坐了两小时的车——一辆咕咕作响的老式马车——赶来。

这是一场奇特的首次表演。家里郑重其事地把客厅里的家具重新作了摆布。圈椅摆成半丹形，大家渴求地坐在他面前，他的双亲，常年患忧郁症的萨郎比耶外婆，罗尔和她的丈夫——尽管他对于十二缀音诗知道得并不比其他人对他的桥梁工程知道得多。在他们当中，纳克卡尔大夫高居上坐，因为他是王家医学会的秘书，还有小达伯来恩。两个可能不太专心的小孩——劳伦斯和亨利坐在他们后面倾向。我们羽翼未丰的年青作家就坐在这群既不是专家，当然也没有充分经验的听众面前，一张桌子放在他前面，拿着稿本的小白手不知该放哪儿才好，他修饰了一下外表，大堆茂密的乱发被从前额梳到后头，象个狮子一样。像在寻找一个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一样，他那失去智慧火光闪烁的小黑眼珠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上扫来扫去。“第一幕，第一景……”他开始犹豫不决地念着，可是，很快他就加快步伐念了下去，立刻，十二缀音诗汇成一股洪流，如万斛泉源，澎湃而出，汨汨而鸣，声韵如流波一样滑进安静的会场。

那些在场的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录，特别是这次长达三四个小时奇特而有纪念意义的表演及其效果。我们无从知晓年迈的萨郎比耶外婆能否在此间保持他头脑的清醒，也不知道两个小孩是否在查理一世被砍头以前就去睡觉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听众在这场持久的表演后，对于马上就给奥瑞利的天才下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并且客观公正的判断感到窘迫。无论是一个外科医生。一个铁器供应商，还是一个年青的土木工程师、一个年迈的军需商，都不是为一部诗体悲剧优劣作出权威判断的合适的批判家。刚才听到的这么一个称之为戏剧的物件，到底是他们自己无法接受还是它就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这个疑问使他们厌烦而不敢贸然决定。鉴于大家对

此不敢确定，德·苏维尔建议把这部“新索菲克利”——象奥瑙利自我标榜的那样——的作品提交给一位权威去评判，对此，当初在昂得律先生——他工业学校中教纯文学的先生手下上课引起了他的回忆，这位先生曾创作不少诗体喜剧，大多都曾上演。他打算周旋其中。因为这是一位颇受人称道的文学史教授，同时又受聘执教于法兰西学院，所以，毫无疑问地，他是最合适的评判人。

上等资产阶级最容易被打动的就是官衔。这人既然是大学教授，又执教于法兰西学院，他一定握有绝对权威的判断力。于是，巴尔扎克夫人携女儿亲赴巴黎参谒这位先生，并恭敬地向这位自得的教授呈上了儿子的作品。教授当然很珍惜她们的请教，因为这么一来，就唤起了一个被人所遗忘的事实——他是一个为人所称道的作家。他对巴尔扎克悲剧的评语一直为世人所公认。他认为这个剧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我们应该归功于他的，还有他没有用最后判决的方式起草他的评语，否认奥瑙利的文学才华。在给巴尔扎克夫人的信中，他委婉写道：

“我非常不希望使令公子失望。但我还是认为他能够比写作悲剧和喜剧更好地利用他的时间。倘若他能够使我高兴地来看我一次，我必然会向他解释清楚我的意思，告诉他研究文学的方法，不需要以写诗作为职业，他将从文学中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巧妙合理的诉求使奥瑙利父母心中升起一点火光。如果孩子确想致力写作，又有什么不好呢？不管怎么样，一个青年人，坐在写字台前总要比在咖啡厅里闲逛，在浪荡女人堆里鬼混要高尚一点，省俭一点吧。但是，这必须如昂得律教授所正告的，不是做一个“职业诗人”，而是单纯作为一种文学嗜好，因此还必须有一个安定可靠的职业。不过，奥瑙利却清楚地看透了这个危险，虽说《克伦威尔》失败了，然而他还是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职业诗人”。上天驱使本能告诉他，这桩工作是上天所授，神圣不可侵犯，绝不能轻易地当作副业了事：

“职业是我的坟墓，我变成一个小职员，一架工作机，一匹马戏团里的跛马，在规定的时间内围场跑个三四十圈，在规定的时间内喝水、吃饭、睡觉，我会坠落为一位致力于日常琐事的人，就如常人所说的生活——像石磨般无休止地转着，永远重复相同的事情！”

尽管他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他肯定自己生来是要做件卓越的工作的。这件工作需要他全身心的力量，乃至超越其上的力量。他坚持原来的合同拒绝妥协。两年尝试期尚未期满。他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可以利用。他象一生中每次经历了重大危机之后一样，以比以前更为坚强的意志，带着当初离家出走一样的不受压抑的精神和固执的毅力，又心甘情愿地回到莱斯堤居尔街的囚室去了。

第三节 和魔鬼订立的契约

究竟有多少天，巴尔扎克一直不愿意承认他的《克伦威尔》是一个失败。他跟朋友达伯兰商量，到底应不应该把这部作品送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位受人尊敬的铁器商，与戏院有一定关系，于是请了艺人拉冯的一位朋友帮忙，请他劝拉冯接下这个作品。然后，巴尔扎克再次拜访拉冯，并尽最大努力劝说他，让他把那个剧本给剧团里的团员看一看。没过多久巴尔扎克又不同意该计划。他为何要自找其辱呢？只要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内在力量。他就承受得了重大的打击。《克伦威尔》既已脱稿，也就完事了，还是一股作气的好。他就叫达伯兰不要再活动，于是他那个稿子扔进书柜，发誓一身也不再去瞧他年轻时没有成就的一个产儿了。

他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想方设法恢复昔日的局面，以便重新开始工作。第一次的重创已经使他的矜持稍微有点收敛。就在一年前，他以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悲剧中，自己便沉缅于丰富奇特的梦幻之境。这就注定他只要一蹶便可成就自己的名誉地位以及丰裕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现在已经从高处重重地跌在地上，他心中的一切目标都应该讲求实际了。他必须独立和自己养活自己。至于什么不朽的著作，都只能以后再说了。最要紧的就是通过写作去赚钱，这些都是为了不向他的父母和祖母要求——因为他们给钱时的神情就像对待乞丐似的。他本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却因为那些令人可耻的事而放弃他的理想，不得不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行事。他打算去完成许多能立竿见影的作品。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在当时是能够见出这种功效的呢？他也不晓得。经过艰苦的探索，他找到了那就是小说。在前一个时期伤感性的小说潮流——这种潮流下曾诞生了卢梭的《新黑罗伊斯》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衰退了之后，一种全新的潮流又出现了，它首先萌芽于英吉利海峡两岸。拿破仑时代像所有战争年代一样，曾经给法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甚至是过分的神经紧张，正因为如此，他们已不容易被小说中个人命运经历所感动和鼓舞，于是一家官方刊物——《劝世报》在当时被代替了小说的功用。在和平来临与布尔崩王朝复辟之后，民众又想用小说中人物的冒险经历来刺激他们的神经和灵魂，以求得亲身经历一下极凶狠的恐怖与近于病态的多愁善感的情感。那些刺激的，浪漫的，传奇性的以及外国人的小说，群众都非常渴望一睹为快。于是许多刚开业的阅览室和出租书籍店，已经满足不了大批文学饥饿者的需求了。

许多作家一点也不犹豫在他们女巫的厨房里面，把海盗与贞女，眼泪与毒酒，血腥味与馨香气，巫术与情歌，都像揉面团似的杂揉在一起，并且把它们煮成了一个个罗曼谛克的带有广阔历史背景的面团，然后沾了一种幽灵般恐怖的冷酱汁在它们上面，最后把它们端上桌来。现在，属于那些作家的黄金般耀眼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例如像英国小说家拉德克利夫·安娜女士以及她的恐怖的志怪体小说——在那些小说里面，读者能听到像机器磨轮似地轧轧地响着。几个算得上聪明的法国人，就剽窃了这位夫人的技巧，用他们“下三滥的所谓浪漫”发了一笔横财。即使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历史背景，尤其是中世纪的背景，在当时也风靡一时。用老式的大刀与寒光闪耀的甲冑的斯各特·瓦尔特的骑士们，征服的国家与打败的敌人，比拿破仑及其利用

大炮所征服的国家和战败的敌手还要多。与此同时，拜伦的提督和海盗，凭着他们浪漫的忧郁气息，造成了人们内心极强烈的恐惧——这正如政府的一次宣称瑞沃里及奥斯特里兹的胜利那样，使人们心脏猛烈的跳动。

巴尔扎克也打算在这股风靡的浪漫风气中扬帆前进，并已想好了写一部历史小说。他并不是被拜伦与斯各特的引人注目的成功所引诱的第一位法国作家。雨果·维克多及其《钟楼怪人》与德·威各尼及其作品紧接着也在这一范围内施展其身手。因为他们是诗人出身，对于作文与字斟句酌的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相反，巴尔扎克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只能蹒跚地走模拟蹈袭的捷径。他借用德克利夫·安娜的最低劣的小说的历史背景和一个依葫芦画瓢的“那玻利式”的场景，再把那些不可或缺的全班人马（那些角色可以在一本极无聊的畅销小说中找到）搬上了舞台，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那千篇一律的女巫——“催眠的松马里地（里）方的女巫”。再有的便是诺曼底人，崇高的被套上镣铐的俘虏，以及一些伤感动人的篇章。初稿简略概括出了战争的进行，围攻，直到退守到最后阵地，以及一些不值得信赖的负伤的血流满面的英雄。就眼前作家的水平来说，这已超出这位青年作家的能（极）耐及才智。还有一部小说，也只是写了一个片段，那是用书信的格式写成的所谓卢梭体，并且写的是“意志的理念”——蓝柏尔·路易所喜爱的一个题目，遗憾的是，这只写了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底稿的一部分，安插到后来的一部小说里去滥竽充数，凑成一个部分。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失败。巴尔扎克尝试写悲剧气馁了，但是在小说方面依旧是失败。一年半过去了，那位非言语所能说服的 Atropos 在家里正在等待着割断他那纤弱的命脉。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被通知必须在一八二一年一月一日从莱斯底居耶尔彻的房子中迁出。

他不得不开始自己挣钱了！其实巴尔扎克一直在努力挣钱，的确没有别的东西比钱更使他拼命了。他为了独立自主，当他被监禁在莱斯底居耶尔街的密室中的日子中，他曾尽力省吃俭用，忍饥挨冻。然而一切都泡汤了。现在——这濒临绝境的时刻，只有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才能挽救他。

在童话里我们常常能看到，魔鬼为了收买人的灵魂，便在一个人正当穷途末路与前途渺茫的一刻，便去诱使他。对巴尔扎克而言，这诱惑决不是像妖魔鬼怪的。他可以使自己以一个既媚人又爱人的充满朝气的年青人的姿态出现。魔鬼的衣裤得体，洁净无染，而且他只是想买巴尔扎克用来写文章的手而已，绝不想买他的灵魂。巴尔扎克和一位与自己相仿的贵族青年德·来哥罗维那·勒·波阿特万·奥古斯都结识了。他的父亲是一个戏子，从他那里，儿子继承了处世的巧妙之方，并以此来弥补他在文学天才素质的缺乏。他居然找到了一家出版社，把他的一本胡拼乱凑的叫做《两个爱克多或两个布列颠的家庭》的小说给出版了。他这部作品从出版家那里得到了八百法郎的现钱。这本书共两册，署的名是“德·维尔惹莱·奥古斯都”，并且将于二月由皇家市场的书贩于倍尔发售。巴尔扎克曾向这位朋友发过牢骚，勒·波阿特万向他解释，他对文学的野心过大乃是他倒霉的真正原因，不过，这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良心与写小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认真看待它呢？这些恐怕就是这个诱惑者的理由。写小说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只要找到或者剽窃到一个题材——最好是历史的题材，因为出版家特别关切这

样的题材一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胡乱地写了几百页，并且最好是两人合作。他已经找到一个肯用他们作品的出版社，如果巴尔扎克有意做的话，他们俩就可以合伙写完一部小说。或者是另一个方法，两个人把故事情节修改拼凑一番，然后让巴尔扎克去写，因为他可以写得更精神而且更快一些。勒·波阿特万则负责营业方面的任务。只要巴尔扎克愿意，他们马上就可以开张。

这个建议是极其下流的。这就是说，同一位毫无艺术野心的伙伴合作，出版一些有一定页数的奉迎读者的小说。这和他昔日的梦想真是有天壤之别。他将仅仅为了几百个法郎而去败坏他的才干，直到声名狼藉的地步。一年以前，他曾想要使“巴尔扎克”这个名字永垂青史，并且要超过拉辛，对人类的意志进行阐释，得出其是万能的。那个诱惑者要的就是他的灵魂——他的艺术良心。但是他毫无办法，莱斯底居那尔街的房屋必须放弃，而且，他的父母也许不会再让他有第二次自由的选择了，假如他不能用自己的笔挣到钱的话。况且自我出卖性命总比替别人卖命要好得多。于是他便和诱惑者谈妥了条件：勒·波阿特万已经动笔，或者说仅仅是打了个草稿的小说雏形中，巴尔扎克只是作为一个“幕后”作家，他的名字将不会显露在封面上，虽然小说的大部分都要由他去写，至于这家新成立的“制造”小说的工厂的以后产品，则由这个厂子的两位老板A·德·维也尔惹（即波阿特尔的笔名）和奥瑙利（即汝纳男爵的别名）共同签署姓名。

于是，这份跟魔鬼签订的契约就算告成了。跟开密苏作品里勒克斯米尔·彼得出卖他的影子给魔鬼一样，巴尔扎克正在出卖他的艺术创作野心，以及他的姓名。为了难得的自由，他竟愿卖身为奴。在这以后好几年里，他的天才和大名被埋在昏暗之中，不为世人所知。

谈妥了这桩买卖后，巴尔扎克回到维尔巴黎西的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在维尔巴黎西，他搬到他妹妹罗尔出嫁前所住的那间小屋。他固执地认为，只有他挣足够钱而付得起房租时，他才再找一个地方住。就是在这间小屋里（他妹妹从前整日幻想着她哥哥将来成名的地方），他把小说制造厂设在这里了。由于托付给他的任务潮水般的涌来——这得感谢他的伙伴与代理人的有效活动——因此他整天整夜地写啊写啊，把一张张完成的稿纸摞在一块。他们配合得可真默契，简直就象钟表的各个零件那样彼此协调一致，巴尔扎克写小说，出售的任务就落在勒·波阿特万的肩上。

巴尔扎克家人满怀喜悦地看着这个事实的变化。看到头一本书八百法郎，接着又很快到开到两千法郎，他们也就不再认为巴尔扎克的职业是荒谬无意义的了。大概是因为巴尔扎克终于能够自立，而且不用再破费他们了。他的父亲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由于他的儿子显然放弃了成为名作家的想法，并用各种各样的假名来避免使巴尔扎克尊贵的姓氏受辱。这个性情温和的老绅士心满意足地说：“他的酒里已经倒了水，以免他喝得大醉，我真诚地希望他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相反，巴尔扎克母亲有一种不幸的天性，她专门于一些事来干涉她儿子的每件事情。她把设在她家里的这个小说制造厂当家庭的事务。她和她的女儿一起想成为他的批评者与合作者。她批判他缺乏自己的风格，而她的确是第一个抱怨他染上拉伯莱恶习的人。他被督促仔细地校正底稿，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他对母亲这种毫无止境的唠叨的厌烦。他的母亲总是对他的儿子焦

虑。他曾向人说：“奥瑙利对他的才干总是自以为是，这伤了每一个人的心。”他在这个家里变得越来越受限制，最后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希望在巴黎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以得到解放和自由——这就是他唯一的希望之所在。

由于自由的驱使，他像一个奴隶般地在拼命工作着。他平均每天写二十页，三十页至四十页，甚至一天写一章。然而他收获得愈（得）多，他越想有更大的收获。他写作的情形，就像一个被迫捕者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这都是为了能逃出家庭的控制。最后他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地无节制的工作，甚至他母亲都害怕起来了。“奥瑙利就象一个野蛮人在拼命，假如他继续这样干下去，不出三个月，他就会象一个肺结核病儿那样被养活了。”巴尔扎克一旦迈开了步伐，他就把他全身的精神和力量都投入到他正在从事的工作中。在三天之内，他就用完一瓶墨水，而且用掉十几个笔头。他工作时像带有一种魔力，并且这种魔力把他的同事们都吓呆了。勒·波阿特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概就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大概在一八二一年以前，他又帮他完成了一部是用“维尔茨莱”署名的小说。这部小说里面的许多章节，都是原封不动地从巴尔扎克的一部作品中抄袭而来的。同一年，另一部叫作《比拉克的嗣女》又完成了。在这部四卷的著作（中）印完以前，另一部四卷的作品《路易·约翰或拾到的姑娘》于一八二二年二月又脱稿了。直到这时，巴尔扎克对仅凭自己的劳心劳力而支撑的工厂感到厌恶了，可是他依然神速地乱写了一部用“A·德·维尔茨莱”署名的作品《鞑靼人，或被流放者的回归》。然而这部书的真正作者汝纳男爵，即使连一个合作者的名分都没得到。到此为止，先前订立的合同便宣告失效了，而巴尔扎克就把他工厂里的产品用自己的笔名出版了。他现在成了这个厂子唯一的股东，并且决心要使这个厂子成为全法兰西首屈一指的“制造小说”的工厂。他对自己能成功地聚敛金钱感到得意洋洋，便写信给他妹妹：

“亲爱的妹妹：

我现在的工作，仿佛亨利四世的马在铸成以前的情形一样。我打算在年底前搞到两万法郎，它将决定我今后的命运……

汝纳男爵不久就要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成为世界上产量最丰富的作家，成为最受人欢迎的伴侣，而且会得到上流社会女人的倾心爱情。到那时，你的亲爱的小奥瑙便会腰缠万贯地昂首直视地乘着自用马车而来。当他走近的时候，人群中就会高呼欢迎一个民众的偶像。人们也会悄悄地说：“那就是德·苏维尔夫人的令兄呢！”

在巴尔扎克拙劣的作品中，我们只能发现一样属于未来巴尔扎克的本领，那就是他写的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由他自己独立完成或是与勒·波阿特万合作的作品大约有十六至二十卷，而仅在一八二二年，他又出产了三部每部四卷的小说。他好象感觉到民众已经快识破这一切了，于是他便在这后两部书上以德·圣·沃盘·奥雷斯取代了汝纳男爵的假名。这个新名字使得出版家多付给他一笔费用。他如此急促地想一年写五本或者十本小说，这就能使他少年时候的梦想得以实现，只须几年，他就能变得富裕阔绰起来，而最重要的是，他的独立自主能够永远地得到保障。

对于巴尔扎克在这些年里不光彩的所写的。和出版的多用假名的作品，都没有详细完整的记录。而这些署名汝纳男爵及德·圣·沃盘·奥雷斯的小说，仅仅是他不道德勾当的一小部分。像以克罗特·奥诺也尔茨莱署名的小说

说《黑白种混血儿》，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写的，甚至是全部。在他二十二岁至三十岁这九年间，无论什么样式的文学作品，不论委托他什么事，不论哪种人际关系，他都不认为有损于他人格的尊严。不管是谁，只要他（给）肯付出相当的代价，他就可以廉价的出售他那署名权。这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居然肯用一种无所谓的，漫不经心的态度——那是连 Aretino 阿芮帝诺 都自愧不如地——出卖自己的手笔。他跟坐在巴黎郊外街头的公共代书人一样，虽然教育水平不高，但为了几个苏，就应过路人的请求，替他们写情书，诉讼状，申请书或恐吓信等等：巴尔扎克为那些有污点的政客，不出名的出版家，以及滑稽的经纪人，写了许多东西，只要他们高兴，什么都能写。他写了一本保王党的小文章，叫做《关于继承权》，又用别的材料拼凑成一本拙劣的《公平的耶稣会史》，另外还有一本叫作《尼哥罗》的传奇戏剧，以及一本《关于巴黎标志》的小字典。

一八二四年，这个唱独脚戏的厂子，为了适应民众不断改换的口味，就创造出了一个新鲜花样——即把产品“小说”改为生产所谓的“法典”和“生理学”。岁月流逝，这个手工工场加工出了勉勉强强能使小资产阶级人物感到高兴的一大串“法典”来。《诚实君子的法典或不被恶人欺骗的绝招》出版后接着又出了一本叫做《女人系领结的艺术》，再一本是《婚姻的法典》，这本书后来扩充为一本《婚姻生理学》。另外一本《商业旅行家的法典》对他后来那本不朽的名著《人间喜剧》（非）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法典”，包括一本《好教养的手册大全》在内，都是以瑞宋·奥雷斯的名义署名的，并且销路很不错，有几种居然卖出了一万二千册。实际上所有这些作品，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出自巴尔扎克之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充分证明的，至于他究竟写了多少小册子，我们都不能够找到，因为不管是巴尔扎克本人还是那些幕后的雇主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个不光彩的、下流的事实。我们所能够断定的是：凡是巴尔扎克在他可耻的年代中胡乱写成的数不胜数的作品，简直没有哪一部可以说与文学或艺术有丝毫的联系。而且，要弄清那些作品究竟出自谁之笔，哪一个都恐怕会羞得无地自容。

我们对这种粗制滥造的写作所能用的唯一字眼就是“拆烂污”，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拆烂污，因为那只是为了追求金钱这个目的才去做的。刚开始，他急于获得自由，后来就愈陷愈深，直到养成始终想发财的习惯。虽然他仅从小说里就可以挣大量的钱，但他为了发财，即使为了较少的报酬，他也愿意滥用他的天才。文学上的各种罪恶，他都习以为常了。简直是同时（给）卖身给好几个文学上的掮客。虽然他的《朱安党》和《驴皮记》已经使他在法兰两文坛上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时，然而为了几百个法郎，常常跑到他曾经去过的低级肮脏的地方，甘愿把德·巴尔扎克·奥璘利降低到一个极低的地位。现在，我们才从他那瞒名隐姓的外衣破缝中，知道巴尔扎克在文学活动中的罪恶勾当是毫无忌惮的。他厚颜无耻地把别人的场面与情节剽窃来据为己有，通过自己的写作来联缀成小说。他巧妙地扮演了文学上裁缝的可耻角色，把那些窃来的材料翻个面儿或是染上别的颜色。所有人们渴求的东西，不论是哲学上，政治上还是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方面，他时刻做着准备，以便迎合他的主顾的嗜好，供给他们急需的东西，并且他早已准备好了随时改弦易辙，去创作任何一类风靡一时的文字。

他诚然是当时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然而他充其量也不过是那些可耻的、偷偷摸摸的出版家，以及巴黎街头满街叫卖的书贩批发商的奴隶而已。造成这样的情形，只是由于他缺乏自信心，并且对他真正的命运大不了解了。在文学史上，甚至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居然不能免于泥潭之中。凡是陷入泥沼中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不受惩罚的。巴尔扎克始终不能够从他的小说中整个排除掉这些不良习气：毫无顾忌的描写，缺乏逼真的形象，以及粗俗的伤感气氛。特别是他神速般地“生产”小说的时候所沾染的那种仓促急迫的恶心，永远地影响到了他的创作风格。

文学会无情地向每个偶然对他莫不关心的艺术家进行报复。对于社会责任感，巴尔扎克的觉醒是太迟了。在他拼命地检讨他的底稿，字盘与版样，并且要校对一二十遍，但是想要让那些在他文章中茂盛地生了根，并枝叶茂盛的恶习锄掉，已经是为时太晚了。假如说巴尔扎克的风格遗留不可救药的缺点，那是由于在对一生有决定影响的年代里，他对自己太不忠诚的缘故。

在他热烈的心中，年青的巴尔扎克也曾模糊地意识到，他正在使其真实的自我价值贬值。在这些作品上，从来不能看见他的大名，到后来，他竟坚决地拒绝承认那些作品是他创作的，虽然他这种厚着脸皮的做法并不能使人信服。对他早年唯一亲近的人，那位忠心地支持他雄心大志的妹妹，他甚至拒绝给她看那本《比拉克的嗣女》。原因正如他所说：“因为那实在是一部下流的黄色作品。”他在跟她定下好几个条件之后才勉强同意把《路易·约翰》给她看。大家也许想得到他的理由“他这样做都是怕别个人看见这本书，并在伯约和其他地方传播开去，以致影响他的声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对其作品是没有多大信心的。合同紧紧地束缚着他，以让他以最快的速度供给印刷者最大数量的书稿。出版家只考虑他的出品数量而付给巴尔扎克薪金：而巴尔扎克呢，则是一一切都只看他到底能得到多少钱。由于巴尔扎克以尽可能的速度写作新书，因而他对于其文法的流畅、风格的前后一致性以及材料的出处等重要方面的问题，根本不关心，以至于有一次他向他的妹妹建议，由于她在家还的清闲，在他写一部作品的第一卷时，她可以帮着他同时写第二卷。瞧，我们的这位先生是多么地滑稽啊！他的工厂刚开张不久，他就到处寻找便宜的搭档，而且是和他一样地，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工作的不为外人所知晓的合作者。然而，他好象清醒了，这是他日夜拼命工作时发生的，他的尚未湮灭殆尽的良心受到巨大的刺激：

“啊，我亲爱的罗尔，我每天总是默默地祷告，让上天赐与我好运气，并且我坚信我会凭着这种自由职业发一大笔财的。然而现在，我却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自知之明，我渐渐相信，我为了在如此荒唐的事情上腐蚀我的思想精华而感到难过。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好像有个人在向我招手，只要我能够确定我的位置，我必定会安心地踏踏实实地工作。”跟他的吕崩柏礼·鲁先相同，（他后来曾把这个人物写得堕落和最后的自赎。）他感到一种像火燃烧似的羞愧感觉，而且惊恐万般地凝视着他那双像马克白斯夫人一样被玷污的双手。

“我试图凭着那股写小说的勇气来解救我自己，——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小说啊！唉，罗尔，我那些宏伟远大的计划失败得是多么惨呀！”

他现在开始瞧不起他以前写的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了。

也鄙视那些曾为他的作品到处活动的人，即使那些东西是他特地为他们

而写的。只有一种模糊的预感才给他一些力量，这种预感就是他超人的努力必定会最终有所成就，并且使他出名。正是这种潜在的预感，才使他能够忍受得住自愿出卖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悲惨奴隶生活。像前几次一样，这位最富于空想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终于被他的幻觉拯救出来。

巴尔扎克直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恋爱，并且好好地享受生活所带来的无限乐趣。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的信任和尊敬，也没有人在他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受不到尊敬的低下的奴隶，在家里受到种种约束与控制，为了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却不惜出卖他早年的人格尊严，以换取一笔供他赎身的可耻的代价。他这样做无异于从终生出卖苦力的困境中赎出自己而自己卖苦力，从劳役中解放自己而从自己从事劳役，这种悲剧性的谬论，便决定了他生活的外形与定格。他在这痛苦的恶性循环的圈子里生存：虽然不愿写作更多的作品，但是仍在写作；虽然不想聚敛金钱，但还是在聚敛金钱，并且金钱越聚越多。他为了能更受当地征服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所有的金钱珠宝，和王冠上最灿烂珍贵的宝石，即他那不朽的名誉——而现在他却把自己拒之于这个世界之外。他为了将来能纵情享受，现在被迫努力辛勤地工作。他拚命着，拚命着，拚命着，不分白昼黑夜地，毫无乐趣地拚命，目的是使他将来的生活过得更有价值。

这些都是巴尔扎克的梦想。这些狂妄至极的梦想使他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地，把体内每一点体力都用上了，这体力就是促使他工作的力量源泉。他的作品并未使他得到“伟大的艺术家”这一崇高称号，而这力量却像火山爆发似地强烈地喷射出一大堆火热的熔岩流，这东西由人性、人类命运、梦想与意念所组成。在他黑暗的地狱里，他拚命地挣扎，竭尽全力为他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以获得阳光和空气——这就是使他增加勇气并且引诱他的自由空气。他慌乱地去接触生活本身，为的是不想永远地只描摹一个虚构的生活。他已取得了完成他工作所需要的力量，而他所缺乏的，不过是命运之神给予他的福运。只要有一丝希望之光，那些处于地窖之中与温暖的阳光隔绝的一切，马上会盛开繁茂的花朵。

“我真希望神魔投射一道魔光到我这种冰冷的生活！直到今天，我还没有享受到生活中热烈的喜悦……我很饥饿，却得不到一点东西来解燃眉之渴。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爱情和名誉，这就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两个要求。然而这二者之中。我一个也没有得到过。”

第四节 爱情的觉醒

的确，这两个愿望之中，他没有哪一个曾获得过满足。爱情和名誉，这两者都还没来到罢了。他的一切空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并且使他热情的努力付诸东流。《克伦威尔》的稿子放在箱子里都发黄了，它杂夹在许多毫无价值的稿件被遗忘掉了。他用假名所出版的那些毫无价值的小说，问世不久就悄无声息了。在众多的法国作家之中，巴尔扎克·奥瑙利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及过。没有人尊敬他的天才，更何况他自己呢。他竭力走后（过）门挤进了文坛中最不光彩的一个角落，结果是把自己的身价贬得极低极低。他象一只扑在面包旁的老鼠一样专心致志地不停写作，但是这并未使他有多大的进展。即使他最有力的奋发，也并没有使他在文坛上向前挪动一步脚。

在这些年里，巴尔扎克不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缺乏勇气，而并非是缺乏力量。相反，他有的是充满激情的力量，只不过正在寻找发泄的通道。一个征服者所具有的条件，包括果敢的意志，高雅迷人的气质以及坚韧不拔的耐力，他都具备。即使在他消沉的日子里（他很少这样），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智力、学识以及勤劳等各个方面，都优越于他的所有同辈人物。可是，大概由于那些年他父母施加在他身上的威胁过于严厉，而使他的自我依靠力受到伤害，以至他的无所畏惧的精神竟不知如何派上用场。正如他自己所说：“说实在的，我有的是勇气和力量，不过它并不在我的外在形态上，它只存在于我的灵魂里。”直到而立之年，他还没有从一个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去大胆地开始和他的天才智慧相称的写作，也不曾以一个平常男子的观念，去追求女人并与之交际，这看起来的确令人费解，晚年风流成性而且急不可耐的巴尔扎克，在他的早年却几近是一个害羞之极的人，多么不可思议啊！

但是，害羞并不是由于意志的薄弱而产生的。只有面对一个内心平衡的人，才能够使自己充满自信。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过剩的精力，这个人就会徘徊于自以为是与惊恐不安之间。这位年青的巴尔扎克之所以躲避女人，是因为他害怕在女人面前暴露自己天性，而绝非怕坠入情网。加之，他的性成熟较晚，并且他说自己青春期是“不完整的”，之所以这样，他认为是“过分地工作而使之延迟”，与此同时，他只是个“犹豫着地尚未发育的柔嫩枝条”似的处男。然而这个矮矮的，胖胖的，宽肩膀的，嘴唇厚似黑人的年青人，到后来却变得精力如此旺盛，并且带着一股强烈的力量。世界上没有人所能比拟的最旺盛的性的欲望。就他个人而言，对于女人，他不需要她有美丽的外貌或青春的野性诱惑力。他就象一个特地克制自己意志的男巫，在他平淡无味的日子里，他只能空想桌上有一块面包，而在他啃着的时候，却发现他正在品尝着鱼子酱和馅饼。如此一个男人，他的欲望一旦膨胀起来，每一个女人，甚至是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令人一看见就呕心的女人，都当作了西施。不管女人的青春容颜凋谢，还是肥臀粗脖，还是女人任何其他的瑕疵——甚至像那些使得一个百般挑剔的情郎都会效法第赛富的抛弃的瑕疵——他都是毫不关心的。只要他喜欢谁，他就会去爱谁，他想要获得什么，他就无所顾忌地去争取。正如他愿意出租他的灵巧的手给任何需要的人一样，他准备向任何一个女人发动攻势。只要这个女人能够帮他独立自主，摆脱他的

第赛富的未婚妻在婚前怀了孕，所以第赛富想要抛弃她；文中所言女人之“瑕疵”即指女人无德性。

父母的控制。至于她漂亮与否，聪慧与否，他都毫不在意。像他的作品署的是假名一样，他的第一次求爱也是使用的假名。他二十二岁时，这个奇怪的理想主义者曾给他的妹妹写过一封信：

“替我留神一下，是否你能帮我介绍一个富有的寡妇？……并且在她面前帮我吹吹牛——一个出类拔萃的年青人，二十二岁，仪表不俗，一双充满朝气富有精神的眼睛。同时他还有一手做小菜的绝活。”

跟那些在皇宫的书店里所卖的书一样，巴尔扎克那时在婚姻上的要价也非常低。原因是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人。直到有人鼓励他时，他才对他个人的价值评价有所开值。如果有一个出版家或批评家赞许过他是如何的不凡，如果一个女人曾对他嫣然一笑过，他会把他的害羞一层一层地剥掉。然而名誉跟他无缘，女人也对他置之不理，于是他只好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另一种较为其次的东西，那就是金钱，以及通过金钱所能获得的自由。

也不怪女人们不给他任何特殊的鼓励与热情。一位夫人曾这样描述巴尔扎克“一个极丑的年青人”并且说他“忽略自己外表的重要性并且滥用自己的天才”。即使是认识巴尔扎克的男人们，看到他缺落的牙齿，并且一开口就唾星四射，还有那乱蓬蓬的带有油泥的厚发，以及那总是胡子拉茬的脸，都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他把他父亲的旧衣拿到托杜尔城里的一个裁缝店里去修改，可是那个老裁缝把那上衣的公牛般的颈部和宽阔的两肩改好后，却不能把腰身裁得体，同时下摆也放不下来。巴尔扎克很清楚自己的腿短和周身的笨拙，假若学着时下的浪荡子弟们的轻盈步伐，或者上舞池的话，别人看了，一定会觉得这真是滑稽可笑。正是在女人群中得不到优越感，就再而三地驱使他回到工作中和他的孤独中去了。每当有漂亮的女士接近他时，他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就怯懦地显出可怜模样，这又怎么能吸引到漂亮女人呢？比他愚蠢至极的人都能用浮夸动听的言语取悦于别人，然而巴尔扎克虽有值得炫耀的才识和情感的丰富，但他却羞得张不开口，说不出一句话，这样的优势对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他深知他的言谈比起那些英俊的，穿着得体的衣服，系着精致领带的年青人有更大的优势，虽然他们比他更善于取悦于人。同时，他的男性的原始野性与挑逗力也要强过那些人不知多少倍。在不可抑制的恋爱饥渴的驱动下，他准备用他将来的杰作，他的智慧，他的学识，去转换另一种征服女人的技巧。这种技巧运用起来可以帮助他了解，怎样用温柔的表情和耀眼的目光去拥抱一个女人，而同时能找到与女人作爱的深刻体验。然而连一点渺茫的希望都没有降落到他的身上，虽然只要有了这一丝渺茫的成功，他就可以使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去点燃、照亮整个世界。女人的飞眼从来不曾射到他身上，这就跟他的姓名对于出版家而言，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巴尔扎克在《驴皮记》里曾描他早年在这方面绝望的心情：

“我的灵魂在它努力自我表现再三地受到伤害之后，它就愈来愈深藏不露了。我的天性是坦诚与直率，所以我在外表上肯定显得很冷酷和装腔作势的。……我害羞而且笨拙，我怀疑自己是否生来就这样的，我真是讨厌死我自己了。我自知我的丑陋，因而我自惭形秽。然而就在我绝望的那一刹那间，一个永远支持天才的声音在向我呼叫：“勇敢一点，加油！”即使那突然显示的闪光照耀了我的孤独而且表现出我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即使从当时畅销小说跟我凭自己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的对比中，我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尽管如此，我仍然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半信半疑。我自信我是命里注定要

成就大事业的人，然而同时我又看到自己的藐小以及微不足道。

.....在与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中：我遇到过许多神气十足的人：他们昂着头，雍容典雅地走路；坐在女人旁边，一点也不感到拘束。这些人给我的印象最深。还有他们所谈论的那些荒唐无稽的事情。在他们的谈话中，他们极尽能事地污辱诬蔑，并且夸张地说他们曾和她们每一个人都睡过觉。至少他们也装出他们曾经有这样的风流韵事。而同时，他们自己却带着自豪的神气，并且假装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过却是无所谓的。在他们看来，最道德、最贞洁的女人，都是很容易弄到手的；只要一句温柔奉承的话语，一个富有神韵的小动作，以及大胆的注视她们的面庞，就能把她们征服。而且对我而言，在那时候，想要赢得一个聪慧的，迷人的尊贵的女士的垂青，简直要比获得权力和文坛上的荣誉地位（要）难得多。

.....在那时，有好多好多女人我都在默默地崇拜着。为了她们，我不怕任何不幸与痛苦，甚至甘愿赴汤蹈火；即使她们用最残酷的手段折磨我，我也愿意。在这种讲求礼节的交际场合中，我比起那些矫揉造作、并用陈腐的客套话或风行的词句来掩饰其思想的混蛋们，我毕竟太稚嫩了。我既不知道使我的沉默怎样表示它所以要沉默，也不知道怎样向人夸夸其谈而的确空话连篇。于是我不不得不把我心中正在热烈燃烧的激情隐藏在心中。然而我的灵魂中的确充满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加以垂青的她们所渴求的浪漫的情调。我内心里的这股力量，正是那些笨蛋所不具备的。但是所有的女人都狠狠地残酷地对待我.....唉，有如此的感觉，认为自己的一生是为了爱情，并且注定会使女人得到满足与快乐的人，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甚至连勇敢而尊敬的玛瑟林，或者是老一点的侯爵夫人都没有找到过！我就像一个乞丐袋中装着的宝贝，却没有一个识货的人，甚至是一个喜好热闹的小孩，或者是一个好奇的妙龄女子都不曾遇到！我是如此地悲观失望，以致我有时真想就此了结余生！”

甚至连一些年青人在冒险的尝试中遇到漂亮女人一样，他却始终找不到。在巴尔维西的小城镇上，有父母监护着他，而在巴黎，他每个月极其有限的薪水，连请个最下层的女工吃饭都嫌不够。

但是，克制力愈强，心中也会产生一种消融腐蚀它的东西，直到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溃败而已。巴尔扎克在一段时期里用修道士所用的斋戒修行把对女人强烈的占有欲和温存欲给压抑下去了，显然，这种从事工作时罕见的专注感是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们从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出，因为他的生活范围所限制，他就不得不用一种替代的形式满足他在现实环境中所不能获得的。然而这条创作道路，都给他的想象力培养了一种可燃的东西，正在等待着那可以引起燃烧的东西引起燎原之火。这正是欲望的不良的恶性循环。巴尔扎克再也不能忍受住孤独的煎熬。他要过正常男子的生活，他要恋爱，要找一个女人爱自己。而当巴尔扎克下定决心欲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时，他能够从个人的世界走向一个大千的世界。

被压抑的激情正像空气、水、火等一样，当压力达到极限时，它就要爆发。自从在维尔巴黎西开始，巴尔扎克的终生命运就在他父母及家庭的约束之下注定了。正好有一对名叫德·柏尔尼的夫妇，他们在巴黎有一所住宅与巴尔扎克家的房子相邻，另外在维尔巴黎西还有一所别墅。这些都使布尔乔亚家族引以为荣的事情。德·柏尔尼·嘉伯瑞耶尔先生出生于世族、其父是一位显赫的官员，而他自己又曾是王家法庭的法律顾问。他有一个比他年青

很多的不是贵族出身的太太，虽然不是贵族的一员，但她却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她的父亲安耐尔·周寨佛·菲力浦出身于一个日耳曼音乐家的家庭，并且他曾作为安他涅特·玛利王后的特殊的监护人。王后给他在她的女近侍中选了一位妻子德·拉波尔德·玛哥端得。安耐尔三十岁时就病逝了，他的寡妻嫁给了保王党中最有胆识的德·艺尔瑞耶骑士。当危险降临时，他以从科布连慈奋不顾生地解救王后于公西耶惹利监狱，这两件事情都证明了他对王室的忠心耿耿。

德·柏尔尼宽阔的别墅中，喂养着七个漂亮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做游戏，到处嬉笑无忧，给这家庭带来不少生命的气息。老巴尔扎克尽心地款待着他那位邻居，这位邻居最近眼力越来越糟糕，脾气长变得阴沉而怪癖。同时，巴尔扎克夫人与德·柏尔尼夫人也成了密友。德·柏尔尼夫人和她年纪差不多，并且多少带点罗曼谛克的气质。劳伦斯则经常跟着德·柏尔尼姑娘们玩游戏。当巴尔扎克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便找一些合适的事去做，以便增进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他的父母认为他正好可以做点事情，以偿还在家里的食宿费用，于是就叫他在写完小说的闲余时间，去给他的弟弟亨利补习功课。德·柏尔尼·阿力山大和亨利同龄，因而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到他家庭去听他的讲课。奥瑙利总是找到借口摆脱他父母的束缚，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消磨在德·柏尔尼家里的快乐事情上了。

过了没多久时间，老巴尔扎克夫妇俩注意到巴尔扎克的情形越来越怪。第一是，奥瑙利在不应该教功课的日子里，也总是到德·柏尔尼家（庭）里去，并且在那儿，消磨掉了整个下午和黄昏。再次，他比以前更加注意自己的修饰打扮了，对人也越来越和蔼可亲，而不象从前那样冷冰冰的。显然，奥瑙利是在恋爱了，并且不用问也知道他爱上的是谁。德·柏尔尼有一个十分美丽动人的女儿，巴尔扎克在二十年曾这样描述她：“她是一位令人销魂蚀骨的女人，一朵异国他乡的丽花。”他父母满意地笑了，这真不错，而这个深不可测的儿子，直到现在才做了一件值得赞许的聪明事情。德·柏尔尼家族不但很富有，而且社会地位也远远高于巴尔扎克家，如果跟这样一个有钱有势的家族联姻，奥瑙利很快就会得到一个较高的位置，而且这位置比起为那些不太出名的出版家出小说来，要荣誉得多。他们神秘地暗示并鼓励巴尔扎克去跟她们家深交。而老巴尔扎克夫人单有可能正在满意切算计，这位新娘也许会带来很大一笔嫁妆。她幻想着这对年青人婚姻的缔结，最好是由这两家所有的亲属们签名。

其实，奥瑙利的母亲是非常不幸的。虽然她真切地关怀儿子的进展，然而她却从来没有真实地了解他。这一次，她又搞错了。巴尔扎克恋上的并非那位媚人的少女，而是那位已经作祖母的叫做德·柏尔尼·罗尔的母亲。人们很难相信，一个生过九个孩子的四十五岁的女人，竟然仍能使一个感情充沛的青人射出热烈的火花，这一切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这是一切可能性中最难令人置信的。现在没有肖像可以让我们判断德·柏尔尼夫人在早年是否美丽。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四十五岁年纪的她是不应该被任何正常的年青人作为情欲的对象了。虽然她忧愁多病的面庞可能有点诱惑力，但她的身材却已是半老徐娘的粗胸围、腰围了。因而，她母性的抚爱更甚于她媚人的诱惑力是很正常的。

但是，巴尔扎克童年所渴望得到的，就是这种母性的爱抚，然而他自己的母亲却拒绝给予他。他一直在苦苦追寻，而竟在此时却得到了他早想获得

的东西。他就是要这样一个能负保护之责的天使般的女人，让他自觉到他身体里的蕴含着的力量如何排泄出来：一个既爱他而又是他知己的人来解除他内心的紧张；把他纤维中粗糙的部分提取出来但又不伤及他的身体；既能鼓励他，同时又以一种合作者的态度指出其缺点，但决不是恶意地批评；尽力了解他的思想，但对他丰富多彩的梦想并不加以嘲弄。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的内心思想感情坦露出来让别人知道。这个年纪与他母亲相仿的人，在听他倾诉时，给他留下的是值得信赖的感觉；当他谈到他那些众多的、充满了幻想的计划时，她的明朗而且聪慧的双眼温和地闪耀着。就是这个女人，她用她的温柔与和善，把他那由于粗俗和缺乏自控力而造成的神经质矫正过来。经过她温柔小心地调教，经过她的熏陶和教育，便使他已失掉的自信力重新恢复了。在他的《费米安尼夫人》一书中，描写到他们两人的接触而给他带来的幸福：

“你曾经有福气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吗——她和谐的声音，使她的谈话增添了不少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也同样地表现在她的整个脸庞？一个女人，她知道何时该说话，何时该沉静；她用一种完美无缺的娇美感来吸引你的注意力；她妥当地选用每一个字眼，并且语言说得特别纯正？她对你的嘲弄就象对你爱抚，她的批评使你毫无受伤之感；她不是大吵大闹地处理事情，而只是循循善诱，并使这场谈话能适可而止。她总是挂着微笑，她的高雅也决不是矫柔造作。她从不使你感到厌倦，而当你一旦离开她时，你却对他和对你自己都觉得满足，而且你发现凡是她用过的东西以及她周围的一切都有着某种和她同样的媚力。她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让你感到愉悦，即使你呼吸的空气，就象跟自家的空气一样。这个女人真是太自然了。她的一切举动都决无一丝矫情；她从不自我炫耀，她之所以表示她的情感仅仅是因为她的确有所感触……她既温柔又活泼，而她的同情心乃是在一种特别合适的情形之下表露的。你将会为如此可爱的天使而活，即使她做错了千万件事，你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是对的。”

巴尔扎克所闯进的是一种特殊而又新颖的氛围。跟这个家庭的交往，竟给这位年青的巴尔扎克一个机会去体验当代历史上的真正精神，他原本对民众及其时代的关系有着深厚的感情。德·佛龙萨公爵和德·西玛仪公主是法国的国王和王后，如此高贵的教父教母来主持德·柏尔尼·罗尔的洗礼。她承袭了路易十六的姓氏而叫作路易斯，以及安德涅特·玛利王后的姓氏而叫作安德涅特。在她继父德·艺尔瑞那骑士的家中，她听到这个忠心的骑士冒着生命的危险潜入公西耶惹利监狱，并且从已被判处死刑的王后手中接到了接到了她给费尔桑写的信。大概德·柏尔尼夫人曾把王后写的这封信连同在她的断头台上浸了血迹的手帕拿给巴尔扎克看过。这封感人的遗书上写着：

“我们曾经有着一个美丽的梦想。然而，你的忠诚，对我而言，意义真是太大了！”

这是一些多么值得纪念的故事啊！依着一种极详细的陈述，他的想象力给鼓舞起来，他的设想和创造的意志也被加强了。巴尔扎克孤独的少年时代是很容想到的：他那些在莱斯底居耶尔街穷困的楼上的凄苦岁月以及在学校里的奴隶般的地位；他在家总是听到关于高的租金、息金的利率以及投资与年薪等无穷无尽的繁琐的抱怨，还不得不倾听他父母之命开始去挣钱以及如何安身立命的训诫。然后你再去想像一下他在倾听这温柔和蔼的声音，讲垂死挣扎的君主政体和大革命时期的恐怖故事的情景。当他忍耐不了的好奇

心越来越强烈时，他并未被拒绝，而是被报以母爱的一笑。在这样的谈话中，他想象着自己变成一只鸟飞了，他的心胸越来越开阔，而在这温柔的教导之中，这位急不可待的诗人，便感激地得到了生命之中第一次的聪明与才智。

事情开始的情形，跟德·华伦夫人请卢梭·约翰——约克到她家里时一样。她并无什么高深的思想与崇高的目的，她只是想将自己的经验传给他，以使这个幼稚的、粗野的而且脾性暴躁的年青人从中获取一点经验而已。但是，这种类似师生之间的关系，却能不知不觉地、极容易地变质，并且趋向于情欲方面。用不着有意的专心致志，友情变成了爱情，恭敬也转变为为对方倾倒，还有那种朋友间的亲密的交际的欲望，却成为不公开地性的欲望。德·柏尔尼夫人正像德·华伦夫人一样，起先也认为那不过是认为，充满青春热情的青年学生只是对她的年纪以及尊敬的社会地位的崇拜，结果她还是受骗了。她毫未察觉她逐渐地鼓励起他自恃的心情的同时，她正在把那炽热的，被长时期压抑的，只需一点就能燃烧起来的情欲之火解放出来。她绝对没有想象到，像她这样年龄的女人，已是一位母亲甚至是一位祖母的女人，居然能使巴尔扎克那样富于幻想的人，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少女。他的强有力的意志，即要去爱恋一个女人的强大支持力，造成了这个情感奇迹：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而且我的想象也开始剧烈地燃烧。我坚信，你就是我所要寻找的最完美的人……虽然我说不清到底是哪一类人。但是，这种意识终于在我的整个意识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我只看到了你这种唯一的完整无缺的美，我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的。”

赞美之辞最后变成了情欲，而巴尔扎克一旦鼓足勇气去追求这种欲望，他是不会理睬任何的羁绊。

德·柏尔尼夫人被他吓了一跳。就在她早年，她也不是一位贞洁的女人。那是在她婚后不久，也就是二十二年多以前，他就跟一位黑头发的科西嘉年青人发生了第一次火热的暧昧关系，而且据说这个人也并非是她最后的情人。在维尔巴黎西，甚至有这样一种恶毒的谣言在流传，说她所生的最后两个孩子，只不过是名义上属于那个比她老得多而且半瞎的丈夫而已。因而，那决不是一个清修的贞女被年青人的火一般的热情所震撼。她很清楚她知道，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她已长大的儿女的监视之下，跟一个比自己儿女都还年青的男人私通，是多么地荒唐可笑。一个人既然知道这样的爱恋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那又何必深陷于这种情欲的诱惑之中呢？在一封不曾公开的信中，她试图把巴尔扎克和自己的交际仅仅限于友谊的范围。她并未忽略他们之间的年龄悬殊，而且还特别强调这一点。巴尔扎克却急躁起来，况且她并不像他的那本《老小姐》里的悲剧性主角葛兰桑·阿丹那斯那样胆怯，“怕社会嘲弄和诅咒一个二十三岁的年青人跟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的爱情。”他决定要坚决地征服她，而且近乎忿怒地叫嚣起来：

“上帝啊，如果我是一个女人，并且我四十五岁仍旧可爱——我将会和你有相距径庭的观点！一个丰韵渐减的女人，却拒绝采摘那种使亚当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果实，那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只因为她也爱上了这个热情奔放的年青人，故德·柏尔尼夫人设置种种障碍来拒绝这位急切的求爱者。好长一段时间，她总是尽全力抵抗这个年青人的猛烈攻热。然而，这是巴尔扎克的第一次恋爱，他怎能轻易放弃，于是他全力而赴了。为了使自己的自信心被树立起来。他需要一次重大的，前所未有的胜利。而对一个意志薄弱的女人，婚姻上又是失意与不幸，加之她的

情火又被点燃，因此想要抗拒一种力能征服世界的意志，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一个沉闷的八月里，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在黑夜之中，德·柏尔尼别墅花园的后门轻轻开了。一只颤抖着手引导着等候已久的情人进了屋子。在那儿就开始度过。

“这极惊异的夜，如此地充满了欢乐！那一夜，是幸福的，在他的一生中只能享受一次，并且永远不会有第二次。”

在一个小城里，没有一件事能长久地保持神秘的。而奥瑙利频繁地拜访德·柏尔尼夫人，不久便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揣测和议论。德·柏尔尼家族方面，则引起了不少忙乱场面。他家那三个闺中待嫁的年青女儿，看到父亲受人污辱，觉得非常难受。她们也竭尽全力不让那个不受欢迎的情夫，在她们的家里来占据本不属于他的位置。其实，巴尔扎克夫人被这件事的真相影响是最深的。在决定他儿子发展前途的早年，她对他完全忽视，并且有意抑制他对她的幼小的情爱，以致使他居于一个卑贱的地位，把他的自信力给毁掉了。然而现在，当她认识到他从德·柏尔尼·罗尔身上找到了作为母亲应该给予他的一切以及一个情妇应该给予他的。这位作威作福的女人便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为了把他的儿子从他情妇身边弄走，她便在一八二二年春天，强迫他离开维尔巴黎西，而到伯约去和他妹妹德·苏维尔夫人暂住一段时间。她是亲自把他送上马车的，并且使他在最后一刻都没有逃走的机会。她从前根本不当他的小说作品一回事，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赚钱的手段而已。现在呢，她却一反前态，想让他文坛取得重要地位。她让他在把稿子送出版家以前，先得经过得批评一番。然而那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巴尔扎克已经学会区别他母亲的批评和德·柏尔尼夫人的批评了。他对她那种装模作样地兴趣以及她同样的表示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从而使他对她的恐惧和对她尊敬渐渐消失了。巴尔扎克夫人曾忿怒地给她女儿写了一封信：

“我叫奥瑙利答应我，他必须仔细地校改他的稿子。我告诉他，应该把稿子送给比他更有写作经验的人去请教...而奥瑙利却对我的话置之不理。奥瑙利是如此地自以为是，以致他拒绝把稿子送给任何人修改。”

她觉得她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控制；她想再次控制住他，可是她的权力棒已经失灵了。巴尔扎克和一个女人爱情的第一次成功，导致他成为了一个成年人。他大胆地表现出自信力，而她却不得不承认她二十年来加诸其身的权力把他的青春糟塌了，但是这种权力却从此被摧毁了。当她向他的妹妹斥责他时，她也是斥责了她自己的无能。巴尔扎克就像一个害了场病的人一样，从他不幸的青春中恢复过来，并且把自己从倚仗他父母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他对自己的能力引以为荣。他生命的中心和焦点，已由他父母的家转向德·柏尔尼夫人的家，无论是百般地恳求，严厉地斥责，抑或是家里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发狂，或是城中闲言碎语的窃窃私议，都不能破坏，更不能阻止他对这个爱他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献身的决定。他母亲又一次狂怒地写信给女儿：

“奥瑙利不认为他一天到她家里去两趟是不检点行为。他根本没有看到这样清楚的事实就摆在他面前。我真恨不得插翅飞到千里之遥的维尔巴黎西！他整个脑子里就只有这件事，别的什么都装不进去。可是他却不明白，假若他真如此过分地专注此事，他总有一天会对这件麻烦事感到厌恶。”

他母亲最大的一个希望就是，他的儿子不久就会对这使他深陷的无法摆脱的爱情产生厌倦之情，并且最终彻底终止与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准确点说是四十六岁——所发生的荒唐可笑的爱情。然而，她深知她对他是多么

地不了解。这对他不仅绝无坏处，而且还帮他通过与德·柏尔尼·罗尔的爱情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人性在这个半成年半孩子的身上被唤醒了，逐渐地，这个伟大的小说作家获得了自由，那是深藏在那鄙俗的写作者身上的。在德·柏尔尼·罗尔的“经验之建议”之后，巴尔扎克真正地寻找到了失去的自我。后来他承认：

“她是我的母亲，朋友，伴侣，家人和顾问。她让我成为一个作家，她给予我年青时所需要的同心，并且影响了我的嗜好，像一个妹妹一样地逗我笑。她每天在我身边，能轻轻地给我带来温馨……如果没有她，我肯定早就死了。”她给了他作为一个女人所能给的所有：

“当强烈的暴风雨，快把我淹没之时，她用她的勉励和愿牺牲的举动，使我不致沉下去……她使我重新有了自尊心——这种东西在保护一个人与世上的邪恶事物对抗时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我能很好地活下去，这都应该归功于她。她是我的一切。”

而且这种出于肉体性欲的“爱情”，继续维持了十年（从一八二二年到一八三三年）之久，并且渐渐降温到仅仅是“友情”，而巴尔扎克的爱慕和忠诚都深化了，加强了。凡是他在所写的关于德·柏尔尼·罗尔的一切作品，组成了一个对这位“伟大而可爱的女人和天使”的一首狂热的，感恩戴德似的赞美诗。他身上的人性，以及艺术家的创造灵感和才能，都是这个女人唤醒的。他从她那里得到了前进的勇气，可贵的自由以及内心的安全感。甚至在《幽谷百合花》中，那位理想化了的人物德·莫尔梭夫人的描写，他仅仅认为她是一个“跟她相差甚远的生活原型，……只是轻描淡写似地描写了那个女人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优点。”并且他还很自责地说，他永远都不能把她的对他的情景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因为我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去亵渎我真正的情绪。”但是，这次跟德·柏尔尼·罗尔的交结，他认为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幸福之艳遇。他的这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情还是他用不朽的文字给记载下来：

“一个姿色沉寂的女人为了实现一个男子的初恋而甘愿供奉出最后一次情爱。这种可贵的行为是什么东西也不能比得上的。”

跟德·柏尔尼夫人的交际。是巴尔扎克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她让这个男人发现了真正的自我，并且使这个快要绝望的作家获得了自由，而且还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今后所要爱恋的女人的标准。之后，巴尔扎克便在每个女人身上搜寻这种母性的爱抚和指导，那个女人的爱抚和指导给他非常大的幸福。他所要找的女人，首先她不需要占据他工作的时间的女人，并且他工作结束之后，她有空闲和本事使他轻松与快感。他的爱情的先决条件是，这个女人在精神和社会两方面都有特殊的性质，他认为“了解”他更甚于“爱恋”他。因此能符合他的极少的女人，就是那些经历比他多、年纪比他大而且为他尊敬的女人。那些早已成熟的、并且对生活和爱情都已失望的“寡妇”和“三十岁的女人”，不仅仅是他小说中的主角，而且是他生活中热烈追求的女主角。她们既已不再希望有任何美事，但在她们一旦又为他所爱慕，并且让他们以伴侣和内助的身份来为这位大作家服务时，她们便认为这是一种不小的恩赐。巴尔扎克是从不着迷那些娼妇、雏妓以及所谓的有吸引力的崇拜文学家的势利女人。外貌的美丽从来都勾引不了他，并且青春少年的女人也诱惑不了他。他甚至认为“少女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她们一味地要求被给予，而付出的则少得可怜。他曾说：“四十岁的女人愿力你做

一切事，而二十岁的女人则什么也不想做。”在他所经历的爱情之中，他潜意识地渴求那种无所不包的恋爱再次出现；这样的爱恋，他曾在一个女人身上找到过，这个女人是他的一切——他的母亲，姊妹，朋友，教师，情妇兼做伴侣。

第五节 失败的商业生涯

巴尔扎克第一次的尝试已经获得了成功。他已经得到一个爱他的女人的辅佐；而由于她的这种帮助，他已成为自己精神方面的主人了。他一旦成为自己物质方面的主人，他就可以开始他所想要做的，真正的职业。

在二十五岁之前，巴尔扎克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生涯来一点一滴地，百折不挠地去获得物质财富。于是在一八二四年冬末，他突然决定从事一个新的冒险事业。在他的年谱上，那个日子是不吉祥的。他为了出售他最近的小说而走进圣安德烈·德沙尔广场第 30 号一个出版家兼书贩的康乃尔·雨尔板的铺子里。他并不是在那里受到了冷遇，而相反的是，康乃尔深知德·圣沃盘·奥雷斯写作小说是准时出货的，绝对误不了时间。而且他的那些凶杀暴力的，缠绵悱恻的，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都能让读者掏钱买它。康乃尔先生毫不犹豫地就把巴尔扎克的稿子接下来了。

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出版家同时又把他的一个正在盘算的商业计划告诉了巴尔扎克。他的计划就是，他想出一个能发财的绝妙机会，去印刷一些圣诞节礼物和暴发的资产阶级家庭所需要的书籍。至于法兰西的古典作品，虽然有很大的需求量，但是由于那些受尊敬的大作家写得太多了，不一定能有很好的销路。例如，像莫里哀或者拉·方登的全集，已经有不少的版本，而且在一般的家庭里，这样的书已经是不少了。那么，他何不出版所有古典作家的（作品）全集，并且每一种只印成单行本。通过缩印，整个莫里哀或者拉·方登的全集很容易地就能包装在一本书中。并且这些书再添加上精美的插图，这些书必定会很快地被销售一空。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已策划好了，目前最急要地把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办成功，最缺乏的乃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

巴尔扎克乃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年青人，很自然地他对这个计划喜得合不拢嘴，并且建议康乃尔，他自己也加入到他这个计划中去。其实，他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使他草率地从事一件冒着巨大风险的商业投机。只要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自己出产的小说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他每个月只须用一束鹅翎笔和几本稿子，他就能挣到一笔相当可观的、固定的收入，这样一来，一年大概就有几千法郎。但是他希望过上一种更上一层标准的生活。作为一位贵妇人的情夫，继续住在顶楼，并且他现在所居住的那间狭窄的杜尔农街一家五层楼上的小层，对他简直是不相适应了。他那写作的工作，一行一行地、一节一节地、一页一页地计算价钱，在他看来是一种耻辱、不光彩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为什么不冒险地试一下而发一大笔财呢？为什么不花几千法郎投资在这种绝对有把握的机会上呢？他本可以继续用他智慧的笔毫不费力地写出一些滑稽无聊的小说，给报纸写稿以及其他一些匿名的作品。鲍马赤曾就把德·伏尔泰先生的集子当作添头出卖过，然而这并没有使他的天才智慧受到贬斥；而中世纪时代的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又有谁没有做过校对人和技术指导呢？不论用什么手段挣钱，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丢脸的，只能说明一个人多才多艺而已。一个人干很多的工作，却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这个人就是很愚蠢的；而一个人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大量的金钱，那才算是聪明的。终于获得巨额财富的机会来了，他可以集中他的所有力量，去创作一部能够签署他的真实性名并且能够让全世界公开承认他的作品的巨大

艺术价值。

巴尔扎克对此并未深思熟虑。只要他一听到有一笔生意可作，他的理智就被想像冲昏了头脑，不再去考虑这个理由是否能成立。而且商场上的投机事业他感到刺激过瘾，就跟他在写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样。为了在文学上获得自尊，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发财的大好机会。从书籍图画到铁路股票，从不动产到木材五金，任何生意他都愿意去做。他唯一的野心就是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至于目的和手段。那是不用考虑的。他只想获得权势。在他三十岁时，他仍不能决定是当新闻记者还是从政，正像歌德一样，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倒底是当画家还是作诗人。他跟华格纳一样，吃不准是当戏剧作家还是做一个音乐师。假如机会巧的话，巴尔扎克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生意人或人口贩子，一个投机者或一个银行家。把他引向狭窄的文坛，不过是机会而已。如果在一八三一年，或年一八四一年，甚至在一八五一年，他在变成一个罗特奇德与《人间喜剧》的作者之间有供选择的余地。他是否会做金融界的寡头而去做文艺界的巨擘，这都是极有疑问的。

每一个计划，不论是商业的或文学方面的，由于那些计划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便使他的想像力兴奋起来。他看问题时，总是被他的幻觉所支配；他讲故事时，总是夸张其事；他计算数目时，对数目也含糊了。在每笔商业投机中，他总能象他小说中的灵感突然冒出来一样，并能把每一个复杂的细节都补充起来相似，他也看到他的冒险活动必然能带来一笔大量的利润和财富。康耐尔先生不过跟他谈起关于古典书籍印成单行的事，而他却能平添不少幻想；他把那些装帧精美的、用雪白的纸印刷而成的插图拿在手里，第一册、第二册，甚至整个丛书的版本都出来了。他似乎看见众多的读者在巴黎以及外省各地的书店里排队购买，在客厅和小屋之中读着，抚摸着这些珍贵的书籍。他看到了康耐尔先生的柜台上厚厚地堆了许多定货单，脚夫们在沉重的包裹之下吭唷作响，每天都送出许多包裹到四面八方去了。他看见成千上万的法郎从钱柜里塞满，而自己住在一所讲究的房子里，门口还停着一辆自家用的马车。他看见摆在家中的家俱，沙发上覆着从塞纳河上一家店铺里买的锦缎，窗户上挂着锦缎的锦帘，墙上还挂着名贵的油画。他向站在他身边大献殷勤的康耐尔先生宣布，他愿意无条件地分担小小的二三千法郎。其次，他还愿意给拉·方登及莫里哀这两本全集写两篇序言，这还是第一次向法国人民介绍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物。总而言之，那套丛书算得上最精美的集子，并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

当巴尔扎克离开书店铺时，他顿时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了。康耐尔先生提出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商业投机，而可怜的巴尔扎克却错误地认为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

这件奇异的商业冒险，简直可以作为巴尔扎克小说创作的一个合适的题材。他被深深地卷入这件事，显然是有违他的初衷的。在这个商业投机中，他所出的股份始终都没有超过一千五百或两千法郎，那也只是他胡乱地写一本小说所挣来的钱数而已。但是，凡是巴尔扎克所关联的每一件事，都会变得规模庞大。当他写第一部《私人生活的场景》的时候，他并未意识到他正在开始写他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诗史般的作品即《人间喜剧》。当他在康耐尔先生的计划里出了一份并不是很大数目的股份时，正像他写书没料到结果

一样，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将要为此负担财务责任。

第一份合同是在一八二五年四月的中旬毫不费力就签订的。巴尔扎克不过是这个合伙人之中的一个小小分子而已。他们共凑集了七八千法郎，作为出版单行本《拉·方登全集》的经费开支。这个团伙一共有四个人：除了巴尔扎克外，还有一位大夫，一位退休的官员，以及前面已提到的主角人物、书贩康耐尔先生。这四个人到底是如何凑到一块的，至今无人知道了。所有的这些人，并不是很有钱的，他们每人出资一千五百法郎左右，为的是从这个很有希望的商业投资中赚一大笔钱。不幸得很，他们这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合作，并没有合作多长时间。我们从一封信——即那位大夫所写的极其愤怒的信里，可以猜想到他们的第一次会议是如何进行的，即激烈的争吵，甚至差点打起架来。就在同年的五月一日，巴尔扎克的三个同伙人把他们的资金全部抽出，只留下一位理想家去承担整个重负了。

巴尔扎克现在所要做的事，比起他的初衷来，无疑又是重多了。现在得由他出将近九千法郎的钱去开销整部《拉·方登全集》的费用。这对于他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款子，而他到底从哪里弄到手呢？是去说服他的父母借钱他，还是抽时间迅速完成两三部小说挣得稿费呢？这些都是不太现实的。正好是德·柏尔尼夫人——那位为他的毅力所折服的热心的太第二次帮助了他，给他提供了三张署着她的名字的支票。

可是巴尔扎克总是很怪的。按常理，他应该先等等看《拉·方登全集》的销路如何，然后再决定是否应该去出版第二位作家的集子了。然而他的理智最终被他的天性的乐观主义所击败，他不想只在一个小的局面中去开展工作。于是《莫里哀全集》便迫不及待地紧随着《拉·方登全集》而出版了。两本书比起一本书来，也许更容易卖一点。他把一切商业上的顾虑统统抛掉，放开胆子干起来。

巴尔扎克又一次热烈的劝说，使得他家里的一朋友，德·阿宋威耶，表示愿意出五千法郎帮他印刷《莫里哀全集》。在前一本书还没有卖完之前，巴尔扎克又把从别人借来的一万四千法郎投资到自己的冒险活动中去了。他急切地要求快点出版这两本书，以致狡猾的商人把贮存了很久都快发黄的纸张供给了他。本来巴尔扎克对德外瑞亚的插图曾抱以很大的希望，结果却制作得很糟糕。整个拉·方登的作品都缩印在一个本子里，铅字自然得很小，以致于视力很好的人，看了都觉得吃力。而巴尔扎克充充完成的两篇序言，也并未给这两本外表装帧并不好的书的内容，增加什么吸引力。

从商业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投资的结局自然是不会好的。巴尔扎克为了能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把每本书的售价定为二十法郎，这样的价格书贩显然是不愿接受的，这头批一千册，并未给巴尔扎克带来美好的希望，他们也被无可奈何地搁置在印刷场的一个房子里；不管是书贩，还是读者，都不想要他的书。在年终时，所卖出的书，总数不过二十本。但是印刷的、装订的、造纸的人，都必须付给现金。为了挽回损失，巴尔扎克把书价减到十三法郎一本，然而这仍然无济于事；接着，他又减到十二法郎，还是无人问津。最后他不得不把所有的存货全部甩卖出去，并又被欺骗了一次。经过一年的痛苦历程，他不但没有赚到他所梦想的财富，而且还负债达一万五千法郎之巨。

任何人，只要经历这样一次严重的失败，他也会甘愿倒霉的了。但是巴尔扎克却不甘心承认这是命中注定的，他要与命运抗争。后来，当他的一部戏剧被大家非难时，他发誓要写一部震惊世界的小说挽救他的损失。当他被

他的债权人紧紧相跟而且执行法律的官吏也在等着他时，他就取笑他们为自己寻开心，并且把他的负债之事大肆渲染以获得人们的尊敬。他二十六岁时，他既没有成就，更没有好的声誉来向他的债权人担保。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文坛上的拿破仑，因而是禁不起一个偶然的挫折。

大概是由于他羞于向他的父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为他的父母一直都是怀疑他的能力的。或许是他不愿意向德·柏尔尼·罗尔认错，说自己在第一次赌博时就把所有的赌注输光了。于是他就又把他的赌注增加了一番。他所能捞资本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更多的资本去冒险。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巴尔扎克认识到了自己的小毛病，那就是：不能只做出版家，因为那些印刷商要价很高，会把油水都抽去的。无论是写作或出版书籍都是不利的，而印刷则是有利的。只有从事一桩包罗万象的冒险事业——即自己写书，自己印刷，自己出版——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他决定从事书籍的各个环节，以此来挽回他在《拉·方登》与《莫里哀全集》方面的失败。于是巴尔扎克又开始了他生意上的第二个起点，即他决定要开设一家印刷厂。

举办这样的企业，有许多关键的东西都必须弄到手，而目前巴尔扎克一样都不具备。首先，他对印刷一窍不通。其次，他没有王家的执照，因为在当时，这是一个印刷厂商所必须拥有的。第三，他既没有厂地又没有机器。第四，他没有钱，更谈不上有经验的助手。然而，一个人决定要在不太可靠的基础上开创事业，他总是常常发现这恶运在刚开始时会帮他一个忙。巴尔扎克找到一个可以帮他忙的老手，名叫巴比耶尔·安德烈——巴尔扎克在印刷《拉方登全集》时便注意上他了。于是巴尔扎克就说服了他负责自己印刷厂的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通过德·柏尔尼先生的关照，他给一位部长和公安局长写了一封介绍信，弄到了印刷厂开业所必须的执照。我们能够想象得出，该是一位多么善良的人，自己已被人取而代之的丈夫的信：

“这位青年人我很熟悉。他的坚强的信念与学识，就可以保证：他具备开这种专门行业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这样的介绍已经够了，而巴尔扎克·奥瑙利也得到了一张可以从事印刷业的官方执照而已。

只要有了特准证，找到一家准备出卖的印刷厂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于是他塞纳河左岸上一条黑暗的狭窄的巷子里找到了他所想要的印刷厂。在这所房子的底层，有一家脏且小的印字房，而紧挨着这座房子的，乃是有两位名人即拉辛·约翰和勒古弗惹·阿得连那都死在那间房子里。老劳仑斯先生是这家印字房的主人，他早就想把这个不太赚钱的厂子转手，现在既然遇到了一位肯出好价钱的买主，那也是很觉得幸运的了。

四个条件已经有三个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最困难的就数第四个条件了，因买东西总比付款容易得多。巴尔扎克必须有五至六万法郎；用三万法郎买取专利权；一万二法郎给他的技术顾问巴比耶尔——大概是他不大相信他的雇主的经商能力，所以索要这笔款子作担保。其余的钱则为杂用开支，比如这个厂子年久失修，装修费恐怕就不会便宜。巴尔扎克本来的债务就有一万五千法郎，现在又要又筹资五六万法郎，看来希望不是很大的。他的运气真不错，他找到了他绝对料想不到的、靠得住的担保人。他的父母，对于有诱惑性的投机事业，总是一向乐于承诺的，而目前他们的动产大约在二十万法郎左右，有不少资金可供他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于儿子的这

个新的冒险，倒并未提出反对。印刷不像作书那样无所谓的事情，而是一桩靠得住的行业。同时，奥瑙利的永远的乐观主义精神，恐怕足够说服他的父母并促使他们相信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一次家庭会议便同意了借给他一千五百法郎的款项，并由他父母作保，他们的一位叫德兰诺瓦夫人的，付出三万法郎作营业资本，不足之数则又是由甘愿自找牺牲的德·柏尔尼夫人供给。一八二六年六月四日，巴尔扎克通知部里，说他已以一个印刷商的身份开张营业了。

“在下，即巴黎一家印字馆的老板，兹通告私人住宅及营业地点即日迁至圣·日耳曼镇，玛勒街十七号。”

这出悲剧的第二幕已经开始上映了。

这个奇怪的印刷厂在《幻灭》和《绕线猫店》中的许多生动的篇幅里被描写。玛勒街是在圣·日耳曼前街与拉居码头之间一条曲折狭窄的街。整个街上都显得阴气沉沉的。巷里的许多房子都有十七世纪的直通到院子中间的高大的街门。这些大门，都曾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看到了川流不息的马车，贵族夫人小姐的迷人的身影。然而，两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改变了，无论是高贵血统或富比王侯的贵族商人，早已搬到了那些阳光充裕，而且比较适宜的房子去了，同时，一些地位低下的小生意人便寻找到这条破烂不堪的巷子里开店设铺，苦度日子。加之煤尘、尘土以及岁月的磨砺，这条巷子更加荒凉了。

虽然这条街曾经与贵族有过密切的关系，但巴尔扎克与巴比耶尔在里面开设的印刷厂并没因此而带来什么便利条件。这个房子以前是一片广阔的房舍，并且它的范围向前伸展了不少，与那些客气的邻居相比，显得更突出了，它的前部已经伸到街上来了。为了考虑经济效益，这所房子建筑得很便宜，没有花费不该花的许多钱。这个私宅，有一间会客厅，一间黑漆漆的厨房，一间两用的书房和起居室，并带着一间小起居室。

这正是巴尔扎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精心地布置它。他取下用纸糊成的模，而代用了浅蓝色的花棉布。他把书装订得很漂亮并摆列起来，还找来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玩意起摆设作用。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的“内助”赏心悦目。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去看他的。“她每天的到来，就像能减轻病人痛苦的睡意。”

巴尔扎克对他这个新的职业非常严肃认真，因而，他在商业领域里的冒险，并不只是对奢侈的欲望的渴求。每天清早至深夜，他只穿着敞着领口的衬衫，跟他的二十四个工人一起，在那间散发着油墨味和纸味的屋子里，冒着汗拼着命地在工作。在他看来，没有一件琐碎小事是不重要的，因而每一件琐碎工作，他都是亲自去料理。他帮着排字，校正铅字盘，估价成本，而且亲自开发票。他那肥胖的身体在一间狭小的却有不少人的房子里穿来穿去，走到机器盘和堆着的包裹，不是监督工厂要卖力点，就是往自己那间带着玻璃扇的小办公室里跑。在办公室里，他为了一分钱而跟书贩、纸商们付价还价。那些来向这位忙碌的印刷厂的老板送定货单和票据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曾有过一丝预感，他们面前的带着污垢的毛发和善辩的口才，矫胖的而勤奋的年青人，竟然是，或说将要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那些日子里，巴尔扎克真正地扔掉了他高傲的宏图伟志，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灵魂和肉体都投向了这新兴的印刷事业。他那把法国古典作家的全集带到千家万户的幻想，早已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要让他的印刷机永远地

转下去，并且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业务关系。无论什么稿子，他根本不挑选就一应承诺下来。他这个印刷厂里印刷的第一种没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只是一本叫作《减少蛋白质的长生药片》（或《长生药粉》）的计划书。第二种是由一位志向远大的律师出资印刷的一个女杀人犯的答辩状。第三种是一个叫作《药剂师勒贝尔的巴西混合剂》的销售假药广告。然后是一大堆庞杂的内容，主顾拿什么来印他就帮着印什么，譬如小册子，古典作品的刊本，计划书，广告，目录，诗歌，以及一些娱乐消遣的小读物。他只印了一部由他自己所创作的叫作《无赖者所写的关于巴黎标志的小字典》的作品。这部作品大概也是他急需现款时，胡乱地写了送给出版家的。

他的事业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波折，而在巴尔扎克看到一本送来付印的叫作《偿还债务以及满足债主的方法》（或叫《已破产的人们所用之公正商业手册》）的小册子稿样时，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了。他就是从来搞不懂，如何满足他们的债主。他的才干用在不同的范围里，往往就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效果。那种在艺术创作中能创造出新的世界的乐观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用在他的买卖活动中，就必定会让他倾家荡产。他的第一步就没有走好。为了增加营业资本，他不得不把积压的《拉·方登全集》和《莫里哀全集》共二千五百本，以相当低的价格贱卖给书贩包都安，总共才拿到两万两千法郎。这样算来，平均每本书的价钱还不到九法郎，而他最初的定价却是每本二十法郎。他因需款太急，便急着把契约签定了，完全没有想到后面将会发生严重的事情。原来，包都安只是用五千法郎的现款把巴尔扎克这条鱼给钩住了，然后呢，一万七千法郎的现金，包都安却宁愿用给他两家书贩的二万七千法郎的支票。就在巴尔扎克拿着他给的两家书贩去讨钱的一刹那间，这两家书贩竟然同时破产了。像他那样债台高筑，是不能一直等到他们办清破产手续的，于是他决定能拿回多少是多少，就把乡下那家书贩的积压的书籍抵债了。他并没有收到现金，而是收获了一大批不值一文的书。这些书都是像格斯累，福洛尼昂、费拉龙以及基勒贝尔那些不出名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堆在乡下库房里好多年了；都已经发黄了。

这又是一出合适的喜剧题材。利用德·柏尔尼夫人提供的资金，他出版了自己的两本古典作品，又因为销路不畅，不得不以还不到原来定价的一半价钱抛售，来获得另一项急用的资金！然而现在，他并没有得到原来希望的现金，反而自己的另一批书籍积压在手里，照样是脱不了手。他简直就是用一大堆不值钱的东西换来了另一堆更不值钱的东西。这好像德国童话《幸运的汉斯》的故事一样，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头牛，然后用这头牛换了一只羊，又用这只羊换了一只鹅，最后用鹅换了一块磨石，磨石最终也滚落进水中去了，他最终什么也没有了。

这些曾风靡一时的作家的作品，一大包一大包地被捆起来，放置在印字间里去沾灰染尘了。不幸的是，工人们希望付给他们薪水，而巴尔扎克却不能用费纳龙、福洛尼昂和其余作家的书来付给工人工资。供给这家印刷厂的纸商们不久就听到了风声，于是就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巴尔扎克的本票。因为那些巴尔扎克亲笔签名的本票还没有获得它们将来的价值。他们坚决地要求立即把他之间的帐目结算清楚，然而这间带玻璃扇的小办公室，的确不是躲避他们嘈杂的讨债的安全避护所。于是，印字房里越来越不易看见老板巴尔扎克了，特别是快到周末的时候，他就几乎整天见不到人影了。他一家挨着一家地奔走，尽力说服他们，允许他们，允许他延期付款，同时从银行家，

朋友或者亲戚那里寻求借钱的可能性。在那几个月里，他经历到了一切令人羞耻的场面，但他仍然顽强地挣扎着。这些羞耻的场面，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正如他在《毕骆都·恺撒》里所描写过的一样。

他用一种参孙的力量来拼命地奋斗，然而到最后，他还是被迫洗手不干。一八二七年的夏天，他的一切都已失掉，连付给工人的一文钱都拿不出来了，他干印刷业比起他干出版业或是作小说的作家，并无更大的成就可言。他现在面临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宣布破产，要么私人之间处理。

然而巴尔扎克选择了第三个可能性，就像那位不朽的拿破仑一样，他不甘心承认自己的失败而囚禁在厄尔巴岛上，还想在滑铁卢上试一下他的运气，以证明自己是无敌的，永远不可战（争）胜的。

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未使巴尔扎克清醒过来，他又一次想通过扩展他的事业的方法来避免他的破产。他在出版生意即将被浪涛所吞没时，他把一个印字馆当做救生圈抛了下去，然而在印字馆又要沉没的时候，他又试图投入一个铅字铸造厂而使它重新焕发生机。这个企业之所以最让人伤心的一点，正像巴尔扎克这个人一样，他的一半是幻想家，另一半却是老练的现实主义者。他有像律师或商人一样的智慧。就拿他把古典作品刊成单行本发行的计划而言，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后来，就有人实行他这样的计划，并且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他冒险从事印刷业，也并没有不对之处，因为读者对读物的需求量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着。

他的第三个计划，也就是关于铅字铸造厂的计划，尤其是有成功希望的。他曾听到一种由一个叫作德瑞希·彼得的人发明的新的印刷方法。据说这种方法比普通的铅印方法效率更高。因为它“不用铸字型的坩埚，也不用翻转和矫正铸字模型。”巴尔扎克立刻就对这种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预见到在这个工业化的时代里，每一种生产工艺的简便和成本的低廉，都将会带来巨大的效益。而且，这一发明创造，会带来技术的革新。正如他的小说里所说的，他对于发明创造的兴趣始终不会减退。在一部以巴尔扎克从事印刷事业为生活原型的小说《幻灭》中，他认为施且尔·大卫发财致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机遇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有眼光地在造纸方面的技术革新。《绝对的追求》里面，克拉埃斯。巴尔礼萨，毕骆都·恺撒，他们是苏丹糕的发明者。可以说，从歌德以后，再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像巴尔扎克那样如此兴趣满致地关注着科学的进步。并且他预言，由于观众大量地增加，在若干年后，一定会有一种非常进步的机器设备代替用手排字和用手铸字这种落后的方法。不管怎样说，这个新的发明方法如果能很好地利用把握，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的。巴尔扎克因为迫不及待的乐观主义，以及他尚未解决的破产事件而绝望，现在却又有了一个挽救失败命运的机会，他怎能不把它紧紧地抓住呢？

就在他的印字馆濒于破产之际的一八二七年九月十八日，一个包括巴比耶尔和劳容（这位劳容也就是小吉来先生铅字铸造厂的破产清理人）的新的印刷事业集团又诞生了。十二月，他们已撤出了第一次通告。这个集团内的分工是这样地，劳容供应设备装置，巴比耶尔负责管理，而巴尔扎克呢，比起他从前作小印刷商时的那种既管这又管那的辛勤劳动要轻松得多，他现在只负责这个新方法的广告事宜。就这样，这个新的事业又开始了。巴尔扎克准备了一份精美的册子，凡是他的店子所能用到的新字型的样品，还有一些插图和一些图文并茂的插画，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册子里，这些东西，正是

印刷家和出版家所能需要的东西。就在这条船开始驶离港口时，巴比耶尔突然宣布他准备退伙，眼看着船就要沉没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又是德·柏尔尼夫人再度出手援救。她说服了她丈夫把财产代理权交给她，并以此买下了巴比耶尔的股份。她又拿出九千法郎，这才使得这只船暂时不致沉没。

然而一切都无济干事了。那个带着各式各样铅字的、以吸引买主和顾客们的华丽册子还未准时备妥，而这个店铺的债主们鉴于巴比耶尔的退出——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可信赖的股东——便开始讨债了，纸商和书贩要求偿还帐目，放款人要追还贷款，工人则要求发工资，虽然巴尔扎克一再保证：只要新企业能站稳脚步，度过困难时期，钱财会滚滚而来的，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他的承诺。再也没有人肯接受他们的本票了，不管是巴尔扎克和巴比耶尔的商号出的，还是巴尔扎克和劳容的商号出来的，或是巴尔扎克·奥瑙利自己开出来的。终于在一八二八年四月六日，这个本可以存在十二年之久的第三次合资团体，因宣布无力清偿债务而破产了。巴尔扎克又破产了，三次的破产——出版商，印刷商和铅字铸造厂的股东。这个坏消息是瞒不住他的父母了，他必须马上向他们报告有关情况。否则，他们从报纸上得到消息，了解到他儿子破产对整个家庭的玷辱。的确，这个坏消息像春雷般地使他的父母感到震惊。起初，他的母亲尽量把他们的投资破产的事隐瞒她那已经八十二岁的丈夫，并且开始她的丈夫也没察觉。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问题仍旧得解决：到底是拯救整个家庭，还是放弃这个浪子，还是再一次投资，把他的声誉给挽救回来。

当巴尔扎克在学校时，巴尔扎克夫人连一分的零用钱都不曾给过他，并且见他在房屋的墙上挂一个小雕像时，竟然骂他奢侈浪费。虽然她家庭仍有数目相当可观的存款，但要想使她动用这笔款子，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不过，她更关心自己的尊贵的姓名，惧怕众人的闲言碎语。巴尔扎克这个姓氏将被冠以“破产者”的头衔出现在所有报纸上，这会使她在亲戚朋友面前羞愧难当的。两相权衡，她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之下，不得不宣布她情愿再牺牲一次钱财，来避免这次公开的不体面的无偿还能能力的出现。

她请来一位表亲，德·赛地洛先生办理这件麻烦的清理工作。德·赛地洛先生几乎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才把巴尔扎克的好几个商号和它们各自的混乱的债务清理出来，尽量使债权人满意。他首先把巴尔扎克从这个办理业务的手续中完全驱逐出去。他那幻想家和夸大计划的图谋，对一件需要仔细地精密的工作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他办的这个印字馆，就使他负债高达十万法郎，而巴比耶尔则以六万七千法郎把它买走，这就意味着巴尔扎克家净损失四万至四万五千法郎。而德·柏尔尼夫人为她的情夫一共投资四万五千法郎，接收了一个远远不能偿付债务的铅字铸造厂作为抵押，并且把这个厂子交给她的儿子阿历山大去管理。至此，所有相信巴尔扎克经商才能的人，都受到严重的损失。也许由于命运的嘲弄，那两处买卖，即印字馆和铅字铸造厂，在巴尔扎克退出之后，竟开始了自给自足，并且是在一种经营企业所需的稳重和果敢的判断之下进行的。巴尔扎克不得不回到他的丰富想象力能创造出巨大的成果的唯一领域，也就是文学创作中去。

当德·赛地洛先生把这两个商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所能给巴尔扎克的，只是他经营企业得失的一张“资产负债表”了。从物质损失来看，他自然是输得一蹋糊涂。他已经二十九岁了，却依然不能自立。他十九岁时虽然一无所有，但也不欠别人什么；而他二十九岁时，却欠了他父母和德·柏尔

尼夫人将近十万法郎的债。十年中，他那扑在工作上的没有休息的，没有中斷的，没有安慰的拼命劳动和艰辛，都付诸东流了。他也受到了一切方式的耻辱，用假名写几千页的稿子并且急切地寻找买主，或是为了躲避债主的追索，他是东躲西藏，或为了应付债主，不得不从早到晚一直被固着在办公室里。他做生意的三年中所欠下的债务，竟成为他今后的“西西夫斯岩石”，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尽力气把它推到山顶，而在到达山顶后，却眼巴巴地看着它又迅速地滚下去。他第一次的失败，注定了他一生中是永远都偿还不完债务的，而他早年希望能独立自主地从事创作的梦想，命中注定将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

然而，在“资产负债表”的另一面，他又获得了一笔无比的资产。他作为商人所丢失的东西却以作文学家而捞回来了。三年来的艰辛生活，使得他不得不尽力面对现实的压力，教给这位极富浪漫主义的“作家”——他一直是从小一些时髦典型里抄袭浅色的阴影——去看这真实的世界和许多日常的表演。它们中的任何一出，如他后来所言的，都是一出莎士比亚悲剧一样的动人，和一场拿破仑的战争一样激烈。他已深深地体会到，在一个唯物的社会里，金钱具有的魔法般威力的重大的意义。他也知道了，进行票据交换或本票交换时的斗争以及在小商号里所使用的狡诈和权术并不逊于在巴黎的大帐房中所进行的。这些斗争，狡诈和权术所费的心血，和拜伦写他的海盗冒险，或斯各脱·瓦尔特写他高贵血统的骑士所花费的心力同样大。由于与工人一起干活，跟高利贷者争执，以及与批发商们拼命地讨价还价，他比起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物——如雨果，拉马丁，穆塞·德·阿尔弗勤等人，这些人只追求生活的罗曼蒂克——获得了一种多得不可胜数的，关于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巴尔扎克也学会了去观看，去描绘那些生活中贫困的残酷，卑贱中的丑恶，以及隐伏在人们内心的力量。

由于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慧眼，加之失去幻想的怀疑，使这位年青的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力极大地丰富了。从此，再庄严伟丽的情形也不能打动他；再具罗曼蒂克的帷幔，也不能欺骗他。因为他已深入地看到社会运动的底蕴，注意到那些绑住负责人手脚的陷阱，以及那些告诉人从漏洞逃走的方法。他知道如何发财和为什么赔本，知道怎样打官司，也知道人如何在社会上混下去。他知道如何节省以及怎样才能不浪费，如何骗人以及怎样骗自己。这正如他以后这样说的，只是因为他年青时曾用过各种办法去谋取生活，而学会了如何观察它们的因果关系，以致他能忠实地描绘他那个时代。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幻灭》，《驴皮记》，《蓝柏尔·路易》和《毕路都·恺撒》这些描写中产阶级的、证券交易所的，以及商业社会里的方方面面的伟大的史诗，如果没有他那些年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次次绝望，我们简直想象不出他究竟该会怎样写成这些东西。只有他的想象力和现实融合相通，巴尔扎克小说才会以一种最完美的现实与奇特的想象混杂而成的令人惊异的本质。只有当他在现实中失败甚至是惨败之后，他的艺术才能才会非常的成熟，并创作出一个他自己的世界，以区别于现实的世界。

第六节 剑与笔：史诗的循环

照理说，巴尔扎克冒险的投机事业全部崩溃之后，他的自信心必然会丧失殆尽。然而，当他的计划像一幢纸房子一样地倾覆之时，他却只感觉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可以自由地重新开始了。从他父亲那儿他继承了可能是倔强农民的生命力，并不因为这次重大的打击而受到一点影响。他也不想为他所折耗的钱财而抢天呼地，因为无论如何，失去的钱财并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所负的巨额之债，跟他想象中所获得的财产一样，简直不像是真事。挫折并不能动摇他永久的乐观主义，一件能把软弱者的脊梁压折的事，对他仅仅是搔了一下皮肤而已。“在我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里，我的不幸总是被我的勇气所克服。”

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暂时躲避一下锋头还是必要的。更何况，为了躲避那些讨厌的债主们登门索债，他下去独立成家也是很有道理的。像他很喜爱的古柏尔·凡尼莫尔的一本小说里的红人物一样，他一度东躲西藏。他留在巴黎，一方面是为了谋生，另一方面是为了接近德·柏尔尼夫人，因此他必须随时转移住处，并且尽量不把住址报告给警察。

他第一次的藏身之所是他在最近几个月中邂逅交上的叫德·拉杜摄·亨利的家里。拉杜摄非常熟悉巴黎新闻界的情况，对这个年青人他也很关心。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而自己不大善于创作，对同情的知晓和批评方面有着女性的才思。他成功时并不盛气凌人而是和颜悦色，当失望时，他便默默地处于沉默的沮丧之中。他自己没什么天才，而却善于发现天才并能分享天才的不幸。陈匿埃·安德利的弟兄嫉妒地把他的诗锁在书桌里达二十五年之久，而正是他挽救了安德烈的诗而使之能流传至今。他还启发他的情人戴斯包尔德——瓦勒莫尔·玛赛琳写过一些空前美丽的法国抒情诗。他现在又把他的友谊和尊敬呈献给了一个接近三十岁而没有显示他未来天才的破产的印刷商；而且，再也没有其他人象他这样鼓励巴尔扎克，勉励他在写作上再试一次。这些，便足以说明拉杜摄的知人之敏锐的能力。

巴尔扎克并没有和拉杜摄住很长时间。为了按他那种特殊的工作方式去工作，也就是不停止的没日没夜地工作，并且他工作时要与人隔绝；自己需要一间哪怕只能容下他自己的小屋。为了享受这重新开始的宁静生活，德·苏维尔家同意他借用他们的姓氏。因为假如他自己的姓名去租房子，他的门铃整天都响着，而债主们管理破产者财产的官员，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涌来。从一八二八年三月间，巴尔扎克就借用“苏维尔先生”的姓氏，搬到了卡西尼街一所小房子里。他在那里居住长达九年之久。就是在这所小房子里，他把那些被他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所召唤出来的无数鲜明角色都移植到他的作品里。

从地理位置来看，卡西尼街给他提供了许多方便。那条街道处于近郊，居住着一些无名小辈的人物，根本不用担心人们想到这儿会发现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知名的作家。

“那里虽然远离巴黎市区，但它仍是巴黎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点象广场，又有点象大街，还有点象林荫路……；既在乡下它也在都城里，所有这些它都有点象，也全不象。它简直是一片沙漠。”

正象一个响马贼从他的城堡上守护一样，在黄昏，巴尔扎克可以下降到

“我想征服的就是我脚底下的巴黎。”否则，他可以拉起吊桥，防止不速之客的打扰。只有他的两个朋友知道他的秘密处所之所在。一位是住在楼下的画家波尔志·奥古斯都，另一位是德·柏尔尼夫人，这所房子大概也是她帮助看中的。不仅她的房子就在这横街上，而且这房子有一个狭窄的后楼梯，通过院子直通到一扇巴尔扎克卧室的密的门。因此，不论她来的多么频繁，都不会损害她的名誉。

这个住所费用比莱斯底居耶尔街多些。他占有三间房间——起居室，书房和卧室，以及一间讨人喜欢的小浴室——一年还不到四百法郎。但是，巴尔扎克不知道如何去节省。在他刚刚搬进新居之时，他就想要花一笔钱来装饰它。他像华格纳一样，当他仍在辛苦地挣钱的时候，他就想在他的环境中享受一下。华格纳只要搬一次家，首先便是请家俱设计商装置一天鹅绒的窗帘，把家俱覆上锦缎，铺上厚地毯在巴尔扎克勤勤恳恳地用功的环境之中，他需要纹饰甚至是过分装饰的环境，实际上，这种环境对于孤独的生活来说，是过于热闹了。他喜欢把房间装饰得有各种各样排场的背景，这跟他用大量的琐碎小事塑造小说中的那些角色的环境一样。这种琐碎的小事，是需要一个建筑师，一个裁缝，一个家俱设计商以及一个鉴赏家的综合学识。现在，他还没有钱购买更值钱的像意大利铜器，金鼻烟盒、装饰有花纹的马车之类的必需品。在卡西尼街，他暂时使用的都是价格低廉的奢侈品上。他搜寻遍了所有的古董店和古玩铺，去买那些没有多大用处的摆设品。他在玛勒街居然从债主们那里偷偷地救出了几件家俱。不仅他的父母，甚至他的朋友拉杜摄，都觉得一位不名一钱的作家，竟然对这些物品发生了女性特有的嗜好，真是太令人捧腹大笑：

“你简直一点也没有变。你挑选了卡西尼街去住，然而你从来不在那儿。你哪里都去，就是不到那个正在等着你，而你在那儿又能谋得生活的圈子里去。你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地毯，桃花心木的柜子，装订得极其费钱的书籍，多余的时钟上面。你搜遍了整个巴黎就是为了找一只从来不会向你放射光明的七星樵，而你的口袋里，连使你能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的几文钱都没有。”

也许在这种环境中，他需要依靠这种过剩来使他的内心的过剩得到平衡。他把他的书房简直变成了一个僧院，并且使它永久保持这样。那屋里的一张桌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他去什么地方，他总是带着它，好象有点迷信似地怕它离开自己。还有那只烛台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多半情况下是在夜里工作的。还有那架装纸张与稿件的碗橱，都是必要的。但是那间客厅必须是媚人地带着诱惑性：那间卧室，尤其是那间浴室，必须是妖艳的。他从那工作的黑暗的小房中走出来的时候，他要温暖的感觉，他要周围有肉感的颜色，他要有精致的家俱，以及一朵从财富的乐园中生出的五色云；他要有一些能使他脱俗的东西，因为这个原因，他将不会从他的梦想中突然地醒来。

但是，巴尔扎克能从哪儿弄到钱去买这些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呢？他不仅挣不了钱，还背负了六万多法郎的债务，而且光付这债务的利息就有六千法郎。在莱斯底居耶尔街，他为了省钱，不得不自己擦洗屋子，自己从六条街以外的地方汲水，虽然这样，才仅仅够糊口的。他现在欠着巨额的债务，怎么可能在买必需品之外，同时还买奢侈品呢？他小说里的主角，德·马尔赛，拉斯迪额，以及梅尔加特，帮助我们解开了这矛盾的东西。他们一再抗辩这个题目，说如果没有负债，或仅仅负小债，这就能使一个人节省，而巨额债

务却能使人奢侈浪费。当巴尔扎克一个月有一百法郎时，他在每花一法郎前都得再三琢磨。而当他负了一笔对他而言是天文数字的债务时，那就不论他是否偿还了债主们的另外几百法郎，或是在原有债务上再加上几千，都是没有两样的了。他的主角们的争辩——巴尔扎克也如此——说如果一个人出了名，或是娶了一位有钱的太太，或是在交易所里交了好运气，那就什么都好办了。相反地，如果徒劳而没有什么成就的话，那么他额外增加的债，对于他们的债主是不会有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的。

然而巴尔扎克注定会成功的。他深深地知道，真正的奋斗决不是仅仅为取得少得可怜的钱财而战斗，这些不过是战斗的刚开始。这一次胜利是会影响他的终生的。他把一座拿破仑的小石膏雕像立在他书房的壁炉架上，以改变他书房里空荡荡的感觉。巴尔扎克觉得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凝视着他。就像是对他发出挑战。他在一张片上写道“他用宝剑战斗并没有完成他的事业，我将用我的笔锋完成我的事业，以此来作为一种驱动自己奋发向上的原动力。他把这张纸条粘在雕像底部，留在那儿持久地勉励他，鞭策他一股作气，直到取得拿破仑曾经攀登到的果实；并且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在他白手起家之前，不过是住在巴黎一间顶楼上，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着时机。巴尔扎克以桌子为战场，以笔作为唯一的有杀伤力的武器，把几卷从没用过的稿纸作为他仅有的弹药，就这样决定去征服这个世界。

现在比起以前来可便利多了。巴尔扎克不仅发现自己工作的才能，而且知道他工作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过去的十年艰苦的挣扎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发现了取得成功的条件主要是坚强的性格加上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认为，只要他专注于某一方面的事业，并且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向它。那么，这种意志力是会创造出奇迹的。只有目的的单一，专注的集中，这才是生命力量的来源，它也一定会保证你走向成功。他在商业方面太幼稚了，太缺乏经验了。他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在里面，并且把注意力始终都盯在上面。还有，他并未像成功的商人一样，把每一分钱以及每一份订货都看得格外重视。在他从事印刷业的冒险活动中，他也并没有把每根弦都绷紧起来，他的聪明才智并没用在上面，而是花了不少时间去从事写作事业。如果他现在再想在文学上有所发展，他必须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里面去。并且从事创作他也有许多便利的条件，首先是他通过大批匿名作品锻炼了他熟练的写作技能，其次是，他经过和各方面的人的接触以及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他的创作材料显而易见地足够满足他广阔无际的素描了。他侍候过不少主人，并且什么工作都愿意干。他快三十岁的时候，他的学徒生涯已宣告结束，他将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以全身心的力量投入到他所从事的工作话。

为了自己以及新的工作，他决定用启己的真实姓名去出版他的一部作品。他只要隐藏其庐山真面目在名字之后。（他除了能迅速地获取一笔收入外，没有其它别的目的。）他不论赞美谁或是责难谁，都只能给他带来一点小小的责任，因为大部分责任都由那位真实的德·圣沃盘先生担负了。然而转念一想，一旦在市场上，他的作品能赢得众多的读者并且能给他打开一个新局面。他就再也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一个依靠流行小说吃饭的人。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真名写在新的招牌之上，他必须以真实面目进入作家群，并且打算跟最成功的、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一争高低。他不但要跟他齐名，而且还要超过斯各脱，他给他的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作的序言，就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的：

“作者从来都不想把自己限制在单一的叙事体风格之内。那种风格实际上使人昏昏欲睡，动作也是按部就班，就好象给读者展示一幅清晰的骨骼表图。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深刻的教训，现在人们必须用自己都能了解的方式描绘。这种方法许多天才的作家已苦苦追索了几十年，现在作者也决定加入这个搜寻者的行列。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重新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把历史上一桩偶然的事件赋予其伟大的生命力。他宁愿采用活鲜鲜的口语而决不用官方文件式的记录，宁可描写战争本身而绝不是把它当作战争的总结报告来写。并且他不是用史诗般的叙述，而是动态的戏剧描写。

巴尔扎克很早就尝试过写韵体悲剧作品，不过这次他是第一次全力发挥而对待其工作的。而不久的将来，世人会惊奇的、心甘情愿的接受他极度专心致志听取得的成果。

巴尔扎克很快就开始工作了，为这本他选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素材。在稿纸中，有一本内容是，与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旺代叛乱有关的事件，其名是“少年”。另外一些情节，他是从准备放在另一本有关西班牙的匿名作品里取出来的。然而，他那日益增加的责任感使他醒悟，在他较早期的历史小说中，有很多史料是虚构的、错误的。要是他选用他同时代的题材，仅仅靠纸片上虚构的情节充实人物、环境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以白描式的笔法叙述生活中的实际环境，并且赋予它典型的意味，生命的旺盛力。他以前的关于中世纪的小说，只有专家才能看出他的毛病之所在，而旺代战争离他所处的时代也并不遥远。无数目击者——那些参加过革命军或与加都答尔的农民军打过仗的人——现在仍然活着。巴尔扎克于是用他那踏实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去开展工作了。他从图书馆借来当时人们的回忆录，仔细研究那些军事报告，并大量地摘录了许多有用的细节。他发现，那些微小的、无足轻重的但真实的琐碎小事，竟使一部小说令人相信它的活泼生动。艺术是需要真实的，如果那些角色所依存的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土壤，他们是绝对不能生长发育成丰满的人物形象。必须使他们生存在那个时代的土壤和环境之中，让他们呼吸着那个时代的空气。然后，巴尔扎克便带着他的第一部独特的、有鲜明个性的现实主义小说登上了舞台。

巴尔找遍了所有能利用的材料，并仔细研究了两三个月。同时，他也熟读各种地图。尽可能准确地寻找各个部队的军事行动。是的，一切直接观察生活比最敏锐丰富的想象力部要明确得多，并且给人很深的印象。巴尔扎克认为，除非德·维尔纳小姐坐马车跟他的女主人路线一致，她的旅途所见所闻就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他只有置身于真实的现实环境之中，并且发挥其独特的、丰富的想象力，他创造的那些人物和景物才会生动有吸引力。

真是凑巧得很，一位曾经参加过抵抗朱安党农民军的老年人，刚好就住在当时军活动的发生地福吉尔。并且，这位德·彭迈惹尔男爵是巴尔扎克家族的一位老朋友。即使因这次旅行借债，或是写一些骗人的作品（即使一些研究巴尔扎克的专家都不能断定，在他开始写正经小说的时期，他倒底写过多少糊口作品。）这样的有利机会绝不能错过。他急躁地向德·彭迈惹尔男爵坦白，说他由于经济状况不稳定，他必须被男爵邀请到他家去小住。而德·彭迈惹尔男爵，大概在偏远的村子里过于寂寞，并且像每一个老战士一样，喜欢有人洗耳恭听他往日的战斗故事，于是复信说欢迎巴尔扎克去他家。

他那时依然很爱虚荣，象他后来发生的事一样，在他一百三十件背心中

挑选一件最考究并且最贵的。同时他也没有自己的马车，让一位穿制服的侍从陪着旅行。于是他穿得非常俭朴——甚至可以说是衣衫褴褛——爬上了公共马车，并且找了一个价钱较低的座位。他连全程的费用的付不起，因而最后一段路他不得不步行。他这种在公路上步行的情景，加上已经有点乞丐的装束，使得他就象一个落难逃荒的人。当他满衣泥污和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德·彭迈惹尔的门前时，竟然被当作流浪者。不过，这种印象不久就消除了。在初次介绍尚未结束之前，他便满心喜悦起来。因为他终于找到好去处了，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内，吃住是不成问题了，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兴奋，紧张的心情也就渐渐松弛下来。德·彭迈尔夫人给我们留下了这第一次会面的文字记录。她把他身上放射出来的生命力，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

“他是一个短小但块头很大的年青人。由于他衣着不合身，使他那大块头的身材格外明显了。他的帽子真是糟透了。可是他把帽子一摘下来，让人看到他那富有表情的面貌时，一切不愉快的事都已经忘记了。从此以后，我只注意他的脸，任何没有见过他的人，根本想象不出他的前额是什么样，他的眼睛又是什么样！一副宽大的眉毛非常清晰明显；含黄色的眼睛充满表情，就跟他说话一样。他的鼻子高而方，大嘴永远含着微笑，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他的髭浓密，头发垂到肩了。在他刚到的时候，他全身都显得瘦小，就像从来没有吃饱过……他的整个仪表，他的一举一动，他的魅力，以及他讲话的方式，都显示出了的天性的善良、纯朴和坦荡。人们看见他的那一刹那，就已经不能不喜欢上他。他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永久的好脾气，这种好脾气太丰富了，简直都能感染别人。

他在德·彭迈尔家休养得很好，以致他返回巴黎好几个周，都还没有消失他那“新获得的肥胖和良好的气色”。

他原打算在那里只住两个星期，结果竟住了两个月。他倾听德·彭迈惹尔的怀旧之语，记录着，并且还边写作。他已经忘掉了巴黎，忘记了他的朋友，甚至是德·柏尔尼夫人。他曾向她发誓，他一定会把记录着日常生活的印象的日记寄给她。他全神贯注地生活着，那种聚精会神的状态，将会是他顺利成功的第一步而已，他全身心地专注于他的工作，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可以把他的新小说的几章，寄给在巴黎的拉杜摄。

拉杜摄有发现天才的良好本事，他立即预言巴尔扎克有希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预言最初可能是诚恳真挚的，结果却真正地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决定为这本未来一定畅销的小说一本姊妹篇，并且深知巴尔扎克不会拒绝，于是就把一千法郎作为这本尚未完稿的小说的版税寄给他。巴尔扎克当然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虽然他以前毫不费力地就写了几本书，并且兜里就装了一千五到两千法郎的现钱，而按目前的情形，一千法郎的现款已算不错的了。要是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那他们的交情也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拉杜摄过去一向认为巴尔扎克写作速度较快，不论是写凶杀的，残暴的，还是言情小说，他总是一天都不误地能拿出稿子，而现在他却发现一件令他不愉快的事情，他总得提醒巴尔扎克快点把稿子交出来，但他都不大愿意，除非他自己对稿子已经满意才行。以后的耽搁稿件的事就接踵而来；当稿子费了很大工夫最后从那位推三托四的作家那弄出来，并且排好了版时，而巴尔扎克却又把那稿件作了无数处的修改变动，以致稿件不得不再一次排版，拉杜摄发火了，他认为巴尔扎克永无休止的删改，使他蒙受了金钱和时间的双重损失，但是巴尔扎克依旧是我行我素，从不着急。艺术家的一种重要的责任

感就这样竖立起来。巴尔扎克第一次感到他的巴尔扎克·奥瑙利是多么的神圣，他必须为他的姓名负责，他决定要使他的姓名永垂青史。虽然他对事业和自己的负债都无所谓，但写作这件事对他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容不得丝毫马虎和儿戏的工作。

巴尔扎克的《最后朱安党》（或《一八 年的不列颠》）由康耐尔出版店在一八二九年三月中旬发行了。这本书共四卷，签署的只是巴尔扎克·奥瑙利，而还不是德·巴尔扎克。这部书没有取得预定的效果，其原因是存在的。在这部书里，巴尔扎克第一次显示出大作家的大手笔，他用极熟练的笔法展开场面，生动的身临其境的战斗描写，全书的布局和照应简直处理得完美极了。雨洛司令间谍高乃丹这两个人物，是实际生活中人物的摹本。他那对政治的深刻的洞察力，把那个时代的特征绘画般地绘下来了。他把他终身崇拜向往的、拿破仑强有力的敌手福赤从许多阴影中形象地勾勒出来。只有这本书的情节可以让人了解到他是曾经写过德·维尔纳小姐这个角色的流行小说的作者。因为他队两三年前出版的一本用假名的小说里移植了大量写得不太深刻的情节。

尽管巴尔扎克和拉杜摄花费了不少精力为这部小说作宣传，但巴黎的批评家们却对它没多大兴趣，并指责它“风格太拙劣”。即使巴尔扎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前些年粗乱写作给他造成了不小的损害。甚至在五年之后，当他用了最大的努力去洗刷他的风格并写了一本新小说送给热拉尔男爵去看他这部“修正了风格的作品”，他仍然认为：“不管我怎样善于伪装，恐怕我这初出的手笔写出的作品，别人总会看出来的。”同时，读者对这位未来的斯各脱爵士的法国作家，也并不是特别热情。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一年仍然只卖了四百四十部。对巴尔扎克天才的过早的相信，必然会导致金钱上的损失。

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补偿了巴尔扎克这次不完全的成功。当他的《最后的朱安党》还没有完稿的时候，出版商勒瓦瑟尔发现了他的住址，并且拜访他，毫不留情地提醒他，在一年前他曾付给他二百法郎叫他写一本叫作《商人手册》，然而巴尔扎克早已把这件事给忘了，但是勒瓦瑟尔却坚持要求他非履行合同不可。巴尔扎克不愿意打断正在进行的正经工作而转去写一本流行的小册子。于是向他的债权人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即在他的旧稿中找一本《婚姻法典》——这本曾用《结婚生理学》的名字在他自己的印字馆里排印过——如果勒瓦瑟尔同意的话，他准修订这本旧书来偿还他所欠的二百法郎。勒瓦瑟尔恐怕很清楚从这个贫困的作家身上是弄不回二百法郎的。只好答应了他这个意见。

巴尔扎克又开始工作了。在他写完时，原作已经没有多少了。近年来，他读了不少拉伯莱的作品，于是他使用一种充满激情的风格取代了他从前模仿的斯特尔纳·劳伦斯的冷峻风格。德·柏尔尼夫人与一位新结识的德·葛朗台公爵夫人，给他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掌故。于是，这本为偿还一笔遗忘债务而写的书，就成了一本光芒四射、妙趣横生、笔调多姿的作品。这本书中的大胆的怪论调，带有侮辱性的媚劲，以及讽刺幽默的怀疑，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种争论，既有善意的，又有恶意的，它马上就要爆发了，而就是这场争论，使得这部作品相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日后成为巴尔扎克忠实的顾问的女人，真是又气又喜。她们有的褒扬他，有的贬斥他，有的恭维他，有的则是批评他。然而不管怎样，这本书在以后几星期内，成为

人们茶余饭后唯一的谈资。

巴尔扎克还没有打开他的局面，他还没有成名，然而有一件事算是成功了。他引起了巴黎人的注意。他被人们邀请出席各种活动，因此，他必须制套得体的服装和漂亮的背心。同时，德·葛朗台公爵夫人把他引见给瑞卡米耶夫人。在当时，这位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文学交流的场所。当他拜访苏亚菲和盖·戴尔凡夫人时，他结识了已经成名的同行，雨果，拉马丁，以及查宁·儒尔。只要更努力一点，他的一生中的第二次乞望就可以满足。届时，他不仅出名，而且也会被人爱恋。

路虽然还没打开，但已经冲决出一个缺口了。巴尔扎克巨大的创作力，正像一股被拦截的洪水，潮流般地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冲泄出来。巴黎的人们认出了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虽然他既能写出一部正经的历史小说，也曾写过象《婚姻生理学》那样的流行小说，他就开始被鲜花掌声，以及那些潮水般涌来的委托书给弄得晕头别转向了。然而，那些委托人，竟一点也不知道他写作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巨，也没料到他们第一次约稿竟会带来如此轰动的反应。

当巴尔扎克的姓名开始有点价值后，他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三一年这两年的创作成果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能与他比拟。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评论、小品文、报刊文学，以及政治纪事。如果把一八三〇年出版的、确实出自巴尔扎克之手的七十多种作品和一八三一年出版的七十五种作品统计在一起，两年中他平均每天要写将近十六页的书，并且不计算他在稿件上的修改。巴尔扎克的名字，出现在所有的期刊和报纸里。他把一堆内容庞杂的稿件投到几十种出版物上。他谈到《装饰的哲学》或《烹调生理学》。一天写拿破仑的事迹，第二天又写《一般人看道德》。在争论《圣西门的门徒和圣西门主义者》时装出哲学家的一派神气。再不就发表一篇《我对食品杂货商的意见》。深入研究《捧场家》或《银行家》、对《引起打架斗殴的原因》加以讽刺嘲弄，并讨论《一瓶香槟酒与它的道德》或者是《雪前烟与生理学》等等。

在巴黎这个新世界，像巴尔扎克这样多才多艺与聪明，并算不上很稀奇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行行色色的迎合潮流的作品中，竟可以找到能够流传久远的、完美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跟那些转眼即逝的作品一样，只是限于一个小小的范围，并且是用同样迅速的速度，只花一夜就完成了。《沙漠中的情爱》和《刽子手与侯爵》这些小说就把这位以前一直鲜为人知的、有如此高明的写短篇小说技巧的作家展露在大众面前了。他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前进着，并且逐渐发觉他能做的事真不少。他的力量在前进中增长。他用那种描写巴黎日常生活的写实手法，写出了象《女人研究》《三十岁的女人》和《家庭中的和平》这类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被误解的妻子”的典型形象。这些女人因为婚姻而幻想破灭，由于丈夫的冷遇和漠不关心使她们落魄丧魄，就像患上了忧郁综合症似的。这些小说，依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有点过分地显示出病态美，因为它们的伤感氛围过重，同时，它们由于缺乏客观现实性，大大地损坏了它们的内在力量。然而在当时，它们却吸引了许多热心的读者。在法国和其它许多地方，无数女人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能诊断她们忧郁的医生，希望他能把她们的“被误解”的泥沼中救出来。他饶恕了女人所有因为爱情而发生的错误，并且敢于主张，说不但“三十岁的女人”而且“四十岁的女人”特别是四十岁的女人，有本事，有理由去恋爱，因为

她们有成熟的、丰富的经验和辨识力。的确，只有他才了解她们。她们把他当作她们的代理辩护人，帮她们在法律和资产阶级道德方面的过错加以辩护。而且在他理想的人物素描中，不少地方戴格曼夫人看到她自己的身影。他那部在一八三一年四月问世的“世人生活的场景”，被人们在世界各地，包括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热心地阅读着。他的口号“三十岁的女人”宣告了青春已逝的女人的恋爱权利。

他的那些女性读者，喜欢把小说里的那些自己所满意的角色当作自我的化身，沉浸在她们顾影自怜、感叹红颜薄命之中。甚至连一些比她们要古板得多的读者，也不能不为这位文坛上的多才多艺的青年作家的力量所折服。他写的《红色旅店》是那样的描写简明有力，以至于他同时代的已经成名的人物，没有一个能够写过跟它匹敌的作品。在他的天才使得批评家们惊讶之后，他的《无名的杰作》更加显示了他天资的深度。特别是他的同行们，认为他那种急于达到一切艺术最深奥的本领的心情在此以前是从来没有人到如此狂热的地步，以至于超出了一般作品的意义。他的多方面的天才，都反射出它本身蕴含的内在的光彩。而他的天才正是在他丰富的、庞杂的知识经历中得到的。只有看他的全部成就，才能见出他的各方面的本领。

正是在《驴皮记》里，巴尔扎克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真正的内在心源。他在这个故事里点出他的宗旨是：把小说当作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所反照的是那高高低低的贫富悬殊的阶层，天才和资产者，急需要食物的和大量地挥霍浪费的，巴黎孤寂的顶楼和嘈杂热闹的沙龙，金钱的本领和它的无能等等。精确的批评家和锐力的观察家，认为他的那些伤感的浪漫主义已有了真实的感觉。《驴皮记》里的一个明显浪漫特征就是把东方的童话《天方夜谭》移入巴黎。更富有浪漫性的可以从那个残酷的福多尔伯爵夫人以及跟她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保琳。前者是一个宁可奢侈浪费而不愿恋爱的女人，后者却是能永远地舍己为人而且愿意恋爱的女孩。然而，现实主义的影子仍可从他震撼同时代人们的巴纳加里亚身上找到，而且关于他求学时代的自传性的描写，也是直接从他个人的现实经历史得出来的。很显然，小说中那些医生们的争论，高利贷者的逻辑，不仅仅是从沙龙中窃听的谈话的再现，更主要的是角色的典型意义的概括。

经过十年的挣扎与绝望，巴尔扎克找到了他自己真正的事业：即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家。他可以给那个奇形怪状的巴黎，法兰西，或者全世界，进行心理咨询，诊断病情，医治疾病，或是绘出它的“肖像”甚至它的全身的像，并且作为一个审判官和文学工作者，来揭露和批评这个世界的不正常的现象。如果说他首先发现的是自己巨大的工作能力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个并非次要的发现，乃是运用这种力量的目的之所在。当巴尔扎克找到这个目的时，他也就发现了他自己。在这以前，这些力量只是堵塞在他心里，他始终觉得这些力量是抵挡不住的，它们最终会把他带到那广阔无垠的世界之中去，在他同时代的民众之上翱翔：

“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同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着我去追求权力与荣誉。”

跟歌德一样，甚至在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柏尔里卿根骑士》成功之后，他还是没有勇气承认他的天才应运文学而生的，而且仅仅是为文学。同样，巴尔扎克在《驴皮记》成功之后，依然不相信文学就是他真正的事业和命运。实际上，他的天才在他所采取的任何方式下都能显露出来的。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可能成为第二个米拉保，成为一位达利兰，成为另一个拿破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画商，或者是一个商业投机大王。这也是他早年为什么始终不相信他生来是一个作家的料，而一个深知他的人高提埃所说的大概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他并不具备一种文学的天才。在他的整个表现中，思想和方式之间隔着一道特别是在最初阶段他根本不可能越过的鸿沟。”

写作对他而言并非绝对必要，他从来都不认为当作家是他的天职。他觉得写作只是许多可能性中挑选的一种，通过写作，他能够获取财富和名誉。并以此达到控制整个世界：

“他发誓要成为一个伟人，并且放射出比流还要强的那种力量，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确实的天才就来自他的坚强的意志，而他坚强的意志帮他在文学上找到了出路，这可以说是机会或命运在作怪。世界每一个国家里，都有人喜欢读他的作品。老年的歌德都曾向爱克曼表达了对这样一个杰出的天才的惊异之情。同样，不少评论刊物和新闻报的编辑，都打算用最高的代价诱惑他，可是他却仍旧没有信心。一年前他曾写道：“一张邮票和坐一次公共马车，这些对我都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且我呆在家里，为的是不弄破我的衣服。”

现在，虽然他每天都接到数不清的委托单，但他仍旧觉得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已。最迟在一八三二年，他还给他母亲写信：“迟早我是会发财的，不管是当作家，或从政，或者进新闻界，也许是娶个有钱的太太，还可能是一笔有希望的大买卖。”

一段时期，他的脑子被从政的念头给充满了。一八三一年七月的革命。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且给有为的青年提供了许多施展本领的机会。那时，法兰西议院中的一位下议员，他开迁之快就像拿破仑时代的二十五到三十岁的陆军上校那样。巴尔扎克差点决定为政治而放弃文学了。他自己投入到热烈的政治热情的氛围里，而且打算到康伯瑞和福瑞尔两地去竞选。他热切地希望掌权；如果那些选举人对他有好感的话，他的政治野心可能就要实现了。他可能成为法兰西的一位政治领袖人物，而绝不作特等，或者，他甚至可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

真是幸运得很，这两个选区的选民都没有投他的票，他的政治希望破灭了。然而另一个潜在的危险依旧存在：他还可以找“女人和财富”，找他终生所追寻的“富有的寡妇”。如果这样的话，他的苦干精神就会丧失殆尽，取而代之就会是快乐的生活和享受。因为他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同样大的环境压力分不开的，虽然这一点他并不知道。不论在什么时候，即使他名声已很显赫，只要他找到一位年收入三万或四万法郎的寡妇，他就准备从文坛上退隐，过另一种安逸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曾经向他的朋友卡罗·卓尔玛坦言：“我情愿置身于家庭的温馨之中。”并且他向她描绘他在乡村生活里的梦想：在那里，只要他有兴趣，就会以一个“业余文学工作者”的身份偶尔写几本书。

可是上天就是不尽他的意，并且不让他的舒适的、快乐的梦想过早地实现，因为上天要他从生活中取得比他的梦想贵重得多、有意得多的东西。于是，上天拒绝他梦想在交易所里一下子赚很多钱财，阻止了他坐在内阁大臣的位子上而避免他糟蹋他的才能，并且总是让他找不到他想得到的那些富有

的寡妇。他使巴尔扎克早年对新闻界的激情变质为对所有报纸作品的鄙视。他把他紧紧地吸引在书桌旁，在那里，他发挥出来的才能不仅能够征服议院、交易所，或者一个奢侈的王室家庭，而且能征服整个世界。他象一个狱卒一样，严格的管束着他，一次次地驱使他回到他的工作中去。上天总是横加破坏他所能享受的自由、爱情以及权力的任意运用。他每一次试图逃跑，上天便加倍地把他套紧。在他早年成名的时候，他被一种不知名的感觉侵袭，他的负荷越来越重了。他总是反抗和设法逃避，他从来都没有停止渴望奇迹的出现，那奇迹使他摆脱了牢牢的束缚。他继续梦想着一次次大的侥幸，一位富有的太太，以及一次奇异的转运。

但是，逃避命运是上无所不允许的。命中注定了他必须从事文学创作，因此他那被紧闭在内心里的力量，应该为它自己构建一个范围广阔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幅员是无边无际的。他刚开始工作时，他就发觉，如果要让他或他的读者能领略这广阔无垠的文学世界，他就必须有条有理地把他内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白出来。既然文学是他的活动的天地，那么他千万不能胡乱地写他的任何一部作品，而要把它们变成一个一切人情风貌和生活的形式。当他把这些小说的第一部送给他的朋友时，他写道：“我工作的下一步又有了模糊的影象。”他曾经酝酿了一个结果圆满的构思：使各个人物角色在不同的书中重新出现，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一部完整的具有文学性的当代社会的历史，它包括了一切阶级的活动、职业的艰辛，人们的观念、情绪和要求、欲望等等，而不必用一串小说来联接它们。他在《哲学小说》里，请查斯勒·菲拉瑞特按他的意见写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他要求读者作好准备接受他在文学方面的革新。一部当代社会的历史于是被设计好了，而第一卷是：“一组壁画中的第一幅画。作者着手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了。在作者看来，这个时代因为它玄浮的想象和个人极欲主人已经堕落了。我们能看到作者是如何不断地在调色板上调合颜色。他是怎样把一个一个人物——乞丐、农民、市民、内阁大臣——介绍给我们的。即使描绘教士甚至国王的画像，他也是决不会弄虚作假、犹豫不决的。”

巴尔扎克现在的确还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的范围是多么的大。他在写《人间喜剧》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竟然是在记录一个时代的史诗——这些事实本应是时代告诉他的。当他的艺术家因素占据他的整个心灵之际。这个伟大的图景已经展现他的脑海里。但是，二十年的丰富的而且是无比的辛酸的经历，却还是不够用来充实这个图景，使其变得具体可感。

第二章 在时代的深渊写作

第一节 三十岁

自一八三一年开始，在巴尔扎克三十岁的时候，而且他的第一部作品公开发表的时候，从那时开始就永远成为“德”·巴尔扎克·奥瑙利了。这个辛劳异常并且曲折发展的阶段是结束了。无论从一个成年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人的人格来讲，他的发育阶段快结束了，无论是他肉体的外型，或是他做一个艺术家的发展，或是他的道德观念，都没有明确地改变再发生。他找到了生命的方向，这个有丰富创造力的作家已安排下工作计划，这个有勃勃雄心的建筑师已初步设置他未来建筑物的试验计划，并且巴尔扎克以其“雄狮般的勇敢”，投入当前的事业之中。只要他的生命力仍继续存在，他的日常工作的节拍便会不中断但也不减少地继续下去。从他投身于事业的一瞬间开始，这个事业的规模事实上是无穷尽的了，只有死神才对他“普罗米修斯”的意志有限制。写作中的巴尔扎克，可能是近代文坛里所能寻到的创作上有耐久性的最伟大的例子。像一棵苍天大树从土地的无穷根源里吸收养分，他以他庞大的力量笔直地挺立着，——直到他被巨斧砍倒——一枝又一枝地指向碧空，牢固地扎根，顽强的运行他那勃勃生机的命运：发芽，开花，并结下累累的硕果。

尽管他整个事业的突飞猛进，巴尔扎克却再也不改变了。倘若一个人把他五十岁的形象和三十岁的对比一下，他只会发现一些细小的不同！头发上多了一丝白发，眼眶下多了一抹阴影，以前红润的容颜上被少量的苍白所代替，但是大致的肉体外型却没多大的改变。当他二十岁时，他的那些男性特征已基本上定型下来了。这“矮小、瘦弱、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在他这种不加修饰的外貌里，唯一明确的只是一个和未扬名前的拿破仑相似的面形。）令人奇怪的是，竟复原为那“圆形面孔的胖孩子”了。只要他坐在写字台前，他神经中的高度亢奋，踌躇不定，急不可待，随遇而安等因素，就屈服于气象阔大和从容自信的气概满注了力量和自信的感觉。当他写道：

“在阿尔苔斯的眼里，那曾经一度闪烁着高贵野性火焰的神情，在成功到来之前，已疲惫不堪了。他眉宇间的庄严的思想已经渐渐消褪，曾经瘦弱的身体已经强壮起来。过上好日子的，闪烁着金黄的光芒已镀上了他的面孔；那张面孔，当他年轻时，曾露着为贫困所包围的，苍白的颜色——显示出一种正使尽全身气力，不断争斗，直至胜利不罢休的气质。”

以上是在阿尔苔斯的角色中描绘自己的形像。

由于他形象造成的第一个和——正像多数的艺术家们的情形一样——不可靠的印象，是一个身体健康，喜爱享受，和愉快的好脾气的印象。尽管那修饰整齐的额头上，堆积着他不太干净的头发，可是他脸上松弛的肌肉，带着它那油性的皮肤，疏落的髭须，近有那宽阔而不规则的面容，给别人一种错觉，觉得这是一个贪图享乐，有长时间睡眠，好吃懒作的人的面孔。只有当人们看到他宽得像举重运动员的双肩，他自己笔下芜特灵的双肩；当人们看到他那富有筋肉的，像初生牛犊一般的，能连续工作十二或十四小时却不疲倦的脖颈；当人们看到他那像运动家一样的坚实的胸膛：只有此时，人们才会可能想到此人身上藏有某种巨大力量。从他的身体来看，这爆发力量的

源泉就在那松弛的下颌底下。他的身体是用铜铸成的。它那主要的性质是蕴蓄于它的雄浑奇伟之中，蕴蓄于它的不可用言语表达的顽强生命力中，正如他作品中写的一样。所以，要想从巴尔扎克的面部去察觉他天才存在奥秘的任何一种尝试，都是徒劳和根本错误的。雕刻家德·安志尔·大卫打算向众人显示他有天才的印象，加高了他的上额，并塑成一些隆起部分，就好像这位作家的思想，要冲破阻挡，灵魂出窍似的。而画家白朗志则打算用一袭白僧袍来遮掩那无所顾忌的肚皮，并想把他全身的风度整饬一番。罗丹也同样地给了他一个从悲惨幻梦中惊醒过来的失神丧魄的模样。为了让其内里的天才易于辩认、识别，为了要加入一些有魅力的或英雄的因素，所有这三位艺术家，似乎都感觉到有必要加强这副缺乏显著特征的脸孔。而巴尔扎克本人，当他在佐·麦卡斯一角中再度描绘他自己的小影时，也做了同样的努力。

“头发像鬣，鼻子又短又扁，鼻子头上皱着，而且鼻孔有狮子那么大。前额也像狮子一样，并且被一条大大的深沟分割成两块有力的隆起部分。”

诚实的观察者必须无情地承认；像如托尔斯泰或路德一样所有真正有代表性的民族天才们，巴尔扎克看上去只像是群众中的一员，也就是说，他脸孔的本来样子，只是他故乡中无数个卑贱平民们脸孔的摘要罢了。巴尔扎克的脸孔是勿庸讳言地平凡，甚至于有些鄙俗。特别在法兰西，最高智慧的成就来自于两种类型之中的：一种是贵族化的精炼地升华了的，比如从李志留，福尔泰尔或梵立希身上所发现的；另一种则显示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顽强生命力，如从米拉保或唐丹身上所找到的。巴尔扎克则完全属于天然的类型，既不属于贵人们，也不属于贱人们。如果他系上条蓝色围裙，站在法兰西南部某酒馆的柜台后面，他那讨人欢喜的神情，将和任何一个一面斟酒，一面同他的主顾聊天的目不识丁的掌柜的神情没有多大差别。或者把他算作一个庄稼汉，算作一个街头的挑水夫，算作一个税吏，算作一个在马赛妓院里的水手，巴尔扎克看上去也没什么不妥之处。只有穿着衬衫或随便的衣服，他方显出真诚和本色。如果他想变得高雅些，并且显出贵族的神气，头发上抹上半瓶头油，眼前挂个单腿眼镜，去模拟圣日耳曼镇的纨绔子弟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好像化了妆去参加假面舞会。就像他作品里一样，他的能力不在技巧方面，——当他涉险到哲学的或感伤的领域里面时，在那儿他对自己并不忠实的，——而是在他的本色方面。他主要身体的特征，同样地，也是他的生命力，他的活泼，和他的体力。

把这些特征用视觉表示出来，并不是画张肖像可以奏效的。那只是一段拷贝中抽出的一个静止画面，一刹那间的停顿，一个断片的动作。但是我们从他的各类肖像画中去推想他身心方面的丰富，比我们从他若干作品中的某页去推想他天才般的精神生产力，也同样地强不了多少的。往他脸上仓促地、表面地看一下，是找不出什么东西的。所有和他同时人的记载都证实了这一点。当他那矮胖的身躯，因为爬楼的费力，还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披着一件扣错钮扣的棕色外衣，鞋子多半忘了系带子，投入一把圈椅，他那体重使得圈椅咯吱怪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糟糕得很。这个蓬着头、满脑肥肠、粗野的，却浑身冒香气的家伙，竟能是我们的权利的保护者，我们最隐密的情绪的歌唱者——巴尔扎克吗？这就是那些惊讶的贵妇人们的心中疑团。而另外在场的一些作家，则满足地斜视着镜子里面，来证明这事实：他那么多的小布尔乔亚气，并且没有他们聪明。许多嘲笑躲藏在扇子后面，同时那些高贵的绅士们则交换着恶意的目光，冲着他们的平凡却危险的文坛劲敌。

但是，一旦巴尔扎克开了口，最初的可怜相便消失了，因为一股四射光芒的隽语的激流，像电一般地感染了这氛围。在他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时，——宣讲哲学或简述政见，把他那愈说愈玄妙愈不可信的，真伪参半的传奇或掌故所做成的大节目引为谈资，——他吸引住所有的眼光。在他嘲弄，吹牛，哂笑，和陶醉他的听众和他自己时，从他漆黑的眼睛里迸出了富有戏谑性的好脾性的金色火花。当他能够散布他那普泛的友情时，没有人可与他相比。

他的作品迷惑他的读者的魔力，是和他肉体的活力所播扬的魔力同样不可比的。他做的每件事似乎都有十倍于人的强度。甚至他笑时连墙上的画都在颤抖。他说话的时候，话语像瀑布般滔滔不绝，使人们忘掉口里的坏牙。他旅行的时候，每半个小时掷给车夫一笔额外的小费，催他赶马儿快些跑。当计算钱财的时候，千百万的钱叮叮当当地纷纷坠地。他工作的时候，废寝忘食。他坐那儿一写就十二个小时，磨钝了一打的笔头。他吃东西的时候，——下面就是作家戈佐兰对他品头论足的场面描写：

“……他的嘴唇颤抖着，眼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双手由于快活的期待在抽搐着，看着那一堆艳美的梨或桃……他那种浮夸的，庞达格律耶尔式的神气真是伟大；他解开领带，同时敞开衬衫的竖领；手里拿把水果刀，他喝着，笑着，一面把刀切入一只大梨多汁的肉里……”

巴尔扎克天生决没有一丝小器。他具有孩子般的好性情，而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它。虽然他知道他那些同行们对他的笨重的丰采感到发窘，并在他背后窃议他缺乏风格以及其它恶意的诽谤，但他却作善意的周旋，把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写进《人间喜剧》，并且把作品呈献给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一处可以找到对某人的非难，他是豁达大度以至不能与人为仇的了。当他虐待，并使他的出版家就范的时候，并非向他们勒索几许额外的法郎，而是出于一种欲望，一种逗他们玩耍的欲望，并且表示他们是他们的主人而已。当他说谎时，并非想要骗人，而是由于他的幽默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他把那些举动弄得格外夸张起来，是因为他知道人们嘲笑他的那些被认为幼稚的举动。他向他的朋友讲一个言过其实的故事，以他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眼睛观察，他的朋友根本不信他说了一个字；奇怪的是，故事第二天一早便轰传整个巴黎。从而使他更厉害地渲染他的故事，往故事里添油加醋。他看到人们认为他有点怪气，而且不入他们的俗套，他甚为自得。当他预先知道有人将以他为笑柄来讽刺时，他就先以拉伯雷式的风致讽刺过自己了。反正他们对他又损害不了什么。他被所伸意识所控制，觉得皮肤下的肌肉和脑子里的灰细胞皆强过他们，于是便放任自流了。

巴尔扎克的自恃，来自于他身体和智慧双方的力量的感觉，而非他的名誉与成功。因为从其文学上的成绩看，甚至在《驴皮江》、《高里奥老伯》和十几种其它不朽杰作以后，他仍不能自信。在他的生命力中，他那元气丰沛的自信，是一种天生的东西，而非生自自我反省，也非生自其他人的判断，也非生自一种轩轾轻否的衡量。他享有内心里丰富的感觉，不用于醒悟的自我批评或自省的分析。像他给德·葛朗台公爵夫人的信上所说：

“我的五尺身躯之中，充满着每一种可能想像的对比和矛盾。倘若任何人高兴说我是虚有其表、顽固、夸张、轻浮、思想无定见、粗心、放纵、奢

侈、缺乏适当的反省和不够辛勤、不坚忍、欠圆通、好饶舌、天教养、粗鲁、神经质。以上的可靠程度，也就像别说我是节俭、谦异、不屈不挠、勇敢、勤苦、积极进取、坦然自若、沉默寡言、有定见、高尚与文雅、永远愉快。或者说我是一个英雄或懦夫，一个聪明人或白痴，一个天才或笨蛋，都能同样的真实。不管说我什么，我都不会惊诧。终于断言地相信我只不过是一个环境的玩物、一个工具而已。”

他总是昂着头，愉快并且勇敢，无论别人怎样诅咒、赞美、嘲弄他，而且毫不在乎地继续向前做去，坦然地接受一切命运的打击。他能够对一切不计较，虽则他有幼稚的虚荣心，但却绝非小器，他有着那样一种微醉的人才有的坦然自得。

像这样一个带有深厚基础的大方的天性，肯定是有些夸张的。虽然巴尔扎克在每一方面都挥霍无度，但他在人群中消耗的时间必然非常经济。他曾说过，他“一天只有一小时给这个世界”，他的生活中是没有余隙去搞社交的。所以，和他密切交往的朋友寥寥无几，和他真正亲昵的不足十个人，除一个最重要的以外，在他三十岁时都没有更多地介入他的生活。晚年，他友谊的圈子很小，就和他的处世经验和艺术发展的变化一样可怜。他已经吸收了他的所必须吸收的东西。他没有交新朋友的时间，只有写作的时间，对他真实而重要的只有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男男女女。

在他那狭窄却持久的圈子里，女性们占了主要的地位。他的大多数信件，十分之九，甚至更多，都是写给女人的。她们能听从他所谓“倾吐他过分充满的感情的需要”，他那再三以自白方式倾吐心里不可遏制的欲望。对于女人，他能够赤裸裸地呈现自己，由于一种欲通情思的迫切促使，在几个月的缄默之后——常常是一个他从未见过面或仅属泛泛之交的女人，——他会突然地爆发了。他从来不给男人写一封亲昵的信，从不曾向如雨果或司汤达之类他同时代最伟大而最驰誉的作家们，倾吐过他内心的冲突或艺术创造的问题。因为他习惯于垄断一场谈话，迫不急待地去继续他的神侃，而决不等着听别人的吹牛，因而他毫无兴趣与那些同伴作家们通信或谈话。他不需要友情的刺激，恰恰相反，他需要内心的紧张得到一种松弛。他多半给女人写信，不仅因为像他开玩笑地向高第埃·提奥菲尔所说的，由于“那造成一种风格”；而是出自他的一部分是潜意识的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找一个了解她的女性。由于对写作的厌倦，受事务的迫害，在债台重压之下生活，在他“激流似生命”之流中多次遭遇坎坷困顿，他热烈地期待着一个女性，她可以当作一个母亲、姊妹、情妇、和内助，就像在他成长年代里的德·柏尔雷夫人一样。他这样去做只是出于一种对宁静的热情的需要，而非出于一种猎艳的目的而不断地去物色。人们不要受了他那色情的、带着喧闹的《笑林》的骗，巴尔扎克决不是唐璜或卡珊诺娃。他所要的是一个会给他以布尔乔亚的满足的女性，像他所坦白承认的，“一笔财产和一个女人”。一个有着他那样活动智力和想像力的人，是不需要由于廉价冒险而得来的更多的心理上及情绪上的亢奋。他总是一半是下意识地（虽然有时也看得很清楚），寻找那种能满足他为人两个极端的女人：一面必须作为赚钱手段的灾难中把他的工作赎回，却不因她对她的若干要求而损及工作；一面满足他肉体的欲望，同时把他从金钱与物质的困难中拯救出来。倘使可能的话，她应该是出身于贵族，以满足他那天真的势利心。

这就是他一生的梦想，虽然它从未得到满足，他寻找到的追求对象，只

是不完整的，有时这一方面，有时另一方面，或是兼而有之的。即使是他与德·柏尔雷夫人的第一次私通，他也判定为不完美的。原因是像他曾说过的，魔鬼如此残酷地把他们年龄的机器发条上错了。在他二十三岁时，曾在她身上找到一个领导者和安慰者，她在危险的时候拯救了他，并热烈地恋爱他。但他们年龄上的差异在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便显得不相称了，虽然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年龄差异并未显得不自然。在他三十岁时，即使巴尔扎克能把任何女人都看作他梦中的海伦，也发现作一个五十三岁女人的情夫，确实让他有点难堪、尴尬。显然德·柏尔雷·罗尔很难在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之前让步，（即使对最聪明的女人，只要她在恋爱，也是一样的难。）但在他们关系中的色欲成分，还是渐渐消退了。

可是在这个变化结束之前，巴尔扎克已在别处寻求并且得到他天性中感官方面的满足。而那个上了年纪的德·柏尔雷夫人也许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增加她的嫉妒：原来他这新朋友也和她一样地是半老徐娘，而肉体方面的媚劲儿也因之有点衰退了。这位德·葛朗台公爵夫人乃雨那将军的寡妻，当巴尔扎克大约于一八二九年第一次在凡尔赛遇到她时，她已成为过去光荣的破旧的纪念碑了。波旁王朝遗弃了她，她在社交中丝毫不被注意，而且陷入无可救药的债务之中，以至于她用回忆和发掘一些半真半假的丑闻来赚钱。她把那些东西一卷又一卷，年复一年地出卖给出版商。她觉得把巴尔扎克从德·柏尔雷夫人俨如母亲一般的裙带威力下分离出来并不困难。因为她启动了他天性中两个最强的因素：艺术家从活的源泉中去研究历史的无尽的渴望；和他由来已久的弱点——那种无底的势利心。头衔与高贵的姓氏一直用一种魔力操纵着他。但他只能做一位公爵夫人的朋友，最多不过当个情夫罢了，在她床弟间，即使不是做皇储，不论怎样也是做皇帝的一个将军、穆拉、拿破仑王、梅特涅亲王的继承人，这种优越感至少也准能暂时把他从德·柏尔雷夫人的怀抱中转移吸引过来。而德·柏尔雷夫人的母亲，只不过是安他涅特·玛利跟前的一位女侍官罢了。

这种在巴尔扎克内心中永远鄙俗的情垫和虚荣，使他处于一种冒险中！这场冒险开始时并未显出有那么多的困难。对于一位想像力只消一星之火便能照彻整个天宇的未来的“当代历史家”而言，他竟与一位知道所有历史秘密的女人同床共寝，会有多大的益处啊！德·葛朗台公爵夫人曾在其母亲派尔蒙夫人家遇到当时还是孱弱少年的拿破仑。她不仅站在杜伊勒里王宫新受封的皇子公主们的前列，并且窥见了幕后的一切。倘若他写的所有带拿破仑背景的小说中，如《一桩可怕的事》或《查伯尔上校》是沉浸于洋密文献中，那么则是由于她和他结识的缘故。在他们结识中，真正的恋爱成分比较彼此性欲和智慧方面的好奇心，仅扮着一个极小的角色。

一场恋爱事件并未持续多久，一种友谊的感情却保持下来。他们双方负债累累，急欲品尝生命里甜密的东西，但不久便被其它爱情牵制得转了方向。智暂的爱情冷却之后，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志同道合地彼此相助。她把介绍给瑞卡米耶夫人和其他贵族的相识，同时他帮助她分派回忆录给出版商们，并且在写作上暗中助她一臂之力。渐渐她从他的生命中褪去。若干年后，当人们发现她已死在巴黎一处时，他以一种吃惊的口气描写她的结局，事实被泄露；她和他只是一场热情的偶然事件而已。

当他和德·葛朗台公爵夫人私通初期的时候，卡罗·朱尔玛进入他的生活。而且，他们形成了最好，最尊贵，最圣洁，最有“意义，并且是，——

虽然多次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原因而分离，——最永久的友爱。和他一直深爱的妹妹罗尔年龄相仿，杜昂然·朱尔玛在一八一六年和一个姓卡罗的炮兵上尉结了婚。卡罗是一个正直严肃的绅士，一个勇敢的军官，他真正的功绩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的同伴们或者在战场上拼杀出了辉煌的业绩，或者在政府中爬升到今人仰视方见的高贵地位时，他却在英国牢房中消磨时光——他不幸地成为一个战争囚犯。尽管最后交换战俘时他得以归国，然而，太迟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军官，既然在被俘时没有机会去要什么政治手腕，又没有能够获得勋章，那么他显然不会得到什么合适的职位。他曾被放置在小省的驻军中，最后，他被任命去掌管国营火药厂，于是，他带着妻子默默地生活在一个边远小镇中。卡罗·朱尔玛——她不是很美，而且糟糕的是还有一点跛——怀着崇高的敬意面对她丈夫忠厚的天性，同时又深深地怜悯他运途多蹇——时运是他雄心的失落的剑，他的生命也就此沉沦下去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他怀有爱情。尽管她料理着孩子和他的一大堆家务，然而由于她天赋的聪慧明睿，虽说被局限在一个极其有限的社交圈子里，她同样能够跻聚一个忠厚的，即使是地位寒微，然而却是朋友的小圈子；这当中有一位柏内乐上尉，后来巴尔扎克曾跟他过从甚密。就是这位上尉，他曾经向他提供大量有关军队生活的详情以充实他这方面的小说。

在巴尔扎克妹妹家里朱尔玛和他会面，这是对他们双方来说的一桩好运气的事情。她的那种对人性的正确的看法和远远地胜过她的朋友中任何一个人的智力，（或者更甚至于远胜过很多和巴尔扎克同时的批评家和作家），在她的小天地里遇到这样一个人，他有着和他的灿烂洋溢的人性同样的文学天才，而且她一下子便看了出来，这对于朱尔玛来讲是一个心灵上的强烈的经验；而对巴尔扎克来说，却是一桩好运的事：当他迫于债主们和疲于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去朱尔玛的家庭，在那里，他可以找到足够的安慰而不至受到过分的阿谀和供人玩赏。她在家中总是为他预备好一间空屋子，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写作。在晚间，他同时也发现有一些心里温煦的朋友在等待他，他可以毫无拘束地同他们交谈，并且享受那么一种十分温馨的气氛。他可以在工作时穿着自己的衬衫，也就是说，他永远不必担心别人把他当作累赘。还因为他知道在紧张的工作以后，有一个永远供他随时使用的避难所，所以他在旅行到那些有驻屯军的城镇——不论在安古莲，在佛拉柏斯罗或圣·锡尔，只要赶上是卡罗夫妇他们驻扎的地方——的几个月之前，他就梦想他的旅行了。

没有过多久，巴尔扎克便开始察觉这个不著名的妇人心灵上的特质，和她专心致志以及诚恳的天性。一种纯洁的，深厚的友谊在他们之间产生起来。以巴尔扎克如此的人品，所散发出的肉体方面的诱惑，卡罗·朱尔玛毫无疑问地不可能无动于衷了，但是她却克制住了自己。她知道没有别的女人能够为巴尔扎克的无常的个性做如许多的事，她那样地不顾自己，同时也更加不露声色地减少他的麻烦，扫除他的障碍。她有一次写信给她道：“我是命中注定为你尔生的女人。”但他回信道：“我需要的是，一个像你一样的女人，一个不自私的女人。”她也向她坦白：“同你在傍晚一起消磨一刻钟，对于我来说，要比在那些美女们的怀抱中竟夕欢娱更有意义！”

但是，卡罗·朱尔玛确实能够清楚地发现她自己的弱点，她缺乏足够的性感的诱惑力去满足一个她特别看重的男人。但是不管怎样，像她这样的一

种天性，要去放弃或欺骗一个把快乐完全寄托于她身上的大夫，是不可能的，她自己明确地了解这一点。于是她开始给予巴尔扎克一种友谊，像她所说的：“一种圣洁而且和善的友谊”，脱开了任何自私的野心与虚荣，并且不被性欲的潜流所打扰：“即使是一种介于自利自私，我也决不愿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关系中来。”

由于她不能像德·柏尔雷夫人那样去做，既给他以爱情又给他以指导，她就宁愿将这两方面分开，为了成为在他困难中的十全十美的内助，“你的多一只眼睛的照顾”。而且她喊道：

“上帝啊！为何生命之神不把我降生在你所住的城市里呢？我将会给你一切你所羡慕的东西，以爱情的方式，我将会把我的家迁到你的住所里去……那该是多么美的事啊！”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把人的生活分为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机会并没有降临他们，于是她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将把你认作我的儿子。”她将以此为其终生事业：照料他，为他着想，忠告他。正像所有女人不知怎样对待自己生活的孩子般的天才一样，她也确实感到有必要用母爱的方式去爱他。

事实上，巴尔扎克不论在做艺术家或做人上，都再没有比这个不著名的女人，——她的命运却是被一场平凡的婚姻所束缚，埋在乡下，——更能胜任或更真诚的顾问。在一八三三年，巴尔扎克的作品一度成为流行的轰动一时的东西，可是人们却没有真正地了解他，他以那种恳挚的，不畏缩的语调——这种语调把她所说的一切都赋予特性——写信给他道：

“你是当代的第一位作家，同时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是在所有时代中最重要的作家。只有你自己和你堪比，但在你以外的其他的一切，都显得肤浅了。”

她立刻接着说：

“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加入我的声音，用以增强那些成千累万正唱着你的赞美诗篇的合唱。”

这些话都是真实不虚的。

一种确实无错的本能在指引着他。在为巴尔扎克的成功风靡一时，耸人听闻的因素提心吊胆：那正由于她深知他心地的伟大，正由于她受那“一直和善的心地”，而“把自己隐在一切纱窗帘，羊毛披肩和一些铜铸雕像的后面”的已尔扎克，以至于她担心他个性和天才方面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会从他在沙龙中所获得的社交上的成功，以及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的物质上的成功，生出来的。她为了他应该把他最高的潜在效力充分表现出来而焦虑：“那种要看到你成为尽善尽美的欲望把我弄得着了魔了。”这种尽善尽美并不是

“一种沙龙的或时髦的成功。（那是我所痛惜的，因为它破坏了你的前途。）尽善尽美——你真正的名望必须建筑其上，那种未来的，我所仰慕的名望，它对我，正像我顶替了你的名姓，或者你我站得如此之近，以致它的光辉也会同样照射到我的身上是一样重要的。”

她把艺术良心的责任加到她自己的身上。因为，她虽然认识了他的美德与伟大，可是她却并非看不到他的危险的信号，在幼稚的虚荣驱使下向社会的谄媚低头。她冒着失掉他友谊的危险，（这友谊是她一生之中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以极度的恳切向他陈述，他对他的忧惧并不亚于对他的嘉许，虽然她暗中意识到她那样的论调，违背了那些社会上的贵妇们和公主们对时髦作家的过分施与的阿谀。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得到比她的批评和判断更有见识的，甚至于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位炮兵上尉的妻子所述说的每一句非难或赞美的话语，都比圣提——柏夫和别的职业批评家的批评更令人信服。她赞许《查柏尔上校》、《蓝柏尔·路易》、《毕骆都·恺撒》和《葛兰德·欧琴妮》，但她对于过分地渲染了沙龙情节的，比如《三十岁的女人》，就有一种可怕的厌恶，很公允地称《乡下医生》是“过分陷于理障的沼泽”，并且因为《西拉飞达》的夸张怪诞的假神秘主义而惹她憎恨厌恶。她以惊人的清醒神智察觉到威胁他走向成功前途上的所有危险。当他打算进入政坛中，她焦急地警告他：“《笑林》比内阁大臣更重要得多。”当他将要倾向保王党时，她劝诫他道：“还是让那些在朝的人把持这种利益吧，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否则你将只是玷污你以前所曾经诚实地获得的名誉而已。”她大胆地宣称，她将永远地忠实于她对穷人的亲爱，那些如此忍辱地为富人们的贪婪所剥削和毁谤的穷人——“因为我自己是属于人民群众的。从社会阶级来讲，我们诚然被当作贵族中间的，但是我们永远地保存了我们对那些被压迫受罪的人民们的同情心。”

当她看到他在暴躁的仓促之中写作对他的作品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的时候，她警告他，说道：

“在你写作的时候，正如有把刀子搁在你的脖子上，你就真正称那东西为文学吗？如果你连把作品写到纸上的时间都刻不容缓，你怎么会创造出一个真正完美的作品呢？为什么这样赶忙，难道仅仅为了提供你自己一种适于暴发户而不适于一个天才的奢侈吗？能够描写蓝柏尔·路易的人实不该一定要得到驾车的英国马不可！奥瑙利，看到你对自己的伟大不忠实，真令我忧伤。！在我这方面呢，你固然能买车、买马，和波斯垂幔——可你不该给某种狡猾的人有机会对你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用钱买动他！’”

她爱他的天才，却担心他的弱点。当他放任自己被一些沙龙强加利用时，当他疯狂地写作时，和当他为了打动她所轻视的“上流社会”而用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包围了自己，并且驱使他陷入负债时，她都在忧惧地注视着。她用一种近乎完全正确的先见之明恳求他说：“不要这样过早把你自已用尽！”以她强烈的法兰西的自由感，她愿意看见这一世纪里最伟大的作家，一切无所依靠，超乎舆论、毁誉、金钱的需要；但在她看到他接连不断地落入新的奴役里时，她被抛入失望之中了：“一个传教——那就是你所要扮演的角色。你把十个人的生命汇集成了一个，却在你的贪婪之下耗尽了你自己。你一生的命运将成为唐塔腊斯的命运。”这真是一个有预见性的评论！

在这段时期里，当公爵夫人和公主们用她们谄媚的甜言密语把他包围时，他不但接受了这些强硬的，而且往往是过激的谴责，还再三地感谢她的诚恳，这一点很能说明巴尔扎克的完全，他远比他能令人想像的少许虚朵心聪明多了。他写信给她道：“你是我的舆论，而我以认识你为荣，你带给我的勇气使我成全了自己。”他感激她帮助他“拔去我园中的杂草。每一次当我看到你，我部从你那儿获得一些令我终生受益的收获。”

他知道她的警告没有卑劣的动机，没有智慧上的骄矜，没有嫉妒，只是因为对他艺术的不朽灵魂最诚挚的关怀所引起的。她同时在他的生命中给他指派一个特殊地位：“我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别的人可相比，也没有东西

唐塔腊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位富有的国王，是宙斯的儿子，被责罚投于湖中，口渴时想喝水，水退了下去，饿时想摘果子，果子向上升去，受尽苦恼，现用以比喻巴尔扎克。

能比得上它，甚至（没有东西）能和它相似。”即使在后来，当他把他的灵魂倾注于另一个女人——德·韩斯迦夫人——时，（他将她从乌克兰招来作为他个人自白的对象，）也不能动摇“在我心里永不改变的这种优先特许权。”

他仅仅对他的旧友逐渐沉默起来，可能由于一种不安于某种秘密的羞愧感。在他向其他女人们和德·韩斯迦流露真情时，他传奇化了他自己，他的工作和他的债：相反，他知道他不能对卡罗·来尔玛说一句不忠实的话却不被发现，在他向她自白之时，他便不自觉地越来越禁忌越多了。若干年过去了，他没有再去她家那间专为他设的安静书斋，却只有一次她来巴黎，——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他却写作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致于他没有拆她的信，却使她等待一个永远没有的答复。可是他终于过了十六年，把德·韩斯迦夫人娶过门那一年，在他死前不久，（那时他已是一个临到末日的人了），他曾经停顿了一瞬间去检查一下他那过去的生活，并向自己承认，朱尔玛曾经是他所认识的女人中最诚挚，最重要，和最友好的一个人。他拿起手中的笔给她写道：

“我从没有停止过爱你，怀念你，甚至到现在停止过和你谈话。”

巴尔扎克，这个永远浮夸者与妄言者，当他把卡罗·朱尔玛的关系放置于一切其他人之上，并且和那些人截然相反地看作她最纯洁的友谊时，他却没有一丝浮夸。一切其他的关系——除了他和德·韩斯迦夫人的订交，那控制了他的晚年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些偶然性。在他所有认识的著名的女人中，当他特别地对高贵的戴丝波儿得——瓦勒摩儿·玛西琳亲昵时，他显示出他确切无疑的心理上的睿智。他把他那最伟大的作品中的一部奉献给她，到王宫中她的顶楼上去拜访她，忽视那一定会使他喘息的百级阶梯——对他的体重来说，这就不是小成就了。和桑德·乔治，他招呼为“乔治兄弟”的，他却以一种毫无色欲的，诚笃的亲密气味的友谊和她交往——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了。他的自尊心保全了他，使他免于列入她情夫的名单中，被算作第十四或第十五情夫，也没有沾到巴黎半个文坛（包括德·穆塞，桑德，萧邦，和圣提——柏夫在内）在她床弟之间的光荣。私下里，还有几个为时甚暂，不著名的人物，例如一个不知为何许人的“玛利”和他有过一段私通，她可能给她生下过一个孩子；还有另一位“路易丝”，她的姓氏也同样不清楚。要说到他和女人们有亲密关系的地方，巴尔扎克在一种表面很坦然的喜欢多嘴的外表后面，却保持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谨慎。

他和男人的关系则更加稀少了。那些和他亲密交往的人们，几乎全是不重要、不著名的平民。倘若他需要女人是为了能和他们休憩，那么他需要的男性朋友则是为了依靠他们。像贝多芬、歌德，以及大多数决定献身某种博大作品，有创造性头脑的人们一样，巴尔扎克并不选择一些有卓异智慧，可以在艺术的竞争和创造上督促和刺激他的朋友，他喜欢那些随时可以帮他忙的，在他工作的间歇中去找找他的朋友。他寻求的是一种亲如一家的朋友关系。我们对那位德·马尔冈先生所知甚少。在他撒彻的别墅里，有一间可供写作的舒适的屋子，那是在巴尔扎克很多次要离开巴黎时，提供给他随意使用的。而且，他真正的朋友却决非有拉马丁，雨果或萧邦那一类资格的人，（虽然他直接认识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铁器批发商人，一个无名的画家，一个医生，和一个小裁缝。小达伯兰翁自从在莱斯底居耶尔街的那

些年，业已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朋友。波尔瑞·奥古斯都和他曾一度同住在卡西尼街的一间房子里。拿克加尔大夫直到他临终前都在照顾他的健康，并且时时帮助他：不仅在他紧急之时用几百法郎来弥缝他口袋上那从未修补的漏洞，而且对他的小说提出一些专家性的意见。在利兹留街的那个小裁缝，布伊松，（他早在巴黎的批评家发现巴尔扎克的天才之前便知道尊敬他了，）不但允许他爱欠债多久便欠债多久，而且常常供给他钱用。当巴尔扎克没有一处别的地方可以躲避债主的追债时，布伊松还在家里为他预备下避难所。把钱借给一个像他那样有感激心的人，布伊松的生意并未亏本。无论欠债的数目多么大，我们这位可敬的小裁缝最终从《人间喜剧》中的两行文字得到充分的偿还：“一袭布伊松做成的衣服，足够使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沙龙里扮演天家的角色。”如此小小的宣传，马上使布伊松成为所有要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人物的裁缝师傅了。除普通的用钱偿还以外，大人物们是另有一种偿还方怯的。他们可以把不朽和无形的价值赐予他们的债主。

当巴尔扎克当初开始写作那些使他声誉大振的作品的时候，这个狭小的朋友圈子实际上已告形成。在他三十岁那年，他队外向内吸收的时期已告结束。他已不再需要讨论、博览、剪裁，新鲜知识，或新的朋友。他已准备好了一切，在智慧和天才这方面，他心须表现出的奋勉与热情，是属于他以后的工作的，他曾悦过，“一棵大树会吸干它周围的土壤。”为了使它可以开花结果，它把在它范围之内的一切能量都吸收到它的内部。虽然巴尔扎克拥有几百个相识，但是他以后不再把别的任何人置入他比较亲密的圈内——除德·韩斯迦大人之外，她是他生命的中心人物与真正焦点。

第二节 欢愉和挣扎

突如其来的成功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在一八二八年，巴尔扎克只是一个靠文章糊口的人，穷困潦倒，债台高筑，是一个自己承认所以留在家是为了省衣服的彻头彻尾的穷鬼。两三年之后，他成为欧洲最有名望的作家之一，杂志报章竟强索他的稿件。他被赞美的读者们的信件所压倒，被出版商谄媚。一夜之间，他年轻时的野心竟然实现，这“光荣”，这令人眩目的声誉拉着他的姓名在放射光芒的羽翼上环游世界。即使是一个比巴尔扎克头脑更清醒的人，尚且不禁被这种成功所陶醉，而且巴尔扎克还远远不是头脑清醒的人。他在穷困，晦暗，饥饿中生活得过久了，充满了不耐烦的失望。在嫉妒和羡慕的一刹那间，他观察到凡是那些获得成功，财富，女人，奢侈，和生活中过多邪运的人，从来是别人而永远不是自己。以他那种耽欲的天性，他急于利用他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品尝一下人世间可以得到的快乐，是可以想见的。他要吸纳已加在他身上的名誉，用手指触摸它，在舌头上品尝它，用他所有的感官去体会、感知它。他要感受到谄媚的芬芳令息，感受到向他喝彩的群众们那种安逸的亲热。世界发现了他的天才，他就要把自己呈现给世界。他已疲于若干年来的奴役与钱财的穷困，废于蒙耻于受挫，他准备屈服于与名誉俱来的甘媚引诱之前，屈服于浪费与奢侈的欢愉之下。他知道世界现在是他的舞台，他决定在他的欢众之前表演，并且扮演社交中的一个角色。

显而易见，和巴尔扎克当作家的天才同样，乃是他缺乏扮演社会名流这种角色的才能。人类脑子的特征就是：即使有极广泛的经验积累和极高度的智能，也不能克服一个人天生的无能。无论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气质上的很多观点看得非常清楚，却没有力量把它们除掉。诊断和治疗并非一回事。所以，我们可以一再看到，顶尖聪明的人是如何地不能驾驭他们那些成为别人笑柄的小笨蛋。这位能以一种贝多芬的漠不关心态度在国王与太子面前走路的人，这位出产了此一世纪最伟大创作的人，却患了一种想做贵族的荒谬的精神病。一位圣日耳曼镇的公爵夫人的信，对于他比歌德的赞美更有意义。

他很可能宁愿做一个罗特弃德，住在一所宫殿里，有着马车、仆夫，和罗列着杰作的长廊，却不想获得不朽。而且为了一份由菲力蒲·路易国王签名的真正贵族特许证，他会出卖了他的灵魂。倘若他父亲能够从农民跨入富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为何他不该跨入贵族社会呢？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年代不过刚刚过去，但有什么理由可以断定它已完全结束？如果一个雨诺，一个穆伊，一个纳伊，这些车夫与手艺人儿子们，或店主的孙子们，由于命令骑士们进攻或短兵相接，而成为公爵，倘若股票行里的倒把客，出纳员，和工业企业家们，都甚而被进爵加官，为什么他不该同样地能够升入社会的“更高”阶层呢？

这种同样的资本，——它曾经在六十年前，促使他的父亲用拉·奴该瑞的草屋去换取巴黎更大的机会——现在则可能正在无意识地激励着他儿子更高地向上爬升。但是，他不以他自己创作的成就做较高目的。把进入一个前此不许外人擅入他的圈子做为他较高的目的，是荒唐可笑的。那不是一种能被合理分析的心理状态。一件不能理解的矛盾处于我们面前。他终生忍受多少耻辱，仅为了爬进一个“较高”的社会范围。他判定了自己去勉强劳作，

只是为了生活奢侈。他把自己扮得神气很荒谬，却是为了显得风雅。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变为在他小说中所表明过很多次的定律的话的证据：——在某个领域里的一位专家，当他冒险进入另一个对他来讲并不相宜的范围时，他竟能是一个蠢货。

巴尔扎克按他在社交里所要扮演的角色装扮他自己。首先，他不能仅以巴尔扎克的形象出现。在圣日耳曼地方，那听了会觉得太小布尔乔亚味儿了。在自己的权威之上，他加之以贵族头衔，从《驴皮记》开始他的作品都用“德”，巴尔扎克·奥瑙利的姓名出版了。若谁敢否认他对这个头衔的使用权，谁就要倒霉了。他将会对有怀疑的人如此说明：因为他乃是德·昂特拉格侯爵的后裔，所以他只称呼自己“德·巴尔扎克”实在由于纯粹谦逊。为了使那说法格外可信，他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章及刻在他的剑上和画在他的马车上。其次，改变整个生活方式。他这样辩论；只有他生活得和他的名望相符合，人们才会相信德·巴尔扎克·奥地利是伟大的作家。在一个只有外表才算数的人世里，若一个人想得到很多，那么他必须得表示出他有很多，“对于有的人应该给他”。倘若德·夏都勃里昂先生能够拥有一幢别墅，查宁·儒尔或须·欧贞能够享有一辆马车，吉拉尔丹能够保有两匹乘马，则德·巴尔扎克·奥瑙利之所以应该驾一辆双轮马车，后面带一个穿制服的跟班，乃是有着更多的理由了。所以人们才不至把他视作第二流的作家了。在卡西尼街赁了一所房子的二层楼，他又买了丰富的家具，而且没有一个贵族子弟能说他的衣服比德·巴尔扎克·奥瑙利更贵重更阔绰。那位可敬的布伊松赠给他丝织品和绵缎的背心，同时他特地为他的蓝色礼服作了镂花的金扣子。就如此，他把油涂上厚重的头发，把一只小眼镜拿在手里扭捏作态地取着平衡。于是，这位新长羽毛的作家跨入巴黎的那些沙龙，他使自己成了名——似乎他的名誉在他当代和将要到来的时代中尚未十拿九稳。

结果，巴尔扎克跻身巴黎社交界的活动非常令人失望。而且这对他做作家的名望有所损害。他想把自己造成一个贵族子弟的梦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生涯中的这阶段中，他出入的沙龙，并非圣日耳曼镇的沙龙，也不是大的公使馆，他所去的地方，仅限于瑞卡米耶夫人和盖·戴尔梵夫人母女的“文艺客厅”，而那些女太太们是想用一些培养贵族文学的方式来和不跟人交往的官场贵族竞争的。但是，即使在那些并不崇高的圈子里，巴尔扎克这种外观美丽的风雅，他的影响就是一个大灾难。无论是金扣子，无论是沙领带，无论是布伊松的手艺，都不能够遮掩这个粗肥，矮胖，红脸蛋儿的平民。他不让别人在旁边岔一句嘴，用如此大的声音谈话，而且像他的大炮弹似地突然地闯入屋子。因为气质过分的丰饶，以至于他不能用一种出之于不自然的慎重节制的态度来约束住它。二十年之后，德·韩斯迦夫人有足够的理由去抱怨他：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把刀子伸进嘴里，而已他那种聒噪的夸张，把那些最诚恳地急于赞美他的人们的神经都震乱了。他那种带有回响的轰笑，那种把别人的话语都淹没于其泛滥之中的“辩才的激流”，令她更加慨叹不已了。

除了只注意外表和有闭的人，才有耐性和时间，永远地呈现着奕奕丰采的外表——这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但巴尔扎克，却很各易让人看破他那种为了一件特殊事件而装饰自己的匆忙。他仅仅把自己从工作中拖出来一个多钟头而已。德拉古瓦对他衣裤上不相配的色彩设计失望了。但是当他的手指甲肮脏不堪时，一个金单照拿在手中又有何用呢？他的鞋带松散了，拖曳在他松

弛的丝袜子上。在他热的时候，脂垢会从他涂了油的头发上滴到衣领子的花边上。巴尔扎克就像一个小厮穿制服一样修饰他的丰采。他的嗜趣愈来愈不倾向于慎重而倾向于奢侈。他令贵重物品都看着像一些廉价货。他还给奢侈加以夸张的外表。正如被那些以他为题材的讽刺文所证实的，这种混合而成的影响，甚至常常迫使着他那些女性的赞美者，在扇子后隐藏一个微笑。

巴尔扎克越感到他附庸风雅的企图的失败，便越想作得夸张一些。倘若他不能崭露头角，至少也要轰动一时。倘若他不能用一种不刺目的卓异神色，制造出引人注意而愉快的效果，最低限度他的放荡不羁应该变得和他用来获得声誉的作品同样地驰名。假使他要变成别人嘲弄的笑柄，他最少会给他们充分去嘲笑的理由。当他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发明了一种怪诞的策略，也就像他戏谑所说的，这将使他比他的小说更加地出名。他买了一根镶着蓝宝石像杠子一样粗的手杖。他散布了一个关于手杖的最荒诞的谣言，比如说，他在手杖的柄头上弄了一个神秘的情妇的小照，其实这个女人属于贵族中最高圈子里的，打扮成“夏娃”的装束。当他走入意大利剧院的“老虎”包厢时，黑尔居尔的棒子始终破他握于手中，（这东西破费他约七百法郎，其实他一直没付钱。）所有的观众似乎被催眠了一样地凝视着他。并且德·吉拉尔丹夫人还受了这件事的启发，写了一本小说《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但是一直没有治好贵妇们的幻火，而且没有一个女人选这个曾经歌唱她们的赞美诗的浪漫诗人作为她的保护者。他所深深地赞许的那拉迪额和凡尔赛的原型的巴黎的名流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担心这个新的侯补人为了光荣而做出的愚蠢的竞争了。

在文坛上，巴尔扎克与他的同事们相处，没有得到较大的成就。那些人看着这条出现在他们鲤鱼池里的梭小鱼，而且是肥梭小鱼，显出一种不宁贴的态度。他们中许多人仍记得清楚他突然成名以前暧昧的过去。如果不是他的多产的干扰，他们被他的天才所震惊，他们肯定已有准备，把巴尔扎克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来看待了。但巴尔扎克拒绝了他们的接近。尽管他对别人成就的大方的热心和他的好脾气，可是他，尤其对文坛的同道们，故意地用一种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没有接受他们给他的友谊，却以无礼、粗暴的态度对他们。他头上戴着帽子进屋，并拒绝把自己和他们置于文坛上的相同地位。他大声疾呼，他坚持地反对把他和德·柯克·保罗，仲马·亚历山大，须·欧贞桑那，或查宁放进一堆去，却没有放任他的同道作家们满足于他们的小虚荣心。他夸大了他所能博得的报酬而得罪了他们，而且他讲价时又触怒了新闻记者。很少有作家这样地不重视新闻记者可以控制的舆论和善意批评的可能性。正像他想用他那很粗俗的装束的浮夸，把自己造成社交上的与众不同一样，他让他们觉得他不需要他们的恩惠。在他鲁莽和质朴的真诚之下，他多次强调他不能以衡量别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许他怀着游戏之味的善意心情，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在可能想像的不重视的态度下这样地做出来，但巴黎人都认为他的行为带有挑衅性。

巴尔扎克的显著弱点，足够让那些人得到敏捷心智和恶意上的无数的可攻击之点，而那些入将准备利用这些的。同时他受到报纸上全用嘲讽的幽默向他大肆地起哄。这位当代最伟大作家，竟和讥仙的短评与无礼的讽刺文很得人缘。没有比一个既轻视社会却又不能脱离它的人，使社会给予他的报复更严酷了。巴尔扎克并没有受到失败的特别影响。他只是过于精神充沛，过于元气旺盛，再加上一种自我优越感，于是他不注意一些小刺激。他对那些

势利的女学究们或油头粉面的讨厌人物的热骂冷嘲，报以一种喧嚣的拉伯莱式的敞笑。就是在盛怒之下，他也是富有创造性和宽宏大量的，对于那些被触怒的文学界小文物们和新闻记者们的怨嫌，他并不用小器的理论，而用在《幻灭》里描绘文坛恶德的伟大壁画来向他们加以足够的反击。

另一方面，他的真正朋友，看到一个具有巴尔扎克天才的人，竟因为他的小小的势利心的弱点而被置于一种可耻的地位——这地位一时证实了这种以他目标的侮辱——而痛苦了。卡罗·朱尔玛，虽在她那遥运的乡镇里，却比他更早地了解了：他所希望在巴黎的社交场合中采得的天堂的果实，将会很快在他嘴里化为乌有的。并且她恳求他：不要“在一个求之于你的要比偿还给你的多一百倍的世界里”作演员了。她以友谊的真诚的劝诫的态度给他写信，说道：

“奥瑙利，现在的你已是驰各世界的大作家了，但是你命中注定要干更高的事业。小小的名誉对于你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你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更高的目标！如果我有勇气，我会对你说：‘为什么你因为纯粹的爱慕虚荣，用这样愚蠢的方式，在糟蹋你那种不同寻常的智慧呢？放弃了这种附庸风雅的生活吧！……’”

但是，巴尔扎克不能在早期成名的陶醉，渐渐进入对他自身的定律有个清醒的认识以前，得到这个痛苦经验的教训。他的定律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精通两个范围：命运不希望他转眼即逝，被那些男男女女们很快地在他忘掉的世界中高视阔步，却希望用这世界的深度和高度，由他的笔的创造力，来让这个世界变得不朽！”

我们可以浏览一下那时人对当时的巴尔扎克的无数的描述。有些是藐视的，另一些则是恶意的或甚至是恶毒的：有些是好玩的，另一些则是诙谐的；但是他们都用巴黎新闻界和社会的谬误的狭隘的观点去看他。他们使我们看到的：是携着嵌宝石的笨重的大棒，穿着带镂花的金扣子的蓝色外衣的巴尔扎克；是穿着拖鞋的巴尔扎克；是赶着双轮马车，带着跟班和车夫的巴尔扎克；是顺着马路游弋，浏览着所有店铺的招牌，去为他书中人物寻觅姓名的巴尔扎克；是出版商的阎王爷，是排字匠的鬼怪的巴尔扎克；是古董搜集者，怀着花十二苏就买到一双本维挪托·克林尼制的碗，或用七法郎拣到一张郎布兰特的画的希望去涉猎古玩铺的巴尔扎克；而一面又是一个换女人比换衬衫还勤快的情郎的巴尔扎克；是向人说教所谓纯洁乃是创作先决主要条件的愚弄人者和大言不惭者的巴尔扎克：是一顿能吞下三十六个牡蛎，接着又吃一只鸡和一块肉排的饭桶的巴尔扎克；是谈到他将从他的暖房里，矿里，生意利润里，赚出好几百万，却自己连一度因为连一千法郎的支票部支付不了，必须用假名字躲匿起好几个星期的梦想家的巴尔扎克。

那些遗留给我们的巴尔扎克的写生，有四分之三只是漫画却不是肖像；他不曾留下一部重要而精确的传记，却让那些同时代人物记载了无数关于他的掌故轶闻。这些不仅仅是偶然。巴黎人对于巴尔扎克的人格的印象，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天才，这从一切情形看来都很清楚。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判断得很正确。他肯定以怪人的模样出现在人群里，就“怪人”这个词的本义来讲，而是因为他！他一旦离开他的写字台，他的屋子，他的工作，他就越出了他的生活轨道了。那个真正的巴尔扎克，对魏兰特，戈兹兰，和查宁他们，对马路上的漫游者和游手好闲之辈，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不是在他创作孤独中的二十三点钟里认识他，而是在他所给予

世界里的“每天一分钟”的时候。当他出去到同伴们之中的时候，好像是记一个囚犯在狱中天井散步以吸些新鲜空气时的放风时一样，像幽灵在深夜的钟最后敲响的时候，必须回到它出来的那块黑暗地带一样。同样地，巴尔扎克必须在他那脱去拘束，精神充沛的休息以后，回到他的工作中去。没有一个沉溺于嘲弄巴尔扎克的人，知道他工作是在严苛的规律之下完成的；或知道那工作的伟大。本质的巴尔扎克乃是在二十年后的一个，除了无数短篇小说，戏剧和散文以外，还写了七十四部几乎皆为一流作品的小说的人。这七十四部小说包括着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天地，和一切需要植根于它上面的不同街市，景物、房屋和人物。

这是可以用来衡量巴尔扎克的唯一标准。只有在他的作品中才能真正地看清真实的巴尔扎克。这个被同时代人物当作一个愚蠢的怪物的人，却具有这个时代最为严格的艺术智慧。当他们因为他的奢侈放逸而揶揄他时，他却是一个辛勤的苦修者，并且带有一种坚忍而固执的隐者的耐性。那些走中庸之道的人们，固为他夸张的倾向而嘲笑他，并心安理得地意识到自己是正常的人类，但是以他有创造性的头脑里，产生出比把他的同行们的作品放在一起还要多的作品。恐怕他是唯一能够说工作到死而后已的。他的日历和那些同时代的人物是不同的。他们的夜晚是他的白天，他们的白天则是他的夜晚。他的真正生活是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作成的世界，一个他自己的世界。真正的巴尔扎克，只有被他写作的那间屋子的四壁听见和看见。他的传记包括在他作品本身里的，没有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能写他的传记。

让我们从巴尔扎克的写作生活中抽取一天来看一下，这一天即是多少天的典型。

傍晚八点钟。巴黎市民早已做完一天的工作，并且离开他们的工厂，店铺或办公室。当他们和朋友，或者和家人，或者孤身一人，吃完晚饭以后，开始涌上街头去寻求快乐，有些人坐在咖啡馆里，有些人在街上散步，另外一些人，仍在镜子前化妆，准备去参加沙龙或看戏。巴尔扎克却在消磨他书桌上十六个钟点之后，独自一人在他黑暗的屋子里睡觉，对人间一无所觉。

九点钟，戏园子里已经开幕了。舞厅里挤满了回旋的舞侣。赌场里的金币叮叮地响着回响。在偏僻的街上，隐秘的情人们更深地挤缩进阴影里——但巴尔扎克在继续睡觉。

十点钟。老一辈的人们要准备上床了。这儿那儿房子里的灯光正在熄灭。可以听得见不多的马车从石子路上驶过，城市的噪响渐渐地低了下去——而巴尔扎克却在睡觉。

十一点钟。戏园子里已经落幕，饭店正在打烊，从沙龙或舞会里出来的最后一批客人正在回家，最后的行人从街上消失了。喧闹的酗酒者们最后一阵声浪消失偏僻街上缓缓地逝去，马路上彻底地空寂了——而巴尔扎克继续睡觉。

子夜。巴黎寂然。百万只眼都闭上了。大多数的灯光已经熄灭。既然别人开始休息，巴尔扎克的工作的时候到了。既然别人正在做梦，那是他醒的时候了。巴黎别的人的白天既已结束，他的白天就要开始了。没有访客来麻烦他，没有信件使他不安静，没有一个人能来打扰他。没有排字工人送信来非要交付改正的校样或一份额外的稿件不可，没有债主来敲门。一个浩瀚的时间伸展（八至十个钟头的完全孤独）摆在他面前，他在这样的时间里，去从事他庞大的工作。正像把冷脆的矿沙熔成不败的纯钢的熔炉不该冷却一

样，他同样知道不该松弛他幻想的紧张：“我的思想像水自源泉滴下一样，必须从眉宇间滴下。这个过程完全是不知不觉的。”

他只认清他工作中注定的定律：“工作在必须中断和必须外出时，对我不可能的。我从没有一口气只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只有在晚上，时间是不分割的和没有边际的，那种持续才有可能。并且为了获得这样工作的持续，他把时间的划分颠倒了，并且把他的夜晚变到白天去。

被他仆人在门上轻轻的剥啄声叫醒，巴尔扎克起床，穿上他的袍子。他从若干年的经验发现，认为那件衣服对他工作最为方便。在夏天，它是由薄夏布做的，在冬天，它由羊毛做的，长而白，领部敞开，允许动作完全自由，供给适当的温暖而不闷气。他之所以选择它的理由，可能因为它和一件僧袍相似，不知不觉地提醒他，只要他穿着它，他必须摒弃外面的世界和世界的诱惑，而且他是在为一个更高的定律服务。一条编织的带子（后用一条金链子来代替它）松松地系在僧侣式的袍服上，而且挂了一把剪子和裁纸刀，用来代替袈裟和十字架。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几次，把睡眠最后的行踪从脑子中摆脱掉，并让血液在脉管中流动得更快一些之后，巴尔扎克于是做好了准备。

仆人紧紧地拉上窗帘，并在窗上银烛台里点燃六支蜡烛，一个显著的符号：现在已经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巴尔扎克不要用星光或日光来计算他工作的钟点。他不去留心看天亮，也不知道巴黎正在一个新的白天醒来。他周围一切有形的东西——墙壁，靠墙排着的书籍，那些门窗和一切门窗以外的东西——全隐没在阴影中。只有他自己脑子中的生物在动作，谈话，和生活。他正在创造一个能持久的世界，一个他自己的世界。

巴尔扎克坐在桌子边，那地方正像他所说的；“我像炼丹家投他的金子一样把我的生命投入这个坩锅中。”那是一张外观朴素的，小的长方桌子，他比爱他财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还爱他的那张桌子。对于巴尔扎克来讲，它比他一只又一只买到的银盘子，比他嵌宝石的手杖，比他已经赢得的名誉，比他装璜得很华丽的书籍，都更有意义。因为他像一个士兵从战争的混乱中撩出一个束手无策的同伴似地拯救它，把它从一个住处带到一个住处，从灾难和破产中拯救它。它是他真实生命唯一的缄默的见证人，它是他沉忧和极乐的唯一知己：“它知道我一切的计划，曾见过我所有的窘困，曾经偷听了我的思想。当我的笔奔驰在纸上时，我的膀臂几乎是粗暴地压迫着它。”关于巴尔扎克没有一个人知道得这么多，也从来没有女人同他分享他那么些个热情友谊的夜晚。巴尔扎克在那张桌子边，生活——并且工作——直到死。

最后一次的浏览，终于确定准备的东西都妥贴了。和一切真正迷信的工作者一样，巴尔扎克很拘执于他工作的方式。他像一个士兵爱他的武器一样爱他的工具。当他投入战斗之前，他必须知道它们已经在他的身边准备好了。他左手边摆放着若干叠整齐的白纸。纸有一定的形状和尺寸，经过小心挑选出来的，带一种浅蓝色，以不致于使眼睛疲倦或眩晕，而且有一个特别光滑的表面，如此他的笔可以毫无阻挡地在那纸面上掠过。他的笔也是同样小心地预备的。除了大鸦的翎管之外，他是不用别种的。在一个贵重的，用孔雀石做的墨水池旁边——那是从他做学生时就伴着他的不值钱的一个，那不是一些赞美他的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放着一两瓶存储着的墨水。他不会忽略任何的预防，这种预防会保证他工作顺利无阻地进行的。他右手边摆着一个记事册，他有时记进去一些在后面一章书中可能有用的意念和思想。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装备了。论文，书籍，研究资料等。是概不需要的。巴

尔扎克已在开始写作之前把一切都融会在脑中。

坐在椅子上，卷起他袍上的袖子，以便他的右手转动如意，向后一靠。然后他鼓励自己，像一个马车夫在怂恿他的马开始拉车一样，用半开玩笑的话对自己说。也许该用一个在从跳板上作入水式前，伸伸腿儿，活动活动关节的游泳家来比喻他。

巴尔扎克不停地写着，不犹疑也不中止。一但他燃着想像力的火焰，它就不断地放射夺目的光芒。它像一团烈火，火舌从一棵树窜到另一棵树，在那个过程中越烧越烈，越来越大。表面上他的笔在疾驰，但是字句几乎不能和他的思想齐头并进。为越写句子越省略，这样可以不致于思想太缓慢。他不能让他内心的幻想有任何隔断，他的笔一直未从纸上提起来，直到一阵痉挛的打击强迫他松了手指，或是他疲劳得头晕眼花的时候，那写的东西在他眼前浮动起来。

街上静悄悄的。屋里唯一的声音只是笔从纸上光滑地驰过的轻轻的刷刷声，或是时而把一篇纸加放到写好的一叠上去的沙沙声。虽然外面的天开始亮了，但巴尔扎克却没有看见。对他来说，白天只是烛光所投射出来的小小光圈而已，除他自己形成的世界之外，无论时间或空间，他全不知道。

这架机器时而有抛锚之虞。就是对于最不可限量的意志力，也不能无限度地消耗一个人本来有限的体力。在五六小时的毫不间断的写作以后，巴尔扎克感到有必要暂时地休息一下了。他的眼睛开始流泪；他的手指已经麻木；他的背脊痛楚；他的神经不能再紧张了；他的太阳穴悸动起来。也许别人可能对他已做的工作知足，而当夜工作，但是巴尔扎克却决不放弃。即使这匹马在刺马针下跌倒，也得跑完规定的路程。倘若那匹懒马不肯保持原有的步骤，那么就必须借助于鞭子了。巴尔扎克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那张放有咖啡的桌子边。

咖啡是重新开动引擎运转的黑色机器润滑油，对巴尔扎克来说它比吃饭睡觉都重要得多。他痛恨纸烟，因为它不能够刺激他达到他工作时需要的那种最高强度的。“纸烟对于身体是有损的，打击了人的脑子，并使整个种族低能”。但是他却唱了一首赞美咖啡的诗：

“咖啡滑进一个人的胃里，它推动了所有一切。整个人的意识像“大军”的行阵一样列队前行。回忆加倍地带着那领导军队参加战争的旗帜涌来。排开了的轻骑兵在疾驰。逻辑像炮队带着它的炮弹和辎重一样铺天盖地地袭来。清晰的观念像狙击手一样果敢地加入这场决斗。稿纸上铺满了墨水，角色们穿上了各自的服装。这个战争已开始，在一种淌满黑色液体的情形下结束，就像一片真实的战场被火药所放出的黑烟的缠法所包围。”

他没有咖啡便不能工作，或者最少不能像他这样工作的情形来工作。除纸笔以外，随处他都把烹制咖啡的用具当作随身物品携带。因为没有别人会把这样具有刺激性的黑色毒药调制得如此浓黑暴力，所以他不允许另的任何人来备办咖啡。而且，正如信仰一种迷信的拜物教一样，他只用一种形式的笔和某类特别的纸张，同时，他也按照一种特殊泡制法把咖啡混合起来。曾经被他一个朋友记载过：“这种咖啡包含三种不同的豆类——马尔丁尼克，摩沙，和布尔崩。他到老奥得莱特街去买马尔丁尼克，到圣日耳曼镇的大学街一家商人处买摩沙，而布尔崩则是在蒙特布朗街买的。虽然在巴尔扎克做采购的远征时我屡次陪同他去，但那人商人的名字我已忘记了。这种远征直穿过巴黎，每一次都要半天的旅程。但是对巴尔扎克的好咖啡来讲，这点麻

烦是不值什么的。”

他的麻醉药是咖啡，但是和所有药品一样，若要它保持效力不减退，必须不断地加大、加重剂量，所以他吞食了越来越多的致人死地的长生药，因而令他的神经追上了那种有增无减的紧张。他谈到他的一本书，是在“成了河的黑咖啡”的帮助下完稿的。在将近二十年的过度的沉溺之后，在一八二五年，他承认他曾经不间断地求助于这种麻醉刺激品，现已使他组织中毒了，并且抱怨它的效果愈来愈差了。同时，他在胃里感到了可怕的痛苦。如果他那五万杯咖啡（由某位统计家所估计的他所饮下的数目）使《人间喜剧》庞杂的写作系统加快进程，它们得对他那本来强健得像口钟似的心脏的早衰负全责。他终生的朋友和医生，拿克加尔大夫，宣布道：“一种因为夜晚工作，因为服用——不如说是滥用咖啡（借助于它来和人类睡眠的需要来竞争）而积成的心脏老化疾病，”是他的真实死因。

终于钟敲了八下，门上又响起剥啄声。仆人奥古斯都送了一盘俭仆的早餐进来。于是巴尔扎克从桌前站起，他从子夜开始工作到现在。奥古斯都拉开窗帘，一个暂时的休息时刻到来了，巴尔扎克踱到窗前，临眺一下他所准备征服的城市，这时候他才想起另一个天地和另一个巴黎——一个将要开始工作的巴黎，因为他自己的劳动此时已结束了。孩子们正忙着上学，店铺正在开门，马车正在街上走过，办公室和帐房里，人们正开始坐在他们的桌旁。

为了正在等着他的更多的工作，巴尔扎克洗一个热水澡，以便让他筋疲力竭的身体得到休息，同时也让他自己重新得到恢复。他经常像拿破仑所喜欢作的，在澡盆里消磨一个小时。因为那儿是他能够不被干扰地去冥想的唯一地方——冥想却不必马上把他所想的東西写下来，把自己在创作梦境的纵情欢乐中解放并且无须同时做身体方面的劳力。但是，在他刚穿上衣服时，就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了。信差像拿破仑的骑使一样，当战争时，在发命令和执行命令的地方的军队之间保持一种往返的联系，从他各处的印刷所来。第一个到来的是索要一份正在写作的小说的新稿件的人，要那墨迹未干的夜间刚刚写完的稿子。因为不仅出版商和报社正在像一笔到期偿的债似地等待稿件，（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写作以前就已卖出去的，）而且巴尔扎克在那梦一般的工作情形中写作，他并不知道他已写了什么和他写的是什麼，即使他敏锐的眼光也不能纵观无余他稿子上浓密的混乱：只有当它们在排印出来时才能逐段逐段地校阅它们，就像士兵的队伍在检阅时走过巴尔扎克这位总司令一样，他才能分辨清楚是否打赢战争，或是需重新反攻，所以巴尔扎克所写的每一部东西一定是立即付印的。

从报馆，出版商，或印刷所那儿的信差把他早些时交出去的二校三校的稿件，和他两夜以前所写而在先一天付印的校样篇幅，还有整叠新的大样，常常有五六打从校样机上拿下来的黑迹来未干的稿件，铺满了他的书桌，以求他的注意。

他短暂的休息在九点钟时告一结束。他休息的方式，像他曾说过的，只是由一种工作变更成另一种工作而已。但对于巴尔扎克来讲，校大样并非一件容易事。这不仅仅包括排字工人的讹误与内容或风格方面轻微的修改，而且包括原稿的改造和重写。

其实，他把第一次排印出来的稿子当成了初稿，没有比把那一连串用他敏锐的艺术责任感屡次审视过修改过的校样中初具规模的文字，接着逐渐加以整饬的工作，更令他牺牲热情与精力了。对于他的工作上的每一件事，他

是迂拘而且苛刻的，特别对排印大样，他坚持非按照他所定的制度不可：纸张必须特别长特别宽，所以印出来的文本着上去好像纸牌里的“么”一样，上下左右的四边，留着大量的空白，以便于校对改正。还有，他反对把稿样印在一般贱价的黄纸上，而要求用一种白色质地的纸张，那样的话，在纸上的每一个铅字都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巴尔扎克又在他的小桌前坐下。他最先快速地一瞥——他是据有蓝柏尔·路易那种一目下六七行的本事的。——然后，跟着用笔使劲地一戳。于是他觉得不满意了。先于头一天，以及头一天他曾写过的一切，都要不得。造句紊乱，意义晦涩，结尾粗陋，风格多瑕。必须整个地加以改动，使它更简明一些，笨重处减少一些，更清楚一些。他向那块排印就的文本进攻，像一个骑兵向敌人巩固的方阵冲击一样，进攻时的那种狂暴是可以从他墨小四溅的笔下那些横穿纸面的凶猛的笔画和戳点看出来的。用他的笔当作佩刀般的一挥，一个单字被刺中了而被猛掷于左方；一个句子便从它的文气中裂出，而被抛向右方；整个一段文字被拉出来而被另一段替代。巴尔扎克要用他自己发明的符号，因为通常的给指导工人作指导用的那些符号是不够用的。没有一会儿的工夫，稿样四周便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供给更多的修改，那些修改现在却比已印成的文本都多了。他在四周所改窜的文字本身上也做了许多的记号，用来引起排字工人对那些补充的事后想到的东西加以注意，一块本是白色沙漠，和中间一块印着文本的沃壤上，都被纵横交错的墨迹覆满为止。接着他必须翻过一篇在背面继续修改了。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当纸上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那些符号和使排字工人不愉快地顺着找路线的十字交叉线时，巴尔扎克就借助于他的剪子了。不要的章节被肢解后挪开，接着把新的纸粘在缺空上。另一个新的起头写成了，而一个片断的起头被夹入中间，整个文本被搜遍和掘起。这样混乱的一大堆排印好了的文本，加入修改和校正的所在，线条，黑点，和符号等，在一种比原稿无论难解和更加难读的情况下，送回印刷所。

在印刷所和报馆里，嬉笑的人群聚起来分析如此惊人的潦草的字迹。即使最有经验的排字工人也无法去索解它。并且，虽然他们赚着加倍的工资，却拒绝一天排印巴尔扎克的作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一个人必须有几个月的工夫才能学会了破译他那种象形文字的学问，但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一个具有特殊才能的校对人，还得重新校改排字工人仍悬揣无定的臆测。

但是，他们的工作不过仍处于初级阶段。当巴尔扎克收到第二次印好的大样，又以和从前一样的猛劲儿投身于它们去修改。他再次拆散如此辛苦筑成的大厦，把每一页从上到下都沾满墨迹为止，直到它的难读和复杂仍不减于它前身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要有六七次，不过在后来的稿样中，他不再把一段整个的文字拆毁，却仅仅只修改单个的句子，最后就限制自己只换掉几个字了。就他若干作品的情况看来，巴尔扎克重改他的稿样多达十五六次。但这个情况，对于他非凡的生产力，只给我们一种微弱的印象。二十年里，他不仅写了他的短篇小说，和他的小品，和他的七十四部小说，并且在那些作品最后印成问世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写了它们。不管是出版商的恳求，或是钱财的需要，都不能劝阻巴尔扎克不去实行他那费钱的方式。很多次，他丧生了代价的一半，有时甚至竟整个丧失，因为他得自己付钱来偿付改正和重新排印的费用。虽然这只是有关艺术上的完整无瑕，但没有人能说服他改变。有一次，一家报纸的主笔没有等到最后的校样便把一份小说的稿子印

出来了，结果巴尔扎克永远地断绝了同他的关系。对社会，他显得拖沓，轻浮而贪婪，但做为一个艺术家，他却在近代文坛上进行了一切作家所不及的最不屈服最本平良心的斗争。他把他的底稿校样当作唯一可靠忠实的见证人一样来爱护。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间与外界隔绝的实验室中，他是怎样耗尽精力和自我牺牲使他工作上十全十美，（在那间实验室里，他辛勤地专心一致，是那些只看到他完成的作品的人所看不到的。）它们是他的光荣，这种光荣，属于不疲倦的工匠，属于努力工作的人，比属于艺术家更多一些。所以他把每一本作品编成一份，那是由原稿和那些修改的稿样在其各个阶段的积累合成的。接着把它们订成一大册，如果一本出版的小说有二百多页，这个稿本则将近二千页。有时原稿并未和稿样装订在一起，而是附在里面。巴尔扎克从《人间喜剧》浩瀚的王国里，像拿破仑把那些公爵王子的文章和头衔分发给他的陆军元帅和忠实党羽一样，把那些册子当作他所能赐予的最贵重的礼物，赠送给他的朋友们：

“我见把这些册子送给那些爱我的人。它们是我漫长劳作和坚忍——我曾向你们说过的那种坚忍——的见证人，在这些可怕的篇幅上我消磨了多少个夜晚。”

其中多半送了德·韩斯迦夫人，而巴尔扎克的妹妹，德·葛丝特丽夫人，和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也在这些受赠人的中间。这几个为如此的光荣而选拔出来的人，是深深地知道这些无与伦比的文献的价值所在的，这可以从拿兑加尔大夫收到《幽谷百合》的稿本后的回信中得到证实：（这东西是他多少年来友谊和医药方面对巴尔扎克照料的报酬。

“这是真正令人惊异的纪念碑，并且应让所有相信艺术是美的人都看到它。对于那些读者们——那些人认为这些精神产品，在它们被孕育和创造时，是和它们被阅读时不费吹灰之力的——那将有多大的好处啊！我希望在王多姆广场中心设立我的图书馆，那样一来，那些对你天才欣赏的人，便可以学会批判你工作时所用的坚忍和谨严的真价值了。”

留存于现今的任何文献，除贝多芬的手册以外，几乎再没有比这些册子里面所有的东西，把艺术家奋斗的表现，表现得更加真实准确的了。在这里，巴尔扎克用以完成他作品的非人所及的精力，天赋的元气，比任何当时记载的掌故或肖像，都更能生动地供人研究。只有研究它们，我们才会发现真正的——巴尔扎克。

他戏称为“文艺烹调的工作”的工作于校样稿的三四个钟头占去了整个上午。接着，他撇开那些纸张，用一顿简单的午餐——一个鸡蛋加一两块火腿面包或一小枚肉饼——来恢复他自己。他喜欢过舒适的生活，也喜欢他家乡的有味的腌肉，脆鲱鱼，社尔式的原味油腻的菜，以及多汁的红肉之类，同时他熟悉他家乡的白酒红酒，就好像一个钢琴家对琴键的熟悉一样；但是当他正在工作时，他抛弃了所有奢侈。他知道没有时间来迟缓怠情的，所以不吃好东西浪费时间。甚至他连片刻休息时间都没有，饭后紧接着把圈椅移到小桌边，继续摘抄备忘录，校正稿样，写一两篇东西，或是写信给朋友。

最后，将近五点钟时，他才算把笔放下了。他没有见到一个人。甚至连报纸都没有看，但是现在他能够松弛一下了。奥古斯都正在准备晚餐，他可能有时接见一个朋友或一个出版商，但他大多是独自一个人冥想的。他所想的大多有关当天晚上所要作的工作。他几乎从不到街上去，因为他实在太疲惫了。八点钟时，当别人出去寻欢作乐时，他于是上床去，并且马上就睡着

了。他的睡眠很少有梦，大多是沉睡。他的睡眠像他做的任何其它事一样，带着极端强度的特性。他所已经做的整个工作，并不能使他在明天，后天获得解放，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仍要工作，但一睡觉就忘记了这些。子夜，他的仆人又进来了，点上蜡烛，于是给醒来的巴尔扎克又复燃起工作的火焰。

这就是巴尔扎克一口气工作若干星期和若干月的方式。他直到手边的工作做完，绝不肯忍受任何打搅。但是在两个完全专心致志的时期是中间的休息，只能永远是短暂的。一本紧接着一本，就好像那件大织物——是他的寿衣，也是他毕生的工作——上面的一行针脚。他失望地感慨：“一本书接着一本书，一夜连着一连，那永远是照样的。我要营造的建筑物实在是太广而且太高了！”

他时常会被这种丧失希望的恐惧心所袭击，并且把他自己所精铸成的锁链搞得哗啦乱响：“我在一个月里要做的事，是别人一整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内干不完的。”但是工作对于他已成为一种强制的必要了，而且欲罢不能了：“只有工作时我才忘了痛苦，对我来说，工作是对我的慈航普渡。”

虽然他的工作是各种各样的，却对它的持续不断毫无影响：“我在不写的时候盘算我的计划，而在我不写也不盘算的时候，我改稿样。那就是组成我生命的东西。”

他生活时脚踝上绕着一条链子，当他要逃走时，链子便响了起来。倘若他去旅行，他仍然得写作。当他去恋爱和出远门去看一个被他的热情所倾倒的女人时，这种热情对于一种较高的责任而言，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当他宣布要向德·葛丝特丽夫人或德·韩斯迦夫人作一次预约拜访时，他也许会迫不及待，并且发狂地乱想胡思，但他在信中预先通知他的情妇，她决不可能在下午五点以前见到他。只有当他在做完当天残酷无情的十二到十五小时的工作以后，他才能把自己贡献给他所钟意的妇人。工作是比较重要的。

《人间喜剧》比真实的世界更重要。

当我们想象巴尔扎克这二十年中写出的作品，苦我们算一下他的商业贸易和私事，我们唯有惊叹不已。无论伏尔泰或歌德，都永远地拥有两三个唯命是从的秘书，甚至连圣提——柏夫还用了一个专给他做修改工作的秘书。但是，巴尔扎克在处理所有商业贸易和一切通信时，却没有任何的帮助。除掉他垂危时那封动人的绝笔书：——那时他手指已不能再提笔了，只能在他太太写的一封信后加上一个附白，“我不能再读书写字了。”此外他函札的每一行，他书籍的每一页，都是他亲手写的。当他过目所有关于他被涉及的诉讼程序，缔结合同，他没有一个商业代表，一个书记，或专门顾问。他亲自向商贩们订货，替他家庭采购东西，后来还照管德·韩斯迦夫人的财政，并帮她建议家庭中的一切。他接近病态地用尽他的精力，但他也一次次地承认这种不自然地消耗精力必将导致不幸的后果：“我的脑子有时就像失了火，而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因头脑的损坏而死掉的。”

在他过分紧张和用力的时期之后，允许自己略为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危险得像土崩瓦解似的；“我一天睡十八个小时，而在另外六小时，什么也不做。”在过分的工作之后，他休息的方式，其本身也是过分的。即使他能够提起精神去寻找消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他从洞穴中走出来，去找他的同伴时，他的头脑依旧处在一种兴奋状态中。当他跨入商店时，他仍旧处在那种幻想百万富豪的魔力之下，——这百万富豪只是他曾经从脑子里倒出来吓唬人的，——于是他就胡乱花钱。在他几乎连他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的若

干个星期的缄默孤独以后，似乎因为禁锢过久的驱使，想要冷嘲热讽，想要沸腾出高谈阔论和隽语来，他很自然地垄断了同别人的谈话。在若干个星期的俭朴生活以后，他以一种肆无忌惮的好胃口来暴饮暴食，而当他旅行时，老是嫌马跑得不够快。他在所有动作中都保持一种可在他的小说中找到的富饶的幻想，同时带有一种有生气的欢愉的本能。他可以和一匹关在马厩中过久的赛马相比，一旦可以自由地运转筋肉，呼吸到催人欲醉的自由空气，它马上会像一颗流星似地弹射出去，而不是用一种舒适缓慢的脚步来开始出发了。或者把他和从前热诚而粗豪的一个水手相比，几个月没有见过大陆，没同女人谈过话，没睡过床，一旦他们的船，在克服了海上重重困难之后抵达港口，他会把一个满腾腾的钱袋摔到桌上，喝足了酒，并从生活的纯爆炸性的欢愉中引起一场骚动。这就是巴尔扎克从自己规定的清规戒律中暂时松弛下来的休息期间的如何举动的情形。

但魏兰待，戈兹兰，那一大帮新闻界专擅品头论足的是非精，却玩耍了他们那不值一钱的小智慧，像小人国中的侏儒嘲笑那个从俘虏中释放出来的，在他们中间昂首阔步的巨人一样。他们记录了一些小掌故，那些小掌故传布了他幼稚的虚荣心和可笑的纨绔举动，而且把这些东西当作一回事地印在他们的作品上，于是每一个笨蛋都能感到自己比传大的巴尔扎克还聪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工作得像巴尔扎克一样的情形，假如他行动正常的话；倘若他经心着意每一法郎的计算，还认四分的利息把他的积蓄投资的话；假如他把握了被他统治的幻化梦境的全权后，而出现在实际的人世时，还能遵行那些沙龙的流俗的话；假如他把创造天才，给予在冷静而有外交手腕的策划的圈子里的话，那才是不正常呢！这种小聪明只有用来讽刺他那巨大身材走过时，映在墙上的怪诞的阴影罢了。他同时代的人们对于他的天性一点也不了解。因为巴尔扎克就像一个幽灵似的，他是没有几个短暂的时间来享受自由呼吸，只被允许在它所不属于的世界里遨游一样，直到不可避免的钟鸣声把它召回阴间为止。接着，他就被召回到他那孤独寂寞的藏身之处，回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对于他来说，那才是一个唯一真实的世界。

第三节 玫瑰花的铁链

巴尔扎克的真正的生活方式就是工作。他暗暗地自满地赏心乐意于一种魔妖一般的毅力和创造的意志，原因是这些都可以让他从伸缩自如的脑海和魁梧的身躯中取出最大（甚至于超过最大）的源泉。他终日从事干火热的工作而自豪地宣称：“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放纵。”他的工作方式的原则就是从生活中吸取最多的经验。

可是，最残暴的意念也无法完全抑制一个人的来自天性的要求，人性总是注定去反抗在某种专心的事业中去削平情欲的锐刺的无常的生活方式，反抗在幻想中寻找满足。巴尔扎克经常遭到一种凶残的感情的攻击——随年龄的增长，这种攻击越来越频繁，他总是感到他的黄金岁月已远离了他，最高超的艺术创造也仅能算作生活的代表，而不是生活本身。他向卡罗·朱尔玛坦白说：“我正尽力设法把我的生活集中在我的脑海中，”但他却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同时也是一个伊比鸠鲁主义者，他在他那单调枯燥乏味的，远离尘世的日常生活中呻吟着。这个人需要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比只对毫无反应的纸张的纸张倾吐言辞还要热烈的表达方式。这个创造人物的作家，一度描写了一批和男人们谈情说爱的女人们的作家，他也需要一个可以被他所爱又可以爱他的女人。

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女人呢？这里，他的工作讨厌地拖了他的后腿。他没有足够时间去寻觅一个情妇或一个妻子。他不能够清闲自在地去到处寻找。倘若我们看到他如何屡次地委托卡罗·朱尔玛和他的妹妹帮他找一个可以把他从欲望的苦刑和感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合适的妻子的话，我们也会受到感动的。

突如其来的成名带给他一个奇异的变化。因为当他已走到失望的边缘，似乎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他所需要的女人时，女人们却要开始寻找他了。女人们往往喜欢一个关心她们问题的作家，但巴尔扎克偏爱他所创造的女性人物（他往往把她们描写成苦恼烦闷的，男人们不了解的牺牲品，）他对被弃的，被逐的或衰老的女人的同情，他体贴她们的失败，这些都触动许多女人的好奇，不仅仅是巴黎女人好奇。于是书信便源源不断地从法兰西最偏僻的省分，波兰，德意志和俄罗斯寄来给这位“涉测高深”的作家。

巴尔扎克平常忽视通信。他很少给人家写信，期望和这个时代的伟人讨论知识的问题总要令人感到失望。但是女性读者们的来信总给他带来快乐，同时又令他产生某种兴奋。这一类的通信在他那富有想象的头脑中，总可能包含有一篇可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小说。他也肯定会在预感的精神交通中向那些素不相识的女人们倾吐他的心情和忏悔，他拒绝向知心朋友们述说的心情和忏悔。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五日，当他和朋友马尔冈一家住在沙斐时，有人给他转来一封信，引起他特殊的兴趣。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幻想和琐碎的事联起来的能力。在这件事中，他凭笔迹，信笺和文字的口气感觉到写信的人必定是一个高级贵妇，甚至是最高级的贵妇，虽然她只署英文的假名，没有签自己的真名。她一定是一个有着悲痛经验的，年青美丽却不幸的女人，并且无疑的是一个伯爵夫人，或一个侯爵夫人，或一个公爵夫人。

他的也许也有势利的心情的的好奇心，令他坐卧不安。他立刻回复了这位

不知名的人一封六页纸长的信。他既不知道她的环境，也不知道她的年龄（依据他自己说的话），他开始只给自己辩护，去驳倒她读了《婚姻生理学》之后给他带来的一些无足轻重的意见。但巴尔扎克难以抑制他的热情。一旦他要表露他的仰慕，他就拿狂乱的词藻去表达，一旦打开了他的心扉，带来的就是一场疯癫的忏悔。他对她说他只想和一个寡妇结为夫妇，告诉她他的“将来最秘密的计划”。他又告诉她他要用《驴皮记》来做为他的文学大厦——《人间喜剧》的基石，他“很骄傲有此企图，虽然我知道我的计划会失败。”

不知名的收信人读了这一封不是礼貌的复函而是充满亲密的自白，而且也没有她所期待的文学问题的答复时，肯定会惊讶的，她似乎也迅速地给他复信，可惜他们之间的通信现存已不多了。双方都希望彼此结识。不知名的女人除了社会上散布的闲话之外，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巴尔扎克的事，他的相片也刊登在许多报纸上，但他对她却一无所知。他的好奇心激动到了极点他几乎不能够控制他的耐性，他要发现她到底是不是仅仅一个有才气的女人，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年青美貌的女郎，到底她是不是一个渴望安抚的悲痛的灵魂，他是不是一个受过太多教育的有钱的中产阶级的女儿，或者（大胆的设想和希望！）果然是一个伯爵夫人，一个侯爵夫人，或一个公爵夫人。

结果证明他的心态的本能胜利了。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确实是一个侯爵夫人（后来因为继承关系而领有公爵夫人的头衔）。侯爵夫人不像她从前的情人，那位由于窃国的科西嘉人而得到贵族特权的德·葛朗台公爵夫人，她是圣日耳曼镇中可以找到的最为深蓝和最为优秀的血流。侯爵夫人（即后来的公爵夫人）德·葛丝特丽·玛丽·亨利爱特的父亲是德·麦利公爵，以前的法兰西元帅，十七世纪时就有了他的家徽；侯爵夫人的母亲曾经是德·费兹——詹姆士公爵夫人，也就是说，是斯图亚特王室的家属了。她的丈夫德·葛丝特丽侯爵是著名的德·葛丝特丽元帅的孙子，一个德·基尼斯公爵夫人的儿子。巴尔扎克差点发狂死掉，因为像这样一个在夫家和娘家两方面皆为世族的家庭实为贵族中难能可贵的一个了。她在年龄方面也满足了他的完美的理想。那时她三十五岁，可看作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在其它方面，她也是所有女人最能符合巴尔扎克典型的，因为她是一个不幸的，失望的，多情的女人，她的过去的婚恋史在巴黎社会中丝毫不比《驴皮记》逊色，并且曾经被司汤达所利用，当作他的处女作《阿尔曼斯》的素材。

巴尔扎克轻而易举地发现她的浪漫故事的细节。年方二十二而作为法兰西贵族里最美丽的年轻女郎时，她邂逅了全权的奥地利大臣梅特涅的公子。她坠入了爱河，狂热地爱上了这年轻人。公子虽然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强壮体格，却在社交和外表的魔力方面得到他父亲的遗传。因为法兰西的上等贵族仍保守着十八世纪的开明的哲学传统，若这一爱情没有越出秘密的界限的话，她的丈夫肯定会默许，不管这爱情是怎样的炽热。可是，为了不只激起司汤达，而且刺动全巴黎社会的真诚和同情心的目的，两位情人却蔑视任何的和解。梅特涅·维克多王子放弃了他那光荣的事业，德·葛丝特丽夫人离开了她丈夫的家，断然不顾社会的批评，他们决定只为彼此，只为互相的爱情而生活。这对情侣游遍欧洲美丽的国度，后来他们生了个孩子，他们的幸福得到了珍重保证。后来，奥地利皇帝封那个孩子为房·阿尔登堡男爵。

但是，好事多磨，乐极生悲。侯爵夫人去野外打猎时，不幸坠马伤了脊

科西嘉人，即拿破仑。

骨。此后，她只能躺在床上或斜靠在沙发里打发时光，但此事发生不久她连她情人的温柔照应也被夺走了。一八二九年十一月，梅特涅·维克多死于痼病。对她来说，这一打击比坠马还要凶猛。她不能再继续居住在只有他们的爱情才可能反映出美丽景致的风景宜人的国度里了。她回到了巴黎，她并未恢复社会上的地位，也没有重新恢复她在丈夫家中的地位，因为她曾侮辱过这个社会的风俗。她隐居在卡斯特兰宫殿中，她父亲的家中，只和书本打交道，不和旧友交游。

由于她每天都是他大胆梦幻的实现对象，所以继续和这一个女人通讯，让她拿友谊的话语给他写信，这足够激动巴尔扎克的心了。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一个弃妇，一个贵妇人已经选择了她，选择了她这个农夫的孙子，以前的一个小乔尔布亚的儿子，巴尔扎克，多光荣啊！多少的仲马，雨果，穆塞都只娶到布尔乔亚的女人为妻，找到女作家，坤伶、轻佻女郎为情妇，巴尔扎克胜过了他们！倘若他被允许去炫耀他在她身上得到的不仅只有友谊，倘若在暴发的公爵夫人（如德·葛朗台夫人）和可怜的小贵妇之后他居然能够成为一个正牌的老法兰西贵族公爵夫人的情人甚至于为丈夫，成为了梅特涅王子的继承人，恰如在德·葛朗台公爵夫人的事中承继了王子的父亲一样，他的胜利是多么的伟大啊！他坐立不安地等候邀请，希望受到允许去拜访那位著名的未曾谋面的贵妇人。二月二十六日，带有“信任记号”的一封信终于来了，他立刻回信说他同意接受她的“仁慈的赐予”，不顾“见面时将要遭受相当的损失”的危险。

他这样匆忙地幸福地回信，以至于疏忽了另外一封放在他桌上却未启封的信。这一封信是那一天一个署名“无名女人”的从俄罗斯寄来的。

更不用说巴尔扎克在没有见到德·葛丝特丽夫人以前，便无可奈何地爱上了他。假使他发现她是一个愚笨的或丑陋的女人，一个嫌怨的或是仅仅喜欢吵闹的女人的话，这却不会影响他的感情，原因在于他的一切感情，包括爱情在内，都受他的意志控制。在他结束细心的装份，穿上新做的衣服，坐进车里驱车向卡斯特兰宫进军之前，他已下定决心要爱上这个女人，同时也让她爱上他。就像他跟那个“无名女人”发生的公案中一切的行为一样，他已把德·葛丝特丽侯爵夫人塑造成一个理想的偶像，希望要委任她担任他生活史中的女主角。

这生活史的开始几篇确实和他的幻想吻合。一个虽不太年青，看来有点苍白，有点疲倦，却还说得上年青的一个少妇，坐在趣味卓然的客厅里的沙发上，他是一个曾经恋爱过的女人，知道一切爱情所包含的内容，却需要在孤单的生活中寻求安慰。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一向和王公大臣们来往，并有意大利大臣的公子当情人的女郎，却并不讨厌这个身体肥胖，肩膀宽阔，任何高明的裁缝都无法使之变成美少年的平民。她睁着眼睛，充满兴趣地看着他，娴雅地听他的活泼的谈论，因为他所认识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物，第一个作家，虽然她是文静的，她却感到了他拿来接近她的激动的躁急和领悟的同情。两三个钟头的时间随着魔幻般的谈话慢慢逝去，虽然她尽可能地忠于她那死去的可怜的情人，她却抵抗不了命运给她送来的奇人给她带来的敬仰而生的冲动。在巴尔扎克一面，这是疯狂的起点；在她一面，这是友谊的开端。他给她写信道：“您这样客气地接待我，我同您一起渡过的时光如此地

有意义，我确信只有在您身边我才能找到我的幸福。”

他们的关系变得渐渐密切起来了。以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时间，巴尔扎克的马车都在每天晚上停在卡斯特兰宫前，他们两个人也就谈话直至午夜以后。他把他最后的作品念给她听，请求她的指教，他陪她到戏院去，他拿他的《查伯尔上校》，《三十岁的女人》和《噩耗》当礼物送给她。由于失去情人而孤单的久悲的女人开始从这种谈论知识的友谊之中体验到某种类似幸福的东西，但是在巴尔扎克的方面，友谊还是远远不够的。

当巴尔扎克的需要超出了比知识的交流还要多时，他的追求也就变得渐渐地强烈起来。他向她坦白，告诉她她是他的欲望的对象，因此他也愈来愈紧迫地要求她的屈服的开始和结束的承诺德·葛丝特的夫人由衷地感觉到（或许是下意识地感觉到）被一个她所崇拜的天才所仰慕是何等的荣耀，因此她也并不用冷冰冰的蔑视来阻挡她的过分暧昧的举动。她甚至于故意去挑动他的亲密举动，虽然我们不可以完全地相信巴尔扎克在他带有报复性色彩的小说《兰齐公爵夫人》中所描写的情形：

“这个女人不仅客气地接待我，并且为了我的利益而展示她所有的相当可观的妖冶的艺术。她要使我欢喜因而竭尽最大的努力来让我停留在麻醉的状态中，来鼓励我。她使尽她所有的力量去强制一个静默的怯懦的情人去坦白他的心情。”

但是，当情形开始滑向危险的地步时，她就坚决地阻止了他前进的脚步。也许她要继续忠于她昔日的情人，她孩子的父亲，她曾经为他而放弃了荣耀的社会地位，并且她觉得自身生理上的残缺并不允许她走得更远，可能她确实由于受了巴尔扎克的粗俗外表的驱使而出此下策。也许她担心害怕他的虚荣心会让他到公共场合去吹嘘他和贵族妇女的关系（这并非一个不正当的理由，）她仅允许他做些类似他在《兰齐公爵夫人》中所说的“怯懦的情人应当满足的迟缓的小小征服，”顽强拒绝“用身体的屈服表明心灵的屈服。”生平中第一次，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意志并非是全能的。几个月的不懈追求，每天的拜访，和为保党而努力的在笔墨方面的活动，不管他如何地委曲求全，他仍旧只是德·葛丝特丽夫人的理性的朋友，却不是她的情人。

即使是最具智慧的人往往也是到了最后一个人才会觉察到这样做是毫不值得的。巴尔扎克的朋友们并不明瞭确实的情况，他们看着他在公共场合中所表现出的举止上的改变，不由得大吃一惊。他们看着他拿着小望远镜，从意大利剧院的黑厢中往某一个包厢窥视，看着心神不定的巴尔扎克变成了花花公子，看着他变成了仅把中产阶级（不管他们是怎样伟大的画家，作家，政治家或音乐家）当作小厮的德·罗桑公爵和德·费兹——詹姆士公爵客厅的常客。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这种希望柱上爬的侈靡的生活会有损于他的声望，等到他们的巴尔扎克·奥瑙利在极端反动派的报纸《改造》中当一个政论的作家并大出风头时，他们都正面地感到惊恐了。在《改造》中，巴尔扎克妩媚地同情封建的特权，并且在德·柏利公爵夫人面前公开地屈膝了。他们相当了解他的性格，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他一定被某只无形的黑手带进了这黑暗的政治生涯，他们知道他并非贪图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卑贱的无赖。巴尔扎克特别小心不让德·柏尔雷夫人得知他和德·葛丝特丽侯爵夫人通信，并去拜访侯爵夫人的事，但德·柏尔雷夫人却恰恰是首先警告他的人。虽然她自身倾向于保王党的运动（因为他是路易十六和安他涅特·玛利王后的“教子”，她是贵族的家统），她却十分厌恶巴尔扎克突然变成一个保王党的宣

传家，并尽力劝诫他不要变成了“这些人的奴隶”。她用她在贵族社会中的经验来观察，她用旁观者清的地位来观察，知道这些贵族并不真正地敬重巴尔扎克这个作家，不过是利用他的谄媚罢了：“从本质上讲，他们是顽固无情的保王党人，我的朋友，他们不会仅因你的缘故而改变他们的作风。”

更加坦率无礼的则是，卡罗·朱尔玛深恶痛绝地阅读巴尔扎克给当时尽力设法令他的儿子查理十世的孙子继承法兰西国王的德·柏利公爵夫人所写的颂歌时给他寄来的谏言。她告诫他不要为那些宫廷人物作保镖，不要由于和那些人鬼混而葬送了他的名誉。甘愿冒着失去友谊的危险，这友谊是她最为珍贵的东西，她严厉地警告他因为她对他天才的仰慕令她痛恨这种重视一纸贵族证书却轻视心灵的统一性的卑贱行径：“你居然依附于顽固的享有特权的贵族！你难道不能从你的梦幻中清醒过来吗？”

两位真诚恳切的朋友都不知道到底是玫瑰花的铁链或是金钱的铁链把他捆绑在布尔崩的一群仆从中，但是她们都感到他被迫放弃了他的独立自由，他不忠实于自己。从二月到六月之间，差不多有五个月的样子，他一直奉承着德·葛丝特的侯爵夫人。六月初旬时，他突然间离开了巴黎，到沙妻去和马尔冈一家人住在一起。是否他的情热冷却了下来呢？是否他害怕发生一种关系导致毁坏他留在柏拉图式的友谊中的努力呢？是否他自我感觉到坠入深坑却已冲出了重围呢？不是。虽然他的明见告诉他没有希望了，他却还在他的雄心所引发的一个感情的蛊惑之下。最后，他用公平的，失望的态度向卡罗·朱尔玛坦白他的景况：

“我现在必须去爱克斯，到沙无瓦去爬山，跟随在也许要跟我开玩笑的某个人后面跑——那些在中眼中无疑是一个丑恶的贵族妇人，这是一个有着天使一般美丽面孔的，并且人们认为在这个美丽的面孔之后必有一个美丽灵魂的女人。她是一个正统的公爵夫人，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谦逊，又聪明，又娇媚，又多情，和我以前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大不相同。一个在靠近的接触和每一次诱惑前退缩的女人，一个说爱我，却当她固执时变把我软禁在一个威尼斯宫殿深处的女人！……一个（你知道我向你坦白说明的一切事！）要我专门为她而写作的女人；她只是这样女人中的一个，就是别人得毫无保留地崇拜也，假如她要求的话，别人就得跪在地上，去征服如此一个女人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啊！——这仅仅是我在幻想中遇见的一个女人！……对什么都要妒忌！倘若我可以跟你一起住在安古莲，靠近你的磨粉厂，既可以心灵平静，又可以感到愉快，饱尝冬菇，倾听风轮机的转动，不是在这里耗费我的生命和时间，而是跟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块谈笑话，这一定对我会更好的。”

但是，他这一次暂时地离开巴黎和德·葛丝特夫人并因为他感到他对她的仰慕已宣告破产。原因并不带有罗曼蒂克的成分。定时爆发的一个使他伤透脑筋的经济上的悲剧，和夏日的暴风雨一样，又一次地向他袭来。巴尔扎克恰恰和米达斯相反。他的手接触的东西没有变成金子，却变成了欠的债。只要他着手投机的买卖，只要他谈恋爱，甚至于旅行，结果总是导致经济上的悲剧。因为他的预算搞得十分紧凑，从他工作中抽取一分钟时间就意味着欠下债务中的一笔钱。他在戏院和德·葛丝特夫人的客厅里所浪费的夜晚他可以写成两部小说，而这种收入的损失又因为支出的增大而更加严

米达斯，神话人物，他得到了点金术，只要他的手接触的东西，那东西便变成了金子，结果他吃的东西都变成了金子。

重。他按照适合追求贵族情人的方式不幸地把他的债台筑到高得不可想像的程度。驾车去卡斯特兰宫便花费了不止九百法郎的草料费，而裁缝的帐单，三个仆人的开销，和阔绰的生活使他累积债务。这一次没有债权人来围攻他卡西尼街的房子，却来了一帮法官。只有一条路可以挽救他，就是回到写作上来，但写作需要清醒的头脑：他只有唯一的选择——逃跑。他从爱情中逃了出来，从巴黎逃了出来，躲开了债权人，逃到了别人找不到他的地方去。

他所要写作的东西已经事先卖了版权。动身以前的那一天，他签订了两个合同，预支了一千五百法郎，作为几个月的零花钱。但他离开巴黎前必须付清一千四百法郎的债务，等他踏上去沙妻的驿车时，他身上仅剩下一百二十法郎了。好在住马尔冈家时，他所有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他也没有什么花费的地方。他只在吃饭时出来一两个钟头，整天半夜地坐在房中写作。但是静悄悄地坐在沙妻的房子中却不能降低巴黎家中流水般的开销。他得找人减轻他的费用，清理他的事情，平息商人的吵闹和与债权人斗争，但他唯一能够负担如此繁荣负担的人只有他的母亲了。在挣扎多年脱离她的庇护以后，现在他被迫去卑下地躲在他节俭持家的才能之下了。

顽固傲慢的儿子的屈服是老妇人的一项胜利，她开始勇敢地防护一个失去了的地位。她降低了他的家庭支出，辞掉多余的仆人，击退了查封产业和商人们的进攻，把他华丽的马车和华贵的马匹卖掉。她一个苏一个苏，一法郎一法郎地设法恢复他那崩溃的财政，即使是她，不久也毫无办法地面对债权人的暴风骤雨似的突击。房租仍未付清，房东便抄押家俱。仅一家面包店便拿来一张短欠七百法郎的清单。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单身汉如何消费如此之多的面包。因为每天都有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流转的期票和汇票需要回收，所以她在无可奈何中只能给她的儿子写信，但是他的儿子在书未写出之前便已把书稿版权出卖了，他看出没希望再从出版商那儿再弄到一个法郎了。于是他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工作，却还不清他过去几个月所短欠的债务。

文学不能够拯救他，这很明显。于是，他又故技重施，就是设法娶一个有钱的妻子；这在一个看来已风情万种的人似乎是很古怪的。因为身心的奇特配合，那一年的年初，正当他对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浪漫欲情不断增长时，他却去尽力地取悦一个名叫德·杜鲁米利的年轻小姐，这个新的恋爱对象恰好由于父亲的去世而变得富有，这件事和巴尔扎克的追求不仅仅是偶然的凑合而已。因为历史上并未记载的某种理由，他的追求被人家拒绝了，富有的孤女甚至侮辱了他，因此他决定去找一个富有的寡妇，并希望因此能够保证生活上的物质条件，永远地平息他动乱的心灵，使他得以安心工作。在万分失望中，他不但拜托了他的老母亲，甚至请来了他的老朋友德·柏尔雷夫人去给他从速物色，去寻觅一个可以拯救他的经济危机的阔绰的寡妇。

居然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被找到了，这个女人即某一个德尔布律克男爵夫人，并且她是一个热烈崇拜巴尔扎克的女人，他想出了一个计谋。夏天的时候，因为男爵夫人在沙妻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财产，所以那只金色大商船一定会依照规定的行程抵达港口，于是巴尔扎克便在他的词汇军火库中贮藏了一切足以擒获这一贵重胜利品的武器。为了在最后突击之前软化她，他便送给几部上面有热烈献词的他的作品给她。当时，她居住在查尔西另外的一座别墅中，那些礼物可能会促使她急于和这位有趣的年轻作家结识。每星期三，他放下的写作，从沙妻走向附近她的财产地麦勒去打探消息。

但不幸的是，男爵夫人并未表现出急于离开查尔西的迹象，假如她收到

任何暗示，得知巴尔扎克急于和她那富有的财产谈恋爱的话，她则会更加从容不迫地慢吞吞地来。他那微小的钱包被从巴黎似洪水的滚滚而来的恐吓信熔掉了。除了浪费他的朋友的小小接待费之外，他的一百二十个法郎早已减少到几个银币了，他再也不能在沙斐住两个星期以上的时间了。若在见到男爵夫人之关就离开了沙斐，那么他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了。他的机智达到了巅峰又走到了终点：“一个人把这么多的担忧加在文学工作上，此外又有所有事务的困难，他最好将生命结束掉。”

假如我们阅读处于悲惨境地中的巴尔扎克所写的信件，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艺术家遭遇到精神上的忧虑和激动时，他就再也生产不出有价值的作品了。但把这个理论加到巴尔扎克身上，逻辑推理结果只会是零，不可能的事常常可通过期待来得到。他所住的两个世界，一个幻想的世界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两相断绝的。一个如此有效地把自己抑禁在精神世界中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任凭外面世界的风雨再大也打不到他身上。借着小桌子上灼闪的烛光去发掘很多人物命运的幻想家，他和被法官没收家俱，被人追索债务的那个巴尔扎克丝毫没有相同之处。他一丝一毫没有受到那个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身奥利的欲望的情绪所干扰。

当境况穷困时，他却成了一个最为优秀卓越的艺术家的。忧虑和忧愁都在某种神秘方式中变为高度的内心的集中；但他自己的解释也是最为真切的：“我所有的最优秀的灵感都来自最为悲惨，最为忧愁的时候。”

只有当陷入绝境寻不到出路时，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像被人追捕的麋鹿投水似地投身于他的工作，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继绝了生路，他才真正地寻到他的“真我”，这个情形比这个频繁风暴的夏季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一方面他写他的《蓝柏尔·路易》，这部他的著作中最有深思的作品，这部富有雄壮心志的小说中，他希望证明他比他同时代的作家高明，并希望胜过他所有已写的一切作品。另一方面，他给毫无回信的德·葛丝特丽写情书，每星期三去打探他那富裕的寡妇到来没有，计算着逐日减少的钱，对付预先购买他版权的出版商的追索，施展各种方法去延迟无可挽回的破产，并设法赎回期票。一切都在表明他将放弃往日的作风，跟那个被女性读者所喜爱的流行的浪漫派小说家告别，同时也证实他从事创作时的正直之处，这种作品在读者们正寻求刺激性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言时是不会太有销路的，所以也不会带给他像后者一样给他带来的物质上的成功机会。正当书商和出版商等待他又造出一部古柏尔式或司各脱式的小说时，他却从事另一种带有纯粹理性兴趣的悲剧故事的写作，他对一个理性英雄的想法应当和歌德的浮士德和拜伦的孟福勒特相提并论的。

他的最高意义没有被他尽情地发挥过，很少有人可以领会如此一部富有雄心的作品的真正价值。他借蓝柏尔·路易的形像来反映他的少年生活，试图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要指明因为一只过分热烈负担过于沉重的脑袋不能继续支持，一个深切集中力量在绝对的遁世生活的天才肯定适应不了世俗而生存。这个由于围攻而产生的悲剧故事，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反复奏鸣这个主题思想。这里，他把悲剧带入理性的范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接近病理学的问题了。巴尔扎克远比他的时代早地注意疯狂和天才之间的神秘关联问题了。

在最初几章中，他借用蓝柏尔·路易的肖像描写他自己天才的萌芽，他把自己主要的思想《意志论》说成是蓝柏尔·路易的著作，成功地描写了一

个可以叫人相信的人物。这部书重在说明人性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关系。蓝柏尔·路易因为恳切的求知却毁坏了身体，在“追求不可能”。拿巴尔扎克在《蓝柏尔·路易》中所有的思想的地位来和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有观念的地位相比，这并非夸大其辞。但是，他们之间主要的不同是巴尔扎克必须在六星期之内向出版商高士林交出他的定稿，而歌德费了六十年的工夫来写他的《浮士德》。为了使这部书的某种结局可以给他推导出某个结论，他在他的主角的云母石身躯像四周穿绕了一篇无聊的爱情故事。用“急就”的方式完成哲学理论，使得读者在钦佩之余带上些遗憾的色彩，因为这样一部书比任何别的更能显示巴尔扎克才能的书的缺点都多。虽然后来他曾加以修改，但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这部书依旧是不完美的。但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部书却显现了他要解决重大问题的雄心壮志上的最高峰。

他在七月下旬把书稿交给巴黎出版商。他已在六个月的沙妻居留生活中完成了他的著书目的，但他的经济状况却毫无起色。男爵夫人也没有到来，假如他仍住在沙妻的话，结果只会是麻烦朋友对他的款待了。他显然不好意思因向客气的人们借钱而暴露他的困境。幸好他还有别的可以躲债的地方。他知道卡罗一家肯定会乐意接待他，因为他们也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贫穷，他没有必要隐瞒他的穷困，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们他连补鞋的钱都没有。他曾经一次备过一辆马车，养过两头肥马，现在甚至连坐邮车从沙妻到安古莲去，只好在烈日下步行去杜尔。到那儿之后，他才坐了邮车到目的地去，然后他便身无分文了，接着立刻向朱尔玛的丈夫借了三十法郎。

曾经亲身经历过数次无常的浮沉生活的卡罗夫妇，当听了巴尔扎克告诉他们他的进退两难的境况时，他们不由得万分同情地笑了。他们都竭其所能拿出了所有的东西来帮助巴尔扎克。他找到了一间清静的房子工作，找到了愉快的空气，在晚上和他们一块儿聊天时寻到了友谊的深情。和以前的情形一样，跟这些坦白的朋友一块谈了两个钟头比他所认识的所有的贵族社会都更加能使他快乐。他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除了修改《蓝柏尔·路易》的校稿之外，短时间内他写成了《笑林》和《弃妇》等好几篇故事。除了他每天早晨没有因为收到他的老母亲从巴黎寄来的向他要钱还付不能再沉默的债权人信件外，一切都很美满。即使他只向人家借了三十法郎的小小债务都必须和他的微心作一次斗争，而弄到几千几万的法郎似乎不可能了。

他的黑暗时期到来了。在成功的两三年中他曾吹嘘说能够付清他母亲借给他所有的钱。他相信自己的才能，陶醉在成功中，所以他生活在一种毫不在意金钱的生活方式中。他相信可以跟一个富裕的女人结婚来寻出最后的安全保障，依靠他那可怜的社会关系。现在的他却又跟败家子一样地被迫爬回家中，卑贱地要求家庭来帮助他。他，如此一个著名的作家，圣日耳曼镇的情人，高级贵妇的“侍从骑士”，却得像一个无人救助的孩子一样向母亲飞扑过去，请求她担保去借一万法郎来解救他的破产。他的光荣和他的工作都危如累卵。

奇迹出现了。他的母亲居然能说服老朋友德兰诺瓦夫人借给这个知道悔改的败家子一万法郎。我们必须知道，这块美味的小面包是在播散许多胡椒和食盐之后在放在这个饥饿的人的面前。他必须在肩轭之下低头。被赦免的罪人答应放弃他的挥霍的生活，改变他的奢侈的生活方式，用复利的方式去偿清他的债务，培养节俭谦逊的中产阶级品德。

一个奇迹救活了巴尔扎克，可是当他有希望去在正常的基础上去安排他

的生活，他心里所有的一种需要外在环境的压迫和混乱的天性又用新的失衡来刺激他。他只能在带有火药味的空气中生存。他的热情的天性常常使他忘记他的磨难，但没有要求马上偿还的债务在他一方面就等于并不存在。假如他冷静地考楼，他肯定会看到他的经济状况的改善，唯一的不同点只是把他所有的二三十笔小小的急债总结为一大笔的欠款而已。但是，对巴尔扎克来说，套上他脖子的绳子已经稍为松弛了。只有他可以再一次地呼吸，他将会鼓起他的肺腑。

当他与经济困难作殊死搏斗和忙于写作《蓝柏尔·路易》时，他就不去想念德·葛丝特丽夫人，他知道这场赌博肯定地输定了。当债务的压迫暂时地离开了他的双肩，他又想去最后一次冒险。夏季，德·葛丝特丽好几次请他到沙无瓦的爱克斯去看她，去和她及她舅父德·弗兹——詹姆士公爵一起在秋季时去意大利旅行。身无分文一直妨碍他去考虑这个极具诱惑力的期望，但现在他的钱包中又有几个钱在作怪，她的诱惑攻破了他的防线。他觉得她如此的邀请他到卢梭风景区和安西湖旁岸去并不一定只是应酬，他不该忽略其中带有的一个巧妙的暗示。可能“和一千只猫一样动情”的闭口不管的侯爵夫人之所以在巴黎拒绝了他只是因为怕人说闲话。圣日耳曼镇的贵妇人不是要拿自然的方式在天然美景中去满足她的欲情吗？假如《孟福勒特》的作者拜伦可以在瑞士的湖岸上去寻找他的欢乐的话，为什么《蓝柏尔·路易》的作者在同样的环境中却办不到呢？

艺术家在他的幻梦中往往有一种本能在提防着。巴尔扎克的灵魂中有三种虚荣的方式在斗争——去征服一个随时引诱他却不让他擒获的女人的雄心，飞黄腾达的念头，和鄙弃一个拿他这样有价值的一个男子来寻开心的放荡的交际花的欲望由于朱玛是一个可以跟他坦白地交谈的女人，他天天坐着和朱玛讨论他是否该去爱古斯。毫无疑问，朱尔玛憎恨他所钟意的女人，一切女人的天性都督促她劝他不要去访问她的贵族情敌。虽然她崇拜他的文学天才，却从未相信过德·葛丝特的夫人会让一个和一个平民讲恋爱的故事来连累她。但是，等到她看到他是如何地急躁地等待她去加强他应当去的信念时，她心里便使他能够给他足够的担保。她不愿被他怀疑，认为她只是出于她的护忌心才劝阻他去的。还是让他从实际经验中去获取他的教训吧！最终，她就说了他所希望的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动身去爱克斯。

巴尔扎克一生中都和迷信纠缠不清。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他总要像巴黎女裁缝似地爬上六楼去请教一个算命先生，他相信咒符，他总戴着一只带有东方神秘符号的招福戒指。他相信秘密的启示，灵感，本能的警告力量。假如他在这件事中听从了内心的劝谏，他一定开始就取消他的主张。因为刚开始便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邮车换马下车时，马牵动了车杠，他那不算不肥胖的身躯便跌在铁镫上，腿骨折了。别人一定要取消旅行计划，让医生去治疗，因为伤势相当的严重，但意外只有增强他的决心。匆忙地扎上绷带以后，他就展卧在车板上，一直旅游到里昂去。然后继续出发，到达爱克斯之前，他只能拄拐行走，用他那最丑陋的形体去重弹爱情的旧调。

万分不安的德·葛丝特丽夫人替他找到一间背山面湖的美丽的小房间。这个房间有一个好处，就是房钱便宜。每天只要两法郎。他从未这样清静，这样舒适地工作，但德·葛丝特丽公爵夫人的考虑也出于谨慎。巴尔扎克住的房子并不和她的房子属于同一个旅馆，他们隔着几条街。如此一来，他每

晚的拜访就仅限于社交的性质，却不允许他有更亲密的接触行为发生。

他只能够在晚上看到她。这正是他的愚蠢之外，因为白天时间他都在工作，他答应了他的要求，更换平常从午夜开始工作的习惯为早晨六点起工作十二小时。黎明之后他便坐下来写作，直到晚上六点，从不离开书桌。牛奶和鸡蛋是他的唯一食物，每天他花十五苏，由人家给他端到房中去。他的十二小时的工作结束之后的时间是属于公爵夫人的了，但不幸的是，她仍拒绝接受他甜言密语的征服。她对他是十二分地体贴的。当他腿伤未痊愈时让他坐她的车，带他到查尔特勒斯和布尔志湖游玩，幽默地纵容他，当他变得浪漫狂热时；晚上在谈天时按他的方法调制咖啡，在娱乐场中给他介绍她漂亮的朋友，甚至于不让他拿亨利爱特而是拿玛利来呼唤他，这是她反赐予知心朋友的特权。他从巴黎买到一罐香油，一瓶葡萄牙香水和半打黄手套，却仍无济于事。有时，从她容忍接受或挑逗某些暧昧行为时依旧带有一点屈服的迹象：

“所有爱情的欢乐都从她的勇敢表情的目光，华丽的词藻，清润的嗓音中显露出来。并且她让他在她身上得知有些高级妓女的成分似的……”

在湖畔闲游时，她让他得到一个偷窃的或是情愿的接吻，但等到他要求爱情的最后保证时，等到三十岁的女人或弃妇的保护者希望她拿《笑林》的方式来报答他的时候，她就又变成一个疏远的贵妇人了。夏季快要过去了，安西湖畔的树叶渐渐地枯黄坠落，而新的圣——布勒也并未比六个月之前比他在黑罗伊斯有更进步的关系。

湖边的游客渐渐地减少，美丽的游人准备回家了。公爵夫人开始整理行装，虽然她并不是要回到巴黎去。她打算邀请巴尔扎克陪着他们一起去意大利旅行。但是他却犹豫了起来。他隐瞒不了他长期没有结果却仍在追逐的他那付丑陋的模样。我们可以从他给卡罗·朱尔玛写信时的悲哀情绪中看出：“你为什么让我到爱克斯来？”并且，去意大利旅行会花费很多的金钱，特别是路途上耗费的时光等于他工作上的损失。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是对艺术家的一个极大诱惑。因为正如他以前说过的话一样，旅行可以丰富艺术家的思想。他要观光拿波尔和罗马：他要坐在一个公爵的车子里，和一人他所钟爱的漂亮聪明的女人一起旅行。又一次巴尔扎克抵抗内心的预兆，屈服于她的诱惑。他们三个人在十月初旬时动身去意大利。

南下旅行的第一个停留站是日内瓦，但这已是巴尔扎克的最后一站了。到达这个城市时，公爵夫人和巴尔扎克之间发生了一幕具体情形不得而知的戏剧。他似乎给她发去一个最后通牒，她似乎用一种更加侮谩的方式来拒绝他。她肯定残酷地伤害了他最有感觉的地方，或是他人性的骄傲，或是他男子汉的全概。因为他马上冲奔而出，炽烈的羞愧，满面怒容，决定报复这个把他留在错误的乐土中好几个月的男人。他脑中可能已想到在他的一部小说中给她描绘一幅无情的模样来令她偿还对他的侮辱，并且在后来的《兰齐公爵夫人》（原名《别触动斧子》）中让全巴黎的人都知道此事。为了顾全颜面，他们保持着表面上的友谊，巴尔扎克甚至在这小说出版前当面拿骑士的态度念给她听，虽然他在小说用缺乏善意的口吻向世人描绘她的模样。她后来从圣提——柏夫身上找到另一个文学上的忏悔牧师，但巴尔扎克决然地声称：

《笑林》，巴尔扎克写的故事集，不在《人间喜剧》内。

“我对自己说像我如此的生活不可以依靠于一个女人；我必须勇敢地追随我的命运，放眼去看比一个女人的爱情爱要崇高的地方。”

巴尔扎克就像一个不顾一切到处狂奔的孩子终于碰壁，然后迅速地回到母亲的怀抱接受抚摸，给他照顾伤势似的，立刻从日内瓦回到穆尔的德·柏尔雷夫人那儿。他之所以回到她的身边，一面为的是算清他最近的生活，一面为的是忏悔。他从一个他仅为了虚荣而去求爱，由于冷静计算损失或漠不关心而拒绝献身给他的女人身边回到逃回为他牺一切，给他一切东西的女人身边来。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由于现在她是等一个向他伸出救援之手的母爱的唯一的朋友，他也比别的任何时候知道他该如何地感激她，于是他拿《蓝柏尔·路易》，他一生中最喜爱的书，送给她，以表达他最深切的感恩戴德。他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献给我永远所选择的女人。”

第四节 巴尔扎克的秘密贡品

假如我们相信巴尔扎克所写的话，我们不得不说他和德·葛丝特丽夫人的爱情是一个悲剧，给他留下许多磨灭不了的痕迹。他用高热的感情写道：“我讨厌德·葛丝特丽夫人！她打破了我的生命，却没有给我补上一个新的。”他甚至于在另外一封给一个无名的通信人的书信中声称：“我们的关系由于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意愿却完全停留在无可诟病的范围中，这种关系最严厉地打击了我。”

我们应习惯于他在书信中的这种过分戏剧化的叙说。他的虚荣心和骄傲肯定深深地被这次挫折刺伤，但他是一个过分自我集中，过分坚毅的人，任何女人的“否”和“可”都不能“打碎”他的生命。他和公爵夫人的爱情不是一场悲剧，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因为巴尔扎克并不会像他在给天名的戈通信人的那封浪漫的信中所描绘的那样悲痛。他从来没有过像他在《兰齐公爵夫人》中所描写的蒙特利物将军一样地抱着一个火热的铁块去跟那情妇头上加个烙印的念头。他并不在事后满怀复仇的怒火，而是继续和她通信，并去看过她几次。书中把一个多风波的悲剧似的事在实际生活中显得渐渐地在一个人礼尚往来的表面关系中放着光。巴尔扎克在描绘自己模样时从未讲过真话。他小说的特点就是他的多产。他妄图从每一个经验中汲取更多的小说成分，我们也不应该希望他的创造的幻想忽视自己的经验却不让他添油加醋。

替巴尔扎克写传记的人必须和巴尔扎克自己提供的会产生误导作用的证据去作斗争。他不该受巴尔扎克的热情爆发的眩惑，认为一个高级贵妇拒绝给他法兰西人所谓的小玩艺儿就是导致他后来死于心脏病的真正原因。这并没有打碎他的生命，因为他没有比这接下来的几年更有力气，更加健康，更加勤紧的了。他的书比他的信更真实可信。仅仅在随之而来的三年中他的文学作品都要耗费别人毕生精力，足以使他成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了。但就是这个他只看作一个开端，也只是他将成为的“描写十九世纪风俗的历史学家”的真正事业的起头而已。

他的初期成功令他感觉到他操纵着他的力量。他了解自己的力量，觉得甚至可用他的笔去征服整个世界，就像拿破仑拿着刀剑一样。但是，假如他仅注意到物质上的成功（别人可能由阅读他的书信而这样设想），假如他仅想大规模赚钱的话，他所做的也仅只是满足他的读者而已。特别是女人将继续忠实于他。他可以变成所有失望的巴黎女人的偶像，各个沙龙受人祝贺的英雄，孤单女性的情人，和没有他那样富有雄心的同事小仲马和苏埃·欧贞的胜利的敌人。但当他意识到他的伟大力量，他的灵魂便燃烧了一个更高目标的火焰，他就冒着失去读者的危险勇敢地渐渐远离了他们的趣味。他要找出他的界限所在，他的才能范围从未停止在疾驰的笔杆上时令他惊愕。

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六年间的写作特别显得色彩纷呈。第一次接触这些作品的人一定难以相信《蓝柏尔·路易》和《西拉飞达》的作者也能写《笑林》，他并且是在同时写下如此的不同的作品，并在校对他的哲学小说稿件同时写下一篇“滑稽的故事”的。这种现象只能拿试验自己的天才，看看自己能够达到多高和多低的欲望来解释了。就像一个建筑师在完成一个将来的建筑物以前要计算校正建筑物的压力和大小似的，巴尔扎克也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奠下了他的神圣的《人间喜剧》的未来的基础。

他的《笑林》是用他创造的古典法文和拉伯莱式文风写成的。那是纯粹故事的叙述，能够放纵的崇高的精神。《笑林》并未表现任何费力的迹象，这里不需什么深刻的观察和思想，这很显然。他那人世的气度和高尔民族的精神整个地表现在情欲的自然流露中，他拿葛隆底夫人来寻开心，在他一切作品中，这些故事最能适于描绘一个两颊发红厚嘴唇的胖子的外表。沙龙中爆发的粗野的狂笑都变化成快乐的气泡。我们看巴尔扎克闲散地定作，假如他能够呼吸更多自由空气，假如他没有受到生活的压迫，我们就不会只有三十篇的滑稽故事，很有可能他给读者仍宣布计划书中的一百篇《笑林》。

这是他的天才的最低界限，他给他的气质的贡品，但是，他同时仍在寻求他的最高界限、雄心驱使他去证明“手帕的成功”，即使读者妒旧的才能也满足不了他。现在，由于他了解自己，他就不愿让别人对他产生误解。因为他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完全了解自己的力量，他就希望像他这样一个小说家有责任去解决一个有关人类的重要问题，用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去提高艺术的水平，不管这些问题是哲学的，社会的，或宗教的。他要用服从社会规律，适合社会规律的人来和超出常人界线的人相比。他的目的是描写真正的领袖和自禁在自行创造的世界中的或超过常人敢于孤居的人们的悲剧。他个人失败的这一段生活史是他表现出最大勇气的时期。

巴尔扎克在那些小说中尝试描写那些百加重任的人物，这些重大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解决的。他尽最大的努力去描写那些因过分努力却得到悲哀的人，那些终于失去接触现实世界的机会的天才。蓝柏尔·路易是他在此方面的第一个企图，一个论于疯狂去解决人生最后问题的哲学家的肖像，而且他要在上面布置安排一切想得到的不同形式的观点。《无名杰作》中，他指明了一个幻想追求过分完美的画家如何地越出了完美的命运。他过分的努力损坏了他的工作的材料，就像蓝柏尔·路易的思想最终变成了不可理解的音乐一样。音乐家冈巴拉跨山了他的艺术界限，一直走到只有他一个人听得懂自己所创的和声的地步，就像只有蓝柏尔·路易懂得他自己的思想，只有弗兰荷甫懂得他的天启一样。《追求绝对》中的化学家克拉埃斯在寻找基本元素中毁灭了自己。他们都是追求“绝对”的人。他们都是心灵活动的伊步路斯。

除这些天才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外，他又在《西拉飞达》和《乡下医生》中描写宗教上和道德上的天才。后一篇小说的材料是在他去探望公爵夫人的旅行给他间接感应的。他们出外闲游时，一次一起去拜访德·阿古尔伯爵夫人，他听到别人谈论附近的一个医生，某位罗梅尔大夫，据说这位医生以慈善的活动开垦了一块淤泥地，养多了很多几乎破产的农民。这样一篇故事和美丽的风景，给了他一个深刻的印象，和卢梭同名的这块风景区也感应了他，气他想到了卢梭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努力。他在别的作品中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但在这作品中却要表现一种积极的作用，提出了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纲领。他要指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不仅可以用颜色，声音，思想来形成一篇不朽的作品，也可以用来作为更加脆弱的人类社会的材料。

可能在企图把西拉飞杜斯——西拉飞达的性格加以典型化之中，他更加大胆了。接着，柏拿西斯大夫便退出了这个社会。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葛隆底夫人，是摩顿（1764—1838）一出喜剧中自始至终都未露面的人物她代表传统，拥护旧礼教。
伊卡路斯，希腊神话人物，用以比喻因野心过大而自我毁灭的人们。

巴尔扎克将在一个人物中描写一个如何成功地放弃了所有人间的罗网，并完全把他的爱情升华到毫无欲情的“理性的爱情”上去。这个实践的思想家最初用广阔的思想去解决实际问题，此处却转入瑞登堡式的神秘思想。用最高标准来说，《西拉飞达》和《乡下医生》都不能说是成功的作品，但是，巴尔扎克虽感到两部书的失败和耻辱，并非没有理由。这两部书都用轻描淡写的笔调来写作的，用一个对现实世界有强烈兴趣的人去代表反宗教的思想越出了描写性格的常轨。反正，一部要最后解决永恒问题的作品，绝不可以忽断忽续地写，也不能连载在新闻报刊上。他的哲学小说只是他最高喘息的结果，并未达到艺术作品的最高水平。他只尽了一个天才所能去了解，去描写一个天才的性格，但他的成功作品只是把艺术家写成艺术家。《无名的杰作》是一篇不朽的优美的杰作，但我们不能因此急躁地构成宗教的感觉或哲学的思想。他的哲学小说只能显示他的知识难于致信的广阔，惊人的发达，他的头脑的范围和灵活，在同样的问题上，他都是同样的心灵手巧，除了最后的宗教问题之外。

在思想家和故事叙述家之间站立着生活景象的观察家。写实主义的生活描绘是他的真正事业，他在他所写的那些别人看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家的小说中找到平衡。他的第一个成功是《查伯尔上校》，第二个成功是《葛兰德·欧琴妮》。他发现了工作定律——用一种更有力的作风描写现实，因为他仅限定去铸造几个典型人物。以前，他曾试着到浪漫主义中探求小说的基本性质，一方面采取神秘玄幻的结构，一方面写作属于时代的故事。但现在他发现了如果从正当的角度去观察同时代的景象，也同样会产生丰富、新鲜的生活，重要的不是布局或题材，而是内在动力。假如作者充分紧凑地描写他的人物，使他们的适当的行为，就可以用更自然更真切的方式去获得同样效果。动力存在于人物描写本身，而非结构或文气中。因为一切东西都是材料，所以天地间并没有特殊的材料。《三十岁的女人》的贼船的舱中的空气也可以和在葡萄种植人葛兰德的陋室中的空气同样高度表现。头脑简单的平民少女葛兰德·欧琴妮在吝啬的父亲的下人眼色下给她爱的堂弟查理的咖啡中多放一块糖时的勇气并不比拿破仑奋勇渡桥时的勇气低。老吝啬鬼挣扎着去战胜他的兄弟的债权人表现了他和达利兰在维也纳会议中的活动有同样的机智，狡猾，坚毅和天才。地位和环境并非最重要的问题。《高里奥老伯》中描写的十二个年轻学生所居住的芜桂学舍也包含有和拉瓦西埃的实验室或居维埃的实验室同样多的可能的戏剧。因此，创造需要正当的观察，紧凑，集中，汲取最大的成分，暴露最强人的弱点，揭发感情，发掘潜在力量。《葛兰德·欧琴妮》是他走上这条路迈出的第一步。敬虔素朴的女人的忠诚提高到这样地步，甚至于带上了宗教性，另一方面，老葛兰德的贪婪和丑陋以及老女仆的忠实却带有魔鬼一样的狂烈的性质。爱好儿童变成了高里奥老伯的一种包袱，逼着他去行动。巴尔扎克正当地观察每一个人物，他或她的秘密作者知道得一清二楚，巴尔扎克只须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揭示出来，混杂不同的世界，任意取其恶者或善者，打聪明，懦弱，和卑鄙看作自然的力量，没有故意加重某种道德观念。

任何东西都是材料，巴尔扎克发现了这样一个大秘密。现实世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矿山。作者用恰当的角度去观察分析，每一个人就都变成了人间喜剧的一个角色，不分高低。他像作者一样选择任何东西。这是巴尔扎克胜利的原因。一个想要描写世界的作家不能忽视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必须表

现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无论律师也好，是艺术家也好，是葡萄种植人也好，是背叛丈夫的妻子也好，是士兵也好，是将军也好，是街头女郎也好，是公爵夫人也好，是银行家也好，是水手也好。所有的范围都交织着。他们肯定有相交的地方。同样地，无论一个野心家或吝啬鬼也好，是阴谋家或廉洁的人也好，是节俭的人或败家子也好——任何的一种“人”和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种典型的人物都得登上舞台。他不必继续发明新的人物，因为用一种适当的安排，可以使同一人物重复地出现，一两个医生便可代表一切医生，一个银行家即是一切银行家的标本，如此一来，就可以在小说中紧凑地装入很多材料。巴尔扎克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假如控制这种丰富的材料，他必须定下一个他下半生忙不完的工作计划。他不应把小说单独地写出，而应将它们联系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司各脱兼工程师”。只写出一些个人生活图景是不足够的，因为相互之间的衔接才是最重要的。

巴尔扎克还没有拟定他的《人间喜剧》计划，还得花费十年时间才可让他明白地制定出这个计划。不过，他总是确信一点。他的全集不能是很多单独作品的杂陈，他必须一步步地筑起他的文学大厦。一八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当他还没有知道他的工作范围十分清楚时，他就给他的希望描了一个轮廓：

“一八三八年把这巨大工作中的三个部分完成到相当的程度，至少可以使人们看到这个计划的结构，并用全面的观点去批判它……《风俗研究》要反映一切社会现实状况。我要描写每一种姿仪，每一种生活情景，每一种男性或女性的性格，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生活的方式，每一种社会地位，每一个法兰西的省分，童年，青年和老年，法律，政治和战争——没有漏掉任何一项。这部分写完之后，揭破了一点一点的心灵故事以后，展开一叶叶的社会历史后，算是奠定了我的基础。我不希望只描写幻想的插曲。我身边到处的事实便是我写作的素材。

“接着，我的第二步，《哲学研究》。写了原因之后必然得写结果了。我在《风俗研究》中指明生活，感情和生活的结果怎样互相利用。《哲学研究》中，我则要讲到生活的动机和感情的动机。我提出问题——个人或社会的生命所必要的推动力量和条件是什么东西呢？在用如此的方式谈论了社会以后，我使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他。在《风俗研究》中，我把个人写成典型；但在《哲学研究》中，我把典型写成个人。但是，我所要描写的仍然是生活……

“最终，描写了因果关系以后，进行我的《分析和研究》了，因为说明了因果，我们便得遵守原则，把《婚姻生理学》归入这一项中。风俗提供给我们戏剧，原因是化妆室和舞台。最后，戏剧的作者便是原则了。但在比例方面，因整个工程是螺旋上升的，顶上变窄了，变成集中的了。假如我用二十四册写《风俗研究》，则需用十五册写《哲学研究》，但《分析和研究仅九册就足够了。如此，我便可以描写，分析，批判人的本身，人类和社会，却不必在这种西方的《一千零一夜》中重复他讲述了。所有的工程完成之后……我写下最后一个字以后——然后，别人才可以批评我是对或是错。但写完整个系统，完成了文学的工作之后，我将转向科学的工作，写一册《人的动力》。而且在这个大厦的基础之上，我要用《笑林百篇》的巨大的花草图案来可笑地，幼稚地装饰它。”

他如此热情惊人地投入这事业并喊道：“这是我的工作，我的深渊，在我面前展开的火山口。这就是我要改造的材料。”

一个毕生的工作摆在了他的面前，这决定了他将来的行为。一八三三年九月，他十分自信地写道：“我要不受挫折地在欧罗巴的文化生活中取得统治权！再有两年的忍耐和工作——然后我将跨过那些阻止我前进，捆绑我双手的人的头顶！我的勇敢已在不义的欺压和迫害之下培养成钢一样地坚强。”

前有写作，后有读者，这种感觉令他下定决心不和任何一个人谈判。他不再去讨好新闻编辑和出版家的欲望。细琐的干扰已对他没有作用了。他当面向出版商提出条件，假如他不能完全符合他的条件，他会毫不犹豫地换别的出版商。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假如最具权威的文学杂志随便处理他的稿件的话，他一定会放弃和他们的合作。并且他盛气凌人地毫不理睬新闻记者，虽然他们能够控制舆论。随他们去严厉地批评他的任何一本小说！反正他们不能阻止他去完成他那包罗万象的大厦，这个大厦比他的构成部分更加重要。让他们拿恶意的笑话和讽刺的图画来讥笑他，让他们攻击他，让他们在谐谑的“短栏”中取笑他。他则会用小说去复仇，尽全力去揭露这群渺小之辈的罪恶。在《幻灭》中他用很难消除的线条给这个世纪的墙上画一张画，描写舆论的根本腐败，舆论怎样出卖精神和名誉的价值。虽然他的债权人可以没收他的家俱为抵押，可以要求他赎回期票和利用法律的追究去令他苦恼，但他们却拿不走他的文学大厦中的一块石头或一撮泥土。什么东西都没有力量去动摇他，因为他已定下了计划，因为他能够有足够的内在力量去完成只有他敢于计划，并只有他有能力去完成的一个工程。

第三章 写作之外的巴尔扎克

第一节 女读者们

巴尔扎克清楚地知道，假若他要在欧洲文坛上取得像拜伦，司各脱·歌德以及霍夫曼那样的领袖地位，他仍需要花费千辛万苦，并且他至少得活到六十岁以上，也就是说，他现在还剩下的三十多个春秋都得花费在他的书桌上。他不能有任何空余时间让他去享受生活，寻找快乐，即使他最后付清了他的债务，并且赚了大量的金钱，他也不能在享受快乐方面占去他大量的时间。他也深知这样没有欢乐没有享受的生活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他并不损失了什么，因为他深深地爱上了他的工作。

为了实现目的，他还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以支撑他的事业。他现在已经把他的所有力量和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他的事业上了，他对生活上的最低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不可耐。他需要娶一个妻子组成一个家庭，免除性欲上的压抑，减上债务上的烦恼，出版家的争吵，以及稿子都还没完结就去预支版税而带来的种种麻烦。他希望能够集中他的一切才能在这个宏伟的巨著里。但是，他也要找到他苦苦追寻的妻子和财富。

他这样平民的外表使他非常理智，他不可能跟沙龙里的那些漂亮的熟客们一争高下的。他已经被德·杜鲁米利小姐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跟德·葛斯特丽夫人的交往已经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女人决不会被他的痴心的攻势所俘获。他因为太自以为是，又非常羞怯，不愿花大量时间去展开全方位的求爱攻势。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德·柏尔尼夫人虽然五十四岁了，但不愿意选择她的继承人的原因，至于巴尔扎克委托卡罗·珠尔玛的事呢，因为她也不容易在外省的圈内找到符合他条件的富有的贵妇人。因而，这件事就泡汤了。他既抽不出时间，又没有必要的勇气，更没有机会去寻找他要找的女人，因而只能希望神能给带他运气，让他梦想的女人自己向他这里走过来。

这样的事按逻辑推理来说并不一定能够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不可能的事往往都会发生。女人们果然向他这边走过来。女人们并不认识他，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她们反而对她们所喜欢的作家抱有浪漫的意识。他不断地收到女读者们从各地寄来的信件，其中许多信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这些女读者对他都怀有好奇之心，有的甚至不远千里来拜访他。德·葛斯特丽夫人不是唯一通过信件勾搭到手的女人。许多钟情于他的女朋友（我们大多都只知其教名）终于随着他们书信交往频繁而来拜访巴尔扎克。我们已经提到过，其中一位拜访者并且跟他有了一个孩子。这些书信中有一封信终于有一天把他引上了爱情的道路，而不是短期的“蜜月”。这也正是巴尔扎克之所以仔细阅读女读者们书信的原因。这些书信使巴尔扎克越发感觉到女人对他的重视。如果一封信的某一句话或语调引起他的好奇心，他就会回复一封相当长的信。这类通信到来的时候，就像有一阵甜密的令人销魂的香气浸透到他那垂挂厚厚的窗帘的房间。很明显，巴尔扎克甚至发起抖来，这种情形是女人们特别容易察党的。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需要十几天才寄到的女人写的信。这是一封从俄罗斯寄来的信，上面签了“无名女郎”的字样。可是，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八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巴尔扎克第一次应德·葛斯特丽夫人之邀到

卡斯特兰宫殿去拜访她。这封信他当时没有拆开，可是这封来的不是时候的信对他的后半生却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封信涉及到一个奇特的故事，就连巴尔扎克自己也不能用一篇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楔子来概括它。这出戏的景就布置在一所看来十分庄严的贵族宫邸之中——即茈尔喜尼亚的一所别墅里。别墅附近没有城市，没有洁净的农村，只有农奴住的一排排茅草屋。眼睛所能看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有一片广阔的田野和无数乌克兰森林，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富有的俄——波男爵德·韩斯迦·温西斯拉夫所有的。

那些贵族的宫殿里充满了在欧洲所能买到的一切奢侈品。有名贵的油画，大量的藏书，东方的地毯，英吉利的银碟，以及法兰西的家具，中国的瓷器。马厩里有好几辆车和几匹马。但是大群的农奴，仆人，侍女，厨师以及女教师却不能保卫德·韩斯迦男爵和他的妻子德韩斯迦·夏娃玲娜，也不能帮助他们消除孤寂的苦闷。德·韩斯迦男爵五十开外，不是很胖。他跟他的邻居们不同，因为他不是勇敢的猎人，成性的赌徒，或粗鲁的酒鬼。他对自己的产业并不想花大量精力去管理，他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他所继承的几百万财产。即使身为几千个农奴的主人，他不能感觉到快乐。他的妻子因为得不到任何有趣的刺激或文学上的交流而比他痛苦得多。她出身于波兰一个高级贵族家庭，年青时有美人之称，大家都称她卢赤茈斯迦伯爵小姐。她能讲法语，英语和德语，并且酷爱文学。她有西欧人高雅的兴致和趣味，不幸的是，她却离那些高雅的沙龙有万里之遥。

她在维埃曹尼亚不能够找任何一个可以满足她在文学上的刺激与友情上的交流的人。邻居是一些对心灵的感发之物没有兴趣的，没有文化修养的地产业主，而德·韩斯迦夫请到家里来作伴的两个穷亲戚西维玲和维尔辛斯嘉·登尼斯也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乐趣。房子本来就够宽阔的了，而寂寞无聊却更是广漠无际的。这所房子一年中就有半年为雪所覆盖，好象穿上了一件从来都不曾脱的衣服，也没有任何一位客人来拜访他家。他们除了春天旅行到基辅去参加一次舞会。每隔三四年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去一趟之外，其余时间过的都是荒凉、无聊的日子。他们结婚十一二年了，德·韩斯迦夫人给她丈夫生了七个孩子，除了一个夭折以外。男爵比她大几乎二十五岁，并且是未老失衰，然而她只有三十岁，身体健康而特别有吸引力，只是稍微肥胖一点。可是，她不久也会衰老，她的生命也会失去光泽。

除了冬天的皑皑白雪和夏天无边无际的田野这一片单调乏味的景色之外。这所房子也被一种无穷无尽的烦闷与苦恼所包围。这所房子里的居民每周所希望的唯一事情就是邮件的到来。当时俄罗斯还没有铁路，贵重的东西都是用马车或雪车从远方送来。这是一件大事情啊！德·韩斯迦夫妇订购了许多检察机关允许的外国报刊，特别是法国巴黎保守派的《每日新闻》和法国的所有文学杂志。他们的书商还按期给他送来许多新出版的重要的书籍。距离的遥远使每天发生的平常琐事变成意义重大的事，而在巴黎漫不经心浏览的报纸在这里却被读者从头到尾一点不漏地读着。这个家庭对欧洲的文化仔细地讨论或评论，比起巴黎的报刊杂志来要仔细得多，认真得多。德·韩斯嘉夫人晚上就同她的两个外甥女及女儿的瑞士女教师埃尔·亨特小姐一起交换她们对日间阅读的意见和感受。有的时候，她的丈夫或她的兄弟也来看她们的时候，也参加谈论。他们都用争吵的语调去评论戏子、作家和政客，好象这些人是神仙似的。

一八三一年的一个漫长的冬夜，这种类似的讨论进行得特别激烈。他们正在品评一个新近成名的叫作德·巴尔扎克·奥瑙利的法国作家。他的姓名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我们所特别指的这个女人因为同情或气愤而格外激动。这个巴尔扎克先生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私人生活的场景》。没有哪一个作家像他这样深深地看到女人的内心，这样地对寂寞失望的女人深深地同情。他是多么能宽恕女人们的过错和弱点啊！不过、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又会写出像《结婚生理学》这样一部讥笑讽刺的书呢？这样一个能够洞察女人内心的作家怎么会降低身份写这样的把女人当作嘲笑和戏弄的对象呢？哦，他的一部新小说《驴皮记》也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但是，巴尔扎克怎么会让他的高贵的小姐保琳所深爱的青年主角因为福多尔伯爵夫人这么一个冷残的妖精而抛弃了保琳呢？像巴尔扎克先生这样的天才作家应当对女人有较中肯的意见。他应该只描写《私人生活场景》里的高尚的灵魂，不应当浪费笔墨去描写像福多尔伯爵夫人这样的女人，还有的是不应当提及那种奢侈的宴会。他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应该有人来指导他，使他走上正路！

一个参加讨论的女人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干呢？我们写信给巴尔扎克先生去吧。”其余的女人不是大笑就是愤怒地抗议。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德·韩斯迦夫人给巴黎的一位奇怪的绅士写信的话，德·韩斯迦先生又会怎样想呢？要做就不应当危及到自己的名誉，因为听说德·巴尔扎克先生是个年青人，他既然能写出《结婚生理学》、他的为人就有点令人怀疑。总而言之，要提防这个怪异的年青人收到信后干出不得体的事。所有这些疑虑和意见都只会增加她们冒险的念头。于是她们就商议写一封浮夸的言辞，表示钦佩的、甜密的、带有浪漫性和情感的信。假如这个崇拜女人而又用同样的笔调去讽刺挖苦女人的作家也受到别人的愚弄，那真够刺激。当然，这封信不是由德·韩斯迦夫人来签名或执笔。她的弟兄，或是女教师保埃尔小姐都可以抄写。为了使这位巴尔扎克先生更加迷惑不解、他们还在信上盖了个“无名女郎”等字样，不要让他发觉崇拜他的人是某一地方的德·韩斯迦夫人——一个已为人妻的贵妇人。

不过这封信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揣测它的内容。另外，我们还可以见到一封也是署着“无名女郎”的信件，它也是由德·韩斯迦夫人和她的同伴们联合完稿的。后来通信进入了严肃的阶段，她就禁止自己再在信中出现这一类的句子：“自从我读了您的作品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和您的天才融为一体。您的光明磊落的灵魂显露在我面前，我会一步一步地跟着您走下去的。”或：“您的天才在我看来是高出一切的、神圣的”或“您用几句话甚至几个词来描绘我的整个生活。我崇拜您的天才，我尊敬您，我喜欢当您的一个姊妹。”

不过，这封信与第一封匿名信的风格应该是一致的。因为我们能够从每一个字词里感觉到这些合伙人是怎样的热情去称赞他，也许这封信到巴尔扎克那里的时候，他的幽默性可能更加强烈。这些诚恳的崇拜、愚弄的和稚气的幽默的混合物都不能够完全地实现它的目标，因为巴尔扎克受到苦恼和诱惑。对巴尔扎克而言，收到女人的信并不奇怪，但是这些信一般都是从巴黎，最远也不过是从法国的一个外省。那时候收到一封乌克兰崇拜者的信，他是惊异极了，巴尔扎克想到他的名字飘洋过海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不禁骄傲和自豪起来。一直到为此，他都是隐约地感觉到他的作品在国外有一定的读者，但他却没有想到就是伟大的歌德也曾跟爱克尔曼谈起过他的《驴

皮记》。正像他第一次收到德·葛丝特丽夫人的信一样，他吸进了贵族的馨香的气味。能够写这样优美法文的一定是一个俄罗斯贵妇人，能够花许多钱财邮购各期最新出版的杂志，并从巴黎送到遥远的乌克兰，这一定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巴尔扎克幻想着，与他通信的无名的女人一定是一个年青貌美的贵族女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认为她至少是一个公主。他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的好朋友说他收到了一封“俄罗斯或波兰公主”写来的神圣的信，他拿着这封信给卡罗·珠尔玛或者是别的人看过。

巴尔扎克是绝不会让一位公主等候他的信，然而他的隐藏真实姓名的崇拜者并没有告诉他的姓名或地址。即使在好长时间以后，她还只是说“我是您的‘无名女郎’，我将终身保持这个身份。您永远都不要知道我是谁。……”

所以，他没有办法写信去感谢她，他也似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见到她。最后，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当时《私人生活场景》的增订本正在排印。他增加的一篇故事《赎罪》还没有献词。他就指示印刷家他在标记书名和作者姓名的一页上印上信上的印纹和“无名女郎”，并在下面标上“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等字样。如果她从她的书商那里收到这本新书，并且读了这本新书的话，她一定会觉察到他选择了一种较慎重的方式去向她表示谢意。

不幸的是，德·柏尔尼夫人还继续凭朋友的友谊替他校对稿件，她明显地不喜欢什么“无名的神女”去损害她所保护的作家的事业。在她的一时兴起之下，巴尔扎克“内心感情的无声信号”就在付印前被删掉了。而维埃曹尼亚的一群玩闹剧的女人们也是依然不知道她们的奇特书信已使巴尔扎克激动起来，并且幻想到她们的一切了。

她们并没有指望他回信。她们只是向天空随便地射出一支箭，而并不注重它是否射中了目标。她们猜想这封信对巴尔扎克先生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而消除了两三个星期的烦闷之后，她们又想出更多的计策去刺激他，去鼓励他对他自己的使命感而使他兴奋。她们又写了一封信，这也就是第二封信，可能还有第三封信，她们至少已经达到了一个目的。她们发现了一个可以代替玩恩布尔牌或魏斯特牌的新游戏——给德·巴尔扎克先生写信。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游戏，但是跟一切游戏一样总会玩得厌烦。她们想知道她们那充满技巧的、富于幽默的共同完成的信究竟达没有达到目的。她们想知道这些，但是用什么方法可以发现巴尔扎克先生是感到气愤或是受到奉承时的喜悦呢？碰巧得很，德·韩斯迦夫人跟她丈夫打算春天到西欧去旅行，也许在瑞士她可以更方便的通信，甚至有希望能够收到这位著名作家的一封回信。

好奇是取得发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哟。十一月的一天，德·韩斯迦夫人决定跟她的好朋友们再给巴尔扎克去一封匿名的合作信。在真情流露和确切的精神交叉过后，她们就更疑惑了。德·巴尔扎克先生是否希望收到更多的无名女通信人的信呢？在经过精心的修饰润色后，她就叫他一定要设法让她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到底收到了这封信没有。因为她不想让他知道她的姓名或她的住址，在这一瞬间，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一张报纸上登了则个人的启事：“您在《每日新闻》里的一句话使我确信您已经收到了这封信，并且我也可以放心再给您写信。请您在报纸上发一个启事，并签上‘致无名女郎’……德·巴·奥。”

德·韩斯迦夫人翻开一八三三年一月八日的《每日新闻》，并在广告栏

里找到了一段话，她的心里一定特别的激动；“巴尔扎克先生收到了您给他的来信。一直到今天，他才能借用这张报纸告诉您这件事，他很抱歉不知如何把他的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致‘无名女郎’……德·巴·奥。”

她的内心波涛汹涌，无疑是因为伟大的巴尔扎克表示愿意给她写信而感到很兴奋。不过，接着她就感到羞愧，因为他会过分重视维埃曹尼亚家庭的情况。事情已经由幽默可笑的阶段发展到危险的阶段了。她的丈夫是个心平气和，从不发怒的乡间绅士，他极重视名誉，他一直被他的妻子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他的妻子和她的两个外甥女以及瑞士的女教师所玩的游戏。其实，只要这游戏还是继续用“无名女郎”的假名，这游戏就会无伤大雅的。假使她现在要把这游戏变成严肃的事情，她就必须瞒过她丈夫，也不让跟她一起玩游戏的同伴知道。

德·韩斯迦夫人很苦恼。她有一个预感，她觉得自己将会干一件跟她的地位和她个人的节操都相违背的冒险事情。然而她又觉得偷尝禁果的滋味可以使她得到满足，并且她也抵抗不了一封著名作家的亲笔信的极大的诱惑力。她甚至有个快乐的愿望，她能够幻想着成为巴尔扎克生活小说中的女主角。

正如一般女人一样，她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只好延期作出这不可避免的决定。事实上，她确实马上就给巴尔扎克去了一封回信，但是这封信的口气却跟从前的不同。她不敢再坦露自己激情并告诉他，不久她将打算进行一次可以使她接近法国的旅行。虽然她愿意通信，但她只有在确信这不会有任何差错而危及到个人的安全之下才可以这样做：“我非常希望收到您的一封回信，但是我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我不得不采用许多迂回曲折的方法，以不使我这样做会冒险给我自己带来麻烦。另外，我也想知道我寄出去的书信的命运了，我希望您用最快的方法让我知道，您是怎样打算我们之间的一次严肃的、没有阻挠的通信联系。我完全相信您的话，希望您发誓不要试图去发现我的姓名和地址，因为别人要是知道我给您写信的话，我一定会带来许多麻烦。”

这次的语调完全跟上次不同。这是德·韩斯迦夫人的自白，我们可以从这推理出她的性格。她是一个在冒险活动中也会保持头脑清醒的女人。即使她走错了一着棋，她也不会气馁，而是继续昂首阔步，让理智去指挥她。

德·韩斯迦夫人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旦巴尔扎克在《每日新闻》里答复了她的话，她的虚荣心、好奇心和她的冒险本能就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去促使她跟巴尔扎克的关系更加亲密。但是在维埃曹尼亚收到一封来自巴黎的信，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这封信到她手之前，一定会有人注意到。邮差到来的时候，全家人都兴奋起来，每一个收信件的人或邮包的人都是别人猜疑的对象。因此，任何不光彩的事不可能不被她的丈夫和她的亲戚知道，她必须找一个绝对适合她的计划而又不会背叛她的，第三者来参加。

幸好她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合适人选，那就是她称她莉勒黛的保埃尔·亨利爱特的瑞士女教师。女教师已经跟随她好几年了，并且出身于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生活在远离自己家乡朋友的地方，没有机会见到有修养的男人，因此就非常忠实于他的雇主和他们的女儿。可能她们这个小团体所玩的游戏给巴尔扎克写信中的最初几封不出自她的手。德·韩斯迦夫人打算要让通信带有更多的个人私交成分而不让她的两个甥女知道的时候，只有这个瑞士女教师是最合适的中间人。没有人觉察到一封从巴黎来的寄给保埃尔·亨

利爱特信会是巴尔扎克的信，而这位忠诚的女人也不会不同意她的计划，因为她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她给女主人做的事是一个不道德的事。她因于对德·韩斯迦夫人的忠诚而导致她去实行一个至少对男爵不忠诚的计划，这种矛盾当初她并未察觉，后来德·韩斯迦夫人跟巴尔扎克的关系已经超出正常关系的时候，她的良心被震动了。她的下半生都因为曾经充当过一个不光彩的计划的中间人而感到深深地自责和内疚。感情上的矛盾大概在很早就发展了，而她从来都不能不对巴尔扎克私心的怨恨，尽管巴尔扎克在《聪明贝特》里使她流传千古。当德·韩斯迦先生去世的时候，她的难以自抑的罪恶感就像山洪般地爆发了。在葬礼完毕之后，她就宣布她坚决要离开这个家。于是她就躲在一个修道院里去为她曾经帮助别人犯了一个重大的罪过而忏悔。

亨利爱特的帮忙使通信继续下来。巴尔扎克也知道了应该把信寄到什么地方，而德·韩斯迦夫人也被这精彩的游戏刺激了，她越来越急切地等着他给她的回信。

两封信的接着到来，给德·韩斯迦夫人带来极大惊奇与喜悦。其中的一封是既尽力去刺激又设法去迷惑维埃曹尼亚别宫的主妇。巴尔扎克严肃地写出了他的一封封信，即使他说自己“常被朋友们提醒从您那里收到的书信的可疑”。他愿意自己“被自己的感觉迷惑”，并且描述了她的信所带给他的激动的心情“您是我最甜蜜的梦中情人”

在紧接着一段里，他就用了甚至超过她的夸张的口气说：“假如您可以知道您的信对我产生的效果的话，您就可以看到一个钟情的男子的感恩，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纯洁的爱恋之情。一个年青人对一个女郎的诚挚感激和尊敬以及他对于一个持久的热烈的友情的希望。”

这一类的句子是由巴尔扎克带着他年青时的浪漫气味，用最恶劣的作风表达出来的。这种句子就注定了他会被一个把命运寄托在遥远的乌克兰乡村的孤单女人所迷惑。

他真是太多情了，虽然他还不曾见过她，但他要把他的一部小说题上献词献给她。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拿同样的真诚去回报他。不过不幸的很，她的快乐又很快被厌烦的情景所笼罩。几乎在同时，她又收到了巴尔扎克的第二封信，也是给她最后的一封信，但是这两封信的笔迹却完全不同。那么，到底哪一封信是巴尔扎克写的呢？他是不是也像她们最初几个人合作给他写信似的也由第二人或第三人来给她写信、拿她开心呢？他到底是跟她一样在玩一个游戏，还是真诚的呢？她坐立不安，把这两封信反复地对比，希望能得出什么结果。最后，她还是决定写信给他，请求她解释前后两封书信不同的笔迹和自相矛盾的语气。

这一次就轮到巴尔扎克难堪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不可能给崇拜他的女人一一回信答复，于是他就想出一条妙计，既让这些女人高兴而又不至于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他就把这些信交给卡罗·珠儿玛，由她以他的名义加以答复。而巴尔扎克给德·韩斯迦夫人写回信的时候却忘了这一点。珠儿玛呢、住在外省的幽静的城市里，有很多空闲时间，她也喜欢探知这些情感的流露，于是拿巴尔扎克的特殊笔调去回复。她大概把“俄罗斯或波兰公主写来的神圣的信”和她着手处理的一般信件混淆了，就只用一般的方式，把这封信也按平常的方式处理掉了。

巴尔扎克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换了别的人，不是老实地讲出实情，就是不知所措。但是巴尔扎克从来就没有过不知所措，也从来有告

诉“无名女郎”关于自己的实情。从开始通信到最后的那一刻为止，他们都保持着不诚恳的状态。在巴尔扎克这样一个伟大的小说作家看来，跨越“不可能”绝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于是他就厚着脸皮转了一个弯、巧妙地跳过了真实的情况，请求她不要怀疑这种情况的真实性：“您对我的两种不同的笔迹感到疑惑不解并希望我能给出自己的解释。其实，一年的日子里我会有许多不同的笔迹……这种笔迹的多样性是来自我的一种幻想的能力。”

他请求她一定要相信，他绝不是在欺骗或戏弄她。那时候巴尔扎克已在写他的放纵的《笑林》，却请求她相信他是“一个成为女人优雅感觉的牺牲品的可怜的该子”为了配合他的书信解释，他开始羞答答地信任她，而说他在“全世界”只了解一个女人的心”。他在十几张信笺上作空洞无物的忏悔，谈到他的文学风格和巨大的上作压力，说是这工作逼迫着他“去放弃女人们的爱情”，虽然女人是他的一切。

他也提到了他的孤独生活，我们也不得不钦佩他的高明；“我在您身边就似乎在我幻想旁边似的犹豫不决，您是我一切梦境的希望，您不知道像您这样一个甜密的人、一切美好形状集中在您身上的人对一个孤独的作家的生活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即使是他不知道她的姓名，没有见过她的画像，他就在他的第三封信里对她说：“我爱您，我的‘无名女郎’！这怪异的事情只是因为一个荒凄的孤独生活的很自然的结果……我愿意这样就开始我的冒险生涯，恐怕世上只有我一个人愿意这样。”

这些过早的真情吐露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矫揉造作的姿态，留下很坏的气味，人家不能不怀疑巴尔扎克在细心地给自己编造一个痴情浪漫的生活，这就大大地远离了他的真情。从我们能够看到的德·韩斯迦夫人的书信风格来判断（在巴尔扎克去世后，她小心地烧毁了她给他的大部分信件），除了疯狂的哀怨和令人作呕的奉承以外，这些信就根本没有别的什么内容。我们也不能够从她写给她兄弟的信里找到足以表示她特殊性格的证据。巴尔扎克无意之中给这种无从解释的事情作了一些暗示性的标志：“我不得不自己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感情。”

他要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篇新的爱情故事。因为他的第一个爱情念头就被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拒绝所毁灭，于是他就试图一箭射中他的新的崇拜的人。他的行为本身就符合那个时代的风尚，因为在这浪漫主义的时代里，巴黎和欧洲的读者们大都希望他们的作家不仅能写出富有刺激性的小说，而且自己也得成为一篇小说的主角，这篇小说的题材也得以上流社会的言情故事为准，这样，作家才能赢得大多数读者持久的欢迎。拜伦的冒险生涯和他跟桂西奥里伯爵夫人的结合，李斯特和德·阿古伯爵夫人的私奔，德·穆塞·萧邦跟桑德·乔治的联系，阿尔飞埃里跟阿尔班尼伯爵夫人的不同寻常的联系，这些故事跟他们的作品或音乐一样、都刺激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巴尔扎克希望创作出文学名著以及取得尊敬的社会地位上，也不愿落后于他的同行们。因此，他就把他的心坦露在无名公主面前并且发出伪装的誓言去俘获他的时候，这并非是出于天生幼稚的精神所致，而是故意想建立起浪漫的关系，创造出他的感情。

我们只有把他最先写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看作是部小说的序幕，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继续写信给德·韩斯迦夫人并不是他的灵感的缘故，而是因为事情顺利发展的结果。他的无名女主角只是因为距离的遥远和地位的高贵

而使这游戏更富有魔术般的效果。男主角就是巴尔扎克自己，他只是一个青年人，一个伪装了的，一直追求在撒播了种子的小径上获得丰收而却被爱情拒绝的年青人。

如果我们继续来研究巴尔扎克给德·韩斯迦夫人的“自我肖像”的话语，就会看到另一张图画。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广阔的大都市里，在这里面，他找不到任何人去倾吐他的衷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的心向往着什么东西，他的每个梦幻都要破灭，结果都是一场空。他觉得每个人都不了解他，甚至误解他，谁也不欣赏称赞他的多情的天性：“我是流言蜚语牺牲品，您简直都想象不到别人是如何对我进行攻击和污蔑的。”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人们只斜着眼去看他：“只有我的孤独，我的愈来愈重的工作，我的悲哀始终是确定的。”他在烦恼的时候，他就投身于他的工作，埋头苦干，好似“投身到火山口去寻找安息之所的安柏多克罗斯似的。”

他是一个“可怜的作家”瞧不起金钱，鄙视名誉，只追求爱情，正如巴尔西发寻找圣杯似的：“我唯一的能给我带来悲哀的爱好就是女人。……我观察过女人，研究过她们，知道如何去结识她们并温柔地爱她们。但是我却被远方的伟大的高贵的公主误解。我不得不把我的欲望和幻想寄托于我的写作中。”

没有人希望把爱情闷在心里，也不希望总被爱情误解。他之所以被人误解，原因在于“我的爱情太强烈了。”

他还写道：“我准备好去遭受重大打击。我甚至愿意一年之中跟我所喜爱的仙女享受一天的欢乐。这就可以使我满意，我也要对女人忠诚。我已经三十五岁了，我在渐渐地衰老，这工作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它正在消磨我的精力，我已经浪费了我宝贵的年华，然而我实际上却是一无所获。”

为了使他的小说迅速发展，巴尔扎克就让他那伸缩自如的感情到适应他认为属于德·韩斯迦夫人的品德和智慧，他觉得德·韩斯迦夫人不会回报他的。他希望艺术家要有纯洁的心灵和怜悯的感觉。因此，他追求女人往往都是带有悲剧色彩。他的绝望的同时马上像拜伦一样弥补了他的过错。在布置好了后方的阵地之后，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诚恳，纯洁，孤单和天真可靠的年青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在他的第一封信里，这个女主角只是“最甜密的梦中情人”；在第二封信里，他把她当作“一张梦幻的画面”来抚摸；在第三封信里，他就说道：“我爱您，我的‘无名女郎’！”在他的第四封信里，他就“更加深情地”爱她，虽然他并未有见过她，而且他坚信，总有一天他会遇到他梦里的理想的女人：“假若您知道我是用一种久久追求的、热情的、我的忠诚去报答您。”

又有了两封信之后，她又变成了“使我第一次觉得安慰”人。这种描写其实是对德·柏尔尼夫人和卡罗·珠尔玛的可耻地忘恩负义。他称呼她“亲爱的纯洁的爱人”，“我的宝贝”，“我的天使”。她是他的命运的主人，而且是唯一的主人，虽然他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甚至连她的年纪也不知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我就把我的笔折断，其他的女人也就不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我祈求您宽恕我的爱人。她已经五十八岁了，就像我的母亲。您这么年青，您不会妨忌她的！请您接受我献给您的一份感情，请您把我的热情当做宝物一样珍惜！请您让我从梦境中走出来，使我的欲望能实现！”

只有她使他才实现了爱情的奇迹，只有她才能够填补他那颗已经对爱情绝望的心灵的空虚。等到他知道她的教名时，他就把他的身体和灵魂永远地奉献给了她：“只有您才能使我快乐。夏娃，我的生命和灵魂都属于您，我愿作您的仆人。请把我杀死，不要让我再痛苦地活在世上。我用我的整个生命和灵魂来爱您，请求您别拒绝我。”

为什么巴尔扎克会在纸上写出这样疯狂的、使我们觉得他太不诚恳的话语，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正在创造一篇爱情故事，这也像他每次试图装做多情的年青人似的陷入了感觉错误的、心灵失衡的状态。他使自己的女主角达到理想化的境地之后，为了使图像色泽和谐，他也给他自己画出了一个同样完美的理想化的肖像。仔细的研究他的书信之后，我们惊异地发现当他期待的个人接触渐渐来临的时候，他对温存的爱情欲望出现了一种越来越重的带有强烈色彩的情调。他的精确的计划，使德·韩斯迦夫人的欲望被他那表面上的坦白和热情的明证给点燃起来。德·韩斯迦正式决定她要继续保持无名女郎的身份和捉摸不清情况的状态之中、她那匿名的旗子就在好奇的微风中飘荡。德·韩斯迦夫人突然地督促她的丈夫带她到西欧去旅行，而巴尔扎克也激动地给他妹妹写了一封带戏谑语调的信：“你不相信一个女人把她丈夫大拉出乌克兰，叫他带着她进行一千五百里的旅行来私会她的情人吗？这件事不是很有趣的吗？”

一八三三年初，一群旅客离开了维埃曹尼亚。德·韩斯迦夫妇带了自己的许多随行人员，还有不少仆人，一大堆行李。莉勒黛也陪着他们来，表面上说是照顾他们的女儿安娜，其实是要继续充当秘密联络人。

他们第一个长期的歇脚点就是维也纳。这显然是德·韩斯迦先生的主意，因为他是在奥地利首都度过他的少年时代，并且他这里也有不少朋友。但是他们选择住在新沙特尔无疑是德·韩斯迦夫人的意思，因为这里离法国相当近，假若巴尔扎克先生要来拜访她的话，他也很方便。大概是德·韩斯迦夫人使她的丈夫同意夏季住在新沙特尔，是因为这样能让莉勒黛有机会在久别父母之后能够陪他们住上一段时间。于是在七月到来时，他们就到达新沙特尔，在那里租用安得利别墅几个月。

巴尔扎克接到秘密的命令，要他居住靠近安得利别墅的郊外旅舍，在那里等候召见。他非常的高兴，计算着每一分钟，期望时间快点到来，这两个灵魂第一次躯体就要相见了。他正好寄出了一封紧迫的信：“我亲爱的无名女郎，不要怀疑我、不要不相信我有什么不良的企图。我是比您想象还要荒唐的一个孩子，但是我也会像用孩子一样纯洁的心灵、用孩子所能有的爱情方式来爱您。”

他已宣布他要去准备一次旅行，以此来消除人们的一切怀疑。他已经安排好第一站只停留在新沙特尔几天，在一个月之后再回来。在动身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安排妥当。他应当设法瞒住卡罗·珠儿玛和有妒忌心的德·柏尔尼夫人他突然去瑞士的真正原因。他能够让她们不起疑心，因为巴尔扎克从来不缺少一个问题的解释。他告诉她们他要去柏桑逊去弄一种特别的纸去印刷他的下一部小说，然后他就大摇大摆地登了车。经过四天四夜的紧张的旅行之后，他于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了新沙特尔。他如此的疲乏无力，以致于他没有按照德·韩斯迦夫人的安排而错误地租了福刚旋店的一间房子。接着他就接到另一个指示，要他九月二十六日的一到四点之间到散步场地去。他的精力刚刚够让他写一封信宣布他的到来，同时又祈求他“看在上天的份上，

让我知道您的真实姓名。”他发誓永远爱她，为她而死，但是他不知道她长的什么样子，只知道她的教名是夏娃。

巴尔扎克的恋爱经历中的一幕最激烈的景象就要出现了，他们两只纯洁精神就开始接触了。他梦中的公主马上就要揭掉面上的纱巾，露出她人间的身份。他们终于在闻名世界的新沙特尔散步场上相逢了。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他的梦中的贵妇人实际上只是一个外表平凡的女人，那他的希望不就是破灭了么？如果她想象中的作家不是一个双眼哀怨无情脸色苍白而变成一个更像杜尔兰的酒商，不像被世上的女人误解的榜上有名的文学作家的双颊红肿的胖绅士时，那她又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是要彼此躲避对方的眼光呢，还是彼此同情呢？他们第一次互相认识的情景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遗憾得很！后人并没有关于这一主要场景的记载。民间倒有几个传说，其中的一个传说是他早已在安得利别墅的窗口瞧见过她，并且她的容貌跟他早先预想的一样为她倾倒。另一个传说就认为她从他的肖像里立刻认出了他，并且毫不犹豫地迎上前去。第三个传说就是，她失望地看到他外表的平庸，都禁受不了她所遭受的唯一打击。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编造，不足为信。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事实就是，他们第一次秘密的约会就商定好一个可以让他们正常会晤的机会，让她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上的朋友介绍给毫不怀疑的丈夫。不管怎样，巴尔扎克当天晚上就被正式介绍给德·韩斯迦一家人，而他则跟德·韩斯迦先生和他的外甥女相互周旋，决不是毫不犹豫地开展他的行动来表示他对“美丽女使”的热烈之爱情。

德·韩斯迦先生是个沉默寡言、有点执拗的人，当然他也十分有教养，并且对文学上和社会上取得成就的人极为钦佩。他十分荣幸能够得到机会见到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并且被他那种幽默高雅的谈吐所吸引。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的妻子卢赤芜斯迦伯爵小姐会接受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肥胖的中产阶级的狂热爱情，因而他也没有理由妒忌他。他非常客气地邀请巴尔扎克再来他家，并且他们一起出去散步。不过，一个急躁的情人已经被这种热情的招待弄得有一种十分地不方便的感觉。他已经忍受不了四天四夜都坐在叮当作响的车子里，给德·韩斯迦一家人讲谈文学趣事而让他们感到高兴。他一直是坐卧不安，直到他能够把他那“美丽的天使”抱在怀里，他才会放松一些。

德·韩斯迦夫人只有两三次避开家里人，单独陪了巴尔扎克一些时间。以致巴尔扎克在后来给他妹妹写信时勃然大怒道：“她可恨的丈夫这五天来就没有让我们单独呆过一秒钟。他老是在妻子的裙裤和我的肩膀之间摇摆着。”

当然，那个女教师保埃尔·亨利特也参与进来隔离他们。他们只能在某个湖畔的幽静地方，在散步场肩并肩地进行暂时的倾谈。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后来坦白地告诉他的妹妹说：“我怕你觉得我没有吸引力！”——他居然在第一步计划中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她在遥远的乌克兰城堡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感情炽热的人，她终于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认为这样一个敏感的灵魂不会残酷地拿她的表示来危害她。于是，她就让他与她一起谈论爱情，甚至让他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偷偷地吻她一次。这刚开始的爱情可以使一个比巴尔扎克更悲观的求爱者得到鼓励去希望得到即将到来的更大的胜利。

他喜不自胜地回到了巴黎。坐在极不舒适的车上，身边是一群跟他同样肥胖的旅客。这四天四夜都不能入睡的状况都没能使他的锐气受挫。这种不舒适之感比起他在瑞士旅行所取得的胜利来，简直算不了什么。他的一切期望都已经成功了。他不知名的通信人再也不能完地配合他的行动了，假如他要把她当作自己长篇小说中的女主角的话。她跟他从前的情人不同，因为她还没有到达中年。为了报复他对自己的欺骗，她就想方设法叫他相信她只有二十七岁，虽然这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三十二岁，更何况她是一个可以试试的美丽女人，一个意大利人称之的“美丽的肉”，一块开胃的肉。假使巴尔扎克用他艺术家夸张的手法把她描写成一个“美的杰作”的话，这也不会让我们惊奇的。维也纳讽刺画家达芬格尔的一张肖像也证实了巴尔扎克所看到的优美的体态：“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头黑发，洁净的皮肤并稍微有些棕褐的色泽，一双迷人的小手，双眼睁圆的时候，就像射出一道温柔的火焰。

相反，达芬格尔的另一幅巴尔扎克的略带奉承的肖像却十分地吓人：过度的丰满，厚厚的下巴，粗大的手臂，短而胖的身材。一双眼睛又小又黑，就像近视眼一样蒙着一层幕布。脸部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性格，尽管那里显然是存在一个秘密的心灵的标记。当然，吸引巴尔扎克的并不仅仅是她身体上的美妙因素。他找到的是一个学识丰富的、十分聪明的、能讲好几种语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贵妇人，并且给巴尔扎克这个平民一个多礼的仪表的强烈印象。她是波兰最有名的贵族家庭的后裔，她的一个曾姨母勒辛迪加·玛利曾经是法兰西的王后，因此他享有一个特权可以称呼法兰西国王为“我的表哥”。

可是这也不是最后的奇特之处，他要用来戴在头上的是一顶用纯金制成的并且镶嵌宝石的王冠。我们都很清楚，德·韩斯迦夫人的丈夫并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甚至连一个伯爵，然而，他有另外一笔重要的、也是巴尔扎克所最向往的资本——他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有的巨额财产是巴尔扎克只能够在小说里吹嘘的、虚构的。他的财产包括俄罗斯公债，田地和森林，地产和农奴，而他的妻子——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他的寡妇——他可以通过正当的手续来承继这笔财富。因此，巴尔扎克认为德·韩斯迦先生也有不少值得尊敬和赞许的地方。首先，他比他的妻几乎大二十五岁。其次，他的妻子并不十分钟情于他；第三，他的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巴尔扎克自从在莱斯底居耶尔街过着他的贫困生活以来，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梦想有一天他能够因某种幸运而给他带来希望，他梦想这幸运能够消除他那疲劳、忧愁和卑下的生活，而带给他富裕的、奢华的并且有空去写作的生活。现在他的希望已经是可能的事了，这应当感谢那个奇特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的肉体也是挺有吸引力的，同时她对自己也是很有意思的。从现在起，他就凭着他的一切忍耐、坚定和毅力来争取她。他曾经的“永远的选择”的德·柏尔尼夫人是退休的时候了。他的“北极星”将要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这位可爱的，这个世界给我的唯一的女人。”

第二节 阿尔克旅店房子

新沙特尔之行实际上只起到了策略上的探测作用。他已经观察了形势，他坚信形势的发展对发动最后的攻击极为有利，但是为了削弱对方的防卫和强制德·韩斯迦夫人自动缴械投降，他就非得回到巴黎筹备更多的军火。假如他要以情人的姿态，一个放纵的女人的求爱人的资格，她的富有的丈夫的贵重的朋友的身份发动进攻的话，他的生活就必须够上档次，有一所装饰华丽的优雅的房子。他知道他的赌注是什么。一开始就这样冒险，有着潜在的物质上的利益和社会上的地位。他正加倍努力去实现他的目标。他写道：“这里的朋友对我正在展开的猛烈的攻势是非常了解的。”这决不是夸张。

他虽然还是无法摆脱债务的缠身，但是他又一次地发现了一个出版家柏赤的寡妇，他又可以缓一口气了。她打算付给他两万七千法郎来印刷他的十二册关于十九世纪风俗的研究，这其中包括《私人生活之场景》、《外省生活之场景》以及《巴黎生活之场景》的新版。在这些日子里，他又预支了还没有脱稿的版税，因此，这些合同总算是有利的，于是他就高兴得喊道：“这些总会在我们这尔虞我诈的蠢笨的世界里得到反应。这些总会激起那些自以为能在我的身影里行走的人的发怒。”

虽然他还欠他的母亲和德·柏尔尼夫人的不少债，但他现在的地位已经足以让他去满足最能缠的债权人了。尽管他的欢呼总是太早——两星期后，他又抱怨：“星期四我不得不偿付五千法郎，然而现在我是身无分文——但是这并不使他发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他知道自己只要两三个月的勤苦工作就可赚到一大笔钱。他将要进行的日内瓦之行可能决定他的未来的命运，甚至他的下半生的生活：“现在我应该坐下来安心工作。我必须争取在日内瓦的两个星期过得快乐——这几句话不断地出现在我的头脑里，好象就刻在我的大脑中，这鼓足了我的勇气，是我一生都没有认识的。”

这次巴尔扎克的确讲的是实话。他这时候在可以想象得到的欢乐的迷人的情景之工作，其勤奋和效率都是以前所未曾有过的。他在一个不断在他大脑回响的思想的鞭策之下工作，他觉得他的工作不仅可以使他得到报酬而能暂时性休息，而且他的工作也是为了能摆脱使他苦恼的经济上的困难。而这几个月他写的书便充分地证明了他对自己的最大的最大能力的信任：“我一想到这个念头，血液就流进我的心脏，思想就侵入我的头脑。我觉得自我的存在意义变大了。在这希望的勉励之下，我一定能够创作出我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优美的作品。”

巴尔扎克不仅使他的宝贵的作品在数量上领先于人，他还尽力使这些作品在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上不同凡响。从他和德·韩斯迦的谈话中以及从她写给他的书信里，他已经感觉到她特别厌恶像《结婚生理学》这一类“轻浮”的作品。他害怕他假装成一个纯洁浪漫的情郎形象要被最近出版的《笑林》所破坏。他要让别人相信他有更伟大更高尚的感情，他的心也是人道的，甚至是热爱宗教的教义。他的《乡下医生》在平常读者看来是严肃得过分了一点，但却可以证明他的那些轻浮小说都是在他不大负责的情绪之下草率而成的，然而他的最高原则是献身于一种纯正的创作生涯之中。他同时完成了一部传世之作《欧也妮·葛朗台》。这样看来，他又多了两个根据去证明他作

为艺术家的天才和男人的道德责任。

正当他这样勤奋地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投下重重的一笔又一笔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趁热打铁，以不使他们的关系冷却下来。他每星期都给他的“美丽的天使”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并且早就在信里用更亲热的称呼“你”取代更礼貌更生疏的“您”。他对她说他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快乐的生活”，而她是这个世界上所唯一爱恋的女人。他崇拜她的任何东西“你的语调，你动听的话语，以及你赐给我的热吻”。他一想到他的整个生命都完整地属于她时，就禁不住发起抖来，“在整个世界里除了你一个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女人了。”他把自己当作她的一个“可怜的奴隶”，一个敢偷看高贵主妇的农奴。他自愿捆手绑脚地投降在她的脚下，让她任意处置。如果他的宣言是可信的话，自从他开始写小说以来，没有谁像他这样无穷无尽的爱一个女人。他每星期都朝着远处的堡垒发射他的燃烧弹：“每天我都觉得你越来越迷人了。每天你都在我的心里多占一份地位。你一定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伟大的爱情。”

他很恐慌的知道她已经买了一本《笑林》，为了消除她对他的不道德的怀疑，他就向她保证；“你不知道我的爱情是何等的纯洁。”他又忏悔：“三年以来，我的生活的都跟一个年轻女子一样的贞洁。”

很明显，巴尔扎克并没有自豪地告诉他的妹妹，他正当了一个私生子的父亲。

正当他大踏步地突破他的爱人的外线防御线时，他同时也机智地用穿行阴沟的方式去获取她丈大的友情。他除了用更亲密的口气写给德·韩斯迦夫的信外，还用较疏远的口气去写了称呼“您”和“夫人”的其他信，显然这样的信是为了要取悦德·韩斯迦先生。这些书信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认为德·巴尔扎克先生对这整个家庭都有特殊的感情，包括他们的女儿，外甥女，女教师和德·韩斯迦先生在内，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让他相信著名的作家巴尔扎克先生到日内瓦来的唯一目的是要跟这样一个高贵美好的家庭一起度过几个星期的快乐生活。为了表明他们之间的特殊友情，他给喜欢搜集稿本的德·韩斯迦先生送去了一本《罗西尼》手稿，并谦虚主动地请求德·韩斯迦先生允许他送给他的妻子《欧也妮·葛朗台》的手稿。他没有告诉德·韩斯迦先生他企图在标明作者姓名的书页背后用铅笔写下到达日内瓦的日期。可怜的丈夫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和瑞士女教师正在背后合作凑成巴尔扎克忙于完成的自传体小说。

他已经完成了一切他的准备。《欧也妮·葛朗台》正在刊行，这部书是成功的标志，它使巴尔扎克的仇人批评家惊惶失措，它大大地补充了巴尔扎克的路费，并且还剩余不少。他怀着愉快的心情于一八三三年的圣诞节的日内瓦的阿尔克旅店登记。在这里人家用他所喜欢的黑头发给包裹的一个昂贵的戒的方式来欢迎他的到来。这保证了允许更多的爱情，他一辈子都把这个戒指看成护身符一样地戴在手上。

巴尔扎克在日内瓦呆了四十四天，他每天都花费十二个小时去工作。他用充满激情的、近乎狂热的词语告诉他们他已经匆匆地赶来，并且答应他要在“可爱的天使”身旁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刻，同时他也告诉她，他认每天午夜十二点起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都留在书桌旁。就是在天国里，他也绝不让自己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很显然，他只能够在下午和晚上来表示他对德·韩斯迦夫人的以及她全家的感情，剩下的时间必须留给另外一种不同寻常的感

情——报复的欲望。他带了描写他跟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没有结果的冒险生活的《兰齐公爵夫人》的原稿，打算在他受到最后一次挫折的城市里来完成这一部书。他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这个工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疑地，他要以此来加重德·韩斯迦夫人的心理上的压力。假若他每天晚上都给她念一篇这本书中的情节，她就可以感觉到一个作家是如何去报复一个玩弄他的感情而拒绝给他最后的爱情保证的女人。她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要是这样的话，也会受到同样残酷的舆论批评，并且显得惊恐不已。我们研究巴尔扎克的书信越深入，就越了解巴尔扎克是如何高明地打牌。他一方面让她知道他是如何用狡猾的方式去指责、谩骂德·葛丝特丽夫人，让她知道他是怎样地不肯和解而去拼命对付一个女人。另一方面，他满怀热情地谈论德·柏尔尼夫人，告诉她，他是多么地感激一个把身心献给他的女人。狡猾和热情都是为着提醒德·韩斯迦夫人而提及的，然而她却并没有注意到。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相逢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猜想到巴尔扎克决心说服他的天使“从天上下凡到人间”，来献给他德·葛斯特丽夫人的日内瓦顽固地拒绝给他的东西。

德·韩斯迦夫人决心防卫显然是由于巴尔扎克的情书和他恳求的缘故。另外，她还没有最后消除对他的自由行动的怀疑。传记作家和心理学家大多愚蠢地争论她到底是不是真正地爱恋上了巴尔扎克，好像恋爱这东西是个可以明确定义的东西，不会受什么波折或制约因素影响似的。正如她的后来的生活向我们表明，虽然她是一个天生纵欲的女人，然而好的感情也不是没受到她的理性控制。她总是拿她的名誉和社会地位来约束限制她的感情。她那双近视的黑眼睛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她所走的道路。巴尔扎克热烈的赞颂就危石高悬一样能够使她保持冷静的头脑，而她从开始就注意去避免自己深陷其中的冒险活动给她带来危害。从这方面讲，她是在巴尔扎克进行斗争，但巴尔扎克不耐烦地敦促她下定最后的决心。她从来没有克服过她对他的二元性感觉，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她对他的感情和判断是不同的。在没有忘记他的众多缺点时，她崇拜他只因为他是一个作家，而当巴黎的批评家拿他跟促马·阿历山大和其他同时代的小说家相提并论时，她却能发现他的无比卓越的天才。但是运用这样同样清晰的眼光，她又从他的荒唐夸张的方式中看出了他的心神颠倒的求爱法术。她越来越警觉地听着他的虚伪的谈吐和投机主义的诡辩。虽然她是一个女人，她抵挡不住她的情爱冲动，然而她贵族的身份忍受不了他那丑陋的举止，枯燥无味的、他平民的自吹自擂。他的一切用谄媚的糖浆浸渍了的书信都不能够完全使她昏迷。她高兴地喝下了他的阿谀奉承的奇特威力的香酒，让这酒精刺激她的虚荣心和好奇心，然而她却不能容许他侵犯她的头脑。她在新沙特儿时给她的兄弟寄去了一封信，便指出了她是如何能够清楚地观察她和巴尔扎克的关系“我终于见识了巴尔扎克，你一定要问我对他的盲目的偏爱是不是在我们两人相遇的时候依然存在，或我是否已经没有了这种偏爱。你不是预言他要拿刀子吃东西和用桌布去擦鼻涕。我现在告诉你，第二个错误他倒没有犯，但是他的确犯了第一个错误。他干事情是很别扭的。每次他的一举一动（在我们看来是“粗俗教育”的结果）的错处时，我都尽量帮他纠正，正如我在同样情况下教育安娜正确的东西一样。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表现现象。这个人拥有一些比好坏礼仪更重要的东西。他的天才可以折服你，并把你带到最高的精神境界里去。他让你懂得你的生活里所缺乏的东西。我想你一定又以为我发疯了，但是我可以确定无

疑地告诉你这并不是事实。当然，我崇拜他并不能使我盲目无主而看不到他的过错。他的确有不少过错。他非常爱我，而我也觉得这种爱情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假如我们今天就不得不离别的话，它在我一生中所产生的影响就好像一束火焰在我眩晕的眼前停止照耀似的。我这一双可怜的眼睛，当我想到这世界上一切卑微和渺小的围在我身边的人时，它们就会变得这样的厌倦。”

这几行家信有诚挚的感情，这正是巴尔扎克的情书所缺乏的。她并不因为被这样一位天才作家所爱恋就能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她也富有野心地认识到，他跟他的交往可以使她变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从而给她这位乌克兰地主的妻子赋上一层历史性的外衣。从本质上说，她的精神和对感情的态度跟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因为德·葛丝特丽夫人也觉得被一位著名作家追逐崇拜是一种幸福和骄傲，同时，她又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让她去避免感情被迷惑。她也一样地等到他恳切地说：“让我们彼此热烈地爱恋吧！不要拒绝给我一切有意义的东西！”的时候，就退缩回去了。

她一定认为她偷偷地到旅馆去拜访巴尔扎克是不得体的行为。而他的自吹自擂和到处传言大概也加保了她对他行为的怀疑，因为巴尔扎克向她发誓她的屈服只会增加他的感恩和他对爱情的重视；“你会看到你的顺从只会让我的爱情更加强烈和深刻……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使我陶醉，假如我能够一千次地占有你，你就能看出我只会变得更加陶醉于爱情之中。”

好几个星期就这样地过去了。从午夜到第二天中午，他就伏案描绘拒绝给她情人施加最后恩惠的兰齐公爵夫人的肖像，以此来解心头之恨。然后，他就放下笔继续企图打败另外一个不肯向他屈服投降的女人的顽抗。

终于，幸运到来了。经过四个星期的顽强抵抗之后，他的天使就从天上降凡人间了。阿尔克旅舍的房子就是他们淫乱的爱情的见证人口“昨天整个晚上我对自己说：‘她是我的了！’天堂上的天使们也没有我昨天快乐。”

巴尔扎克计划在现实生活中去品尝一下浪漫小说的滋味，他已经成功了。由于他熟练的技巧，去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实际上可能的事情，把幻想变成事实。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事实上已经变成他梦幻里的年青貌美的贵妇了。没有见面就自荐为她的情人，他已经实现了他最后的欲望。他的生活之中充满着他的《人间喜剧》里的所有故事的意外的刺激和奇异的景象。

这只是第一个高潮。两个情人已经被拥过了，已经发过了永远忠诚对方的盟誓，然后该如何收场呢？德·韩斯迦夫人现在是不是抛弃她不喜欢的年老丈夫，跟着巴尔扎克到巴黎去呢？她是不是要求请求离婚，因而拿她在乌克兰的地产和还没有计算过的财富来作为改姓巴尔扎克的姓的条件，于是她就能够体体面面地在德·巴尔扎克·奥瑙利身旁度过她的余生呢？巴尔扎克是否准备发明什么奇妙的方法去继续进行他一开头就开始的冒险生涯呢？

正如在一切其他的事情上一样，巴尔扎克也在这件事情上把他的幻想和实际联系起来。他一开始就是受了“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的格言的影响，而他刺激他热情的主要是德·韩斯迦夫人既有一张贵族的证书，又有一笔财产。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巴黎建立一个平庸的家庭，而让她自己在那里给巴尔扎克的债权人开开门，作为她主要的任务。他们的结合并不是想通过私奔，离婚和决斗收场，而是一个冷静计算，这几乎可以说是带有商业性的盟约。两个情人答应彼此告知每天的感觉和生活上的故事，他们又彼此交换了

小箱子，去收藏他们将要书写的信件，直到德·韩斯迦先生变成这样的可爱，甚至于不再妨碍他们的结合时为止。他们同时又考虑到不会用引起可疑的偶然见面的方式，以免引起诽谤的流言而伤害德·韩斯迦夫人的名誉。他们的爱情可以等到她的丈夫去世使她成为维埃曹尼亚的无可争辩的主人和他的几百万家财的继承人的时候再由结婚的永远的联合来加以圣化。

在痴情的人看来，这些誓约发生在他们所展开的夸张的感情之后未免有点冷血的性质。但是巴尔扎克并没有看出其中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他想这位乖戾的老头最多只能够再活一年或两年，他的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告诉了他有了一个奇迹。他跟他的情人的丈夫热烈地握手，感谢他盛情的款待和赠送的许多值钱的礼物。德·韩斯迦一家人带了他们的随从和行李动身前往意大利去旅行，巴尔扎克则回到巴黎继续他的工作。

第三节 一个不幸的事故

由于巴尔扎克天才的策略，他在天真地谈论自己的外表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保守他自己的秘密。如果他夸口他的版税是何等的巨大，这极有可能是使人不怀疑他已债台高筑了。如果他用金扣子来装饰衣服并保留自己的马车，这实际上是帮助他遮掩他已不能付清面包帐的事实。如果他试图说服高提埃和桑德·乔治作为一个作家应当如何过一种贞洁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他的意图就是在于堵住那些想窥探他“私会他的情妇”的好奇心。正当其它的文人公开自己的私事，尽量让读者了解到他们在情场上追逐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巴尔扎克却对此保持极大的秘密。自从会见德·韩斯迦夫人以来，他甚至在他最亲密的朋友面前都矢口不提，这些朋友整整十年中都不知道有关她存在的任何迹象。除了在新沙特尔访问而得到疯狂的快乐时给她妹妹写了一封信之外，他就从此没有给任何人提过她的姓名。他把她的所有情书都收藏在她给他的那个小箱子里，并且随身带着这个箱子的钥匙。而《西拉飞达》时献词也是用平常抒情的词藻表达的，这种词句可以呈献给在他的小说上所题署的任何一个公爵，伯爵或外国的贵族，不论他们是男还是女。

巴尔扎克觉得，特别不能让德·伯尔尼夫人知道从今往后这一个女人要成为他表白的对象、手稿的看守人以及最后的救星。从日内瓦回来后不久，他就去拜访他从前的那位爱人。他要尽量瞒住她，他已经选择了一个优秀的爱人。他想要让她一直到最后时刻为止都认为自己是知道他的秘密和唯一女人，因为她的隧康迅速地恶化，医生们也没有让巴尔扎克怀疑她不能够再活多少时间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这个憔悴的老妇人曾经是他的情妇：“即使她能够恢复健康——我也希望这样——我也觉得看着她悲哀地变老是一种痛苦，这好象是大自然为报复自己而特地延长这个女人的生命去抵抗时间的规律。”

这个因为太阳东升而月亮失去光泽，的确象征了这一切。巴尔扎克决定要使另外一个女人成为他的一切的时候，曾经给过他一切的女人的生命就开始衰退。

也许从日内瓦归来之后，在看望德·伯尔尼夫人当中，他内心里倒隐隐地感觉到一种负罪感。他就要永远地离开她了，但是他却不想让她知道他在心里是这样打算的。几个星期的紧张生活之后，接下来的就是一个短期的催眠。他坐在她的身边，又一次想到他的过去，想到她曾经引导他走过满是荆棘的崎岖道路。但是他已经踏上了另一条新的道路，并且巴尔扎克也恢复了他的坚毅，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着实现他的两个目标：财富和名誉。

也许由于他最近在日内瓦的胜利，或许是因为他要让德·韩斯迦夫相信他是一个值得她献身的男人，还是因为他需要在近几个月里赚到足够多的钱，以便让他有足够的花销在德·韩斯迦夫人回到乌克兰之前陪同她在欧洲旅行，巴尔扎克自从回到巴黎以后，他在文学的创作方面差不多比以前更努力了。他的几部第一流的作品就是在这时期问世的，然而医生们却都警告他不要如此地努力用功。他自己也常常担心总有一天健康状况会恶化：“我开始担忧了。我害怕我会在我的长篇巨著完成之前筋疲力竭而倒下去。”

然而他的书是一部接着一部出来，而且都是他的想象走遍的“如此广阔

的领域”。他完成了《兰齐公爵夫人》，在六月到九月之间的“一百夜”工夫写出了他的《绝对的追求》，十月又开始《西拉飞达》，十月开始《高里奥老伯》，并且在四十天之内结束了它，又十二月后的几个月里完成了《海滨的悲剧》、《金眼女》、《和解了的梅尔摩特》以及《三十岁的女人》的后面几部分，而且大脑里又有了《毕路都·恺撒》与《幽谷百合花》的计划。这已经够让人吃惊了，然而这还不是这几个月里出产作品的总数。他同时还修改了几部以前的小说，也桑都·儒尔合作写了一本戏剧，完成了他的《给十九世纪法兰西著作家的几封信》，与出版家争吵，以及定期地给他的情人寄去五百页左右的情书和日记。

正当这个法兰西文坛的西西夫斯 搬运石头到山顶的时候，德·韩斯迦夫人却在意大利享受着其所“追求的甜蜜东西”。她和她的随行人员从这所旅馆转移到那所旅馆，进行日常的散步，请人给她画肖像，搜遍各种各样的商店，陶醉在威尼斯、福罗兰斯和拿波里所有艺术品里。她大量地占有巴尔扎克所缺乏的一切——金钱、空闲，以及这两者给她带来的娱乐——而他们的通信。也发现不了任何的迹象，足以说明她曾有任何的打算去中断她的休假，而急切地奔回情人的怀抱。我们猜想德·韩斯迦夫人主要的是对巴尔扎克这个人感兴趣，而不是他的情书。这些情书是她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命令巴尔扎克定期进贡的，然而她自己的回信却并不多、而且相当的疏远，虽然德·韩斯迦夫人并不是没有时间去复信，因而巴尔扎克常常抱怨她不多给他写信。在一年多的旅行中，她都希望每一个歇却的地方收到他的一封信，而她的“农奴”也没有忘记服从威严的主妇的命令，忠实地给她写信。

不过，他的情书的形式和语气都随着环境而改变。他已经不能像当时在埃维曹尼亚、新沙特尔和日内瓦那样秘密地通信。意大利检查机关非常严格地按“信箱”较交邮件，而瑞士女教师太频繁地收到巴黎的来信也会引起最不善于怀疑的丈夫的注意。所以，巴尔扎克就不得不用德·韩斯迦先生可能允许接受的风格来公开给她写信。亲密的称呼“你”于是也就由客气的称呼“您”代替了，“爱情的情侣”也就变成了“夫人”，而且还常常彬彬有礼地请求“夫人”代他问候“乌克兰的大元帅，您的女儿安娜，保埃尔小姐以及家里的其他人“这里已经没有爱情的誓言和她忠实的“奴才”。他只是假装成他在日内瓦时发现他是一个喜欢文学的贵妇人和一个有着敏锐眼光的批评家而受到他的尊敬，因而觉得不能不写信向她报告他的生活琐事。在与他们一家一块儿生活的几个星期里，他已经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一员了，他不能够抵制给他们写信闲聊的诱惑了。

然而，他的书信都包含有一条只有德·韩斯迦夫人才懂得的内涵。只要他表明自己是如何地热爱瑞士的风景，她就明白他向往瑞士的真正动机。这种富有诱惑性而也带有风险的游戏就这样的继续地进行着。巴尔扎克不但促使德·韩斯迦先生相信他跟德·韩斯迦夫人的友谊纯粹是出于文学上的共同爱好，他也期望向德·韩斯迦夫人保证她仍然是他的唯一爱人，即使她这样地远离他，他也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她。似乎她们之间约定好了在她的丈夫尚在人世的时候两人应保持平常的关系，也许是她的要求，他答应了她要在日内瓦事情之后恢复他所强力辩解的从前的贞洁。不管怎样，每一封接着一封

系哥林多国王之子，无恶不作，死后被罚在地狱里把巨石搬至山顶，石头又不断地滚落下来，他也就不断地搬运。

来的信都表明了他不但在白天而且夜里是多么的孤寂和忧愁。他常常提到他所过的是“修道院式的生活”并且声言“没有谁像我一样地孤单”或“我就像耸立在茫茫大海中的孤石”这一次他写道：“我坐在这里，我的孤单超过了任何一个渴求爱情的女人。”

不过，德·韩斯迦夫人好像并不怎么相信他的保证。她在日内瓦已经觉察到他多么地不像他当初的通信里所描述的浪漫的气质，而且也十几次发现他的矫揉造作。他们在阿尔克旅舍房间里的幽会大概向她证明了，他在爱情的技巧主面并非他自吹的那样害臊，那样的没有经验，那样的陌生。无论如何，她似乎已经在他背后组织了一个相当出色的侦察队。

他离开日内瓦的时候，她曾经给他介绍了许多居住在巴黎的波兰贵族，这种举动也许并非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波多基夫妇或基塞尼夫妇也一定向她报告过，使她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日夜坚持工作而哀痛他的朋友德·柏尼夫人的病。巴尔扎克是巴黎的名人，他每两星期两次固定地培养某个交际花到戏剧去没有人不会知道的。

他不能够继续骗她，他除了在卡西尼街的房子之外又在战争间租了一间房子。她一定曾经暗示过他，她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他欺骗的。他对她保证说轻浮和不忠都是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的。等到她已经知道他的罪过的证据时，他就巧妙地先发制人，写了一封简短的话语：“有些女人夸耀说能够影响我的生活，吹牛说经常来看我。”

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谤诋和夸张其词。他确实曾经躲避在音乐里，但这也因为是他的极度的孤单：“听音乐，这意思就是说更加深地爱恋一个人，痴心地想念一个人。偷看一个人喜欢的双眼，听见一个人愿意听的声音。”

可是她依旧不相信他，即使他有无穷的办法把它作出动听的合理的解释。她能对他深信不疑这一点很重要，这会决定他俩的关系。她什么也不怕，只怕他的疏忽。她已经开始保持审慎的态度，这使他非常不安。夏天又来了，德·韩斯迦夫妇结束了意大利之行，回到维也纳来度过冬天。明年的春天，德·韩斯迦夫人就要跟随她的丈夫回到遥远的乌克兰。巴尔扎克的北极星也就要永远地离开他，并且终生都难相见。

因此，若要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想办法再去看她。她是在没有防御的时候献身于他的，除非通过再次的个人接触，否则他就有失去她的危险。他必须到维也纳去一次，并且他很容易找到借口。他通知他的所有朋友，包括德·韩斯迦先生在内，说他为了完成他几年来计划写的一部小说《战争》，他必须到阿斯本和瓦格兰姆两个战场去凭吊。但是秋天早已过去，冬天也快要到尽头了，春天就紧接着来了。巴尔扎克还留在巴黎，总是被各种形式的障碍所阻挠。他不是去收取他的小说的版税，就是付清一笔小帐，以能够借到一大笔债。这时候，为了照看他已经有点星的炉火，他就一封接着一封地寄出保证他早日团圆的信。他想只要他到达了维也纳，这和煦的清风不久就可以把火焰吹旺到先前的白热程度。

他的团圆希望差点被一个不幸的变故打破了。七月下旬，德·韩斯迦一家人到达了维也纳。因为他们上次呆在这城市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秘密通信都没有受到什么妨碍，巴尔扎克就想在几个月的压抑之后，就冒险给德·韩斯迦夫人寄去一封由“信箱”较交的、热情的、不能让她丈夫大看的信。这一次信里没有用客气的“您”和“夫人”，也没有给“大元帅”，西维琳小姐或保埃尔·亨利特的问候，只有向德·韩斯迦夫人发出的热情的赞美与称颂：

“哦，我的天使，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我的宝贝，我的心肝——这不得不保持的谨小慎微的方式真是太可怕了！我现在能够心照不宣地给你写信，这又是多么地快乐啊！”

在这疯狂的冒险之后，他就宣布不久他将离开巴黎到维也纳附近的温泉去访问德·韩斯迦夫妇：“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你那里去。尽管我不能够先告诉你准确的日期，因为施行需要我好多的准备，真是累极了。但是我会超出常人般地爱你。”

“六个月的苦苦相思”之后，他终于要去“吻那神圣的容颜，去抚摸我曾经这样仔细地用我的心摸索的美丽可爱的头发”。跟她呆在一起只要三天就能给他“一千年的生命和不可想象的巨大力量。”

不幸得很，这封寄给他的“亲爱的白色小猫”的信（或许不止这一封信，可能有另外一封同样亲密的信）却落到了德·韩斯迦先生的手里，并且可能还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暴风雨。虽然我们不能马上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巴尔扎克由于经济上的困境不得不推迟出发，并且不得不提笔写一封信向她残暴的丈夫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这封直截了当地向德·韩斯迦夫人宣布爱情的信。不用担心，巴尔扎克的发明无应付这样的事是绰绰有余的。正跟他上次向德·韩斯迦夫人解释他有两种不同的笔迹是因为他是为着应付不同情绪一样，他也厚着脸皮没有丝毫的羞耻写了一封文笔流畅、有很强说服力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有一天晚上，他所认识的“最纯洁，最天真，最幽默，最神圣，最严肃，最富有哲理”的德·韩斯迦夫人曾经笑着对他说“她很想看看巴尔扎克先生的真正的情书倒底是什么样子”。他当时就用同样的口气回答她“它有点像孟多兰写给维尔纳尔·玛利的一封信”，这实际上指的是他的小说《朱安党》中两个主要人物的风格。当时，他们都是随随便便地说笑，根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后来德·韩斯迦夫人曾在的里雅斯德给他来信时提及此事。她说“难道您已经忘记了维尔纳小姐吗？”这让他回忆起了他曾经答应过她一封他的典型的情书样式，于是他就寄给她两封此类的信。这就开始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一幕：恰好两封信都让德·韩斯迦先生给收到了，并且使他惊诧和引起他极大的愤怒。

巴尔扎克指望像德·韩斯迦先生那样聪明的一个人去相信他这种解释，无异于通过这些话告诉这位戴绿帽的丈夫说他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精神病人。不过，巴尔扎克的下一个行动却是相当的机智。他坚定他说他的第一封信发出后不久——这就意味着此事发生在德·韩斯迦先生发现这封信之前——德·韩斯迦夫人马上就寄给他一封措辞强硬的极其愤怒的回信。他写道：“您决想象不出我的愚笨的玩笑的成功使我处于何等难堪的境地。她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回复了我的荒唐无聊的第一封信，然而在这之前，我已经把我的第二封信寄出了。”

聪明无比的巴尔扎克在东窗事发之后，既不是向被欺骗的丈夫坦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是去请求他宽恕一个不幸的玩笑，而是用绅士的风度去请求他与他自己一样帮着自己消除清白无辜的德·韩斯迦夫人的怒气。她大概忘记了他们曾经谈起的维尔纳尔·玛利的情书，这样就证实了她收到一封情书甚至是一个滑稽的有损于她的名誉的愚笨行为。“德·韩斯迦夫宽怀大度的原谅表现出我的行为是多么地疯狂。这足以表明她是一个多么圣洁的贵妇人，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了。”

而且他还恳请德·韩斯迦先生把他的《风俗研究》第三册连同原稿一起

转交给他的妻子。不过，如果他们夫妻之中有哪一个认为不适宜收一个鄙陋的幽默家的友情的象征——书及原稿的话，“那么，就烦请您烧掉这部书及其原稿。”

即使德·韩斯迦夫人完全地宽恕他的话，他也绝不会饶恕自己曾经深深地伤害过这样一个尊贵心灵，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刻：“如果再也见不到您的话，我真不知道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要就我的愚蠢的冒失行为向您表示深深地道歉。您知道的，我没有多少情投意合的朋友，我简直无法想象失去像您这样高贵神圣的朋友，我会怎样地流泪。”

巴尔扎克此举是明显地暗示德·韩斯迦先生，他对此事所能采取的态度就是，让巴尔扎克继续跟他的妻子通信，并且使他们的友情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德·韩斯迦先生是否这样天真地就相信了巴尔扎克这一篇虚构的合情合理的故事呢？他是否晓得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与她的情人就要相隔万里而采用了更高明的手法呢？这也许是德·韩斯迦夫人不想放弃做巴尔扎克“永远的情人”而说服她的丈夫让了步。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都是带着游戏的味道来采取行动，德·韩斯迦先生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和解的信，而德·韩斯迦夫人也大度地宽恕了她的情人，因为我们发现一个月后他回信说：“我以异常激动的心情来恢复我们之间的通信。我以一切尊称“贵美人”来称呼您，就像称呼‘殿下’‘阁下’‘大人’‘陛下’一样。”

巴尔扎克的请罪被宽恕后，他又得到他高贵朋友的欢迎，继续拿他那没有什么意义的生活琐事来取悦他的朋友。高贵的女主人和她的丈夫甚至宽容地允许他们在他们返回乌克兰之前到维也纳来给他们表示敬意。

“不愉快的误会”已经彻底地消除了。他的朋友们正在等候着巴尔扎克的准时到达维也纳。然而冬去春来，在四月巴尔扎克因为遇到新的重重障碍的阻挠而始终离开不了巴黎。巴尔扎克已经身无分文了。他完成了《高里奥老伯》、三部别的小小说，以及一大批短篇小说，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文学上的成就和更多的稿酬。然而他勤奋的右手在积累钱财的同时，他的不听使唤的左手却把它毫不怜惜地挥霍浪费掉了。他刚刚偿付新的房租和购置家俱的费用。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中说道，这房子并非为他自己，而是为桑都·儒尔准备的。《高里奥老伯》和其他新的著作的收入都先后进了珠主商、裁缝和家俱店主的腰包。他早已计算好了可以用五个月的辛勤劳动换取一个月的自由浪漫的生活，然而计算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因此不得不承认：“我为自己像一个受土地束缚的农奴一样地被沉重的债务捆绑住手脚而感到深深地惭愧。我现在不能够自由地指挥自己的行动，迟早有一天我会被钉死在我的放纵自任之上的。”

德·韩斯迦夫人现在啰唆起她的丈夫来。她的丈夫坚持要马上就回乌克兰，她显然地是费了很大的努力用各种借口说服他留在维也纳直到春天。他们同意四月是最后的时限，但是因为巴尔扎克答应好了在《西拉飞达》脱稿之后就马上赶来，于是她又强求延期动身。如果他五月还不来的话，就再也不能等他了。无论他再提出什么理由来要求延期，这都是不可能的了。

巴尔扎克非常明白这一时刻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巴尔扎克认为只有德·韩斯迦夫人年老的丈夫死了之后，他们的结合才是得以实现他幸运的希望的最后机会，只有这样，他的孤注一掷就不能算是冒险。虽然人家已经付给他《西拉飞达》的稿酬，并且这本书也没有脱稿，但是他可以在维也纳写这本书的

最后几章。他没有钱，但是他并不为此发愁。他把他在卡西尼街家中所有的整套银盆都送到当铺里去了，又从出版家那里预支到一些钱，这样的名字又签在一两张借据的后面。他于五月九日离开巴黎而十六日就到达了维也纳。

这次旅游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认识构成一个天才人物的脾性的若干成份。因为我们发现这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例子，它证明了就是一个最有理性的灵魂也会堕落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凡是光线愈强，它所投射的阴影也是最暗的。同样道理，在常人身上不会被注意到或者有可能引起同情的幼稚的弱点，如果在像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知识丰富的人身上被发现，那就会显得可笑至极。就是最刁难的批评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天才，即将出版的小说的广告就能激起群众的热情去订购，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向他致敬。然而，尽管他清楚他已经取得了可流传后世的成就，但是他还有一个幼稚的野心，即他要拿他所没有的东西，同时却让民众认为他是在占有他绝对不能够占有的东西。他是农民的孙子，但他却要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贵族。他虽然负了一身的债，却要让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富翁。他从德·韩斯迦夫人那里了解到维也纳的人们是何等急切地等候他的到来。虽然维也纳的贵族对待贝多芬的态度已经显示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天才的可贵之处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然而他却幻想他自己也是一个贵族而跟维也纳的贵族交往。埃斯特哈慈一家人，施瓦生柏尔格一家人以及卢米保斯基一家人绝对想像不到像巴尔扎克先生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竟然是属于受人雇用的从事低级鄙俗活动的小人物阶层。他尽最大可能把自己装扮成最高雅的人，然而实际上却只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形象，因为他有：“一支可以成为巴黎人谈资的手杖，一只炼金术士向观天象的光学家特别定制的小千里镜，一些由一个仙女在外衣上缝上的金扣子。”

他不限一般人一样坐上平常的邮车旅行，而是定了一辆特别华丽的马车，上面印着德昂特拉格家的徽章，雇了一个穿号衣的马夫，甚至在路上尽量地装做一位侯爵。光这一笔开销就花了他五千法郎，虽然他很悲伤在他居留在维也纳的时候没有谁注意到这一切。五星期的旅行，其中两个星期花在他那华贵的马车里，剩下的一半时间在他旅馆里的书桌上度过。这一次旅行共耗费他一万五千法郎。

德·韩斯迦夫妇住在维也纳整齐的外交界区域里，他们就替巴尔扎克在附近的金梨旅馆租了一间房子。这真是一个凑巧的选择，因为拉苏莫斯基伯爵的秘书（同时也是伯爵的表嫂杜尔海姆·卢虬伯爵夫人秘密的丈夫）提利安·查利最近就是在这同一间房子里自杀的，当时，他右手握着一支手枪，左手拿着一本巴尔扎克写的小说。他明白了维也纳人是何等地崇拜他，即使他没有带来一个穿号衣的马夫，也没有在他的车门上印任何一位贵族家的徽章，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所受到的圣日耳曼镇和巴黎同行们的嘲讽打击，现在得到了补偿。奥地利贵族阶级中最著名的人物都争气恐怕地邀请他到他们的宫邸里去作客；欧洲最有权力的梅特涅亲王也请他到家里，而且还在一次长谈中告诉了他一个构成他的剧本《基罗·巴梅拉》主干的故事。

遗憾得很，他不能够一切都接受雪片般飞来的请柬，虽然这正是符号他追求贵族名号的欲望，这是因为德·韩斯迦夫人把她召到自己的社会交圈里，偶尔也止他见到她最亲近的朋友，波兰的贵族，例如卢米保斯基一家人或兰斯可伦斯基一家人。除了东方学家汉穆尔——蒲尔格斯托尔男爵与小戏剧家齐迪里斯男爵以外，他就没有遇到过任何其他的作家或学者。前者送给他一

个为他终生所保留的咒符，后者则被著名的巴尔扎克所唯一谈论的版税和金钱问题深深地震动。

巴尔扎克登上了七层天。他在这外国的城市里享受着他的名望给他带来的一切果实，那些来给他致敬的人也带给他不少、他自认为是有尊敬感觉的名字。在放纵的享受诱惑之下，他觉得自己差点离开书桌，上午的时间里，他坐在书桌上来完成他那篇神秘的、闻名世界的宗教小说《西拉飞达》。他校对了一些稿件，去参观阿斯本和埃斯林根两个战场并作了一些笔记为他的小说《战争》作准备。他多半的时间都花在向德·韩斯迦夫人的献媚讨好上，虽然在维也纳好像没有机会可以像在新沙特尔和日内瓦那样进行偷情的可耻行径。发生了信件被截获的事件之后，她已经非常地谨慎，而巴尔扎克的声望也证明他是一个地道的卫道士。离开维也纳之前不久，他闷闷不乐地写信给她道：“几乎没有一刻钟甚至一秒钟是属于我们两人的。这些障碍使我浑身不舒服，并且让我意识到我现在所能够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立刻动身回到巴黎。”

实际上，促使他早日动身的决不仅仅是不能拥吻德·韩斯迦夫人所带来的浑身燥热，而主要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即他不能偿付他的账。虽然他还没有征得出版家魏尔特的同意就把账日记在他身上，可是他的钱包还是一天天地瘪了。六月四日他离开旅馆时而不得不向德·韩斯迦夫人借一个杜卜金币作为付给伺候他的仆人的小费。

他迅速地就返回了巴黎。此后七年他才再次见到德·韩斯迦夫人。他的爱情小说的第一章和他的激动的心情该是结束了。正跟他在其它事情上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他为了能让他有更多时间去进行更急切更诱人的计划，不得不把这故事无限期地延迟。

第四章 天才的光荣和贫困

第一节 诉讼与抄家

有时候自然界表现出特有的现象，两三股劲风从境界的相反角落里冲出来，在一个地点集结起来，并且集聚团结的猛烈力量冲破他。这种灾祸的方式正是巴尔扎克从维也纳回来之后所受到的。这种闲散轻松的日子得要他用增加重量的焦心去赔偿。

首先把他所围困的苦闷就是又出现了家庭的老烦扰问题。德·苏维尔夫人，他的妹妹病倒了，而且在经济上他的妹夫又更加困难，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的弟弟一文既然莫名的带了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妻子从印度回来。因为他的弟弟以前很没出息，被别人送到印度去寻求生存之路。对于这个弟弟，巴尔扎克的母亲很是紧张地对待。作为他的哥哥，伟大而有权力的巴尔扎克必须为他找一份工作，而这个时候，是他应当付还他短欠她的一些债务的时候，更糟糕的是巴黎的一些恶意的报纸告诉读者们巴尔扎克离开巴黎是因为他不能够偿还债务又在这时候刊出。

如果巴尔扎克的母亲不顾他的困难向他索取债务或是对他责难，他一贯的作法就是到他的朋友德·柏尔尼夫人那里去求得一份安慰，这位朋友如同母亲一般对待他。但是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他却要去安慰她了。德·伯尔夫人得了重病，同时一个亲爱的女儿——虽然精神错乱却受人喜欢——却夭折了，她虚弱的心脏更加受到严重打击，更加严重危险。她所处在不妙位置已不可能给他别的什么帮助了。她甚至把给他校对稿件的好意服务都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她的力量已不允许能干别的事了，巴尔扎克虽然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只能反过来扮演安慰她的角色了。

在这个时期，他处在比任何时期都艰难的位置。他却到处向别人借债，这是他的惯例，而且又赶不上他的工作，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活动，坚持要求出版商预付一段日期的报酬，他会在将来规定的时间内如期交付书稿。朋友们都尽力地劝告他，不要再维持这种毫无保证的走一步看一步的生活。最坚持的是卡罗·珠儿玛，她经常性地劝告他最好不要追求一些表面奢华的小东西，这可是用匆忙间的出品来降低他的天才。虽然如此，他的这种固习却是不可改变的。对于他来说，他所有的也是唯一的本钱就是在他在文学中声望，而且他对于这种可以逼迫出版家们来买他的文学作品的权力也是快乐的享受着。他卖给他们那些只有书名而内里一字无成的小说，可能他认为他有这种必要，可以鞭策自己能够汲取最多的体力脑力劳动之前来强迫自己写完一部规定日期的小说。

在出身去维也纳之前，他费尽心思地到处预支他可以对付到的钱。他不但把一本言情小说重新出刊的权利卖出了，这是以前用圣·沃盘的假名写的。还把他的一本新书，《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卖给了《两世界杂志》。其实这部书还没有开始写，而还在等待《西拉飞达》最后几章的布洛斯也催了好几次，这已在几个月前分期登载了前部分。对于《西拉飞达》的稿子，巴尔扎克并不怎么发愁，他计划在金梨旅舍里用八天或八夜的时间之内完成它，根据他的计算，那部《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估计也不会超出他计算的两周的时间。而且在回到巴黎之后，他还可以把他的书稿重新抵押。

虽然这样，对于他所规定的时间表，他却第一次不能够认真恪守。他所安排的日历已没有假期的存在，他已向打破他的计划的社会诱惑在维也纳屈身。他在奥在利或波兰贵族的客万里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或者和德·韩斯迦夫人一起驾着马车闲转，而且让清淡的快乐剥夺了必须坐在书桌上工作的静静夜晚时间。因此，对于不能完成的《西拉飞达》，布洛斯也被迫停刊，对于此，订户们也不以之为怪，原因是他们对它的瑞登堡派的神秘主义以及那种洗炼的文风并不太感兴趣。更为严重的问题，至此巴尔扎克对《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还只字未动，而且这本书他已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又在构思另外一部小说——《幽谷白合》这是他在前往维也纳的路途中突然想出的，这种旅行经常飘来许多灵感。他把这部新书答应布洛斯去代替他曾经许诺过的另一部书，而且他在维也纳时就把已完成的第一段稿了寄给了布洛斯。

对于这个办法，布洛斯也同意，《幽谷白合》的第一段也就要正式印出来了，但他认为他在巴尔扎克的《西拉飞达》中受到的损失他有权利去恢复。那时候一种《外国语杂志》在圣彼得堡出现了，这个杂志有一个政策，即要求法文作品在巴黎出版的同时或是在这之前应该贡献给俄罗斯的读者。这家杂志社同布洛斯定下了合同，同意这家杂志社刊印那些作家们提供给《两世界杂志》和《巴黎杂志》的稿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洛斯就把校稿卖给了这家杂志社。当时，俄罗斯人最欢迎的法国作家便是巴尔扎克，布洛斯觉得把《幽谷白合》送给这家杂志社赚点钱也没什么不可。因为，毕竟巴尔扎克还欠他许多钱，大概不会因此合他争吵的。

回到巴黎时，巴尔扎克尽一切办法才打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像一头发狂的雄狮一样扑向布洛斯的后颈。为了尊重他的名望，他的暴怒我们不当说是由于金钱的问题，而应该说作为艺术家的纯洁受到污辱。但是，《幽谷白合》第一次校稿已被布洛斯送到圣彼得堡去了，而《外国语杂志》早把这一段逐字印出来了却没请示巴尔扎克一句话，向来巴尔扎克把第一次排稿当做是他的草稿，并且经常要求《两世界杂志》在付印书稿之前要他校对五六次乃至七八次。所以，在他收到一份《外国语杂志》之后，他见到以粗制形式出现的新小说，并且带有许多从技巧上说的缺点和一些笨拙的文句，这些都是他不愿让读者们看到的。他的愤怒我们是能够猜想到的。他感觉到布洛斯在欺压他，利用他的出名来欺压他，他立刻决定同布洛斯脱离关系，同这个污辱他艺术家良知的心灵的罪人脱离关系，并向法院对《两世界杂志》提出上诉。

在听到巴尔扎克的决定后，他的朋友们都感到惊慌。因为布洛斯的势力很大，他是两个法兰西最有影响的杂志的总裁，他的势力大到可以成就或毁掉一个作家的名声，巴黎许多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大约有五分之四要直接间接地受控于他。此外，对于一些大的新闻报纸的编辑他都能够施加压力。如果巴尔扎克和他公开冲突，可能他会让巴尔扎克找不到任何一个报纸来帮助他，甚至于一个同工来为他作证。除了他和同作家们的交情不深外，他们起来反抗布洛斯的起码勇气也没有，许多朋友劝说巴尔扎克，布洛斯会不择手段地来对付他的，会千方百计破坏他的声望，会在报纸上骂他，会恐吓他的出版商，甚至会控制书商。所以，是不能和布洛斯打官司的。就算能够胜诉，从实际上讲从开始巴尔扎克就受到损失。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去战胜这个巨大的势力集团，因为这颗势力大树的根须已插向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且巴尔扎克是孤身一人同其斗争。

但是，在艺术家的纯洁希望受到伤害时，巴尔扎克就不会有恐吓的颤抖。在维也纳期间的逗留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力量，帮助他了解了他的真像在本国中被隐蔽到什么程度。他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挫折和困难会更加增强他夺取胜利的坚决性，他对个人的攻击一向是不屑于回答，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想到对于整个无赖狡猾的巴黎新闻界，他都要尽全力去反抗时，就像和一群狂叫的流氓斗争时的愉快一样。他回绝了任何的调停，勇敢地向布洛斯起诉，布洛斯也反诉他没有履行契约。这种争辩也就当然地从法院闹到新闻界和文学界里去。布洛斯动用了一切他可转动的石块，在《巴黎杂志》上用最野恋的话语来谩骂巴尔扎克，揭出他的私人生活，并且对他贵族的头衔进行嘲笑，泄露一些少年时代他写过的出卖身份的作品，并倒处得意洋洋地泄露他短缺人家的债务，并对他的品格进行讥讽。布洛斯还把他的全部文学家臣武装起来，一些作家受到他的利诱，都谎称把一个作家的稿子卖给外国杂志而不再给作者稿费这是很常见的事。因为《巴黎杂志》和《两世界杂志》供应他们吃喝玩乐，布洛斯又打了他们一棍，他们马上就对此大加认可。一些应有同工友谊的人也不和巴尔扎克站在一边，像仲马、阿力山大，须·欧贞，戈慈兰、查宁·儒儿和其他十来个人，最后却出来作证反对巴尔扎克。只有雨果和桑德·乔治始终高贵地抬起头，不去下贱地吮敌布洛斯的脚掌。

最后终审结果出来了，从精神上巴尔扎克赢得了胜利。对全世界文学来说，法院的判断是一桩重要的事情，他认为不能够强迫一个作家去赔偿一个出版家或编辑人，如果因为作家没有兴趣或是能力来完成曾许诺的工作而没有交稿。法院判决巴尔扎克把他从布洛斯手中支取的预稿费付还。这是精神的胜利，却是物质上损失重大的胜利。跟律师们打交道、出庭，对付辩论，巴尔扎克付出了几个星期的宝贵时光，那些巴黎的新闻无赖到处在搜寻他，在这种长期与敌作战的紧张状况中，就是最强的人也会熬不下来的。

从这次诉讼中，巴尔扎克得到了一个人生的教训。他也明白了他让他小说中人物那些行动的正确，在他的小说里，英雄芜特冷，马尔宾，拉斯迪额和吕崩柏礼所遵循的格言就是“先获取权力，然后人家就要注意你！”，这虽是不近人情的格言，但也是极为正确的。获取权力无论哪种权力，富有的权利，政治的权力，军事的权力，社会关系的权力，女人的权力……无论你要去干什么，首先要获得权力，你得随时准备好武器，如果不这么做，那你就完蛋！仅靠独立是不够的，你还要想法让别人依靠你，只有别人感到他们会受到攻击时，这是因为他们的弱点——虚荣、懦弱，你就表现了你是他们的主人。

巴尔扎克认为他对读者们的忠实正是他的力量所在。但由于许多读者分散于世界各地，不可能把他们集结起来，统一训练，所以这些无数的读者也就使他的反对派轻视，读者们只能够憎恨，他们不能用巴尔扎克去对付那些存在于巴黎舆论界的寄生虫。然而在法兰西作家中，他拥有的读者最多，他觉得他可以不再依赖杂志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如果他能够自己控制一个舆论机构，那么，对于那些曾经把他驱出他们批评的堡垒，躲在富人们身后谩骂他，嘲笑他的寄生虫们，他就可以割断他们脚下的地基。

从一八三四年以来，巴黎有一种小型报纸一直存在着，名字叫《巴黎时报》，每周出两期，并不太受读者注目。而且这报纸思想上向极端教会派和正统保王党倾斜，巴尔扎克却对此不在意。他也不对报纸经费困难及销路狭

窄而慌。因为他自信、有德·巴尔扎克、奥瑙利定期刊登他的小说，任何一张报纸都会站得住脚。另外，这报纸还可以成为一架有用的桥梁，变成他的政治斗场。虽然在政治上他曾遭到失败，他还梦想能够入选议院，被封为尘法世卿，当一个封疆大吏。他还迷惑于政治权力的背景，一切带有诱惑力的权势，带着它所特有的兴奋和浪潮。

《巴黎时报》在那时几乎是股本为零，巴尔扎克便想办法弄起一家公司，他自己承担了半数以上的股本，包括他所担负筹股来维持继续出版的重责以及复杂的谈判都使他焦头烂额，但他还是对此持乐观的态度。合同签订之后，他立刻以全身心的力量投入这个全新的事业当中，不久，他罗致了一批有才能干的年轻人，设立了编辑部，其中的人只有高提埃·提奥飞尔一个人直到最后还和他保持友谊。而且他还请来两个贵族青年来当秘书，德·柏罗瓦侯爵和德·葛拉曼伯爵。他不对自己的批判灼见自信，相信的是他的势利本能。不过，这是在一个可以抵上十几个人的巴尔扎克的领导下工作，就算不要秘书和编辑都是可能的。

在巴尔扎克对他的新创事业还很有兴趣的时候，他投身其中，几乎把整个报纸的内容都改变了。每一篇比较吸引人的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笔，无论政论、文评、争辩乃至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在一八三六年正月他主编之下出版的第一期上有他一夜工夫写的《无神论者的弥撒》。之后，他又写了《禁止》、《古物陈列室》、《卡园·发西诺》、《人在这儿》和《被人遗忘的殉道者》。每天的任何一个时间，编辑室中会突然闯进他，他看看有什么新情况，以及督促他的编辑员们工作，并给他们以帮助。他在一种权力争取的欲望刺激下，这也许是为了向别的杂志报复，希望这些杂志因他的报纸声望增高而降低声望，他也就应此而进行了许多应酬活动。在卡西尼街他连续于正月十四、十七、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等日请客，饭茶自然是浮奢的海味山珍，酒像河水一样淌。但他最后两期的房租还没有付清，对于巴尔扎克所负的四百七十三法郎七十参丁，他的房乐只好求助于执达吏帮助征收。

他希望通过这种华宴收到一百倍利润的投资。对他的报纸巴黎人也颇为好奇，在第一期出版后一个月，他就显出了早熟的胜利的自负，这是在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中提到的：

“《巴黎时报》已占满了我所有的时间而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每天我只睡五个小时，但是假始您和德·韩斯迦先生的事情比较成功的话，我可以说我的计划已取得非常圆满的成功。意外地很，订阅人数很多，短短一个月辰光，我已取得在报纸股份上的九万法郎的资本。”

估计《巴黎时报》的资产达到九万法郎，这只是他自己希望的资本交易的市价，这也是一种明显不能实现的创业。巴尔扎克梦想他的脚下踩着全巴黎，更幻想布洛斯会像一只狗一样不久会谦恳地爬到他面前，并在他桌上放下十万法郎，恳求他放弃《巴黎时报》，重新给原来的杂志投稿，以前那些作证狠毒攻击他的作家们不久也会向这法兰西最有势力的杂志求怜。大臣们和议员们也得把他们的政策改为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政策。

但是，不幸运的是，巴尔扎克幻想读者们争先恐后来付订阅费的情景却从没实现。他帐本上的数目却是比较微小。那些股东们都悄悄地脱出了他们的股份，因为他们没有巴尔扎克的天才而有的是更多的商业本能，他也只好廉价抛出了他自己的股本。他的新的冒险事业失败了，他感觉到这一点后就对此失去了兴趣。他对编辑工作也厌烦了，也渐渐不去编辑室了，并且也渐

渐减少他的投稿，结果不到一年，如同巴尔扎克一切物质企业的命运一样，他新的事业整个破产而且债台高筑。他得到的是另外四万法郎的负担而为之付出六个月到八个月疯狂工作。这不如他请一天假去世界旅游。和安达乌斯一样，只有和自己的土地接触，他才能得到新的力量，如果越出了自己的领地，那他的天才和明智就会损失殆尽，就连侏儒都敢和他的巨力戏弄。巴尔扎克曾有过勇敢的宣言“一八三六年我会变富的！”，在这之后，他又承认“我在一八三六年并没有比一八二九年走得更前。”

在这一年惨剧中两件展览品就是布洛斯案件的诉讼和《巴黎时报》的失败。一年中每日都有恼人的插曲。他和布洛斯的诉讼并非是巴尔扎克和出版商争吵的全部。由于柏赤夫人的老雇员魏尔德自行经商诱走巴尔扎克，“超卓的柏赤夫人突然变成为“可恨的柏赤夫人”。她要求他交出他所短欠的书稿而毫不留情，而且救济巴尔扎克魏尔德也没有充分的资本，为了稍微歇口气，巴尔扎克准备自费出版一本新本的《笑林》，但他却忘记了古代的一句格言：一个被火烧过的孩子是怕见火的。以前他曾因冒险出书而破产过。但是，他终于借钱买到了纸，找了一家可以让他先印后付款的印刷厂。不幸连连，正要装订的时候，书库突然间起了火，而三千五百法郎也就化为一缕青烟上了天。

巴尔扎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想不出推开他的债权人的任何借口。他把卡西尼街的家门关上了，连夜把一些值钱的家具和书籍搬到一间以前的公寓中，这是他到维也纳之前用“杜兰寡妇”的名义在战争街所租到的一间新公寓。如同卡西尼街的情形似的，他也在这里享受着一种安乐，在这里他用秘密的楼梯去躲避一个执达吏或其他任何一个不速之客的扰乱。不过，要到达“杜兰寡妇”的前门也不是简单的。他隐蔽他的日常生活，并且天真快乐地引用浪漫的欺骗，他发明了一套不断更改的口令。只有说一声“开吧，西桑！”，门户才会立刻开放，对于巴尔扎克的堡垒的三层炮台没有谁能来窥视。高提埃告诉我们，例如，有一天，门房毕得听他说到“李子熟了”，然后，西尔柏露斯才主上客人闯进门来。这却只有第一步。在楼梯底下等候的是巴尔扎克的忠实仆人，他必须听到人家说“我从比利时带来花边”，然后，客人才能被允许走到公寓的门前，在那里他最后的一把钥匙是一句保证“柏尔特兰夫人身体非常康健”，之后，客人才能走进神秘的寡妇的秘密室里来。

巴尔扎克把他小说中英雄们所依赖的一些诡计被他自己拿来运用。他把期票转给第三者、第四者，这是在延期庭讯，利用从未接到邮件使传票不能送到他的手中。和他描写的艺术家拉巴尔费林一样，他借助于他的法律知识、发明的技巧、以及厚脸皮，采取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计策去躲避他的债权人。在出版家和放债人之间流转着他的期票，那些得到通知去扣押巴尔扎克先生的巴黎执达吏，谁有没有办法找到他。

带着自傲的感觉，也许有恶作剧的想法，巴尔扎克几次考虑之后加入了那些追随他去公开侮辱国法的一帮人。依据刚发表的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应尽入伍参加国防军的义务，巴尔扎克却拒绝这个责任。他认为国王菲利浦、路易是一个没有权利来命令他的篡位者，并以正统派保王党的资格来评论。不管怎么说，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他想现在正是印刷机等待他的稿子，如果去荷枪当一个兵士未免是侮辱他的人格。

这是不成问题的，讲交情也磋商一下，像巴尔扎克这样有名望的公民和

他在文学上的巨大地位，是有办法让他免掉服役的义务的。但是对这种和解，巴尔扎克却不能容忍。他甚至对召他入伍的命令都不回答，政府让他解释没有报到的理由已有三次了，每次他都对此充耳不闻。最后，国防军训育处结果下令罚他监禁八天，对此他却捧腹大笑。因为不愿荷枪而罚这位欧罗巴文坛的大元帅入狱坐牢！这简直是无礼的命令，好吧，就让他们来试试看！那些接到命令去逮捕这顽抗的逃兵的警察却被迫和他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也感到很快活。这些黄带笨伯们要先了解他们要胜过巴尔扎克这样有才能的人，首先在头脑中应加些灰色素。

在这之后几个星期，巴尔扎克突然失踪了。在白天里，警察们屡次突然冲进卡西尼街的房子，但却一无所获。巴尔扎克早已出去旅行了，任何地址也没留下，在早晨他会出现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晚上又到出版家的办公室里收他的稿费。仆人们告诉他老练的警察经常盘问他们，他对此非常快乐，有时更令他高兴的是，他站在门后偷听那些愚夫抓头挠耳，而无从发现他的踪迹。这对帮助他给一些小说增加一点趣味提供了机会。这又给了他增加了一次灵感，使他更加生动地写芜特冷和巴克瓜之如何对付高兰了，拜埃拉和其他法律的猎狗。

但是在某一天早晨，四月二十七日，菲利浦、路易国王竟然能够庆祝胜利。在等待了好几个钟头之后，一个警官巡察和两个侦探看见他走进卡西尼街的公寓，他们在背后追他。三十分钟后，巴尔扎克被绿衣先锋带到了巴辛古拘留所，也就是阿里古拘留所。从巴尔扎克必须满刑可以看出，他在本国的读者对他并没有很大的尊敬。任何人都不能够帮他的忙，包括外国的贵族朋友们，曾经招待过他的钦差大臣们，以及梅尔特尼克亲王——曾经赏过他面子并跟他私下交谈过一次，从四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四日之间，巴黎政府严格地执行法律，丝毫不给他任何特权。他被迫坐在一间吵闹的下层阶级罪犯被关押的集体牢房里。他们大都是工人，因拒绝给国防军牺牲两天时间，在那时代两天不拿工资会使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挨饿。巴尔扎克得到一个唯一的允许，为他准备了一张桌和一把椅子，他也就需要这些了。在周围喧哗地吵闹中，他却能够静下心来校对他的稿件，好像在他自己沉寂的书房里似的。他也没有降低他那幽默态度，从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快乐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坐狱引起了高尔民族的极大滑稽感而不以此为耻。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他因为受到国家的保护，所以避免了出版家和执达吏的纠缠，并以此享受到乐处。他对愈加限制的自由已经习惯，虽然其程度的幽禁在阿里古拘留所里更甚。照巴尔扎克的意思，自由的含义就是日以继夜的与生存进行竞争。

在这命运的灾祸六个月中，他刚毅进行了抵御，虽然在其间他也偶尔叹气“我的确是在杀害我自己”，或“我的头如同一只疲惫的小马似的垂下”。就是以这种时期，他居然受到他那铜铁之躯的第一次警告，这是工作过度的表现。他居然头眩眼花地晕倒了，医生再三叮咛要对自己的身体珍惜。巴尔扎克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到乡下去了两三个月，虽然他对医生的后半半诊断的意思抹煞了。他到了他的故乡杜尔兰，但住在朋友马尔冈家里他并没有依照拿克加尔大夫的叮咛去休息。与此相反，他和从前一样在发疯地工作。他又得到同样的教训，他不能去从事投机的事业，开商业企业或是娶一个有钱的妻子，他能做的只能是从这种他生来就注定的使命里来解除他的困苦。艺术家有一种药品，这种药是任何医生都不能给其他病人开的。只有他，才能

够在这上面加上忧愁的艺术表达，来驱除它们。他能够由他的这种痛苦体验转化为人类活的生活的描写，从而把外界环境对人类的压迫变成创造的自由。

巴尔扎克在沙斐居留的时候，他受到了来自外界环境的压迫。柏赤寡妇又出嫁了，她的新丈夫是个内行的买卖人，他不会宽恕那种触动他的钱袋的事情。在他的影响之下，她搞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要求巴尔扎克把《风俗的研究》的两部出色的书稿在二十四天之内交出来，否则延误一天就得付上五十法郎的罚款。所以，巴尔扎克作出决定，让这个女人在二十天之内得到书稿，从而和她算清帐。他也看出他应该做的事有两年，“一是履行我以往的契约，另一个重要的是，我还得生产一流的作品。”

他实现了他的两个目标，《幻灭三部曲》他在八天之内拟好了腹稿，又写出了第一部：

“我尽我所有力量写作，每天工作十五小时，太阳东升，我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午饭时止，除了黑咖啡以外，不吃任何东西。”

这部书的仓卒成稿虽是为了避免受罚，但却是巴尔扎克的主要力作之一，这仿佛是巴尔扎克努力鞭策自己去挖掘自己的灵魂，在自己面前展现自己的各种欲望的秘密和威胁他的危机似的。《幻灭》从表面上来说虽是现实生活的图象，但这在法兰西文学中，一直找不到与之品敌的广阔的写实作品，这种决定性的尝度，也是巴尔扎克想要把握自己的一种行动。在分开的两章中，一方面，他指明对于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应该坚决忠实，那么这个作家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说明，如果一个浮动的没有价值的虚名，一个作家也受到诱惑想要获取的话，他就不会有什么好遭遇。作为巴尔扎克陷落其中的精神上的灭亡的象征是德·吕崩柏礼·鲁失，他内心的理想的代表是德·阿尔太斯·但尼埃尔。

对于巴尔扎克天性的二元性，他自己是明确了解的。他知道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不可动摇的良知他也具有，这流露出许多他内心所有的优越成份，对任何的调解他却予以拒绝，他同社会准备单独分庭抗礼。但是对于他性格的另一方面他也了解，他的一切缺点：如耽于肉欲，挥霍浮华，爱好体面，不能抵抗虚荣豪华生活的诱惑等等，都是他致命的短处。他需要让自己锻炼，并把那些由于虚荣而辜负自己的良心而取得的片刻成功的危险摆在眼前，他描写了一个作家，一个不能站稳脚步，拜倒在诱惑之下而不能重新站起的作家，并把这作为自己的警诫。查尔登那个和巴尔扎克似的窃取了一个贵族的街头的青年，现在改名为德·吕崩柏礼·鲁先，带着一本诗集以青年理想家的身份来到巴黎。这本诗集就和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一样，他希望能够凭他的才华在巴黎打开一条路。他在一个偶尔的机会走进一个屋顶楼里，这是一群居住在拉丁区的屋顶楼里代表了法兰西未来生力军并忠实献身给预见的使命的青年穷学生所组成的文社。这些人都是蓝柏尔·路易的朋友。一个作家叫德·阿尔太斯，一个医生叫毕安仓，另一个哲学家克拉斯提恩·米赤儿。他们都轻蔑暂时的成功，因为崇拜将来的成就。巴尔扎克描写他自己的优美的一半品质是借着德·阿尔太斯。但尼埃尔的性格的坚强和那种值得骄傲的忍耐。德·吕崩柏礼·鲁先是经过德·阿尔太斯的介绍而加入了这一群诚恳的理想主义的青年当中，但是他并不受到诱惑而因为忠实于他所宣誓参加的高贵的智慧联盟，使那些住在圣日耳曼镇的也袭贵族对他产生注意。他所想要得到的是迅速的成功、女人的宠爱、金钱、名誉、政治的权力，因为

值钱的金币不能靠诗集来铸造，他也就卖给新闻界他的笔杆。和巴尔扎克以前的所做所为一样，他拿他的才能出卖，做一个文人乞丐的工作，同文学制造家们合伙生产，帮助他们造成声势，变成了一个妓女——新闻界的妓女。他居然成为当时文坛细沙堆中的一粒微尘，名声也居然有了，他其实却在一天天地在没落了。

残暴的觉悟是从经年的新闻界的奴役生活中得到的，他的深刻苦痛的经验也是从新近脑子里所有的狠毒的一群所给的，所谓舆论的整个系统都被巴尔扎克揭破了，以及文学界和戏剧界的黑暗腐败，在这里面，人们一有机会却在进行彼此的中伤，虽然表现上团结在一起。巴尔扎克的原意是暴露黑暗的巴黎的一面，但这部书却发展成为整个巴黎的那个时代的一张完整的图像，而且在一切时代里这图像都没有失效。这部书是充满骄傲和愤怒的感觉的，带着劝告隔绝贪婪和急躁的号召，它号召人们要保持坚强，在不断地顽强反抗中积聚更多的力量。在黑云压顶的时刻，巴尔扎克总是能把他真正的勇气找回来，在最慌乱的时候，那些最为优美而且最能代表他的个性的作品总是从他的笔端流出。

第二节 新情妇

在这一年所有的厄运：诉讼、杂志倒闭、被人搜家、违命入牢等等其他的悲剧，在给德·韩斯迦夫人收到的书信中都记录下来，巴尔扎克几乎用被虐待狂的愉快的心情，甚至用多调的笔调来描述。对于他在报告里的这些记载，我们不能够不怀疑，他的忧愁的挫折，他的孤单和哀怨都一星期一星期地被谈到，巴尔扎克遮瞒的目的就在于不让遥远的乌克兰通信人知道别的事实。巴尔扎克把自己描写为一个只为他的工作而活着的苦行僧，一个珍惜自己最后的一点时间而倒瘫在极度的疲倦中的人，没有别的东西再比这样的自描而更引人误解了。

他对于平常所谓的“命途多舛”毫不在意的态度，只有我们明白了是他那深不可测的自信使他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他的性格变成这样的原因。有某种东西，也许是他身上的主要部分，依附在他身上，对他的外在生活的惨剧并不怎样关心，对于此只是观察现象而十分好奇，好像在注视海中那澎湃汹涌的涛浪而自己站在干枯的土地上。经常在早晨有执达吏敲打他的房门，他对此不屑一顾，照样在下午去串珠宝店中利用赊账来买一些对他没有多大用处的玩意儿。就在他的债台筑到短欠十四万法郎，也就是那个悲惨的一八三六年，他得必须吃饭也靠向他的裁缝或医生借钱的时候，他却为了配合著名的“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仗”而买了另外一枝价值六百法郎的犀角手杖，另外还买了一把一百九十法郎的削笔金刀，一只一百一十法郎的皮夹，一条四百二十法郎的项链。卖这些东西的店家是没想到卖给一个决定采取遁世主义生活方式的“囚徒”的，他们希望卖给一个刚刚引诱财主去打开钱包的轻桃女人。

他保持一种平衡是靠他内心中一种神秘的反抗力量。他越是到处借债，却又越是靠维持幻想的奢华而宽恕自己去购置一些昂贵的女人式的琐物。外界的环境越是对他压迫，他轻浮的性格就越显露。被迫踏在站车上的势力越大，他就对享受生活的敏感越强烈。我们会觉得他的行为有点愚蠢，除非我们了解他这样矛盾的性格。事实上，正是这种性格，使他那烈火一般的性格能够开放寻找一种向外爆炸的正确方法。

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一八三六年，是他经验到最严重危机的一年，也是忽而烈日在天忽而倾盆大雨的一年，是巴尔扎克感到一种收获奢华而得到肉感满足的一年。从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中所叙述的自传式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明白，他是那样厚颜惊人地去追求他那些不愿意公开的秘密事情。举一个例子说，他曾和她说，他租到了一间“房顶楼”是为了安稳躲避债权人，在那里，他像一个悲愁的白发老隐士似的过着极其简朴孤单的日子，在这里是不会被他的知心朋友或他家里人发现的、其实他租到的是所最奢华的房屋而非什么一间房顶楼，而且对于布置房间他又免不了要花许多钱。卡西尼街四间房子里他有装饰得很富有的家具，但是他还是从卡布新大马路上的莫罗家俱店里买到了每一件奢华值钱的家具。就是奥古斯督，他的仆人，也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服装，红色的背心，蓝色的上下衣，光是这一套服装他就付出了三百六十八法郎，其实他还是赊帐。他的化装室，是他布置的隐庐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连茶花女也不会小看他的。对于这些值钱的家具和古董，他是非常乐意堆积和摆布的，而且都是他费心地利用各

种颜色搭配而谨慎地选择布置的，在《金眼女》中他甚至对此加以详细乐的描写：

“在这化装室中有一半形成了雅静的弧形，另外一半是中间光亮着白色和金色的云母石壁炉台的白色四方形，两者相互对照。一道朝窗的旁门可以供人出入，旁门就在一张绣花的门帘蔽上。这个化装室是马蹄形的，放置有一张真正的土耳其睡榻，也就是说，铺在地板上，这张卧褥有睡床一样大，周围五十呎，原料是白色卡什维尔绒布，中间饰的玫瑰花是由黑色和火红色的缎子所制成的，它依照钻石的形状排列着。在许多垫子上这只大卧褥的背面要高出好几时，从而在这些垫子的衬托下它变得更为美丽。这化装室挂有一些印着印度绸红的布料，一条凹一条凸地列成柱形，就像哥林多的柱石似的，上下两端都连着带子，是两条大红色而有黑色花卉图案形的。在印度绸的背后，看起来像粉红色的火红的颜色，这是一种可爱的颜色，在窗帘上也可以看到。窗帘也是印度绸红的，衬托以粉红色的薄绸条，并装饰上火红色杂黑色的流苏。照耀这睡榻的，是在相等的距离之间排布在排布上的十二只烛，每两支插在一只镀银的托架上。一只暗色镀银灯挂在天花板的中央，座子是镀金的，白中带黑。地毯带有花纹，就像一块东方的披肩，可以使人想像到波斯帝国的诗歌，这是奴隶们用手制造出来的。饰有黑色和火红色的装饰品的卡什维尔绒布套在家俱上。白色和金色的云母石做的时辰钟、几枝烛台。一块卡什维尔绒布盖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花架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白色或红色花朵的玫瑰花。”

华格纳对于动情的绸缎和卡什维尔绒布的家具也同样喜欢，巴尔扎克可以到处找到他的灵感而不需要像华格纳那样需要这些来供给他正当的艺术灵感的氛围。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他的“著名的白色睡榻”曾经显示给他的朋友方登雷，他笑着承认而忘记了他的谨慎习惯一些时刻：

“我做了它，是在几乎要得到一个高等社会的贵妇时。你看，她的一个习惯是身边有一些漂亮的家具。她不会不高兴的，如果她发现她坐在这样一个睡榻上有话。”

巴尔扎克之所以这样布置他的公寓，我们可以推测得到，就是方登雷没有细评在日记中记下这些事情的话。巴尔扎克又坠入情网的记号就是他又开始了新鲜的装饰。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他预备去迎接一个情妇，那他一定要先布置他的新公寓。他的感情可以根据他的帐目的大小来衡量，这正和他的忧虑一样。在追逐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时候，他搞到一辆马车，雇了一个马夫，他的第一把沙发也是为她而买的。他又为德·柏尔尼夫人装饰了玛勒街的卧室。在去维也纳拜访德·韩斯迦夫人时，他就重金雇了一辆特殊的华丽马车。在一八三六这备受逆意打击的一年中，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热烈地坠入情网，而且还继续给维埃尼亚的“情侣”海誓山盟地永远忠实她，向她描绘他的贞洁生活的困苦的信也是一封接一封。那封曾以动人热烈的辞令深深感动了整个一代人的情书，就是在此时写给韩斯迦夫人的，然而这一封情书却是在他与另一个女人恋爱的同时写成的。

那个新情妇是间接由德·韩斯迦夫人自己的介绍而认识了他的，她给巴尔扎克的生活施展了重要的作用，巴尔扎克也费尽心思去隐瞒他的新情妇。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之前，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阿朋尼伯爵的夫人被德·韩斯迦夫人介绍给他，他也及时去大使馆拜访了他们。在一八三五年一个晚上，他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会上一个女人引起他的注意，她是

一个三十岁左右十分美丽的女人，一个又高又媚的金栗色美人。她带有一种令男性们陶醉的肉感的气度，她态度自如地在男人们中拥挤走动，接受男客们对她的阿谀和赞美。巴尔扎克感情的烈火被点燃，并不全因这美丽的面貌而激动，而是受这面貌背后那高贵的名家姓氏而诱惑，能够点起他的烈火的是他知道她是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人。维斯冈地是米兰的公爵，而意大利第一流的贵族家庭中也有桂都邦尼一家人的名份。巴尔扎克在一个激动的无从抑制的念头冲动下，把他对那时候所旅居在维也纳的维埃曹尼亚别宫女主人所发出的永久忠实的誓言都已忘记，他于是采取了措施去拜见那美丽的伯爵夫人。

那位可爱的意大利伯爵夫人也不是生来就受爵的，实际，她也不是一个意大利女人。她的名字叫洛威尔·沙拉，她出生在伦敦附近的埃奥尔公园，她可以说是一个英吉利反常家庭的女儿。这一家的流行病是自杀和感情的暴发。她的母亲，也曾和她一样，以美丽而闻名，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自己老了，就自杀了。同样，她哥哥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另外一个哥哥于嗜酒而日益悲惨，而她的妹妹则因为崇拜宗教陷于迷惘之中。这个家庭中唯一正常的分子就是处于紧张与恐怖氛围中的伯爵夫人，她在她的色情范围中注入了她的感情，她带有的那种镇静态度也是英吉利人所特有的，她好像屈服了一个冒险行为，这个行为对她诱惑而有吸引力，她没有犹豫，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兴奋。她那在这一方面的冷静头脑，并没有因占有了一个丈夫，桂都邦尼—维斯冈地·爱米里伯爵，而失去。她也冷静面对丈夫所表示的嫉妒。他是一个文静谦虚的男人，她和他结婚好像是她在游历欧洲的某个时候所拣到的。

桂都邦尼—维斯冈地·爱米里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生活 and 乐趣，他的兴趣和妻子的兴趣毫无相同。音乐才是他真正的爱情，霍夫曼小说中那些流芳百世的人物可和他相比。他最大的快乐是演奏他的提琴，坐在一个戏院的音乐队里，混在许多职业音乐家当中，虽然他是一个贵族子弟。他在凡尔赛的纳伊马路上占有一所房屋，这不算巴黎和维也纳的宫邸在内。在凡尔赛时，每天晚上，他都要悄悄地溜出去，在他在戏院舞台前面的音乐队的座位上坐下；不管在何地方，他都谦卑有礼地请求别人让他在该地的戏剧院里演奏。白天的时候，他的快乐就是化学实验。他把各种成分混杂，把结果倒在瓶子中，然后加上明晰的标签。他厌烦这社会。他对他妻子的情人们不构成什么麻烦，因为他愿意躲在背后。他对付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极为谦让，因为他要拿不断贡献的力量来演奏的音乐而不希望别人烦他。

巴尔扎克很幸运，他现在又找到了第二个，继德·柏尔尼先生和德·韩斯迦先生后，一半由于骑士的精神一半由于不太在意的态度而不反对妻子去和一个著名作家偷情的丈夫。巴尔扎克达到目的的过程照例很急躁，陪着桂都邦尼—维斯冈地夫妇驾车到凡尔赛去，这花费了他一切的空余时间，他们分坐了意大利剧院里所有的包厢，一直到了四月份，我们才看到了他的报告，当然是报告给卡罗·珠儿玛的，而不是给德·韩期迦夫人的：

“已经好几天了，对这个非常富有侵略性的女人我都一直迷惑，我不知道怎样躲避才好，因为任何使我快乐的东西我都没有希望去抵抗它。”

但是，对于巴尔扎克的“进攻”，伯爵夫人却犹豫是不是接受。她刚刚和高斯罗斯基亲王，她最后的一个情人，和他断然分手，她所给爱好音乐的丈夫贡献的一个儿子就是由于亲王的帮助。但是到底是由巴黎社会的一只“大

狮”德·崩发尔·李昂纳尔伯爵还是巴尔扎克来继承亲王，她不能够打定主意。巴尔扎克这一方面，也还有其他的几个情妇需要保持恒温。德·韩斯迦夫人听说巴尔扎克突然对音乐发生兴趣，这是她的一个法兰西首都的同乡告诉她的，她也了解到在音乐厅里，巴尔扎克拿罗西尼的情妇柏里西埃·奥比林的无害的包厢去换取维斯冈地夫妇的包厢。她于是责备巴尔扎克的无义和不诚，因为她把自己当成为他生活中的女管家。这有点像在她的盟约中有一条，巴尔扎克只能够到娼妓那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任何消遣，因为在这些女人当中巴尔扎克不会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她用不着为此忌恨。她对他是相当了解的，她确信那位桂都邦尼一维斯冈地伯爵夫人也同样收到过巴尔扎克给她写的同样的情书，她需要独占巴尔扎克。最后，巴尔扎克也没有推迟，因为握在他手中的鸟他可不愿意放走，他就举行了一次挥霍、轻浮的一次旅行，他动身到了维也纳去，希望给她保证让她相信只有她占据他的心房。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把他所欠的书稿在沙斐完成了，一八三五年八月，在追求美丽的伯爵夫人的德·崩发尔·李昂埃尔的情敌榜上，他又入选了，并且勇夺头名。他胜利了，她变成了他的爱人。如果我们相信一位无名作家写的《巴尔扎克真相》的书可以作凭的话，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出世的桂都邦尼一维斯冈尔·李查儿·李昂埃尔可能是他的私生子，这是三个既不跟父亲姓，又不跟母亲姓的三个私生子中的一个。

虽然，她一直和巴尔扎克保持情妇关系有五年，也是他的热心朋友和救济人，但是任何一个传记家却都没对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引起足够重视。其实她自己应对她的疏忽而负责，因为一个人的成就和影响是靠他的吹嘘能力使他成名，而往往不是靠获得名声的暗中努力奋斗。她对身后文学史上的名望从没追求；但是德·韩斯迦夫人，虚荣心、野心、努力都是极为强烈的，却一开头就决心要在这上面占一位子。所以，德·韩斯迦夫人的肖像就整个儿把伯爵夫人的肖像遮盖住了。如果伯爵夫人没有收到同样多情的信，那么他就不是巴尔扎克，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数一数这些情书究竟有多少，也没有为将来刊布而把它们藏在小箱子中，可能因为是疏懈，也许是因为她厌恶别人在他们死了之后还谈论她们名字而有污她那崇高的骄傲，也不希望他的名字被将来的文学史家们插进书中。但是她却尽心竭力地在巴尔扎克活着时对他的福利着想。我们细究德·韩斯迦夫人的案件时注意的苦痛的紧张感在她和他的关系中并不能体会得到。就是在他们那确实伟大的感情中，对她自己在社会上和文学史上应派到的位子韩斯迦夫人也予以时刻考虑。二十多年来，她不断地受到苦恼的侵扰，原因是她害怕受到巴尔扎克和她的关系的灾害。在他的事业中的所有光荣地位她都要保持，却又不想付出自己真正的热忱。她对她一丝一毫贞洁的名誉都不准备污辱，对她的丈夫和几百万家财也不准备放弃。她不愿贸然和一个社会地位比她低的男人结婚，虽然那时她已有了自由。她那慎重的计划和精细的打算是很明显的，她在那次日内瓦的唯一一次投降给别人的印象是并非经过精密的考虑而毫不自私地献身给她所爱的男人，而是因为顷刻之间的好奇而服从的。

和这种不忠诚的表现，由妒忌而生的挑疵，清冷的打算相比，伯爵夫人虽看来不道德但却显得非常仁慈，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真正女人。一旦她决定献身给巴尔扎克，她对此就不会有丝毫犹豫。在《幽谷百合》中我们可以看到底全巴黎对她的事情知道不知道，对她来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在音乐厅的包厢里她和他一块出现，在巴尔扎克躲藏债权人时，她就会把他

藏在家中。他在乡村里建了一所小房子时，她就在附近也盖了一间。她对她的丈夫从不冒充说她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她不能忍受她的丈夫的妒忌，她对巴尔扎克也不用狭窄的妒忌和无聊的侦察来苦恼他。她放任他和别的女人鬼混，笑着给他自由。因为她从未对他撒过谎，她不强制他对他胡说，就像给维埃曹尼亚去信时所常犯的毛病似的，从财富上说，她还没有德·韩斯迦夫妇的十分之一，但是巴尔扎克十来次经济上的困难她都用各种方式进行了帮助。在她和他的关系里施展出勇敢的诚实和自由并且常常拿出一种真朋友的态度来。这种行为，是只有这样的女人：只听从自己意念的命令而拒绝服从社会上和道德的规范，才能有的行为。

当然，她的这种不顾大众伦理的态度使得德·韩斯迦夫人对巴尔扎克和伯爵夫人的关系知晓得一清二楚了。他在《幽谷百合》中描写的杜德利贵人的动人的爱情幕景，是他在第一次心神颠倒的会见伯爵夫人时而生的灵感下写成的，这个事实就算他能成功地否认，他也不能阻止一些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的给德·韩斯迦夫人的报告，这大都是由她在巴黎的俄罗斯和波兰的朋友们报告的。遥远的乌克兰像炮弹似的飞来一封封“充满怀疑和责难的信”。巴尔扎克抱定心思，坚决说这只是一般朋友的友谊。为了他的忠实更使韩斯迦夫人相信，他就对“这个安慰了我许多悲愁的朋友”巧妙地歌咏，从而对她誓言旦旦说：

“你所指的维斯冈地夫人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喜欢的女人，而且具有仁慈的爱心。她既静雅，又美丽，并且能够帮我解决生活的难题。她很大方，坚不可摇，不可能有人改变她的思想和她的好恶。她的风度很为自信。她的家境并非十分富裕，说得准确一点，他们那光荣的家姓都和她与伯爵的财产都不能予以配合……”

但是，他结束这颂歌的时候用了一个悲痛的叹息：“但很为遗憾，我见到她的时候不经常。”

对她是不是相信他，也许他心下里并不十分在乎，因为他的这颗“北极星”的光亮和他已日渐深远而发出灰色。他所期待的结果也不出现，德·韩斯迦先生的健康更是出奇地顽强了。而伯爵夫人则是近水楼台，既漂亮，又年青，且性感。他可以随时在想看她的时候看到她，他的心灵的平静也从未因她而搅扰。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都和她在一起，不过经常编一些善意的谎言给德·韩斯迦夫人，让她保留在那小箱子里，让后世的人去慢慢欢乐欣赏。

当巴尔扎克的导师和顾问，这是德·韩斯迦夫人的野心，作为一个女人，她比任何人都了解他，在文学判断力上，她也要比伯爵夫人高明。但是对于巴尔扎克的人性的需要，伯爵夫人却了解得更清楚。他是怎样疲劳、烦恼，他需要另一种形式的娱乐来放松，这些伯爵夫人都很明白。她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她替他安排好让他去意大利访问，这可以使他恢复创造能力。这件事情是他在突然中断他和德·葛丝特丽夫人一同开始旅行之后随时随刻都在渴望的，他没有花费一文钱，伯爵夫人为他筹划了一切。

桂都邦尼一维斯冈地伯爵以前承继了他母亲的一笔遗金，因为他对事务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他没有能够收集，实际上他都把恢复这一笔钱的希望放弃了。伯爵夫人建议他委任他们的朋友巴尔扎克为代理人，让巴尔扎克去意大利去一趟，巴尔扎克的毅力和办事能力伯爵夫人是相信的。性情和善纯朴的伯爵答应了，他的法律公证人便拟了一份委任状，所以在七月间巴尔扎克动身去了他那久已梦想的向往的“爱情的国土”里，无疑他口袋里装着

旅行的费用。

伯爵夫人表露心肠的方式并非这唯一的。她没有陪巴尔扎克去意大利的原因我们可以了解清楚，因为她刚于一个月前生了一个孩子，可能这个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然而，一个矮个子黑头发的漂亮小伙子马西尔是巴尔扎克的朋友们所全然不知的，他陪着巴尔扎克去南征伯爵夫人却不表示反对。也许布伊松裁缝师是唯一知道这个年青小伙子的来历的。在这几天以前，巴尔扎克请布伊松给他制一套男人的衣服，一件灰色的大礼服。同时他带来一个年青的黑发女郎，这套大衣服就是为这年青女郎穿的，女郎穿上新人后很像一位俊俏的小伙子，虽然她女性的曲线还是有尖锐的眼睛能够发现的。巴尔扎克到“爱情的国土”其实是带着他的风流的爱一同旅行的，不是去寻找那异土的风流韵事。

巴尔扎克得到情人的情形大致是相同的。他和这个新的情妇第一次见面也同由于他跟读者之间的通信。他和大部分女朋友结交也有一个相同之处：这位情妇已经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很是随和。马尔布提·卡洛琳夫人对呆在李莫慈当一个高等法官的妻子有点厌烦，她给巴尔扎克写信也正如她跟其他失望的法兰西妻子一样。这是在一八三三年，这时，他正为被误解的女人的权利而进行辩解，忙碌之中没有顾得给她回信。之后，她又到处寻找替代人，在作家的名单上依照字母的顺序找，在这名单上，Be（柏）是紧接着Ba（巴）的，她于是就给圣提一柏夫射出了丘比特之箭，但是很奇怪，这和德·葛丝特丽夫人的行为一模一样。相对来说，圣提一柏夫是较为容易接近的。他盛情邀请她到巴黎来，她接受了邀请。不过她这年青女郎的热火激情并不能从那个高傲的圣提一柏夫那里得到任何欢乐与快感，虽然他曾经为她的美焕而创作了十四行的赞美诗，最后，她又一次把自己的幸运之箭投向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自从在德·韩斯迪夫人那里取得甜头后，他就开始对比自己年青的女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对这个强求的波提发尔的妻子，并不像约瑟似的拒绝他的进攻。在战争街的化装室中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持续了三天之久，他觉得他的味道和胃口得到极大的满足，他最后都向她建议一块儿到仕尔兰去旅行。对于这个提议，马尔布提夫人因为种种的原因不能够听从这个提议，但是自沙妻回来之后，旅行的事他又重新提出，不过这一次却是去意大利而且利用另一个情妇的钱！对于假扮一个男仆陪同巴尔扎克旅行她非常赞可，因为去那个浪漫的爱情的国土旅行也应该有一个浪漫的故事来衬托。

这个女扮男装的喜剧被巴尔扎克的一个朋友在偶然中看到了。在卡西尼街送行时，桑都·儒儿看到一个剪着短发的年青女郎匆忙赶来，她对这地势非常熟识，很急忙跑上了直通巴尔扎克卧房的楼梯。他对他朋友的新的收获还在心里暗笑，在几分钟后，在卧室里却出现了一位漂亮的青年男子，穿着一件灰色大礼服，拿着一条马鞭和一只旅行箱。箱中装的实际是衬衣和妇女用的衣服，这足够一星期用的。从同一的楼梯上这个男子把箱子拿了下来，放在邮年中，这已等待了好久。巴尔扎克随这青年下来并做在这青年的身边，带着一种为自己成功的改装而显出的快乐神色，一分种之后，在向意大利方向的路上一辆邮车就开始飞奔了。

刚开始的旅途是快活的，而且旅途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这和巴尔扎克的期待正好吻合。年青马西尔那宽大的礼服和结实的大裤子，并没有骗过大沙特勒斯修道院的僧侣们，他们拒绝他俩在修道院中居留。而马西尔，

这位美女刚在附近的溪流中淋浴来报复这些僧侣们。这种快乐的机会被《笑林》的作者有力地抓住了。驾着车快速而又危险地渡过了先尼斯山之历，他们就到达了杜灵。

到达这里后，不用再假扮的时刻照我们看来应该到来了，就算住在一间没人看见不会引人注目的小旅馆里也应是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所能设想的。但是巴尔扎克却是喜欢同平常唱反调。他驱车到了一间欧罗巴旅馆来，这是城中王宫对面的最大的客店，他租了两间接连在一起的房间为他和他的旅伴。著名作家到来的消息，第二天《毕埃芒新闻》新披露了，当然，全杜灵的社会名流都极为盼望见到那著名的手杖，因为在欧洲，他的小说和他的手杖是同样齐名的。许多仆人都送来他们那些名门望族的请帖，每个人都想见到他，几个好心的绅士还设法为他准备了几匹宫廷用的马。

毕埃芒贵旅社会的邀请，巴尔扎克自是不胜喜悦的接受。但是他心中那善作恶作剧的精灵总是向他吹风，让他把他那女扮男装的旅伴也带去。这便引起了新的棘手问题，因为外面已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马西尔就像梅伊柏尔的歌剧《新剧徒》里的马西尔一样其实是一个女人，没有人能想到巴尔扎克把一个无名的床头情妇带到毕埃芒贵族的名流聚会中来，这是极为粗鲁无礼的，不久各处就有一个怪诞的谣言在流传了。人家都知道巴尔扎克的女同工桑德·乔治是一个短头发女人，并且喜欢穿裤子和吸雪茄，更换情人比更换手帕还要频繁。最近她曾经和穆塞·阿尔弗勒瘟一同来了意大利，所以，这一次她极有可能和巴尔扎克同行。马尔布提夫人很可怜，忽然被男男女女们从四面八门包围起来，他们都热切希望与她谈论文学，听她那幽默的话语，并且想得到桑德·乔治的签名，如果可能的话。

巴尔扎克是素愿搞恶作剧的，但对这种情形也感到有些不好对付了。他想籍他的智慧从中摆脱出来。他把这男装美女的真相告诉了德·圣杜马斯·菲力士侯爵，但却为他的行为杜撰了一个道德的动机来掩饰：

“她信任我，因为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已溶于神圣的爱情当中了，她对此深为了解，我已不知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其他女人存在。”

无论说什么，他懂得应该结束恶作剧了，以防止它发展为一个大的笑料。在维斯冈地家的事务成功的办好之后，他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只好离开杜灵，动身回到巴黎。

日内瓦是最后一次让他们歇了不止一夜的地方，这是一个具有幕景意义的城市，在这里，他的生活史上发生过两次决定性的事件。就在这城里，他受到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最后的回绝，把德·韩斯迦夫人最后的犹豫反抗摆平了。现在他又同马尔布提夫人回来了。如果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情夫我们可以相信的话，在这里，据说他不干别的事，只是任神思追思甜蜜的往事，含泪思念远方天涯之外的爱人。事实上，他过得非常有趣，而不是那样浪漫的如其所描绘般。他异样焦争地催促他的马车夫快马加鞭，说是越早到达目的地越好，其实正好相反，在日内瓦到巴黎之间有旅途中花费了数十天的时间，在不同的市镇之间，他每夜都要留下住宿。这几夜的时间我们有什么理由假想他在苦苦思念那远不可及的“北极星”。

在八月二十一日到了巴黎，几个星期的异国销魂已成过眼烟云。在他公寓的门上贴着一些由执达吏送来的通知书，没有清理的帐单堆满了桌子。在他呆在家中不到一个钟头，他的出版家魏尔特破产的消息就传来了。这些并没有使他产生惊慌。在这从残酷的失败经验中得来的认识使他更加确信他每

一口夸张骄傲的口气都会增加对他命运的压迫。他还从那一堆信中找到一封报丧信。德·柏尔尼·阿力山大来信说他母亲在七月二十七日去世。巴尔扎克受到了很大打击，这我们可从巴尔扎克自己的信件里了解到。在这几个月来，他都在为她而担忧，在到意大利之前，他还去看望了她一次，是最后的一次，他已感觉到她连谢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因为在《幽谷百合》中他把她描写为德·莫尔梭夫夫人。但是，他总是应该感到惭愧和羞辱的，因为在她在僵卧冰床时他却和马尔布提·卡洛琳这个毫无价值的女子在意大利过着放荡的生活。也许在这个女人，一个第一次给予他爱情、比他生命中任何人都真心爱他的女人，埋入坟墓之时，他还谈笑于杜灵的贵族大客厅里。一两天之后，他就离开了巴黎去了她的坟墓看望她。他的一段生活时代已结束了，他有一种深刻的直觉，他的青年是时代已经随德·柏尔尼·罗尔而埋入坟墓了。

第三节 分解金银的法术

一八三六和一八三七两年对巴尔扎克来说很是紧迫；悲剧、惨剧是不断地接踵而来。就拿最普通的意外事物而论——如果用普通的标准来判断巴尔扎克的生活的话——那么他最后生活的转折点应是一八三六年。在前一年的夏天，他的债务已由伯爵夫人为他清理了，他也通过《毕骆都·恺撒》赚取了比以往任何都巨大的数目。在以前还没有所有税之说，而法郎也是值钱的多，只是依据册数抽取的两万法郎的版税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读者对他作品的欣赏，再加上他那地无比的写作能力和无穷的材料，每年弄到六万到十万法郎是不成什么问题。对他的债务他可以利用两年时间还清，而且能够保证生活的舒服水平，也不必过分的用功。现在，一年比一年畅销的他的小说，以及准备全套出书的计划和他在全大陆声名的扩大，他所处的环境也是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他把混乱的幸运建立在有秩序的基础之上。但是，在天空出现晴阳时，他那久已压抑的放纵的天性又开始复活，而且召来了新的白云。在他驶艇驶到看见港口时，他总是又转向驶回风暴的转轮中。一八三六年，他的事情正处在顺利的时候，他的秩序又因两个极端蠢笨的念头而混乱起来。

巴尔扎克的蠢笨总是这种样子，在开始都是有道理的。他的各种投机都是建立在完美的观察之上的，这些都是通过正确的计算的。正如以后通过他的继承人证明了，从他的印刷所和他的铸字所中都可能为他产生价值。有了他这样全能的编辑部，他的巴黎时报也应该成为法兰西的领导报刊。他的急躁的性格正是破坏他的企业、破坏他的事业的元凶，他的这种性格使他一开始便展开大规模的行动，这便远远超出了他可能应付的程度，从而使他的支入总是不成比例。他的这种原始的天性和他那原始的天才作家能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应用在需要持之以恒到最微小的范围时却得到了不令人满意的效果。

巴尔扎克从艺术家的天然欲望出发的头一件计划的事情便是找一块可以清静地工作的地方。这个诱惑一切创造家的幻想也一直在勾引巴尔扎克，他幻想在那碧绿的田野中间盖上一间小草屋，好像福尔泰尔的德里斯别墅，卢梭的孟莫莲西别墅或者柏特拉拉克的芜克鲁斯别墅，使他清静的精神工作不被外人来扰乱。巴黎在他刚开始发展的那几年的确是一个好的背景，只要他能像隐士一样生活在那里，观察巴黎的活动，使它保持不被别人所窥视的情景。而现在在别人眼里他又成了好奇的观察对象，现在新闻报纸上到处都有他的那些被卖掉的私生活的一切细节，他的门铃也不断被新闻记者和债权人的执达吏拉响，他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他们损害了他的集中的艺术能力。

但是，为什么他要继续留在巴黎呢？这也不需要他到编辑和出版家的办公室里去谈判了，为什么巴尔扎克不去那远离追踪的山村，在那里他照样可以控制舆论和读者。无论如何，他对和马尔冈一家人，或卡罗夫妇，或其他客气的朋友们一起过夏天的兴趣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在巴尔扎克三十几岁时，有一个小小的“陋室”已是他的一个愿望，就像一个小农民或地方一样来享受一样。几年以前，他曾经在杜尔兰设置了个名叫葛勒那地埃的一个小房子，但是对必要的款项他一直没有凑齐。他决定要节省一下生活——他开头都是为了要缩小他的预算，但鲁莽的冒险总不如他所愿——他把占有两所房子的思想放弃了。巴黎为什么还要保留一个么富呢？既然已在乡村有了房子。

在都城近郊一个美丽的山村中找一所美丽的小屋，让他可以永远的居住，免得住在巴黎使他耗费更多的精力，而且可以随时到城中去办事或是享乐，这不是更好的最便宜的方法吗？

这上合宜的地点他用不着到更远的地方去寻觅。他在以前的生活史中在他眼睛中一闪而过的那些每一个山岭和房屋对像他这样强记的人主尖该是不会立刻消失的。无数次去拜访凡尔赛的旅行中，最初是拜昭德·阿布朗台公爵夫人，后来是去访问伯爵夫人，他在记忆中已深深印下了施维尔溪谷和达芜雷镇的印记，他也是希望再到这里寻找一个“瑞士山谷的一切新鲜空气，景色、香气和绿草。”如果他能离开他疲劳的工作，立身于施维尔山巅，奔目于广阔的山景和如带如玉的赛纳河，周围是迷人的葡萄田，花圃和田野，却又和巴黎如此接近，他发誓要征服的巴黎如此之近，这是何等的美妙啊！在这里他可以盖上一座小屋，不必太奢华，一所不必花费太多像手套一样合他心愿的小屋，一所他可以一劳永逸地躲避那交房租的忧愁而安心地置于其中写作的房屋。

依据他的习惯，他作出了迅速的决定，为这所“简陋的小屋”开始在“遥远的山村”进行搜寻，这是依据他对韩斯迦夫人的话说的。一八三七年九月，他跟一对叫发勒的夫妇签订契约，他成为了九千方尺土地和房舍的主人，这花掉了他大约四千五百法郎。对于巴尔扎克来说，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投资，从事务的角度上说，这也是一笔台算的谨慎买卖。四千五百法郎对于一个每年可赚五万到八万法郎的人来说不算什么，而且这样大方的拥有了一块合宜的土地，这是他能够应付的一件小事。他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而他三四个星期的工作就可以赚回这笔费用。

但是，巴尔扎克好像受了一种强制的赌徒一样用双倍或四倍的压宝的力量的催促，这在他一切的事务尤其在金钱事物上一样。这一块土地他才刚刚拥有，他又从天性中萌发了一种扩大的欲望。不知从何处他打听到，他小屋下面要修筑一个火车小站，一条到凡尔赛的铁路要经过施维尔他的小地产，他估计不久他周围的田野要涨价，他有一种正确的直觉。现在要做的事情显然是买下周围的土地，但是他那急躁的天性又使他失去分寸。并不太聪明的农民和地主不久就发现可以利用他的这种急躁来抬高他们土地的卖价。他把一个清静的小屋的梦想已抛开，在他心灵中又呈现出了占有一个果园、许多森林以及一个美丽的花园的蓝图。他在几星期之内差不多成了四万方尺土地的主人，但却花费了一万八千法郎，他不去请细心的专家来观察土地，自己甚至都不去仔细考察。

开销从来不被巴尔扎克看做是实际的金钱花费，只要这种开销还是以债务的方式存在。他为他当了地主而欢欣庆祝，他在建造房屋之前也从未考虑过怎样去付钱。无论如何，他对他那一种可以点石为金的笔，可以化白纸为法郎钞票的笔具有相当的自信。何况他想还要在新土地上栽种果树，这也会为他带来财富。如果他种菠萝蜜呢？在法兰西，菠萝蜜都是从远方运入，而从未有人想过在暖室中培植。他告诉他的朋友高提埃说，如果开头顺利的话，他就可以赚取十万法郎的利润，这三倍于他的房价。而实际上他又不会花费一分钱，他这辉煌的冒险事业已有被说服的维斯冈地夫妇来参加了。他在建造新房屋时，他们就在布置以前的小屋做为自己留居时用，而且还要付给一笔合适的房租，所以，他是没有什么可以发愁的。

对于此，巴尔扎克没什么可以担忧的，他所急的是他要立刻搬入刚刚建

起来的新房屋。在这里已出现一大批工人，泥水匠、细木工、本匠、园丁、油漆匠和锁匠都已开始工作。一道支持房基的墙已经匆匆忙忙间盖了起来，在上面建立小屋的土地也已挖掘了，石子路也铺好了，四十棵苹果树和八十棵梨树已经种下去，搭起棚架，等着让其他的果木去盘旋；一夜工夫，“遥远的山村”的附近就在吵闹声中改变了，这是巴尔扎克需要拿来刺激心灵和感情的。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他都喘着气爬上小山去监视他们工作。在一八三八年春天一定要一切都竣工，无论这花费多少金钱。他都希望果树不必等到秋天而现在就要为他结实，如果他有这种改变气候的能力的话。

工程是一星期。一星期的继续，一直到了寒冬。花费在随着墙的增高而增多。巴尔扎克已开始有了心慌。他的《毕骆部·悄撒》的版税已随了新房而埋入土中，出版家已被他吸干了，他从他们那里预支稿酬的希望已经破灭，他的工作也因急干的搬入新居而不能够继续下去了。新的热情已经是成为他；日的热情而准备的力量。这是他立自己曾经立下的格言。和他在印刷所方面的冒险一样，超出力量的事业往往是从小规模的企业开始的。和他从前得到的一个铸字所一样，他总是拿一个更大的疯狂去战胜另一个。所以他又想出了一个更新的投机事来，以便把他从电土地投机的危机中解救出来，要想把另外一笔十万法郎的债务偿还，只能够依靠一步登天来获得庞大的数目来补偿，不可能靠节省或文学上的工作。这“突如其来的富有”他总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来。巴尔扎克也认为他已找到了办法。他突然失踪了，枕在树木开始萌芽之前。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只知道他谈自己的空泛计划时说：“我司”以拿到自由，不会再忧烦，不必为我的物质生活而操心。我就要成为大富翁了！”

这故事实在是令人难人相信的，他能由一个负债累累的穷文人“一步登天”而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如果在一部小说中插入这样的一段故事，一定会被人批评为一个完全缺乏心理依据的恶劣的创作。这种疯狂是巴尔扎克式的荒诞。而且如果没有详细的文献的话，没有一个传记作家会把他当作一个反常的天才实例进行描述。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现象，我们倒可以在巴尔扎克的史迹中随时找到，而且总是奇怪地重复着，一只能够正确探视自创的虚构世界的一切情象的灵魂的大脑在现实的世界中却总是运用得这样的天真，这样的幼稚。他在描写一个葛兰德或一个儒僧庄的时候，他心中那逻辑观念和心理灼见总是那样惊人，但是愚笨的骗子却能很容易骗过他，他打开钱包的诱惑度比任何一个彩票都要低。他的小说中那些控制情景的方法他却拒绝从经验中学到并运用到生活中去。巴尔扎克这一次猎取宝藏的目的和性质再也没有比同一脑袋中以前的动机更加明白的暴露出来。

他拿这课题作为他的材料，早在一八三六年夏天在他一部最为美焕的短篇小说《卡因·发西诺》中就用过。在这块文学的钻石上，他描写了他在结婚的典礼上遇到三个音乐家，而最令他感动的是一个吹奏铜箫的人；这个音乐家是个年逾八十的老人，双目的人明，但脑筋却极为敏锐，这个老年人一定是某个神秘命运的牺牲品，他的直党的感觉已经告诉他了。他和这个吹铜箫的老人在谈话的时候，由于几杯葡萄酒的激动，这个老年人告诉他他是卡因王室最后的子孙，他曾经当过威尼斯上议院议员，也曾把好几个年头消磨在监狱之中。他为了越狱而挖掘狱墙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老罗马税务官的坟墓，里面盛满了古罗马共和国时代的黄金和白银。这个神秘的古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由于常年的监禁，他的双目开始失明，他的发现他也不能利

用了。但是正确的地点他还记得，他说如果有人和他一块去威尼斯的话，他们两个人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用一只手抓住巴尔扎克，恳求他到意大利去。

对这个老年人，人们都是笑他，其他的音乐家早已听过这个故事而没有人相信。巴尔扎克也无意花钱陪卡西·发西诺去威尼斯，况且宝藏真吗？他把这轻浮的建议一口回绝，结果老年人死在盲人院中，并没有去寻找他的遗赠。在这篇虚构的故事里，巴尔扎克把自己描写成一个不比其他更缺少理性与感觉，但是不到一年，当他把这虚构的故事真正变为现实时，他的行动却是如何的不符。

在一八三七年意大利之行归来途中，巴尔扎克因传染病被隔离在热那亚的医院中，被隔离是一桩很无聊烦燥的事情。就像是坐在没有墙的监狱中似的。被隔离的人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他不能够工作，也不能够随便走动，唯一可能的就是和那些萍水相逢的相同遭室的朋友进行聊天。借之这个机缘，巴尔扎克认识的朋友之中有一个叫柏西·几乌斯比的商人。柏西在无意中透露出他可以在本乡中发掘出来金库，他并没有欺骗巴尔扎克或是勾引巴尔扎克去冒险的丝毫不良用意。例如，因为一般认为罗马人已经尽量开采过了所以萨丁尼亚的老银矿已经废弃了。实际上，古罗马人落后的生产技术只是从铅矿中淘出少量的白银，那些被认为已完全没有价值的留下来的大堆渣滓，一般人想像不到其实含有高度百分比的白银，如果用现代的方法就可以提炼出来。任何一个稍加投资去开采这个银矿的人一定会成为百万富翁。

这个可敬的柏西先生就这样的与坐在桌边的陌生朋友闲谈着，而且他说的话是真切的。今天的冶金家一定能够借助于先进技术从混合的矿砂中淘出比前几世纪的人更高百分比的贵重矿物，现在人们可以有利地开采一千多年前被矿主们遗弃的许多矿山。不过柏西先生善意的心灵并不知道他已向一个火药库投下了一个火种。对于事物的弹性的形状巴尔扎克有能力进行观察，他已看到从灰色的渣滓中银灿灿的银子已从中冒出来，堆成一座雪亮的银山，这种思想陶醉了他，就像一杯白兰地灌进一个小孩肚中似的。他催促对此确信无疑的柏西立刻请化学专家去查验这些渣滓。招募一些必要的资本给这有利的投资也没多大困难，只要大部分的股票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就能变得富有，想像不到的富有。但是可敬的柏西先生看到这位巴黎绅士对此却出奇的热情而显得目瞪口呆并且渐渐的缩了回去，但是他也答应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以后给巴尔扎克送一些矿物的标本去。

从这时候，一个幻觉总是环绕在巴尔扎克的周围，他自信拯救他的是萨丁尼亚的银矿，这不但可以付清他的新房子约尔地的费用，而且可以清理掉他还没有付清的费用，最终变为一个自由的人。在他的虚构小说《卡因·发西诺》中，他曾经把老年人和他讲的那个隐蔽的宝库的故事看作是幼稚的愚蠢，现在同样的念头却在欺骗他。在他赶快写出最后几页《毕路都·恺撒》，这用不了多长时间，而柏西先生也及时给他送来那矿砂标本的时候，他就可以为招募资本而进行全力奔走了，而且还要为他的伟大的事业招一批专门的技术人员。

但是接下来又过去了好几星期，几个月也这样过去了。《毕路都·恺撒》早已脱稿，但是矿砂的标本柏西先生还是没按允许的时间送来。巴尔扎克又渐渐有了不安。因为他带有忠实的热情，他不应当叫那个意大利的傻瓜去研

究那个荒芜在萨丁尼亚地下的财富，而应该自己负责，现在这个狡猾的光棍一定在独自享用白花花的银元而把他排挤于外了。他现在只能做一桩事了，他一定要令他不在意时抓住他，进行实地考察。但是几百法郎的开办费、旅行的费用是他必需的，但现在却没有着落，他实在不知道这笔钱应该到哪里去弄。他的朋友罗特弃德一家人或其他的银行家他都应该去寻求帮助，请求他们核准。但是天真的他，那样愚蠢地于自己的事情的他，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他，却相信柏西先生忠实地把这样一个大秘密只告诉给他一个人，他不再想像柏西先生会告诉第三个人，任何一个有钱的资本家都会比他先行一步，正如他在《幻灭》里描写的施且尔·大卫的廉价制纸的方法被人偷走了一样。

他可以信托的唯一一人便是卡罗司令官，因为他相信他是一个大化学家，这个老司令官经常拿小试验来消遣自娱，他一定会有“一种花费金钱很少的魔术，可以把金银从其他混合的元素里分解出来。”

这个计划也得到了善良的司令官的认同，但是他并不付诸行动，不想陪巴尔扎克到萨丁尼亚去，也不想投资。巴尔扎克只好从母亲那里借来一些路费，因为她总是随时准备投机而准备着一些贮蓄。别外拿克瓜尔大夫和他的裁缝为他凑合了一部分路费。一八三八年三月中旬，他动身前往萨丁尼亚去占领这些银矿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这虚无的旅行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令人可笑。就算这个计划的成功有希望——其实巴尔扎克没有在直觉上犯错——凭两三天的访问怎么能断定这些老工程到底能否产生利润呢？况且他又是一个平生没有见过矿山的作家。任何的仪器他也没有带，就是带了他也不知该如何应用。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和真正的专家讨论过，他的意大利语也不能使别人真正了解他的用意。况且他也不愿意把秘密透泄给任何一个人。他没有带任何介绍信，他所需要的消息也没有金钱去获得，请求开矿的权利他也不知向哪个机关申请，就是他知道，对于手续上的一些事务他也不了解。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资本。是的，他说：“一块原料标本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了又得到哪里去寻找这块原料呢？到料是什么原料呢？是现在长满草木的渣滓堆呢？还是久被荒废的矿砂呢？这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了解，而且还是个有经验的矿务工程师。巴尔扎克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只有他的直觉。

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个事业巴尔扎克总不能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而且时间就是他的金钱，因为没有金钱，时间才显得更为宝贵，所以他赶快出发。他按照经常的习惯出发，在巴黎和马赛的车里，他五天五夜没有睡觉。他每天生活维持的物品只是十苏钱的牛奶，因为他带的金钱有限。不过他根本没有急切的必要，这从许多困难中可以感觉到。在马赛他打听最近到萨丁尼亚的船没有。到萨丁尼亚的唯一办法是绕道科西嘉。在那里也是他能找到一条小船把他渡过海峡。这是他希望的第一个打击。他心中的热情也就减了一半到了土伦去。临行之前，他带着悲痛语气写信给珠儿玛说：

“几天之内，我将可怜地变为一个最不幸的幻想。这是经常的事情。一个人在快要到达了目的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已开始丧失了。”

在海里一阵狂涛颠浪的行驶之后，他到达阿查齐乌，在这之前受尽了晕船的苦痛。接着，新的考验又在威胁他的耐性。他被迫与外界断绝五天联系，因为听说在马赛发现了虎列拉，这五天之后，他寻找一个等着驶向萨丁尼亚去的船夫更加花费时间了。他心中充满了焦急和烦闷，不可能在那焦急的等待之中工作，于是他便勉强围着阿查齐乌游历一番，探视了拿破仑的故乡，

同时不断咒骂引诱他来进行这蠢笨可爱的旅行的柏西·几乌斯比。最后，他竟然能够在四月二日乘上一艘采珊瑚的渔夫的小船，横渡了海峡，他们没有别的食粮，除了他们在途中所捕捉到的鱼之外。另外一次的试验又靠近了他的耐性，在阿尔几埃罗，又是五天的隔离把他放在帆钩上。最后，在四月十二日，他所希望检拾的几百万财富的岛岸终于踏在他的脚下了。但是他却没有瞥见一粒银砂，这已经一个多月的光阴过去了。

但是银矿呢？它们都远在二十里之外，而自从罗马时代之后，这里一切的路都废掉了。萨丁尼亚既没有公路，也没有大马车。从巴尔扎克所描绘的看，波匿尼亚的土人或匈奴人或许也比萨丁尼亚的居民文明。人民都是衣衫褴褛的半裸体行走，房间中没有火炉，也没有饭馆、客店。几年来已没有骑过马而肥胖的身躯难以坐稳马鞍的巴尔扎克也不得不骑马，一直到达了奴拉，巴尔扎克才从那摆动的马鞍上下来。在奴拉，他最后的希望也被事突击得粉碎。他已来到的太晚，已经不再是银矿可以不可以生利的问题了。巴尔扎克的热情可能感动了柏西·几乌斯比，他利用和巴尔扎克萍水相逢后的十八个月光景达到了他的目的。当然他不可能写一部不朽的小说，也没有盖一所房屋，栽上菠萝蜜，但是他却活动了所有的王权，并最终拿到了矿山开采权。巴尔扎克的旅行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正如拿破仑在遭到滑铁卢败绩之后，他唯一的欲望便是立刻回到巴黎，用尽可能最快的速度回到他的“可爱的地狱”里去。但是，他身边带的钱已不够付路费了，他只好先去热内亚，然后又到了米兰，因为他可以在那里借到款项回到巴黎但用的却是维斯冈地夫妇的含义。这实在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对于他这次米兰的逗留，没有盛大的欢迎，也没有去拜访贵族朋友们。这个“永远的破产家”垂头丧气而没有损毁毅力就在六月里回到了巴黎。

他已损失了三个月的帐薄上的时间，而为了获得更多金钱而丧失了一笔不小的开销。他已经为了一个无所谓的谈话冒了一次险，这是拿他的健康来作赌注，使他的神经紧张了一次。说起来这可真是一个悲痛的教训。和他以前的所有的计划一样，他最初的计算都是正确的，他的直觉也是无误的，但最后呢，总是事与愿违。萨丁尼亚的银矿为别的人带来了财富，二三十年之间，这些银矿的开采工作都很顺利，渐渐也产生了更多的利润。一八五一年用六百一十六个工人工作，九年之后雇用了两千零三十八个人，再九年后雇用了九千一百七十一个人，巴尔扎克所梦想的几百万财富正被世人共知的银矿公司飞速地积蓄起来。他的顶见总是对的，但这是能够帮助他去艺术创造，如果他跨入不属于他的地盘，便会引火烧身。他的幻想和天才加上创作把文学作品挤出来时，不但给他带来金钱的报酬和不朽的名声。但他若想把幻想化为金钱时，他得到的只能是又增加一笔债务，得更加倍地工作。

在离开巴黎之前，他一句预言曾留给珠儿玛：“对旅行我并不惧怕，我只对回来时计划失败的狼狈情形而惧怕。”

他知道他会永远有没有付清的帐目，逼人的官司，无休止的工作，这和他每次回到家中时的情形一样，这一次是更加的艰难。鼓励他面对这些黑暗的乌云的只有一件事——工作，他希望能躲在新房子中把在萨丁尼亚之旅损失的时间找回来。但是又是一个失望，这里一切都没有准备好。地面还是“像一双手掌似的荒芜”，房子还没有加上顶盖，在约尔地他也不能坐下来工作，因为那些建筑师、泥水匠和挖掘工人都在取笑他的茶。他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维持像他自己的速度这一点又一次忘记了，而又陷入了急躁，开始督促

他们，他立刻于不多久之后就搬了进去，而这时最后一块板还没有铺上屋顶。他丝毫不顾医生的劝告，医生说他的健康会受到没有晒干的房子的极大危害。战争街的家具还没有移来，整天充耳的是打铁和锯木的声音，因为工人们正在修改旧房子，为了让伯爵夫人居住。而且还在修铺石子路，洒上柏油，而围墙也危促间盖起，这是极为危险的。但是在这一切的混乱之中，巴尔扎克却因住在属于自己地产的新房子中而感到快乐，他描写新居用了一种不成熟的热情：

“我的房子座落在圣克鲁山岭的山坡上，在这山岭的南边是御花园的半路。向西眺望，可以望到整个达芜雷维尔。向南我可以走到达芜雷维尔公路，它沿着凡尔赛御花园所接连的山岭向南伸展。临东眺远，我的眼睛可以漫游于施维尔以外的地方，看到一片广阔的地平线，巴黎就在它的背后。巴黎的烟雾蒙在著名的麦当山坡和美景山坡。红山的平原和自奥黎昂通到社尔的公路在远处里平铺着。这是一块无以伦比稀世的美景，富有诱惑性！巴黎通往凡尔赛的铁路的车站接近我的地产，铁路的堤轨在达芜雷维尔山谷里伸展，使我的视线不受限制。所以，我可以花上十苏钱花十分钟从约尔地旅行到巴黎市中心的马德莲！从战争街或是查育或卡西尼街到那里我至少需要四十苏钱和一个钟头的时间。如果把这些有利的条件算在帐上的话，我购买约尔地是个愚笨的举动的说法，我估计也就不会有了，虽然这地产的价钱非常高。整个地产有一亩大小，带有一条向南伸展的一百五十尺见方的小土台，这地产四面用围墙护起来。现在树木还没有做，但是秋天的时期，我会装点上花草、灌木和香气，使这个世界小角落变成真正的伊甸园。在巴黎或巴黎的近郊，一切东西都是为了生财而有的，所以，我要买上二十年老的木兰花，十六年老的菩提树，十二年老的白杨、赤杨等等。这些都要用土壤包起来移植。我还要种葡萄树，可以用篮子把它们带来，今年就可以生产葡萄。是的，文化的确是个奇怪的物件！今日的这土地和平常一样荒芜，但是到了五月，这里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我还必须建造养鸡场、果子园，这要在附近再找两亩地。我希望在今年冬天赚到三万法郎，这就够我们开销了。”

“这房屋又狭又窄，四层高、每层都有一间大房子，像鹦鹉的鸟宠似的。地面一层有我的饭厅和客厅，第二层是我的卧房和我的更衣室，第三层是我的书房，这封信就是午夜时候我在这书房里写给你的。我从一层走到另一层利用一条扶梯似的楼梯。房子四周有一条可供人散步的走廊，可以通到第二层楼，垫砖柱来支撑。全体上看，这小楼有一种意大利的风味，漆着土砖的颜色，凿刻的石头每个角落里一块，红色的是含有楼梯井孔的附加部分。我刚刚可以适应这房屋。一个外舍在后部朝向圣克鲁公园那一边的六十步土地，其中第二层有厨房、下房、仓库等，还有马厩、车房、堆放马具的房间、浴室、贮水室等。正房的第二层楼有一个大寓所，可以出租，如果必要的话。第三层楼有几间仆人们的卧室和一间招待朋友的客房。我有一个和著名的达芜雪喷泉一样好的喷水泉，因为它也是从地下水池中引来的泉水。我的地产的周围是散步场地。现在房间中还没有家俱，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慢慢从巴黎搬来……我一直要等到发了财才能离开这里。它很合乎我的脾胃，我已感觉到，我相信我可以隐退而有了足够的金钱时，我就可以安居在这里结束我的残年，然后我会不声不响地与我的一切热望和野心的计划告别。”

对他的新居巴尔扎克你做了这样的描写。但对此，他朋友和客人们却有不同的描述，我们看得出他们在那些报告里没有例外的觉得难于抑制发笑的

欲望。就是最知心的朋友或对他有好感的人也难忍完全严肃的持久，在巴尔扎克用他惯有的动人的词藻来描绘他的伟大的产业时，这座小小的房屋很特别地与于勒哥尔布西埃和他的学派的观念极为符合，异怪得像一只空的鸟笼。在巴尔扎克的花园里，他虽想化梦境为天堂，但只有伸向天空的几颗果子树枝，一片草叶也没露出土壤。十月已过了，接着又是十一月，那群工人还在忙于翻动土地，因为巴尔扎克每天都会想出新的花样。或是计划给菠萝蜜建造暖室，或是栽种可以生产大量烈酒的葡萄，或是设法装上一扇石门，把约尔地用大写的字母体刻在上面，在石门通向前门修了一条绿色的弓形廊。

同时，伯爵夫人所要居住的旁边的小房子，他要监督工人布置，伯爵夫人随后来到这幽静的山坡小房子中，与情人进行了短时间间断之后的第一次幽会。一切帐目都还在赊欠中，在这伊甸乐园里生长的除了典当的利息之外没有别的。随后，一系列悲剧开始上演了。

巴尔扎克关心的只是美丽的景色，又全身心地想像满园的花朵和盖满葡萄果实的乔木，对于土地的结构他没有请专家来鉴定。一天早晨，他被一阵响雷惊醒，立刻从窗口视看，发现天空是清晰的，没有一块乌云挡住他的日光，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的不是响雷而是花费昂贵的围墙倒塌了。苦恼的巴尔扎克写信给珠儿玛说：

“你是我从灵魂上的姊妹，我最深奥的秘密应该首先告诉你。我坐在最悲痛的惨剧中间。约尔地的围墙倒塌了。因为工程师没有打下结实的墙基，虽然是他的过错，却也是我的疏忽。这个人一个苏也没有，虽然我给过他八千法郎的现钱”

在巴尔扎克的现在，围墙是必不可缺的。他与世隔绝靠的就是这个，而且他的确占有了这片土地的确凿感也来自这里。他又召集工人重建。但几天后，一个下雨的夜晚，他又被雷鸣惊醒了，围墙又一次倒塌了，柔软的土地太弱松了。而且情景这次更为严重，石块一直碾到邻居家的田地上。邻居大叫大吵，声称要告到法庭上去，来恐吓巴尔扎克。谁拥有土地谁就得打杖。这就是巴尔扎克在小说《乡下人》中的主题，和《幻灭》里描写的一样，他对他写的情节有了一种亲身体验的体会。不过，对全巴黎恶意的欣喜他还要忍受住。关于巴尔扎克的房屋的多少有点真实的逸事，每一家报纸都曾披露过。人们甚至说他忘记了放上一双楼梯。那些到外地实地考察后回来便万分欣喜的报告要爬上瓦砾必须要冒死的危险。巴尔扎克园中的花木滋长得也不如他们的故事。

巴尔扎克已隐退在与世隔离的生活里，不请任何客人来看他，但是他并没有成功。他的老朋友执达吏和其他法律的走狗照样来阻止他搬走他最值钱的家具而不顾必须攀爬山岭经过石堆的阻止。在他隐居山村，希望在这美色中献身写作时，老把戏又开始演变了。他的了望哨随时注意生人，一有人靠近，他就把值钱东西搬到伯爵夫人的小房子里。等到执达吏摸到跟前时失望地发现这个“鹦鹉的鸟笼”除了一张书桌，一架铁床，一些不值钱的手仗之外没有任何的家具后就动身走开了，巴尔扎克的宝库又快乐地回到老地方。

几个月的光景过去了，他都能够用这种方法打发走债权人。这个游戏使他感到一种天真的快乐，他唯一的娱乐便成为用机智的方法去挫败他们，这

是他从一生挣扎中汲取到的一点蜜汁。不过最后真正的“高布色克”终于被他碰到了，也许高布色克骗诈债务人的法术就是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学到的。高布色克提起控诉，整个巴黎的一切毁谤家处在欢乐之中，出于意外的是控诉的不是巴尔扎克，也不是巴尔扎克的情妇，而控诉的是无罪被欺的奸妇之夫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伯爵被指控为：

“一方面，私藏巴尔扎克一部分家当，一方面又把上述的家当从约原地地产上搬走。对于从巴尔扎克的债权人手中夺去保证他们的权利的相当值钱的东西，他有详细的计划，使他们遭受损失，他必须负责赔偿。”

这个结局是巴尔扎克迷梦的结局。他花了十万法郎在他这“陋室”上，这比在苍细莉茜买一所房子花钱要多得多。伯爵夫人也受够了罪。他的无尽的经济困难和伯爵夫人的关系上有了阴影，她于是把约尔地的尘土从鞋上拂清。巴尔扎克无从择路，然而他的幻想又不忍放弃。他对当地主的空想还想保持，并再一次运用诡计假义把他的地产拍卖一万五千法郎，希望能够反败为胜，但最后这计策也破产了。他又一次开始寻找新的避难所，他又选择了巴士街的一所房屋。这座住宅是唯一还存在的巴尔扎克许多住宅中我们可以参观的一座，可以给它一个光荣的“巴尔扎克故居”的称号。

高布色克是巴尔扎克一篇小说的书名，描写一个债权人如何诈骗一个债务人，这里巴尔扎克却碰到一个真正叫高布色克的债权人。

第四节 为戏院写作

“一切事情都向坏处流——我的生活、我的债务和我的工作。”在这一句总结了他在四十岁的时候所处的情景的话中，巴尔扎克可谓言简意赅。他因约尔地的建筑房屋而迫使他既用力又无结果的勤劳里花费了近三个年头。他以前从未如此努力过，不过，最后他也得承认他的“六位”的债务靠一年五部小说的出足也不能填平。就是把一切他已开始和没有完成的工作都从书桌的小格中抽出来也无济于事。为了钱，他都到了替一个渴望得到勋章的工匠粗制滥造的集了一部拿破仑的格言的地步，给我们留下一幅可悲的图像，描写巴尔扎克在声望最高的时候却出卖他的文笔满足一个生客的虚荣心，而赚了一笔小钱。他不能用平常的方式赚到他所需要的钱。他幻想出现奇迹，天空掉下金币，因为萨丁尼亚的银矿已从他手中流走，他又转向另一个富源，希望能从其中拿到贵重金钱，这个富源便是戏剧。

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巴尔扎克强迫自己去给戏院写作，这是违反他自己的意志的。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是完成人间喜剧，他写剧本也没有什么权利。他的才能绝不能够在戏剧里找到圆满表达，他的本能已经提出了警告。描写人物性格如何变化是他的小说的特征，这不是靠戏剧性的惊奇的场面来表现性格和环境的关系。当他创作时，文字像河水一样汨汨流淌；他需要的广阔的背景，所以每一次他把小说搬上舞台后的结果都终之于失败并不是偶尔的结果。他要去发挥性格的精密色调或微妙变化的逻辑在戏剧舞台上没有可能实现，有限的舞台场面使他的人物显得不大自然。

然而，巴尔扎克的的天才加上意志力量的集中、内心能力的运用，他照样可以掌握戏剧的技术，这和小说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巴尔扎克计划中并未有一心一意地献身于戏剧事业。梦想成为一个新的拉辛或高尔乃尔的从前的他早已改变了思想。现在搞戏剧，他也是把它作为容易赚钱的方法罢了。他这种盘算是细加考虑而且极为冷静，和他以前栽种菠萝蜜和追求铁路股份一样，他并没有加上任何艺术的价值色调在这个计划之上。在去萨丁尼亚之前，他用一种不恭的玩世态度给卡罗·珠儿玛写信说：“如果我又失败在这个事业里的话，我就要全身心地投身于戏剧了。”

除了一个“未计”之外，他也没有别的东西了，他希望这个比他的书稿得到“还要有利的生产”能从这里得到。他已经计划了一个可能性，一部成功的剧本可能为他带来十万到二十万法郎的可能收入，虽然他的第一个努力能否带来这样的收获还不能保证，但他每年写十几部剧本，那么他最终获取胜利的可能性就可保证了。

巴尔扎克怎么样的缺乏严肃的态度对待戏剧的创作，这样冷静的计算胜负就可以证明。他像一个向轮盘上随便扔去一千金路易的赌徒一样，他的意向是把剧本随便上扔舞台。他是依赖运气而不靠他的功绩来决定胜负。他的行动计划是清楚而明晰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最可能使他施展才华和能力的第一步，就是首先找到一位戏剧院的经理，一个能和签订有利的合同，能够让他预支大量款项的经理。如果这一步成功了，那么剩下的只是一些烦碎的小事，按期如约交出他的剧本——拿这和费大力气从不甘心的

这是债务的数位而言，六位就是十万的位数。

经理那里取来的预支款项相比，这简直是一种游戏。巴尔扎克并不缺少几个心眼，他还有青年时代创作的十来部戏剧锁在书桌的小抽阁中。这些文字工作，他可以雇一个“穷鬼”为他做，找个随便的年青人不会花几个钱。他所需要干的是向助手解释舞台的布局，再用一两夜时间进行润色。这样一来他在三四天之内就可把一本剧本拿下来，舒舒服服地用左手写它二十来部戏剧，再用右手来进行他真正关心的工作——写作那些精心构思而又发愤写作的小说。

虽然巴尔扎克幻想庞大的利润会从中取得，他却对戏剧的必要条件毫不在意。他甚至于对一个熟识舞台技术的助手都懒得去请。他遇到的第一个替他做苦工的人——一个破烂穷困的坡希米亚人拉赛伊·查礼。这是他胡乱找的。戏剧的女神也从未看过拉赛伊·查礼一眼，最宽厚的批评家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才能。巴尔扎克是从哪里捡来这么一个可怜的小神经病者，谁也不知道，他板着忧愁的脸孔，长着巨大的鼻子，披下肩膀的是一头蓬乱的头发，带有浪漫幽怨的气息，这简直像一幅讽刺画。也许在街头或咖啡馆里巴尔扎克碰到了他。但肯定他没有问他有什么才能而直接就把这昏迷的牺牲品拉到约尔地和他住在一起，他坚决一定要当天就写一出悲剧的想法是那么强烈，对于巴尔扎克这也可能是场空前的笑话。

这个可怜虫拉赛伊被他们同伴游说拉到达芜尔维去的时候，巴尔扎克到底要他干什么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对于戏剧，他脑中也是茫然无知，去写一部剧本的念头从没有在他头脑中有过。虽然他在路上不断受到巴尔扎克计划的轰炸，他到了家中的第一个工作竟是一顿佳肴。在通常巴尔扎克五点钟吃饭的。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那位忧愁的客人好像一辈子没有尝过酒味似的，只是拼命地喝酒。在这热烈的招待之下他显然兴奋起来，事实是他极有可能在酒饱饭足之后给主人出个主意什么的，但是在六点钟后使他奇怪的是巴尔扎克离开了饭桌，请他去睡觉。

太阳东升的时候是拉伊赛惯常开始一天生活的时刻，才能从童年以来他就没在六点钟上床睡觉过，但是他却不敢抗议。他被别人带到了他的卧室，安顺地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由于大量葡萄酒的缘故，不一会儿，他的卧室中便鼾声大作了。

半夜光景，有人猛摇他的肩膀而他睡的正香，他突然惊起，看到像鬼魂似的穿了一件白色袍子的巴尔扎克站在他的床头。巴尔扎克命令他立刻起床，工作的时间到了。

拉赛伊叹了一口气后又镇静了他的神态，虽然不习惯巴尔扎克这种颠倒昼夜的生活方式，他对新主人的意志也没有勇气去反对。按着，巴尔扎克放了一张椅子在他自己桌子边。一直到清晨六点钟，他都精神恍惚的听着巴尔扎克解释要他写作戏剧，一直抬着倦眼。然后巴尔扎克又允许他回床去睡觉，白天的时候，巴尔扎克写作流行小说，拉赛伊就起草最初的几幕戏，晚上他便把稿子交给巴尔扎克，然后两人再一起修改。

又到了午夜之时，拉赛伊就不禁惊惶战栗了起来。因为这滑稽的时刻又在等待中来临了，他不能够安闲的睡觉，他的睡觉的欲望受到的压制的苦痛甚至还不如他在工作时的苦痛。晚上他刚写的悲惨的原稿被巴尔扎克在讨论时批驳了，他又被重新指正过。这样过了两三天，他那空竭的脑袋就开始觉得苦了。他这可怜的奴才也已对巴尔扎克的佳肴失去了口味；从六点钟，他躺在床上眼睛大大的一直睁到午夜，不能入睡，而随之而来的是惧怕那讨论。

一天夜里，当巴尔扎克又来唤醒他时，只发现了一张纸条，他已经走了。

“对您好意委托我的工作，我不得不放弃了。在一夜的功夫中，我一点有用的东西也没有想出来写在纸上来实现您的戏剧计划。这个我不敢当面告诉您。但是再继续吃您的饭实在是羞愧的。不过，我也为我干枯的脑袋失望，它破灭了 my 希望，原先我希望的通过这次幸运的遭遇而改变我潦倒的现状……”

他这突然的逃离使巴尔扎克来不及去找另外一个助手，为了能够拿到复兴戏院所答应六千法郎的预支，他又亲笔来完成这个剧本了。正在他写作《第一小姐》，后为改称为《家政学校》，的最后一幕时，他雇了不只二十个排字工人把第一幕排印出来，以便使他的签约能够尽快鉴定。几天之后，他就交出了他完成的稿件。但是他发现在戏院经理面前，他的小说家的名气好似没多大作用，这些经理只是关心包厢的报销。他们剧本便被复兴剧院的经理婉言拒绝了，又一次现实的冷空气吹散了巴尔扎克的容易赚钱的梦。他只不过使《幻灭》又增加了一章罢了。

换一个人一定会觉得受到了侮辱，至少会觉得沮丧，但是巴尔扎克的失败只是使他更加努力。他的小说不是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吗？这些小说不也使他感到失望，感到挫败吗？他甚至从这初次的挫败里迷信地看出来一种成功的保证。他给伯爵夫人写道：“我在戏剧方面的事业也一定会像我在文学中的事业一样取得重大成功。那么，我的第一部剧本一定要遭到拒绝。”所以，他必须继续努力！他必须研究求得新的契约的签订还有什么方法。

只要想想巴尔扎克单单把会话加以戏剧化就叫它做剧本，这种无可救药的方法可以使他想像到他的新剧本不会有进步的希望，但是他的新契约的确是更有利的。他逻辑的结论也从第一个经验中得到，他决定不再受剧本被人拒绝的侮辱，而且圣马丁门戏剧院的经理哈勒尔也同意接受、排演，尽管连稿子他还没有看到稿子。巴尔扎克也恰巧听到哈勒尔需要一个吸引观众的剧本，而且更为急切，他就提议把他的芜特冷改编为剧本。哈勒尔极为兴奋。太感谢《高里奥老伯》和《幻灭》，芜特冷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如果出现在舞台之上，而且如果由勒麦特·福勒特烈克来扮演，这一定会轰动整个巴黎。契约很快便签订了，双方都在窃喜，自思财源不久就会滚滚而来。

这一回，巴尔扎克投入了更大的精力。他为了监督哈勒尔，动身离开约尔地，大约在李慈刘街他的裁缝布伊松家里居住了几个星期，他的目的是出席全部的排演，在为将业预备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开始在报纸上作舆论，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战，和演员们讨论他们所要扮演的角色。别人看到他每天都穿着工作衣和宽阔的粗裤子，光着头，露出皮鞋舌，喘着气，走到戏院中去和一些指定的角色们讨论一些特殊的幕景，并把包厢为他的朋友留下，因为他坚信他的初演一定会吸引全巴黎的社会和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在他的忙乱中，他的脑筋好像掉上了一点灰尘，他忘记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他忘记了写剧本。一切都准备就绪，经理在等他的剧本，演员在等他的剧词。巴尔扎克答应他们，他们的需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便可得到满足：一切准备妥当，明天就可当开始排练了。

高提埃·提奥菲尔，是和他同时代的少数几个记载了他而设有夸大嫌疑的一个人。对于巴尔扎克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写一部五幕剧的诺言，他为我们描写了巴尔扎克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他请了四五个可靠

的朋友。来充当他的写作干部，在布提松先生家里召集他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最后一个到来的是高提埃；像宠中怒狮似在房间中走来走去的白袍主人欢欣地迎接了他：

“啊，你来了，提奥，你这懒家伙，总是这么迟，这傻瓜，现在是你动的时候了！在一年钟头之前你就应该到这里来。明天早晨，一部五幕话剧我就得读给哈勒尔听！”

随后，大家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高提埃在他的《人物志》里对这事情有所记载：

“‘因此，你想要听我的意见吗？’我坐在一张靠椅里舒舒服服地问，并打算去听一阵长篇的戏剧。”

“巴尔扎克从我那散闲态度中猜到了我的思想，他带着天真的态度回复我：‘剧本还没有写好呢。’

“‘好家伙！’我叫了起来，‘那么就推迟到六星期后再来念吧。’

“‘噢！不！它立即要由我们变出来，然后再去收钱。为了应付一个债务的压迫，我不能够再等待了。’

“‘但是再论如何明天你也搞不出一部剧本啊！甚至于连抄它的时间的也没有。’

“‘我现在要这么办。你负责编第一幕，乌里亚克负责写第二幕，罗连一庄写第三幕，德·柏罗瓦写第四幕，我自己负责第五幕，明天全部稿子我就要给哈勒尔依约照念。一幕不会超过四五百行，五百行话我们一天一夜可以写得出来。’”

“‘你给我题目罢，你要这布局怎么样的展开我也知道，和你一样正确的描写人物性格呀，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我相当迷乱的回答说。

“‘噢！’他喊道，他带着相当骄傲的态度，他显出一种超卓的神气因为受到这问难。‘要是这布局由我告诉你，准时写完这部剧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觉得问他要写一个什么剧本是由一种不得体的行为，但是巴尔扎克却认为这只是一种无聊的好奇。

“从他那里得到剧情的简略的指示费了我好大劲，然后我做下来写出了一幕的提要，最后的修正后只有几个字还保留着这段文字。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第二天并没有把这部剧本念给哈勒尔听。其他的同工们我不知怎么干的，但是认真合作的人是罗连一庄，因此这剧本题的献词也献给了他。”

看了这一段前言之后，这部剧本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在法兰数百年的舞台上也许再也找不到这样像《芜特冷》一样草率的剧本，然而哈勒尔却在广告上预告它是一部杰作。虽然怀着一腔热忱的作者已经买了一半的座位，但是他最初的三幕却受到冷淡的欢迎，令人有点难堪，连一响的喝彩也没有。他的名字和这种可怕的乖误联结在一起使他的朋友们也体验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天才文学家的全集里竟然印着这可笑的剧本一样。第四幕上演时，风波产生爆发了。为了把芜特冷装扮成一个墨西哥的将军，勒麦特·福勒特烈克选择了一副和菲力浦、路易国王爱好的发饰的假发一样，座中的几个保王党员开始表示不满，开始吹口哨，奥里昂王子也有意示威的离开了他的包厢。公演的结尾是一场杂乱。

第二天，国王下令禁演这出戏。考虑到可能引起巴尔扎克的抗议，文化部私下里给了巴尔扎克五千法郎的补偿，他却骄傲地拒绝了，因为至少从精

神上他又拿到一个胜利。但是这样严重的惨剧还是没给他一个足够的教训，让他去修补他的方法。他为了求得他的幸运又尝试了四次。两篇比较素质好的《杜诺拉的富源》和《基罗·巴梅拉》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继母》也是同样的情形。唯一的一篇能和他的天才相配的剧本是《阴谋家》却是上演在他死后。聪明的诗人海涅曾给过他的智慧的忠告，他又有了苦痛的回想，在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演《芜特冷》之前，他在马路上遇到海涅，海涅劝他写小说：

“‘您得小心，土伦不可能习惯于一个惯于在布勒斯特服刑的人。您要对您所认识的监狱坚守。’”

约尔地的建筑，萨丁尼亚的银矿和剧本的写作，这是三个大疯狂的表现，巴尔扎克在办理人俗事上四十岁的时候并没被证明比十年或二十年前那样精明或是有经验。事实上，他的令人难以所想像的放肆行为证实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冲动去令人发笑。但是我们——我们可以因年代间隔而从远处望着他——却不能和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只强调他的盲目耗费的趋向，而把那些促使他产生创造性著作的他的心灵的光辉本质抹煞了。

在他的逸事被新闻纸披露，他在约尔地的计划和冒险以及批评家、新闻记者和群众所注视他在戏剧方面的失败的几个年头里，《人间喜剧》却是在毫不气馁地加长。他那最为切实的世界都没有被企图创办杂志，地产上的投资，令人厌烦的诉讼等等的烦恼阻止住。在工人们在外面打钉，房屋的围墙崩塌之后，他却完成了伟大的《幻灭》的第二部，同时《妓女们的盛衰》也继续写作，另外《古物陈列室》以及已有计划的《柏阿里特里斯》也开始了写作。他还写了这样两部完美的书，政治小说《一桩可怕的故事》和写实小说《打水姑娘》；又写了《两个新婚女郎的回忆》，短篇的音乐小说，这一种小说的杰作《杜尼·玛西美拉》，《错误的情妇》，《米露埃·雨儿霄》，《马尔卡斯》，《毕爱丽黛》，《一个夏娃的女儿》，《卡迪昂王妃的秘密》，《地区的才女》，《加尔维尼教的殉道者》和《葛拉苏·彼得》。另外，他还写了十来篇小品文，预备了《乡村的教士》的初步格局，《夫妇生活的小悲剧》也起草了几段。

在这多风多浪的四个年头里，他的文学作品在分量和成就上可以和其他作家的毕生成就相比。他的创造的清醒梦境没有被任何证据证明被外部混乱状态侵入。我绝对找不到一点他可笑偏向的气质的痕迹从他全心全意排除一切所进行的写作里面。在作风的精炼方面其中许多篇都超过了他从前的小说，从前他那惯于宽容的芜杂的赘言也克服了。遗留在他作品中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为浪漫趣味的恶俗的感伤成分仿佛已被他遭受的这些失望与心底下的创伤慢慢地吸收并且中和了。他受的困苦的人生教训越多，他作品中写实的成分也就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灼见使他深入地了解了社会的核心，使他带有一种先知性的了解构成社会的互相交织的成分。巴尔扎克在四十岁时比三十岁时同今日的世界更靠近了一步。这十年多的光景带他走了一百年。

虽然这个时期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他那富有弹性的力量远没有告竭。在他埋头于他的工作时，他却能用观察的目光从窗帘背后看出去，不只一次企图发挥力量去抵抗他要在那里面临的顽强的事实。巴黎的少数作家组成了一个联合组织，为了能够保护他们的职业利益，叫做作家协会，这个协会的会员偶尔在桌上聚会，但是却懒于去履行通过的议案。只是把这些议案放在公文橱里生尘土。巴尔扎克是第一个真正意识的如果作家们真正联合

起来，认清他们的使命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另一种力量，他就设法把这些作家组织成为一个保护作家权利的有力的武器，但是又犯了他一贯的急性。

巴尔扎克最了不得的时候常常就是他愤怒的时候，而且他发怒也的确有他应有的理由。比利时人都在每一部书印刷未于之前把书翻印了，他没有从比利时的出版家那里得到分之报酬，但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充满了比利时印刷的比他本国便宜得多的他的小说的版本，因为版税他们是不用付的，而且印出来时也不太讲究。不过，巴尔扎克对此不予追问不把它当成个人的损失。他注意的只是他的声位和名誉。于是一个《法国作家协会法典》就在人手中产生了，这在文学界是一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献，有如法兰西共和国与《人权宣言》，美利坚合众国与《独立宣言》，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在卢·昂，他发表讲演，而且把作家们不断组织进来，但是失败又一次垂青了他。各种反对和争论的势力，他抗争得太强了，他于是从这个协会中退了出去，因为他的思想不能在这个不够强大的社团中实现，他的暴躁的脾气也不能够去适应它。

他代替无名的法律公证人柏伊特尔辩护里，他对他这一代的影响能力又一次受到了考验。但是又一次失败了。判决柏伊尔上断头台是因为杀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男仆，这个判决可能是正确的。柏伊特尔本来是一个新闻记者，在不够受到经济困难之后，他和一个富裕的眼斜克勒奥尔 女人结了婚。从前有关这女人有很多不雅的谣言。据说她的情人是她父母家的男仆，嫁给柏伊特尔时，他就把这男仆带到柏伊特尔家中里。终于一天夜里，她俩被刺死在由邻村回家的路子。柏伊特尔经过严刑拷打后，被迫招认了是他刺死了男仆。如果仅因为这个，他可能比较轻的了解案子，但法官们又一致到认为他的另一个企图是摆脱他的妻子从而继承她的许多产业。

几年之前，巴尔扎克和柏伊特尔就认识了，因为大家都是 LeVoleur 报社的同仁，同时他对这案子的心理方面特别感兴趣。对于福尔泰尔在卡拉案子里所建立的传统他可能想去继承，这个传统后来由左拉在德雷弗斯案案件中进行辉煌的发扬，这个传统便是由法兰西作家为公民权利充当辩护人，一些“无辜的被告”的保卫者。自己的工作却放在一边，巴尔扎克同卡发尔尼一起到柏里去和被判死刑的犯人谈话，他那容易发怒的想象认定柏伊特尔是由于自卫而开枪打死男仆，又不小心打死了妻子，因为在黑暗中难以分辨。他立刻开始起草了一份诉状并递给了法院，这当然是一篇充满法律的见和法律逻辑的杰作。但是，任何非官方的口供法院都拒之门外，把代辩护人的辩护词看作是无效的。这便被驳回了，如同送给国王的恳求宽恕的呈文似的。巴尔扎克既不爱惜时间，又不心疼金钱，为一个在他看来无罪却被判为死罪的人辩护，结果却是又一次的失败。断头台上便又多了个柏伊特多。

但是，最后一次的警告他也应该收到。他在《巴黎时报》中的惨剧和他在这一冒险中的损失的金钱只是四年的工夫就让他忘记了。然而，直接同他的同胞说话的欲望他还是不能抑制，他不断在各处宣传他的文学，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见解主张。他知道他的自由写作是不会得到巴黎的编辑记者先生们

克勒奥尔指法国人或西班牙人在美洲和土人所生的儿女。

一八九八年，因间谍嫌疑被诬陷判处徒刑的法国军官德雷斯受到左拉的辩护，他发表了有名的《我的控诉》一文，参加为德雷弗斯伸冤的同时文人还有法郎士等人，这件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德雷弗斯案”。

允许的。对于他们他曾用独立的态度侵犯过。没有人理会他的企图，他总是企图把他的意见发表在他们所控制的机关报纸上，而且就是发表也是被人删削得失去原貌。如果不想被他过多的思想憋死的话，巴尔扎克想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创办一条喉舌。

《巴黎评论》便又一次在巴尔扎克手下产生了。他相信成功，因为他打算它的内容全部由他执笔。对于法兰西唯一的自由独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德·巴尔扎克、奥瑙利每星期对时事的评论，对新的重要书籍的批评，巴黎和世界是不能够拒绝的，他们将看到欧洲第一个小说家在他自己所办的杂志里发表小说。这条道路是唯一指向成功的。他不能托别人去干任何别的事情。五个人的事他一个人干，他不但同时干编辑和编辑部的事，甚至财政上也得照看。他校对稿件，与印刷家交涉，监督排字工人，监视送报，每天从清早到夜晚汗流满面的在排字房和他的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或者是伏在脏脏的破书桌上，在一片吵闹的声音中赶写一篇文稿，同时又向部下发号施令。这样他工作了三个月，写的文稿可以足足够充作三四部书用，但是他那可怜的幻想又一次袭击了他。对巴尔扎克的政论，巴黎和外面的世界并没有表示特殊的注意，他的评谈也受到冷淡，而且是在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和社会方面好。三个月后他离开了编辑桌，他又一次在他巨大的努力中一无所获。

但是他的努力也并非毫无结果。例如巴尔扎克评论史当达尔的《巴尔姆修道院》的文章，就可以说是法兰西文学年鉴中一页金书，而且《巴黎评论》那么快就发表了。对这无名作家所写的无名著作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应有的赞美，在这篇文章中，巴尔扎克表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豪侠气概和他的艺术灼见。对于同工友爱的直觉感情实例除此之外我们恐怕再也无从在世界文学史上找到了。巴尔扎克的这种宽阔胸怀，他这样自愿而完全自由地表示把最大的文学荣誉归于他在小说界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就这样无猜地为史当达尔赢得在文学界中他应有的名声：为了衡量计定这一种精神的实在的价值，对于两人在同代人眼里所处的地位我们必须进行比较。从欧洲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巴尔扎克的声望早就传遍，然而人们却全然不知有一个史当达尔，他死的时候，如果在报告上登讣告，甚至都出现把他笔名误为史当哈尔，把他真名误为拜尔的情况。在法兰西作家的名单上从未有他的名字。报纸上的赞词与颂词都是充满着卡尔·阿尔凡斯，查宁·儒儿，桑都柯克·保罗和其他笨拙的作家的气味，现在人们已经遗忘这些笨拙的作家的作品，但是在当时却成千上万册地卖。但是史当达尔的《爱情》只卖出了二十二部，他甚至都和自己打诨，管它叫“天书”，因为没有人敢与触动《红与黑》，第二版的出版也是在他死后的事情了。

职业批评家不认识他。当《红与黑》出刊时，圣提一柏夫认为毫无价值，不值不提，而且他后来在提到时，他的傲慢态度都难以令人接受。他说：“他书中的人物都是死的，这些人物都是一些构造巧妙一点的机器人。”《法兰西杂志》也评论说：“史当达尔先生并非一个傻子，但是他写了几部傻书。”人们一直在史当达尔在死了之后好久才注意到歌德和爱克尔曼对他的高度赞许。但是对于史当达尔的智慧的本质和他在心理方面的掌握，巴尔扎克早在初期就看得一清二楚。他向这个只为自己写作而不去问耕耘收获的作家应用了一切的机会去致敬。《人间喜剧》曾谈到爱情结晶的过程，而这个正是史

注，史当达尔的真名为马累恶·亨利·拜尔

当达尔第一个描写过的，关于旅行意大利的书他也指出史当达尔的成就。但是史当达尔太谦虚了，对于这位著位的同工他却不能按这些友谊的指示去接近，他甚至连他新出的作品都没给巴尔扎克送去，幸而他们的朋友哥伦布·雷曼引导巴尔扎克注意了他们，同时对这位批评家们没有欣赏的作家他又请巴尔扎克来卫护。巴尔扎克即于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日回信说：

“《修道院》的节录我已在《宪政报》中读到了，这使我犯了一次罪，因为我居然冒出了妒忌的火苗。是的，当我读那一段关于战争的准确而卓越的描写时，我的确受到妒忌之火的烧烤。我自己曾梦想在《军旅生活之场景》中把它描绘出来，但这又是我遇到的最难写的一笔。我为这一笔而沉醉，而苦恼，而迷惑，甚至差一点引我上绝路……您可以我对它的想法是诚恳地告诉您的。我自己已由这一段文字而引起了新的期待，它也使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更加紧严了。……”

看到自己将要写出的小说，一个关于拿破仑的战役的描写的主要幕景已经被另一个作家用完美的技巧写了出来，小气量的人看后一定会很苦恼。《战争》的布局已在巴尔扎克的头脑中构思了十年。对于传统的英雄主义的作风，浪漫主义的描写，巴尔扎克都不愿意抄袭，他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描写，要有确凿的细节，要带有时代的创造精神。但是现在他已经迟了一步了，因为史当达尔已经捷足先登了。一个思想丰富的艺术家，一个创造天才赋予无尽的作家，他应该慷慨一点。况且还有一百个题目在等待着巴尔扎克，让他去写书，他并不忧愁仅因为一个同时代的作家写出了他心思中计划写的杰作。因此，对于《巴尔姆修道院》他没有停止歌颂，认为这是一部“有思想的文学的杰作”：“这部伟大的作品只能由一个正当盛年，思想成熟的五十岁的人来写，来构思。”

他对这部小说的内在活动的精巧的分析，对史当达尔关于意大利精神的各种方式的深刻了解的认识，任何以后的批评家在讨论这题目时也没有超过他。

巴尔扎克的评论把史当达尔在齐维达凡齐亚的寂寞生活打破了，当时史当达尔在该城当领事，史当达尔也为之震惊。他最初甚至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作品一向遇到的都是些卑劣的评价，但这样一个他尊敬的伟人却能如此评论他的作品。巴尔扎克祝贺他时当做一个同等水平的作家，而史当达尔所写的谢函电表示出一种他抑制不住的昏惑的感觉。他开始写道：

“先生，昨天晚上我是大为惊奇，我在想任何人都没有让他的作品在杂志中如此的评论过，而且是由这个问题的最高权威来评论。您是在怜悯帮助一个被人遗弃在街头的孤儿。”

之后，他就对这任何作家都没有从另外一个作家手里得到的一篇赞誉极高的评论表示了谢意。

和巴尔扎克一样，他也有同样的艺术灼见，他接受了巴尔扎克的友爱之手。他明白他们两人都是在为后代而写作：

“我们死了之后，就可以跟这些人交换座位了。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的身躯他们有绝对的力量统治，但是过了这个时间，他们就会永远的被人遗忘。”

感谢一种神秘的同类相关，灵魂与灵魂碰撞，这两个不朽的作家都在那个乱蜉杂螭的文学界里于杂乱之中静悄悄的彼此看在眼里，在他们的心里保证大家站到一起来。在数干部出版的书中，巴尔扎克竟选择了一部不被批评

家注意的一部来加以赞颂，他的直觉从没有比这更为超卓的表现过。然而在同类人当中并没有因他为史当达尔的辩护而引起反响。和柏伊特尔的辩护被法院所批驳一样地与替史当达尔的辩护也受到批驳。他那火炽的呼吁又落了空，如果任何一个伟大的道德行经，不论成功与否，都只能说是落空的话。

落了空！落了空！这句话巴尔扎克经常对自己说，这句话的道德他也深刻体验到了。在四十二岁时，他那顽强不息的脑袋已经生产了一百部书，创造了大约两千个人物，其中许多都是不朽的流传。一个整个世界已从他的脑中构思出来，但是任何东西他也没有从这居住的世界中得到。在四十二岁的时期，他穷困于任何一个时期，居住在莱底期居那尔街的时候，他心中还存在幻想，但是现在他连这些幻想也都消失了，他的工作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东西，除了债务之外。他曾经为自己建筑了一间房屋，但这房屋却又被别人抄押去了。他创办了一家杂志，但他推行的努力去被这些杂志忽视。他冒险的企业也失败了，他的政治活动也被一些选举人不表同情的破坏了，他想竞选为研究院评议员的候选人也被推翻了。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落了空，或者上好像是落了空。他的体力，他的那过分兴奋的脑袋，他那过度紧张的心脏，这些是不是永远抵得上这几乎不能忍受的重担呢？他还有力量去完成他的人生喜剧吗？他能否还和别人一样进行无拘无束的旅行呢？平生头一次，巴尔扎克受到暂时气馁的打击，他很想离开巴黎、离开法兰西、离开欧洲，他要到一个不同的工地，他想到巴西去。巴西有一个叫彼得罗的皇帝，这个皇帝也许会救援他，也许会给他房子住。他研究了许多有关巴西的书籍，他又梦想着未来，在头脑中转动着这些问题。事情不可能跟从前一样发展到他想像的情形。把他从这毫无结果的工作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什么神力。一夜之后，他就会改变他的奴隶命运，把他从这种无底的不可忍受的压迫中解脱出来。

但是，这种奇迹有可能在第十一个小时之后到来吗？巴尔扎克已不再存心希望这个了。一天早晨，一八四二年正月五日，正在他经过彻底的工作离开书桌之时，他收到了许多仆人送来的信。其中有一封信的笔迹是他极为熟悉的，但是这一次，一个黑线圈加在封信口上。印章上也带有同样哀悼的颜色。他撕开了信，看到了德·韩斯迦先生谢世的消息。和他订立盟约的女人，他发誓要永远敬爱的女人，德·韩斯迦夫人，现在这女人成了一个寡妇，但是她承继了夫君的几百万家财。巴尔扎克一个新的被遗忘的梦境又重现了。一种获得新生的欢乐，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平和生活景像又在他的头脑中开始构建。巴尔扎克又开始了最后一个幻想，这是他一切幻想之中最后的一个幻想。在这个幻想中，他要去度完他的人生，并且在这里要辞别这个世界。

第五章 《人间喜剧》的命运

第一节 德·韩斯迦夫人

一八四二年正月五日 是巴尔扎克最后生活的转折点，这天他接到了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他的过去忽然成为现在，并且统治着将来。从这一天开始，他只有一个目的：上注意他的意志力。本来，他和德·韩斯迦夫人的感情已开始淡化了，但现在必须重新恢复，他们的同盟条约必须进一步演化为结婚证书，他们一定要实现曾经有过的诺言。

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这需要付出十倍的努力，因为在前次的相逢之后的几后之后，他们之间已是只存在形式化的联系。他们的通信已变得越来越冷淡，越来越缺少诚恳，因为自然的法则我们到底下能够破坏。他们已有七个年头彼此不相互见面了。因为他经济上的困难，可因为他和伯爵夫人之间的关系，巴尔扎克没有可能到维埃曹尼亚去旅行。再一次到西欧来游历一次以便会晤她的情人，德·韩斯迦夫人已不能够或不愿意劝说他的丈夫了。

如果需要爱情永远生存，那就需要两个人亲近，正如要想使火旺长燃需要充分的氧气一样。为了这个缘故，他们之间的热情也就在渐渐熄灭着爱情的火焰。巴尔扎克在他的情书中还要设法保持那种心魂颠倒的腔调，但是这是一种矫揉造作的热情，德·韩斯迦夫人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就住在约尔地新房的隔壁这一事实，住在巴黎的亲戚和朋友谁也没有忘记告诉德·韩斯迦夫人。就是乌克兰这么遥远的地方也传来了他和马尔布提夫人的轻荡行为的有关评论的材料。这是不足为怪的，如果德·韩斯迦夫人因巴尔扎克的欺骗而愤怒，对于他用来消除巴黎谣言而证明的令人狐疑的所谓永远保持忠诚的保证书，如果德·韩斯迦夫人只能吞位绝望的泪的话。他们的书信中充满着一种酸辣的气味，德·韩斯迦夫人已觉到巴尔扎克希望她相信他说的那些寺院式的生活的欺骗，她已为此显出了悲哀。他的真诚，她已用直接的言词指出的其虚伪性。因为巴尔扎克在神经紧张的时候也曾寄给她一封信，而心中那份慌张也未被文辞掩饰过去。他对这个安居在丈夫身边而不知何为忧愁，虽然她以前曾忧愁过的女人因为所谓“放纵的愚蠢”而受到谴责已经难以忍受了。悲愤之下，他就回击她说：

“对于那些落水灭顶却挣扎要到水面上来的人的事，我劝你不要再管，不管是称赞还是责难！对穷人们的困难，富人们永远不会了解的。”

有一次，她谈到他的“轻浮的天性”时，他对于更为恼火，暴躁地写道：

“我难道是轻浮？我二十年毫无休止的献身于伟大的写作事业难道是证明我的轻浮？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永恒十年的爱情吗？是因为我为付还我母亲蠢笨的计划而负的一大笔债从而付出我十二年来日夜苦劳吗？是因为我虽然那样苦困而没有被憋死，没有被枪击破脑瓜，没有落水自杀吗？是因为我不断地工作，用各种新鲜的方法去减少我被罚去施行苦工的时间吗？请你说一说！因为我对社会不理睬，是因为我孤独自守，是因为我集中一种专注的感情，拚命地工作，付清我的债务吗？……轻浮的天性，是的！的确！你的举动就像一个中产阶级的好评论家，看见拿破仑左转右转地各方面视察战场就批评说：这家伙不能够固守一面！他没有固定的思想！”

在这两位情人之间，已七年没有见面而习惯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在他们

的通信之间，神韵和理性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德·韩斯迦夫人已有了一个长得不小的女儿，她现在可以和她女儿谈论一些机密的事了，不再需要通信给巴尔扎克来发泄心中的感情了。而她的报告中也不可能有什么机密的平淡生活了。在巴尔扎克这一方面，他因为长期的等待也已厌烦，对于她的誓约，她显然已忘记这个不能实现的计划了。他曾在一八三九年给卡罗·珠儿玛写信说，如果她碰到一个有二十万或十万法郎的女人时就应该告诉他，“只要她能用嫁妆解决我的问题”。对于天仙一般的公主，他不再存有奢想，因为拥有百万家财的德·韩斯迦先生似乎不会太早放弃。他已准备放弃对不可捉摸的北极星的窥视，为娶一个能替他还清债务的女人而打算，把她刻成正牌的巴尔扎克夫人的肖像，来为他管理地产和家事，他在婚姻方面的幻想在他四十岁时，这个现实主义者已经放弃。他又回到了他早年的理想：“一个女人和一笔家财。”

他和德·韩斯迦夫人的通信很可能在这一点上已经完结了。他们的通信已渐渐稀疏起来，和巴尔扎克对卡罗·珠儿玛要求更大的忠实感到不舒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说，巴尔扎克和德·韩斯迦夫人都不愿意断绝关系。她感到一种荣耀，在这位当日最伟大的文学家向她献礼中，这几乎在她的生命中成为一个伟大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于这样诱惑满足她的虚荣心的通信，她也没有理由去自动放弃。另一方面，巴尔扎克也有一种不能扫除的习惯，他总需要自描，需要和一个人倾吐他的困难，描写他的工作，总结他的债务，这几乎成了他的另一个天性。而且他也乐于享受有人私下里藏着他的信件的乐趣，因为德·韩斯迦夫人私下里计划保藏他给她的信。

他们虽然随时间而逐渐稀疏通信，但这关系还一直保持着。他偶然间也会抱怨她“您寄来信太少了”，或是“您写信的间隔时间太长了”，而她也经常责备他写信不够经常。但是对于她的这种责难，他却不能沉默，在他和她通信方面所有的责任，她怎么能和他比较呢？她整天没事可干，她没有工作的生活在寂寞无聊的空间中，而他却随时缺少时间，每天写作和校对要花十五个小时，他给她写信的时间都是他用来写给那些已支取过稿酬的作品和他极需的少量睡眠中榨取来的。对此，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这个金钱可以当土用的女人——收到她的穷情人的一封信，那么他就等于从编辑和出版家那里少得到用同样字写的几百法郎的损失掉了。因此，如果他希望两星期收到她的一封信的话，这个要求也并不算过份。但她的回答似乎是一种宣布，说她只能一封还一封，于是，他就发怒了：

“啊！我终于发现您原来如此的渺小，这证明我所认识的您是世界上一个平凡的女人！啊！您停止给我通信仅仅因为我不常给您写信！好！我不常写信，这是因为我没有邮资，没有时间！这个是不愿意让您知道的。是的，我已陷入了这样一个地步，甚至还要比这深得多，这是多么令人讨厌，我很悲痛，但事实无法改变，就像你居住的乌克兰一样。是的，有不少的日子我是一边吃着一片卷包，一面骄傲地在马路上走着。”

最后，这样的争吵越来越尖锐，他们通信的间隔也越来越长，最后巴尔扎克在整整三个月之内没有提笔给她写过信，直至这封报丧信的到来。他们之间的互相刺激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对互相的冷谈，懒怠、或诡诈是越来越纵容。大家都却把这个通信变淡的责任推给对方，这个通信就像音乐上的术语似的；是以“最强”开始，继而“最快”，而终于却失去了“热情”。

他们之间谁也没有过错。错处在于他们开始时所有特殊的反常关系。他

们当初只是希望暂时的别离会带来永远的结合，而且坚信这个时候是不会太远的。在她的大夫还在人间时，他们用这种关系表示彼此的忠实时，德·韩斯迦夫人又强制给巴尔扎克提出一个条件，让巴尔扎克继续忠实于她，他只能到那些靠皮肉生活的女人中消遣，这是她唯一的允许。但是，德·韩斯迦先生又活了八年，德·韩斯迦夫人干犯她的情人的源泉又正是她那受伤的骄傲和她的妒忌。在长期的欺骗夫人之后，他便直接了当的给她写信说：

“ 来来，一个男人并不是一个女人，对吗？您对一个男人在一八三四年到一八四三年之中是否保持其贞洁是不相信，不是吗？从医学方面说，您也得到了足够的消息，知道他已将要返化为无能的了。您提到“ 妓女 ”。那么我处的地位可能和在桂的朋友在罗马所遭遇的地位一样。对于时时工作、处处碰钉、刻刻忧愁的富于幻想的人，您应当衡量一下他所感觉到应有强力的消遣需要，您要拿来寻找我的过错的那一点理由和这来抵消，和责罚这些错过的残忍的方式——然后，对以往您就不会再谈以往了，除了去哀痛我们别离这个事实之外。 ”

他的这种坦白产生的效果不大。对于他的这种纯血的男性能力虽然她能够心里确信，但是和其他女人的胡闹她可不能容忍。虽然他不是一个职业“ 情郎 ”，他也是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为伟大的文学事业而献身的、但是她却对他性格中无常和轻浮的性格大加责备。虽然她生活在丈夫身边是舒舒服服，她也不准备去牺牲一点，但是她却坚持说巴尔扎克再苦恼也要像和尚一样的贞洁，像小书记一样节俭，不允许他有任何的奢侈和一丝的懈怠，只叫他半天加一夜的写作，只是等着，等着，也许——也许只是也许——等到德·韩斯迦先生死后，她就可以对他的苦行和坚忍去酬报了。她埋怨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对脱离她的控制而生活，他也有必要的权利，应该避免她对他的行动的拘束。但是；他不这么办，而是瞒了她许多东西，把自己装成一个和实际相反的人的样子，说了许多关于他和伯爵夫人以及和其他女人的笨拙的谎言，就像一个小学生害怕挨打似的。也不知是为了何种不知道的理由，对于她对他的忠实的要求，他一直不能采取一种勇敢的态度去适应，用一个对自己有信心风范去对付一个乌克兰的贵妇人。但是在他的一些小插曲和过失之中，在他向她保证他决不是要寻找冒险的生涯，而是希望求得一向缺乏的安定生活来摆脱他的艰苦，他倒是极为诚恳的。对于永远的挣扎，他渐渐开始倦怠，经过了不断被风波打击的二十年，他只向望能够驶人比较平静的海湾。对于太多的冒险、太多的女人他都已有了，而且这种女人他寻找时只能在写完一部书和开始写另一部书之前的空闲之时，再加上还有密约和背后有谦恭的丈夫而引起的种种不方便。还是一八三八年九月的时候，他就给卡罗·珠儿玛写过信，他也从来不敢撒谎，他的腔调是很诚恳的。

“ 我对你发誓，我的一切希望，我的一切妄想，我的一切野心都已经包起了。我要过一个牧师的生活，一个简朴平和的生活。一个家有四十万法郎的三十岁的女人，只要体态柔美外表雅洁，我就可以等着她来嫁我，如果她愿意的话。她可以为我把债务偿还，我可以在五年之内赚到钱来补偿她。 ”

这正是他替德·韩斯迦夫人设想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他觉得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远隔万里而可能已经不是六七年前他所认识的情妇身上，已是一种不太明智的方法。他曾用秘密的梦幻相告的“ 无名女郎 ”现在已不知不觉又变成了他的“ 情侣 ”，他用忏悔的方法去实现已没有效果，因为这已经退化成为他随时可以应用的机械的习惯。一八四一年九月，收到

这报丧信之前的三个月，可能是他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对上上德·韩斯夫人的幻想已不再有了。他那对爱情和财富的梦也已成为过去了，而且可以把他放逐到他在《幻灭》中构造的地狱中了。

当他撕开那封带着死亡味道的信时，读到德·韩斯迦先生于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日逝世的消息，他的心脏中流出了滚滚的热血。他太激动了，以至手都有些发抖。不可恩议的事情或者是他从来不敢再去想像的事情居然发生了。他的这个曾经和他海誓山盟的女人现在自由了。她成了一个寡妇，而且是他日夜幻想的拥有百万财产的寡妇，这是一个理想的妻子，贵族的、年轻的、聪明的、可爱的、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巴尔扎克的妻室的女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将为他还清债务，使他得以尽力进行真正的重要工作，可以使他的天才倍增，名望日隆、满足他的性欲。以前他是如迷般地爱着这个女人，她也曾经爱过他。在知道她已经自由的一刻，他的内心为之疯狂，他的感情又从灰烬中闪出了星光。改变他的生活的将是这张令他发颤的信笺。以前他所渴望与希望过的每一个东西都令他看到了实形，结在德·韩斯迦夫人身上，他也感觉到他去做应该只有一件事。必须要再一次征服这个曾经一度远离他的爱过他的女人，这一次是永远的最后征服。

从他给她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深情与激动。这是一封诚恳的男子汉的信，对于寡妇的损失，他并没企图用虚伪的态度去安慰。因为他了解她损失了不爱的丈夫并没有多少的悲痛。对于他的丈夫的死，他也没有用优长的语句表示悲痛和哀悼。他只限定自己对那些可能的责难至少辩解，说他是这样地渴望得到她，在他心里会不会存在希望她变成寡妇的念头：

“至于我，我的亲爱的，虽然我在十年来所热烈追求的东西的地方已被事情带来了，在我心里面从来就没有过别的念头，这我可以向上帝和您发誓，除了完全的服从之外，就是在最紧急的生活关头，我也从来没有脏污我那圣洁的灵魂。对于自己一些无意的偶然的幻想任何人都不能够来阻止。我常常对自己说：‘如果和她生活在一起，我的生活该是怎样的轻松快活啊！’一个人不能够在没有希望之下还能够维持他的信仰，保守他的精神，或保持他内心的纯洁。”

他在这事变中单是一件事就使他感到快活：他现在给她写信是“打开心房”在叙述，他向她保证丝毫他也没有改变。在新沙特尔会面之后，他的存在的一切一直是她，他向她请求，要她“写信来答应我，你的生活将整个儿与我溶于一体，我们现在可以变得快活了，任何云雾都不可能为此投下一丝阴影。”

他立刻又在刚发出一封信后又写了一封信。在一夜之间多年前的婚约就变为了事实，现在阻挠他们的最后结合的还有什么呢？他面前后光彩已笼盖了一切的东西，连他自己也不例外。在十二个月之前，在他自己的描绘中他还是一个忧愁的白发者翁，肥胖得令人讨厌，不能够集中思想，高血压病又时常压迫他，而且脑充血又危胁他的灵魂。现在，他给他未来的新娘描绘他那健壮的俊美了。他的雪白的长发变成了迷人的黑发，他的忧愁也已云消散而变得快乐了：

“只有在这里那里还有几根白发，因为我辛苦的生活方式，不过我还保持着康健的身体，除了久坐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一点肥胖之外。我从维也纳回来后没有什么更改，这我相信，而且我的心还年轻，也就使我的身体保持年轻，虽然我过着严酷的寺院式的生活。我至少还有十五年的青春，和您一样，

我亲爱的，不过在这种时候，重现我们见面的时刻我倒愿拿十年的韶华来换取。”

他的将来生活的整个图像他用快速的幻想勾画了一番。他劝告她给她女儿尽快找一个合适的“精明耐苦的丈夫”，尤其重要的是，这个丈夫应该是“相当富有，能够接受您的委托，付出一笔巨款来当嫁妆”的人。之后，她就可以从物质上的困难中在法律和道德中摆脱出来，他们也就能够生活在一起，就像以前想像得那样，而且还要比以前更加快乐地生活。任何一个日子他们也不再会浪费。他准备清理他在巴黎方面的债务，然后，他就要到德勒斯登去，在那里他和他那无比钟爱的情人就更加接近了。他已经做好准备，比任何时候准备得都好，他也比任何时候都爱她，他从来没有比等待这件事更焦急地等待过，等待她口中说一句话让他到她那边去，这在她的情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她的回信到达他那里是二月二十一日，这已是在他听到这消息的六星期之后了。对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了解，因为后来她把这封信同其他信一同烧了，但是对信的意思我们还是知道的，她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追求，对他要求到她身边的请求断然拒绝。他却从未考虑过她会拒绝，但对他们彼此之间所发过的盟誓她却用“冷冰的镇定”取消，而还给他他所不愿要的自由。她用清楚坚定的口气说：“您是自由的，”对她的决定的理由她还有了说明。她不再相信他，因为七年的光景他都没有来探视她的愿望，虽然他对到意大利去旅行两次的时间和金钱都找得到，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去的。因此，在这件事中他定有别的理由，使他们彼此之间有盟约，这一切都已过去了。她要贡献给她的女儿，在余生中永远不离开她的女儿。”“假如我的可怜的孩子被人带走，我不可能活下去。”从巴尔扎克绝望的回信看来，她的信一定是和刀剑一样锋利，把他的希望一下子破倒在地上，切断了他一切的希望之根。

德·韩斯迦夫人的“不！”的回答，是一个经过细密考虑的最后回答，还是带有一种虚荣心和骄傲感诱使巴尔扎克更加热烈地追逐她的一种装腔作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复杂问题，需要精细的心理的分析。问题不在于对两个简明的判断之中的一个进行选择，是她爱他呢？还是人他爱她呢？这只是避开要点的了解问题，而不能够正确的说明这种内外都受抑制和矛盾所统御的结合。一个女人的痴心恋情，它的特征应是无条件的顺从。从这一个观点来讲，德·韩斯迦夫人对巴尔扎克就缺乏必须的热情，她带有俄罗斯贵族的骄傲感，以及富裕的优越感，是一个自信强烈、任性固执的女人，他对他的爱情的要求好像一种贡品，可以慷慨接受又可侮谩拒绝的。这从她的情书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她也不断抑制、约束她那顺从的准备。她一开始就把他看作是一个比她社会地位低的人，她只有降低资格才能现出顺从。在巴尔扎克方面，她给他规定的下等的社会地位他一开始就接受了。他的被虐待感早在他自称她的农奴或奴才时就已意识到。他和女人们的关系，一般讲来，都没有男子汉的尊严，他把他自己横置于德·韩斯迦夫人下面。我们常常感觉到他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屈膝的姿态，这是否定他个人的尊严。我们也沉悲地看到七年来他垂着这千古以来最伟大的头颅在亲吻她的鞋，五体投地的拜倒在一个俄罗斯外省的贵妇人脚下，对于德·韩斯迦夫人的性格和她的辩护人的称赞，我们如果没有什么怀疑的话，这一定是不只她鼓励纵容巴尔扎克这样屈从，而是她可能还要求过这个。如果一个真正伟大的正视巴尔扎克的女人如果见到巴尔扎克采取了这样不合时宜的举动那一定会羞惭

的，会扶起巴尔扎克，让他直面面对她。如果有机会的话，她也应该把她的意志从属于他的意志。德·韩斯迦夫人无疑是够不上这个条件的。她变为他的崇拜对象，这满足了她的骄傲感，她对他的情感也包含相当多的爱恋成分，但是——这个“但是”是决定因素——这就带有屈从的色彩。她的恩宠是她从她的座子上下凡用慷慨的神气颁发的。“善良的巴尔扎克”或是“可怜的巴尔扎克”——这是她给她女儿信中经常用的一种腔调——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便可以从此了解到了。她是够聪明的，她对自己的价值认识得很清楚，她也是够女性、够重感情的，对他那像暴风一样的精力她也懂得去享受。虽然对于他的缺点，他的不可靠她也了解，她对此深表同情，但是，说来说去，她爱的还是自己。她只对冒险成为女主角而兴奋。这是给她的平庸投下光辉的赤热浪漫的崇拜，然而对他的疯狂的追逐她还没有失去冷静而进行急切的回报。作为一个带有阶级偏见的女人，她不能够软弱得把她的禁命投向东风而毫无限制的贡献自己。她对她的女儿的呵护是她所施展的唯一的真爱情。就是巴尔扎克和她过着夫妻生活的时候，几个月里他们也没有成为知己。她只相信她的愚蠢的女儿，而把巴尔扎克看作为平民的外界人，她最后的心灵堡垒拒绝向巴尔扎克敞开。

但是在丈夫在活着的时候，她却接受她的情人巴尔扎克，而为此深深堕入情网，也没有危及到她的婚姻和社会上的名声。但是现在到了检验她的爱情的时候了，由于德·韩斯迦先生的过世，使她面临着两种方式的尊贵选择，要么地位和财富，要么天才和名声。对于做下这一决的时刻，她时常感到害怕，虽然不能都认真可靠的她给她兄弟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她那时的心情：

“当我被迫去决定要不要和你只怕当了你的姊夫好男人结婚时，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知道我爱他，比你想像的也许还要爱他。我孤单生活中一件重要事情便是他的书信。对他的信我经常不耐烦地等着，我希望在这些信中读到的一切赞美之词，他在我看来是那么顺服，我在他眼里也比任何女人都重要。因为他是一个天才，一个法兰西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只要我考虑到这个想法，其他的不会再烦恼我了，那个因为赢得他的爱情而来的骄傲便弥漫了我整个的灵魂，虽然我是那样地配不上他。但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一些不合适，而苦痛的想到别人也会看到这些情形的痛苦，我却不会太去注意。在这种时刻，我痛哭是因为我的爱情和骄傲，我责骂那些人们竟看不到在我看来是这样明白清楚的地方。对于德·韩斯迦先生的死我一点也不愿去想，不管我处在什么地位。我一向所努力的去尽我的责任。这是我希望清楚地知道的，就像我们的父亲所教导的那样，但是这也会在我心灵的深处倒觉得有点快活。因为别人没有叫我去打定主意，而人世的任何东西我也能够在某一时刻里忘记，除了这个伟大的天才准备为我这样一个不可能给他什么回报的人而牺牲之外。”

对于他们的盟誓，这是巴尔扎克的一切希望之源，也是使她不断焦急的源泉。

因此，延期去决定，这是她的第一个动作。她拒绝情人急躁地赶到她身边来，因为巴尔扎克的游说魔力是巨大的，这也是很合平自然的事情。同样，也决非巴尔扎克所幻想的那样，她的行动是不完全自由的还要受到许多限制。因为家庭中的人因丈夫的死对她已开始注意。在附近地产里居住的舅父们和舅母们，叔伯们和婶婶们，住在她家里的两位外甥女和圣彼得堡和巴黎

亲戚们，对于她和德·巴尔扎克先生的风流韵事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都极为害怕一个冒险家，一个用爱情的甜蜜字句来迷惑这位寡妇的法国作家把她所承继的维埃曹尼亚的巨大产业和几百万家财吞掉。对德·韩斯迦先生的遗嘱，一个亲属已提出起诉，对此进行争辩。因为依据这个遗嘱，财产是德·韩斯迦先生和妻子共有的。这案件被转到基辅去了，但判决的结果对德·韩斯迦夫人极为不利，她只好到圣彼得堡提出最高法院的诉讼，还向沙皇上呈。

同时，其他的亲族男女又从四面包围了德·韩斯迦夫人，他们都尽力地捏造一些恶意的谣言和谤语来使她和巴尔扎克的关系更为僵破，那位人所共知的姨母罗沙利是其中最起劲的一个，这是有足够的理由使巴尔扎克和一切其他的法兰西人对他怀恨的。在法兰西革命的时候，她的母亲因间谍罪而被判为死刑，送上了断头台；她在孩提时代，对于那个恐怖时代囚禁处死罪人的公西耶惹利监狱就有深刻的了解；她一想到她的外甥女有可能和一个公社份子的儿子结婚，她就有一种仇恨感从而不断恶言劝告并企图去影响德·韩斯迦夫人。就算德·韩斯迦夫人真的同意巴尔扎克到乌克兰来，她的愿望也不可能在这件事中得到满足。这样她在法院的官司可能会败诉，而且她的境遇也会变得更为恶劣，再说如果圣彼得堡的贵族社会突然出现这位举止粗鲁的肥胖绅士，她还不得不把他介绍给令她头痛的她的家族的话，社会上一定会窃笑。因此，对于她只有一条路可走，也许她这样严词拒绝他是她试探他的诚意的一种严厉的方法，但她只能拒绝他的要求。

巴尔扎克在接到她的信时，好像被当头砍了一斧。他都整好行装要到德勒斯登去旅行了，他都为德·韩斯迦夫人提议，让她能更好的保护她女儿的财产而她只吃利息。他又写信告诉她他的各种幻想，告诉她即要实现的结婚，以及他们要共同发动的旅行，以及他们的即将居住的大厦。可是现在却接到这样一封信，这样清楚明了地说“您是自由的，”这样无可调和的说了一声“不！”

但是，一个否定的回答并不是巴尔扎克准备接受的。他的反抗已是习惯，而且这也只能够加强他的攻击力。每一个星期，几个每一天，他都要写一封热情的长信给她，让她坚信他的诚实与坚决，像暴风一样给她吹去阵阵可爱的狂风。那种他在给新沙特尔和日内瓦寄去情书时的心魂颠倒的特性又一度卷土重来，在久久的沉寂后又迸发了：

“我归心于你的强烈情感你是不能够体会到的。我在为人类的一切目标——爱情、友谊、野心、成功、骄傲、虚荣、记忆、快乐、确信——而归心于你，我归心于你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一切创造的美誉。”

他宣称他们从初次相逢之后，他一切都是为了她而写作。他的思想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总是他“在其名下完成一切”的女人。

他说，任何的让步准备他都在做在。他们的盟约不必明天或后天就可履行，但是她可以规定一定日子，任何一个日子，某一个日子，或某一个的年月使他能够期待他的希望的实现的可能。

“唉！我可爱的天使，这不是一件严重的事件，我恳求我的夏娃。我要你说的不过是‘我们可以在十八个月或是两年之后可以变得很快乐的’。我要你说的一声只不过是‘咱们’从而给我规定一个等的期限罢了。”

他恳求她能给他哪怕一点希望，使他能够得到安心的许诺，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够支持下去了：

“经过辛苦的十五年创作后，我已经对这个伟大的奋斗不能单个人支持

了。创造！永远创造！上帝创世只是用六天，第七天他就休息了。”

只要对他们最后的结合想到，他的脑中就像加入白兰地一样：

“噢，亲爱的，最后我们心心相印地生活在一块，彼此都为对方而活着，我们不爱任何东西的束缚！在有时候，思想使我变笨，我就在自问，我这十七个月的光景怎么在你我相隔这么远的地方度过的！金钱的力量是多么样的强大！必须依靠他，最优美的情绪才能得到，这是多么悲痛的一种景象！我的身体受到锁链的束缚，被钉在巴士街里，而我的心则悬在一千五百哩之外的地方！太多的日子我自己都陷身在梦境之中。我自己幻想一切困难最终可以解决，‘王后，的智慧、谨慎和技巧已经胜利了，她已经给我送来信，请我“‘来罢！’，我居然欺骗我自己的思想说我已开始旅行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一些朋友都不认得我了。他们询问我这到底为了什么……我回答说，‘我快要结束我的困难时代了，我有了希望。’他们就说我‘你疯了。’”

他开始计算从巴黎动身需要多少时间，多少路费，在一得到她到彼得堡去料理讼案的消息后。从哈佛尔到圣彼得堡要用四百法郎，回来自然还要用四百法郎。从哈佛尔到巴黎还需要二百法郎。对于他的旅行的必要，他立刻创造了无聊的理由。他说创办一个法兰西的剧院是他久已有的征服圣彼得堡的心愿。之后，他又说他的妹夫计划创立一个用轻薄资本造船的船公司这需要他去到圣彼得堡和有关各方面协议。他立刻又发现——或许为了对付来自俄国方面的书信检查——他怀有对沙皇的崇高尊敬，因为全欧洲的君王之中，沙皇是一个唯一的纯正贵族，于是他又宣布他对‘当一个俄罗斯的居民’并不表示反对。

于是，他的信像猛烈的炮火一样连续不断地向俄罗斯轰去。三月、四月、五月和整个夏天和漫长的冬季的整年漫长的时间都流走了，接着又是年轮的一圈，他的等待还是未被批准。这位寡妇在德·韩斯迦先生逝世后一年半之间，对她的“情人”始终没有发出“来罢！”的邀请。最后，在七月的时候，这个信号终于出现了。一八四三年七月，在整整距他们初次会面十年后，他从登克尔克到达了圣彼得堡，他第一个目标自然是德·韩斯迦夫人居住的枯代梭夫的住宅。在这里还有象征的意义，因为这条“大百万”街道正是这位住宅的座落地点。

第二节 一部小说代表一个时代

四十三岁的时候，重新赢得德·韩斯迦夫人是让巴尔扎克唯一知道的可以得到安静，让他去完成他所进行的伟大的事业。他一切的希望都下在这一赌注中了。在她让他等待了十八个月后才让他到圣彼得堡来的那段时期里，他这求婚人的身份，他也不断地不顾生死的努力改变他在反对他的她的家庭成员中的形象。但是他那中产阶级的污点靠他文学里的任何声望都不能拭去。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特别注意。他是一个农民的孙子的事实并不能靠他在家姓前面加一“德”字来掩饰过去。他们总是拿一种傲慢的御下的气派来对待他。然而，如果他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在政治上有了地位，国家也承认了他自加的贵族封号，说不定还要封他更高的爵位，或是他当上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评议员，这一切都会改变。这种荣誉完全可以消除别人对他的嘲笑而给他一个尊严。更何况，当上研究院的评议员，他就可以每年有两千法郎的俸禄，如果给他一个终身职业，字典编纂委员会的委员，他就可拿到六千法郎的年薪。还可以穿上饰有梭叶勋章的著名礼服，就可以门当户对的和德·韩斯迦·卢赤芜斯迦氏结为婚姻了。

为了争取到和德·韩斯迦夫人相同的社会地位，他就探索在这些道路上。但是每一条道路上，他都步伐滑动不了一步。对列入候选人的名单他没有最低数目的必要资本来保证，因此，当议员的雄心便失算了。在竞选研究院的议员时，他又是失败了，他的要求很快便被批驳回来，因为别人可以找到一个轻易的借口把他排挤出去，从而他所幻想在法兰西研究的四十名“不朽的人物”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变为泡影。人们说他这样一个老让执达吏和债权人躺在门外等的人未免有污四十位“不朽的人物”的神圣。“德·巴尔扎克先生太肥了，他恐怕坐不下我们的靠椅”，这是一句由他的劲敌说的最老实的妒忌之语。巴尔扎克把这些人物都看作是“腐朽”的人物，当然雨果·维克多和拉马丁除外。

对他急迫的困难，他还留下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个方法便是戏剧，于是两部剧本便仓促间产生了。一部是《基罗·巴梅拉》，芜德维尔戏剧接受了并进行了公演。这也是由他的两个“穷鬼”为他粗制了五分之四之多。另外的一部《桂诺拉的富源》也在奥德思戏院上演，巴尔扎克决心要创造一个震动的成功，让人们忘记他惨败的《芜特冷》。

这一次他又在他错误的方向上集中了他的努力。第五幕还未写完时就开始排练，著名的女演名铎里发里夫极为怒怨，并从中退了出去。而巴尔扎克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初次公演能成为巴黎从未出现过的美妙的景象。在第一夜巴黎的一切贵族和名人都得出席，绝对不准那些恶意的捣蛋者用怪声叫喊来破坏这美妙的空气。因此，他同戏剧的经理协商，第一次公演的戏票除了他亲身的批派之外不能卖给观客，他把他更多的修正剧本的时间都花在处理包厢戏票的犹豫迟疑当中。

他的行动是大规模举行的。各国的使节和内阁名大臣占据正中的包厢，佩有圣路易勋章的骑士们和世卿们排在两边的包厢中。第二楼的看台给议院议员和政府官员们，第三楼的看台让给财政界的名人，第四楼的看台让给富

有的中产阶级。池座中必须坐娇美的女人，以便引起最大的注意，而艺术家们也受他嘱托要把这巴黎的一切年鉴中再也找不到的匹敌景象成为不朽。

按例他的惯例，巴尔扎克最初的计算应是准确的。全巴黎传遍了即将演出的戏剧的各种谣言，包厢的票都被人拿走了，人们争价买票。但是巴尔扎克却总是拉得弓弦太紧，弓总是在他手中掉断。对于两三倍票价的建议他不听，而是只提高群众的兴趣，说票已全部卖完了。他甚至安慰观众买第二次公演的票，以免引起不能观看戏剧的悲哀。

在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九日晚上公演的时候，打开门去接纳显赫的观众时，四分之三的座位因巴尔扎克的错误策略而空着。那些到场来祝贺的人们当场就冷了半身。最后，戏院经理李勒派人去取“捧场的人”，并对任何愿来看戏的人免费送票，然而一切都落空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观众是随了舞台上的悲剧而嬉笑。只有那些想来吵闹的观众才来看以后的公演。场中发出了叫声，但不是叫好声，是嘘声，还编了两句临时的合唱：

“巴尔扎克这小子，
干了这些糊涂事。”

第一夜任何召他到幕前来的彩声巴尔扎克都没得到；无论怎么说，他已筋疲力尽于请他所选择的观众来充塞戏院；戏剧终场的时期，他已睡在他的包厢中了。他的空中楼阁在舞台上又摔得粉碎，他又被命运锤击回他真正的前途上来。他对德·韩斯迦夫人抱怨说，如果《桂诺拉的富源》失败了的话，他会另外创作四部小说，有了这句话，我们也不必太为他悲哀了，因为他在 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三年之间他写出了最有力的作品。我们差点就损失了这些好小说，如果他的可怜的歌曲能够成功的话。

这个时期是他小说最成熟的时期，有时败坏了他的初期作品的社会上的时髦的趣味在这里已渐渐无处可找。他已学会对社会进行观察，他又不被圣日耳曼镇的沙发所诱惑。伟大的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的虚荣心和小野心或渺小的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的大雄心已不再是刺激他天才的创造的源泉，而是赏心悦目的平常男女的感情。越是从经验和失望之中尝到苦味，巴尔扎克就越是接近于真理。那些沾染在初期作品的令人作呕的油垢也开始慢慢蒸发开了。

他的观察对象越是广阔，这观察的焦点也就越是正确。在拿破仑的政治背景下，他用一桩可怕的事情投下了一道探究的灯光。在于性爱的大胆的看法，他在《打水姑娘》中勇敢的提了出来，这是同时期的作家无法比美的一种思想。他是那样大胆地描写鲁志医先生这样一个七十岁的老头怎样抚养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来当他的情妇，而这老头的儿子又是怎样愿意把这女孩子当作牺牲品，他放胆地讨论这乘戾的情爱和性的束缚。他又是如何惊人的创造了布里都·菲力这个人物。布里都·菲力和芜特冷一样没有道理，但是没有戏剧性，而同真实的生活完全吻合。在这三个年头中，伟大的壁画《幻灭》和轻松小调《米露尔·雨儿眉》，他都创作出来，他用一种唯神论的人物写出了无神论的杰作，而高超的描写令人折服。他还写了《错误的情妇》，《两个新婚少女的回忆》，《沙发龙斯·阿尔培》，《初入人世》，《奥璠琳》，《地区的少女》和十来篇零散的东西，这充实了他的根基。

现在，他自己的事情，巴尔扎克想严肃地清理一下，已经到了让他考察他的写作的源泉的时刻。对他这最后的源泉，不管他的债权人如何逼迫，他也要保留住。他把出版全集的权力谨慎地保留下来。无论他如何的困难，对

于超过某种限制的出版次数的版权，他都不会出让。无论他在别的方面如何放纵和思维简单，他对最宝贵的产业都拒绝割让，直到他的不可磨灭的创造可以使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骄傲和妒忌的时候。

他为了追逐贵族的寡妇，他应该向世界炫耀一下他的巨大财富了。他一宣布要出版全集，立刻有三个出版家为这伟大的事业而投资，这个全集每年中有一部新作加入进去。一八四二年四月十四日签订的合同对杜保赤，福尔纳和嘿齐尔三个出版公司有如下规定：

“有权利去为印刊他们认为最合宜出版的全集而自由准备，包括刊行他到现在为止已出版过的著作的第二版、第三版，或在本契约有效期间可能发表的作品的第一版的三千部册数。全集的排印形式应是八开本，并包含有……差不多二十册的篇幅，依照全集的需要而定。”

巴尔扎克接到了一万五千法郎的预酬，还有的版税的办理要按卖了四万册之后每册抽收五十参丁的税率来。这样一来，常年的永远收入他就有了保证。契约里一个唯一的限制条款倒是他所愿意接受的。他要从自己的钱包中付清校对中超过了一页五法郎的费用，因为对只要印刷家给他送校稿去都要修改他的笔调的诱惑他不能够抵制，为此，校对的费用高达五千二百二十四法郎二十五参丁。而且“全集”这个名字，出版家也因其太平常而不愿使用，这不足以引起读者的重视，他们请求他找一个书名，而且可以表现出这是各部小说的一个联系，描写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和深度。

对这个要求巴尔扎克同意了。在十年之前，他曾为达凡·菲力士的小说集写了一篇序言，他表示他要向一个描写人类社会的要略方向坚强的走下，每一部书都是这个文学大厦中的一块砖石。现在，到了为这一系统的伟大工程寻觅一个可以表达整个范围的书名的时候了。对于许多提议他都考虑过，直至最后的运气来帮助他的时候。德·柏罗瓦，他的朋友和以前编辑部的秘书，从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文学之后回来了。他读了原本的《神圣喜剧》，这给了巴尔扎克一个启发，一个带有世界性的喜剧可以把他的那些小说联系起来，并和但本上的神圣的喜剧互相辉映，用社会的结构去对照神学的结构。好！还有什么比《人间喜剧》最好的书名了！

巴尔扎克是非常的得意，出版家也是笑逐颜开。不过，他们还请求他为这伟大的工程写一篇序言，给读者一个明了书名的回答。不然的后，有的读者就会对此认为有点夸张了。这序言巴尔扎克是非常的不愿意写。因为他的笔还在等待时间去干更为重要的事情，他提议说达凡·菲力士曾经为《十九世纪风俗的研究》创作了一个旧序言，这可以大体说明他的意图与目的。而且这个序言十之九是他自己写的。后来，他提到桑德·乔治，桑德·乔治与他很是了解，为一篇出版家所坚请的新序言，她可能相当慷慨地写出来。但是，最后他的意志倒了个头，因为受到了嘿齐尔的一封很有说服力的智信的诱惑，嘿齐尔还把一些有用的建议贡献给他，指出应怎样写这个序：

“尽量客观而谦虚的写它。您在您完成的伟大的事业中应有的骄傲，就可以用这唯一的方法来炫耀。您应当十分冷静地说。您得把您想像为一个老年人，您也应从以往的岁月中看到自己，和您创造的人物似的说话，那么，为此您就应该写一篇有用的东西。您就这样写罢，我的大伯伯，一个卑劣的出版家冒犯的对阁下您说了这样的话，您知道我这么办是出于一番好意。”

于是，巴尔扎克坐了下来，把这《人间喜剧》的著名的序言写了出来。当然，冷静和客观在这篇文章中超出了我们所期待的。对嘿齐尔的劝告，他在实践中聪明地感觉到极为有道理的。在他的伟大的题旨和人家教他去表现的个人的谦卑之间，他也很成功的找到了一个中庸之道。他告诉德·韩斯迦夫人；为这一篇十六页的序言他花了比一部整书还要多的气力，这也不是过甚其词。他在这里释译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系统，和圣喜勒尔、几奥福罗瓦和步风的系统相比较。正如自然界中，各种不同的兽类依据环境而发展为特殊的生物，人类也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如果有人要写一部容纳三四千人的“人心的历史”的话，每一层社会阶段，这阶层中每一个形式和每一个人物和故事都应有感情，艺术家必须努力去把握这个，把他们有机联系起来，并构成一篇完整的历史，使“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代表一个时代。”

因为无穷的变化是人类天性的特性，艺术家应该去观察，于是巴尔扎克把他的论点的纲领在这里提了出来：

“小说家有着最大的机遇。只需研究，就有创造。真正的历史学家是法兰西的社会，我不过是指挥这个历史学家的一杆笔罢了。在记录社会的善恶、选择社会的重大事件，把许多同类的人物提炼铸成典型的过程之中，一部历史学家所忘记动笔的道德的历史居然被我记下了。”

给十九世纪的法兰西写一部历史，这就是他的目的，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工作没有由罗马人、雅典人、孟凡斯人、波斯人或印度人为后世流传。他要为他这一世纪的社会描绘一幅画像，同时对这社会的秘密的动力也要揭破。巴尔扎克大声的宣叫小说家的事业应是写实主义的，但是同时他又说并非一切不符合事实的小说都是没有价值，然而他同时也得是无形中要求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呼声。他的计划在他的广泛的大纲看了展开了：

“《私人生活的场景》描写童年和幼年，说到他们所举向的错误的一步。《外省生活的场景》揭示感情，计算，自利，和野心的年代。《巴黎生活的场景》最后描写各种不同的爱好和恶习，加上一些行为方式的放肆，这是各个都城中都有的礼仪风俗的特征——因为这种地方，善和恶相接触而有了最强烈的反响。”

“……在描写了社会生活的三部分之后，我还要用另外的事业来与此对照，对爱特殊环境的影响的人所过的生活进行表现，这些人是一切人或许多的人所感兴趣的，他们都是逍遥法外的，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引导我去写《政治生活的场景》。这幅社会大图在完成之后，他为着自卫或征服的目的而超出自己的范围所发生的最激烈的作用，我有无揭示的必要呢？对于这个，我在《军旅生活的场景》中有所描述，这是我完成最少的一部分工作。不过，在我的集子中我为它留了个地方，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他补上去。最后，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乡村生活的场景》所表现的社会的戏剧是我长期工作之后写出的。最纯洁的人物和法律、政治、道德的最大原则和应用，读者可以在这一部分里找到。”

结束他的序言巴尔扎克运用了惊人的和音：

“一个社会的历史的社会的批评只是这计划的一部分，它还包括一个对于社会原则，社会恶习的解释。我相信这种计划可以让我正确的给现在出版的集子加上一个书名：《人间喜剧》。这不是太荒谬了吗？这配得上这个名称吗？读者可以在它完成时来判定。”

这部书名不是荒谬的，这被后世的人们判定了，虽然我们今天拥有的也只是这巨构的躯像。不幸的是，正当巴尔扎克为他计划的整体的作品而继续写作时，他的手被死亡击中。在他说到“三四千人物”的时候，其实是超过了这个情形，这和他喜欢开期票等到将来去应付的习惯相符合。《人间喜剧》只包含了大约二千多个人物，这不足他预期的数目，但也是极为可观的。不过明显的事实是，其他的已经存在于巴尔扎克的无尽的脑袋创造之中了，在一八四五年，巴尔扎克曾准备了一个目录，把他已出版过和还没有写出的小说的书名全部列出来。在今天读到这目录时，我们不禁感以悲伤，正如我们阅读绝对看不到的失去了苏可夫的戏剧或达·凡西·黎昂拿尔多的绘画的目录一样。这目录中标出的一百四十三个书名中，只有名而无书的就有五十本以上。但是他的计划已经充分证明他头脑已形成详细构思的各种各样的形状的蓝图，而且是那样富有高超的建筑师的技巧。

《孩子们》是第一部他要写的小说，第二部和第三部则要描写一个女生宿舍和一个男生宿。他要描细一整部的戏院，对外交界、政界、学术界和政党的幕后实情，巴尔扎克也计划去揭破。在不只十二部他计划描写的关于拿破仑时代军事生活的小说中，只有《朱安党》见了天日，别的如埃及之战，阿斯本和瓦格兰姆之战，莫斯科的败退、莱普锡抵抗各国联军战斗，法兰西本土的斗争，以及囚禁法兰西俘虏的狱船等等，恐怕都留在了巴尔扎克的脑中。农民、法官和发明家，应该都各用一部书描写他们，而为此描写而进行的研究应当有几篇解释和分析的论文作为附录——《社会病理学》，《教育界的解剖》和《有关十九世纪的美德的哲学性和政治性的对话》。

这些无疑可以写出来，如果他活着的话。像他这样强记的想像力，任何结成的形状呈现在他幻想中都是无分的。他缺少的只是时间，时间总是在他那短促紧凑的生活中的紧俏商品。

巴尔扎克的全世界宣布他的全集刊行的时刻，一种骄傲的冷静感觉在心中当然会滋生。他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画出了界线。第一次指明他所努力的目标，对于这样伟大的事业，他的同工没有一个敢想，五分之四的计划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庞大的工程再过几年就可以竣工。在《人间喜剧》的最后一册出来，他的私人事情也有了秩序之后；对他一向错过了他的野心里，他又可以自由地运用他的能力。休息、生活、享受和快乐，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苏可夫是著名的希腊戏曲作者。

达·凡西·黎昂拿尔多是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画家。

第三节 回到巴黎

巴尔扎克只是想像德·韩斯迦夫人只是度过一年守孝的时期，他们的约言一定会履行，但是时光一日又一日地流逝。最后在他的诚恳祈求下，她才屈从了，允许他到圣彼得堡来会见她。她已在一个困难的沼泽中陷入了。巴尔扎克是个有名的人，在这拿瓦河边的城市里，任何法兰西的世界闻名的作家也没有居留过，到俄罗斯后，他不可能不引人注目。从迦太琳皇后以来的激动必然会中巴尔扎克的到来而引起。他和她身上一定会集聚全部的关注目光，因为她是上等社会的一个分子，而且沙皇也招待过她。无法避免谣言。在她丈夫活着之时，尚可借家庭的应酬来解释巴尔扎克的访问。然而，来和他的寡妇相见，这让人觉得是来订婚的，就算德·韩斯迦夫人会急于与他结婚，她的意向也不会实现，况且她也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根据当时通行的法律，只要在沙皇允许下才能与外国人结婚。而且除有特许，财产还不能转向国外。所以她也不能如她所愿·和巴尔扎克天真幻想的一样，她的财富可以在除了俄罗斯以外任何国家中自由处置。如果借用近代的术语，她的金钱是一种“被禁锢的卢布”，除了非法走私外不能带出国境。而且事情在她的家庭的反对之下更加困难了。特别是姨母罗沙利只是把巴尔扎克当作一个想骗取财富，使一个富孀转嫁给外国的穷小子，而不是一个天才。对这些贵族亲戚，也许夏娃——我们并不清楚——下过决心反抗，但是她所溺爱的没有成亲的女儿她也应该想到。如果她错走了这步棋，她和她的女儿一定会被俄罗斯社会抛弃，那么女儿的婚事也定会受到影响。

因此，并非她的恶意和地理位置的远离这此人们误认的理由让她叫巴尔扎克久待。相反，她已经作了一个勇敢的动作，允许巴尔扎克到圣彼得堡来，因为这至少可以表明他们的意向。她的思想改变，巴尔扎克明白不能只靠信，如果还像以前在日内瓦似的，她受了他的游说能力的说服，那么他这次要再试一下。他把一切可以换到金钱的稿子和几篇没有写好的剧本卖了出去；在经过海上困苦的漫长旅行后，他于七月十七日有圣彼得堡登岸了。

在巴尔扎克和德·韩斯迦夫人阔别八年之后，一种奇异的会合使他们在枯梭夫宫的标致的客厅里重逢了。他的行动举止和以前一样热忱，除了胖了一点和有了几根白发。因为永远年轻的秘密是幻想的天赋。不过在一个女人生活中，八年的时光是多么漫长。就是达芬格尔在维也纳为她描的小像中，她也显得有点有了。假设可以相信巴尔扎克的情书，那么她在他眼里比任何时候都年轻，虽然她已生过七个孩子。长期的分别之后，他也装出对她的感觉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的样子。可能他希望他见到他后放弃他的初衷，因为她不是他在这几年里想像得那样，但实际却非这样。他劝促她与他成婚，他已定了一个计划，授权领事去证婚的必要文件他甚至都已装在口袋里带来了。

对此，她是设法摆脱他，她也没有给他一个断然的拒绝，但是对他说在她的女儿结婚之前他们的关系只能保持现状。不管怎样，他到底有一个等待的时间。最多不过一两年。耶可布曾经为拉赤尔服务了七年，后来又侍候了她七年。对于德·韩斯迦先生的位子，巴尔扎克也等了七年。现在，在她女儿有着落之前，她又开始让他等待的第二时期。

巴尔扎克在圣彼得堡居留的记载是很少的。夏天的时候，贵族们都到乡村

的地产中生活去了，京城都空了。他好像没有到什么地方参观，甚至对黑尔米达慈博物院和它的图画他也没有提到。也许他脑中除了这个让他到俄罗斯的目的之外已没有别的东西了。不过，他在离开圣彼得堡从陆路经过柏林回到巴黎的时期，一个许诺已装在他的口袋中了。

他在十一月回到巴黎，照例又是坠入了漩涡之中。不断与他赛跑的时间又失去了四个月，他离家的时候，他的事情也没有好转。为他照料家事的母亲“照样跟一个真正的夏洛克一样折磨我。”在他离开国时，他的戏剧《基罗·巴梅拉》曾上演过，他希望从此中弄到一些俄罗斯之行中的旅费之损，也希望回来后过点清静的日子，然而演出的失败又一次无情的打击了他。虽然它没有琐碎得像《芜特冷》，粉饰得像《桂诺拉的富源》，但是对巴尔扎克对巴黎报界的腐败的攻击，批评家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猛烈攻这个剧本，使它不能上演下去。各种东西好像全都串通好了对付他。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金钱投机在北国铁路的股票也跌价了，他的忧愁因清算约尔地的地产的困难而更加深了。他又一次面临整个的经济崩溃，他只得把这短期的旅行用彻夜的工作来补偿。

他的不幸却是我们的幸运。戏剧上的失败使他又被迫回到小说上来，在极短的时间中，他为《人间喜剧》增添了好几年，从出版《私人生活的场景》和《巴黎生活的场景》的修正本开始。他几年来他写作的《农民》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协商用连续登载的方式来刊行。但是危险总是出现在他的那些延搁太久去完成的计划。每行拿到六十参丁的报酬，这是他已经计算好的，他可以把陆续登载这部书的权利卖给《新闻报》，那可得到一万四千法郎，另外还可再卖版权得一万两千法郎。《新闻报》已刊登了预告，他也写了好几章，但是他突然支持不下去了。他的弹簧已被压扁了，巴尔扎克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再也应付不了这无尽的要求了。

他的健康是慢慢开始破坏的。树干还强壮有力而且生产果实的时候，叶子每年换新一次；但是虫子却在咬噬果实的核心。这变化的发生，他也多次怨叹精力不足，例如一八四四年四月的信：

“我陷入了一种昏睡不醒的泥潭中。我的意志已指挥不动我的体力。它要求休息。咖啡也不再能刺激它。我喝了许多许多咖啡，希望刺激它为我完成《谦虚的朱昂》，但是跟喝水一样，任何效果也没有产生。我三点钟时醒来，接着又昏昏入睡。八点钟时吃完早饭，然而却又想睡，最后终于睡着了。”

一阵阵的痉挛抽动他的脸部肌肉，而且他还不断肿胀、头痛、眼神经抽搐，对于《农民》的第二部，他都怀疑自己是否有力量写完：

“我进入了一个可怕的神经痛苦的阶段，由于过度喝咖啡而生了胃病。我必须进行完全的休息。三天来我一直被这前所未有的痛苦所苦恼。病刚来时，我只以为是感冒……噢！我无法形容我的忧虑。今天早晨，我算了一下这两年我所写的有多少——四册《人间喜剧》，从现在起的二十天，我不可能做什么事了，除了坐上邮车离开这里。”

后来，他又写道：

“我在筋疲力尽地与耶可夫和天使搏斗。还有六册的东西等着我去写。这将来出来的著作全法兰西都在注视着。根据书商的旅行代理人的报告和我收到的信件，这是不用怀疑的。《新闻报》又增加了另外五千家订户。人们

都在等待着我——我却觉得如一个皮袋泄气一般地毫无生机。”

这种疲劳不权是身体上的，他的大脑也在磨坏。他最迫切的需要是“设法得到休息”。他觉得救他的只有德·韩斯迦夫人：

“总有时候一个人的理性会因为极度的希望而失去，我就是落到这个地步。冀求获取这目标是我整个生命都在集中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我的心中这已发生了动摇。”

他已不再有太多的兴趣于他写的东西，因为他的思想飞得太远了。他的人物命运他已不去构造，而开始梦幻构造自己生活形状的方法：

“我们在一八四六年可以拥有巴黎一所最优美的房屋，我也一苏钱的债不会再欠。我的《人间喜剧》可以为我赚到五十万法郎，而且还没有把我可以得到的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版税算在内。因此，找美丽的夫人，如果我能够长寿的话，我就能拿到与我的声望相称的一百万法郎。如果像你说的跟我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要了一个穷女人的话，那么你嫁的也不是个穷小子。我们将成为一对美贵的老夫妻，其实只要两个人相爱，这也没多大的关系……只要 we 当中还有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痛苦！苟活在人世的那一个人的生活会是难以想像的痛苦！”

我们不妨再回头来叙述一下一八四四年的情形。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线的光芒。德·韩斯迦夫人决定到德勒斯登来居住而离开乌克兰的故居。七月的时候，一个有钱的年轻贵族梅尼齐克·乔治也和她的女儿安娜订了婚，天真的巴尔扎克认为一切他面前的灰雾都拨开了。让耶可夫把新娘带回家来的时刻到了。但是他又面临另一个失望。顽固的德·韩斯迦夫人坚持要与她的女儿和将来的女婿在德勒斯登过冬，而不允许巴尔扎克去探望她。在这德意志的城市中，她到底是怕遇到同乡或亲戚，或者因为她讨厌他的外貌，或是对他认为已固定好的婚期，她要有意的延长，我们也只能揣测这些事情。不管怎样，他要来见她的要求是被拒绝了，她给他送来的唯一的信任的信号是委托他去办一件令他极为伤脑筋的事。

她派她的女伴，保勒尔·亨利爱特，她女儿从前的女教师，是位瑞士小姐，在他们初期的通信中所尊称的“莉勒黛”到他这里来。亨利爱特忽然宣称她要离开德·韩斯迦夫人家到修道院去修行。这是一个惊人的决定，尤其对于一个瑞士的加尔维尼派教徒，其中显然是有秘密的动机隐藏在背后。她受了德·韩斯迦先生死的打击，也许在某一方面他爱恋德·韩斯迦先生，也许是因为她的良心想到以前是她促使他的妻子背叛他而作痛。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和德·韩斯迦夫人的关系开始变冷，而她心中也有了秘密的仇恨。这从巴尔扎克的《从妹贝特》里可以看得出来，巴尔扎克应用了她作这本书的原型。德·韩斯迦夫人也不再依靠她的伺候，她就指示巴尔扎克去帮助这老处女去完成她的心愿。他是相当热情的招待了她，因为他觉得她曾给他帮助。德·韩斯迦夫人也请求他给她办好一切必要的手续、为她布置，让她能为罗马天主教收留。询问重要的僧侣和修道院的当权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他的努力居然成功了。她削发为尼的典礼他也参加了，就这样修道院的高墙就把他在《无名女郎》小说中头几章的助手淹埋了。

最后在一八四五年春天，他收到了德·韩斯迦夫人的来信，说是她希望见到他。他立即丢下手中的书稿，也不在意等待他继续出版的已预约书籍的几千读者，以及那些已预先付过稿酬而对他失信愤怒的出版家，他放弃了全有，立刻到了德勒斯登去。因为为取悦别人而发明的小说没有他自己的生

小说来的重要。与债权人人们争斗的是他的老母亲，平息读者愤怒的是出版家基拉尔了。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工作，和其他生活的人一样，他要生活！

对于巴尔扎克在德勒斯登所有的思想和经验的书信我们一封也找不到了，但是快乐、惬意一定充满着他的生活。他跟梅尼齐克伯爵和安娜相处得极为融洽。梅尼齐克其实并不聪明敏捷的，而是很愚蠢，他的主要嗜好是捉昆虫；但是他的态度很温和，和喜欢享乐的安娜一样，他无时不在嬉戏。我们可以想像上天送巴尔扎克是来给他们解闷的，他与他们一起享受生活的轻浮和快乐，他记起他在巴黎看过的一部喜剧，就为他们的小圈了起了一个雅号“丑角队”。他们像一群戏子班一样周游欧洲，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去招待看客，而是社会招待他们。

他们一块儿旅行到康慈塔特、卡尔斯鲁埃和斯特拉斯堡。他甚至都劝说德·韩斯迦夫人到巴黎来访问，虽然她要偷偷而来，因为这是俄罗斯臣民的禁地，在革命的法兰西土地上旅行是沙皇不允许的。不过这一类的困难，巴尔扎克懂得如何巧妙克服。德·韩斯迦夫人扮作他的妹妹，得到旅行许可证，安妮就可以他外甥女欧琴妮的身份出现。在巴黎的巴士街，他们租了一间小房屋，对这巴黎夺人耳目的美景出神入化地指引他们观看。他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向导，陪着他们用新奇的目光参观巴黎，也分享了他们的乐趣。八月的时候，他们到了方登布鲁，奥里昂，布尔慈。他带着他们环游了他的出生地杜尔，他们从那里可以到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他们在那里滞留了一段时间，巴尔扎克便短促间回了巴黎一趟。九月的时候，他又匆匆到了巴登——巴登也他们会合，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然后，他们又动身到意大利旅行。十月的时候，他们到达了马赛。过路到拿波尔去。

他在这一段时间内一丁点儿的工作也没有干。朋友、出版家、债仅人，都被他抛在脑后。跟他希望要上的女人在一起和他是自由的是他唯一关心的一点。就是《人间喜剧》也不要紧。凭他那吸取和传达印记的能力，他一定大大地享受了一番。几年来他昼夜不止地为他的工作而熬干了血，现在他要补充，吸取来恢复他的精神、他的气力。他是幸福的，因此，他也是缄默的。用艺术家的身分来说，他只是在环境的压迫之下才去创造的。

我们无法知道他在这短期的插曲之间的债务和契约。没有人能够理清巴尔扎克的财政乱麻，我们所能证实的只是他的口袋里从未流出一点他在此中的费用。他们之间分配金钱的方法好像有一种规定。德·韩斯迦夫人把他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有一两年，虽然她还决定嫁给他。她实在认为这是一件绝美的事，和她的女儿，她的未来的女婿，以及她的旧情人巴尔扎克一起游历欧洲。也许她恐怕的一切就是单独与他在一起。

第四节 巴尔扎克的收藏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从未听说过巴尔扎克其人的过路人，并把他在1845和1846年里所写的信交给他，让他判断一下巴尔扎克有什么嗜好和职业的话，他对写信人是一个方董收藏或图画收藏会是相当自信的回答。可能他也会猜想写信人是一个地产投机家或是一个房屋出租人。他绝不会认为是出自一位小说家的手中。巴尔扎克想给他未来的新娘一座房子的热情绝对大过完成他的《人间喜剧》的注意，这座房子，他计划用他的劳动所得和她的资产来建造。

这一次，他又是把车子放在马前面，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把空车子放在驾车的马要来站在上面的地点之前。在1845年，对于他脑子里的大厦，他既没房子，也没建房子的地基，更没有足够的金钱去买一块合适的土地。但是他却急躁的为他的空中楼阁买置家俱。一夜之间，他又有了收集古董的嗜好。一个三位一体的宝室才是他和新娘子居住的房屋，即同时是宝藏室，画廊和博物馆，他准备与罗佛尔、黑尔米达慈，乌飞西和其他欧洲的王宫相竞争。他要在墙壁上挂满霍尔拜因，拉发埃尔，凡·代克，郎布兰特和瓦都的图画，宝贵的地毯铺在客厅中，古典的家俱、细雅的瓷器。他梦想着一切可以从阿拉丁的神灯里变化出来的各种宝物。

当然，这需要足够的资本来搜集这么多贵重的艺术品，但巴尔扎克解决的办法却异常简单。从拍卖行里他买了一些零星旧货，然后他又宣称他发现了一批稀世珍宝。他的母亲遗传给他的投机嗜好使他着迷于古董收藏的这一误途，结果每到一城，他一定要搜索各种廉价的物品。他好像陷入一个泥沼而不能自拔。他会在这里买几张画又在那里买几只画筐。有的时候，他又骄傲宣称他拥有了许多花瓶，有时候，又成了几只烛台的主人。从德意志、荷兰、意大利，一筐筐的宝物相继运到他将来的寓所中。他不管买来的物品有无真正的价值，他只是——一味地像一个疯子一样受到这一行学徒的摆弄而买下一堆堆的废物。但是他有一种信心支持着他肯定会得利的危柱。他也不断向德·韩斯迦夫人发胜报，让她随时知晓他最近的收获。

德·韩斯迦夫人也并非一个俭朴的女儿。她和她的女儿也发疯地到和平街的珠宝店中买东西，她最喜欢梳妆台上贵重的嵌金物品，为此商人们大发而发，她只是计算物品的价值，而不考虑金钱的流失。可能她把十万法郎送给巴尔扎克让他自由处置——他们管这笔钱为“老狼的宝库”，因为在他们来往的信函中，巴尔扎克的绰号叫“老狼”——让他去购买家俱来布置房屋，他的基本观念照例是合理的。对于他来说，他要等待时机搜寻优美的古代家具，而且他可能在有利的机会中拾到便宜货，那他便可以花几个小钱便把他们的房屋装饰得富丽堂皇。但是，他的耐心不够，他一旦开始购买东西的闸门打开就再也关不住了。最初只是合适时购买，后来则是惊人地发展为一个古董收藏家。在他的一生中，总是有一条清楚的界线，两边分立着冷静的推理和愚蠢的疯狂。德·韩斯迦夫人开始对此不放心了，她警告他应当慎当些，但是他对他的工作用了一大堆详细的计算进行了证明，说明他是如何经济地省下了她给他的钱。

对他这种常用的自欺欺人的方式，任何读他的信的人都会讨厌，不过，如果我们送他一个买卖的经过考察，看他如何企图发财，也是不免令人发笑的。例如，他买到了一套可供九人用的中国“古瓷饭具，就得意非凡的宣扬：

“我买这个只花了三百法郎。仲马却为国样的一套花了四千法郎，而它真正的价值至少应为六千法郎。”

结果，他承认他买到的只是荷兰仿制的中国瓷器。

“它也并不比我更像是中国的产品。”

他还痛苦的加了一句话说：

“请相信我的话，搜集古董是门深奥的学问。”

这也并没有阻止他继续用轻浮的心情去追求这门困难的学问。只过了一天工夫，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就又买了好几件东西：

“三个钟头之内我到处跑，买了许多古董。第一：一只黄色的杯子，估计至少值十个法郎，是一个工艺的杰作，而我花了五法郎。第二：一只蓝色的施维尔杯子，有帝政时的派头，带有不可想像的富丽颜色，上面有许多花束，光这一点就值二十五法郎，这是人家送给达尔马的，我只花了二十法郎。第三：六张真正官制的靠椅。我要留下四张，另外的两张将改造为睡椅。那迷人的包金颜色太好了！它们满可以把小客厅装饰好，而我只花了二百四十法郎。”

同一天，在奔跑中他又找到了：

“两只施维尔的花瓶——估价在五六百法郎之间，告诉你，我只花了三十五法郎！这是我做的最便宜的一桩买卖。他们的巴黎是一般人不能认识的。只有有时间，有耐心，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无数的珍宝，而且都是说不出的便宜。你可能不会相信，如果看了我花了五个法郎而捡到的黄色的贵瓷瓶的话。”

他同样又议价购买一个烛台：

“它以前是德意志皇帝的用具，有二百多磅。是用结实的黄铜制成的，就是按每克两法郎二十参丁的黄铜价格我也可以用四百四十法郎的价格买下来。”

因此，他好像没花一分钱一样，其实，整个的房屋应当这样装饰：

“你可以像王后似的生活着，贵族所能供献的一切豪华都围绕在你身边，你处在最大可能的财富和奢华之间，而且我们还有保留资本价值的作用。”

他自信任何人也买不到比这更便宜的东西了。

“我要你知道我这只老狼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经理，一个能干的业务熟练员。巴黎的任何一个角落我都搜寻过了。真正的好东西都是成倍地每天涨价。”

在一次偶然机会之中，他上了一个大当，对此他也不得不承认：

“路易十四时代所画的一张塞维疑夫人的肖像被我发现了，花了一百法郎。这是一个杰作，你要吗？”

但是第二天他就知晓了它的真伪：

“多么可怕的肖像！”

杜卡是古代欧洲的货币。

达尔马是拿破仑时代法兰西著名戏子。

不过，能从布袋里抽出另外一个彩物，他总觉得万分侥幸：“我找到我法兰西的王后勒辛斯迦·玛利你的姑祖母的一张肖像，是古瓦柏尔所画的小像，非常的相酷似，起码也是他的一个学生画的，我兴奋地对自己说：‘好样的！老狼！居然被你把这幅画找到了！’我买它只花了一个画筐子的价钱。”

一个星期之后，他对它的真伪作出了判断，这“只是”郎克勒的一张画。幸好他能够以八十法郎的价格把画筐子卖给一个商人，整个东西他只花费了一百三十法郎。在有时候，他写的这样一段文章被人发现了，人家对他的愚蠢程度实在怀疑：

“这一张小山水是鲁易斯达尔画的。米维尔因我花三百五十法郎而捡到拿杜瓦的画和霍尔拜因的画而妒忌的。”

这个时候，他正是在《从兄蓬斯》里讨论霍尔拜因图画的昂贵，他认为不拿几千法郎买不下霍乎拜因的画，对于画商为什么会让他如此便宜的买下画，他恐怕从来没有考虑他们的愚蠢。他从没从这一条路去思考问题，而只是欣然走到梦幻的道路上去挖掘被人忽视的财宝。在每一条街上都有宝物在等待着他。他曾说过：“巴黎遍地铺着便宜的贵重物品”。

巴尔扎克的妻子在他死后在杜鲁奥旅馆柏卖他的遗物时，实际情况当然是相反的。根本没有霍尔拜因和鲁易斯达尔的画，任何一张标有“巴尔扎克收藏”的画中，我们一张也找不到有价值的。就是最贵重的物品卖出的也只是令人可笑的价格。教导他买东西要比卖东西容易得多的，除了那个惨重的花了十万法郎而只卖了一万五千法郎的约尔地产业的大教训外，还有一个小故事。

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一家古董铺中，他发现了一张书桌和一个旧柜子。这些可能是意大利典雅的出品，这从雕刻上可以判断。他产生了一个直觉，这个可以使他用一个时辰把一架平常的时辰种变为一个曾经“属于英吉利的亨利埃达王后”的东西的魔术直觉，他又果断地判断：

“他们都是最优美的王宫里用的东西——在佛罗伦斯人们为德·梅迪西·玛利亚制作的写字台和柜子。她的徽号都刻在上面，是用结实的紫檀木制成的，镶有珍珠母。富丽精致的花纹可以使已故的桑梅拉尔先生销魂。我觉得极为难。罗佛尔王宫其实应该来收买这两件物事。”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巴尔扎克的直觉是怎样不可避免地与他那投机的尘沙搅拌在一起，这可以充分说明。他欲求获利的想像中总是一腔热情，虽然审美是他的第一个动机，但是爱国主义的色彩也不是没有染上：

“这两件东西是保护吕邦斯的一个王后的纪念物，必须要从中产阶级的手中把它拯救出来！为这两件东西我要写二十页的文章来讨论它的价值与意义。”

他又一口气加上说：

“从投机的观点来说，至少一千法郎的利润可从中获取。”

第二天，他便把这两件家俱用一千三百五十法郎的高价买下了，他又因另外一个灼见而增加了快乐：

“我惊奇地发现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关于这故事的细节，今天早上我就要考探。只有柜子是属于德·梅迪西·玛利亚的。写字台的上面分明刻着刚齐尼或是德·埃伯尔囊公爵的徽号，但是他也在那美妙结缠上有两个“梅”的字母！这证明德·梅迪西·玛利亚和她的一两个情人可能与这张桌子有关。她拿她的柜子送给了他，同时又为他制了一张写字台。德·安克尔元帅虽然

他是一个外表滑稽的元帅——给这东西用珍珠嵌上了枪炮和其他的军事标记符号。”

这一无稽之谈的唯一的一点真实史实是，王后的确曾宠爱过后来当了德·安克尔元帅的刚齐尼。其余的都是幻想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形成的。但是这也很快使他的发现增加了价值，对于一个他想像的买客他也不至于找不到：

“光这只柜子就值四千法郎，我要把它卖给属于国王的桑梅拉尔博物馆，写字台我自己却要留下来。”

当然，他在这里的利润又可投机下一次的买卖：

“如我能卖给菲力浦·路易这个柜子三千法郎的话，那我太高兴了。这样，一千六百五十法郎的利润就到手了，我便可用此为基金，我可以更深地走向古董的宝库来增加我的财富，增加我的宝库。”

对这些买卖，德·韩斯迦夫人怀疑是不聪明的，她劝告他不要产生这种“购买家具的疯狂”，但是他回复说：

“我已经计算好，这两个东西花费的钱我可以卖掉一个后就赚回来了。这样我就可以不费一文钱就把另外一个拿在手中了，同时我手头也有了付烛台的钱了。”

他于是同一个精明的买卖人一样利用了报纸的广告力量：

“我的发现是怎样轰动全球，不久的将来您可以从新闻报纸上看到。”

二月十一日，《消息报》上登载了一段巴尔扎克自己写的小报告：

“我们的一位最伟大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极顶的鉴赏大家，偶然间在古董中发现一个带有超卓历史韵味的家具。这个东西便是曾经装饰过德·梅迪西·玛利亚的卧室中的一个柜子。这个家具便是我们可以想像的最完美的艺术品，他是由结实的紫檀木制成的……”

关于这个曾属于法兰西著名王后的上选家具，国王并没有注意它。最后，来看货的是几个受了广告诱惑的商人。巴尔扎克几乎是高兴得飞于九天之上了：

“一个买货的人来了。对这两件福罗兰斯的家具他愿意出一万法郎买下，并打算转手以两万法郎卖给国王。他答应给商人杜孚尔一千法郎的代办稿劳费。但我的意愿是只卖给他柜子。各方面的人，甚至古董商人都来看货，他们都赞叹它的精美。”

渐渐地，那些欣赏家的赞叹冷淡下来，三个月了也没有实现任何一个买卖，他的直觉是个错误任何人都料到了，但巴尔扎克不这么想，他反而提高了价钱：

“我要在我的富所中保留一件。一切的赞词都不能表现它的完美，它实在是太伟大，太卓越了，我实在无法用文字描述它。所以，我对其中任何一件不想无限制地留下。六万法郎，这是最知名的商人对这一件的最低估价。修理写字台的细木工说只是这工钱一项就值两万五千法郎。他认为制造它至少要用三年时间。它上面所嵌的花卉图案就是拉发埃尔看到也不至于有什么愧色。我要看看到底伦敦的桑特兰公爵或是一个什么爵士或是一个什么皮尔·罗培尔或是其他的人是不是愿意给我三千英镑的价钱。有了这个价钱，我就可以出让了，这样我的债务就能付清。不然的话，我就要一直在我房间中留着它。”

又过了一个月，从任何一个英吉利世卿方面他都没得到任何出价购买的

信号。巴尔扎克对此并不气馁。他用一个无可克制的坚忍酿出了一个计划，他计划为这两件家具制造一张雕版，并在《家庭博物院》上登载。这个杂志可以给他五百法郎的版权，购买这柜子和写字台时所花费的款项可以用此来抵销。

春天已让位给夏天，夏天又在秋天之前隐退。但是《家庭博物院》并没有印出这雕版，在地平线上任何可能的采购人也没有出现。终于，在十月时候，有了一线光芒：

“大消息！罗特弃德对我的福罗兰斯家具已发生了兴趣，他要来看我，他的目的一定是为此而来。我要价一定低于四万法郎。”

一年多的时候后，就是靠广告诱惑也找不到一个采购人之后，这闻名的银行家的交际拜访就得让他再把价钱提高一次。关于罗特弃德的拜访的确凿的消息，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但是我们又发现他谈到了特凡柴尔公爵，叹息着说：

“噢！如果这有什么结果的话！那么这就可以把情势扭转了。”

但是，连这个也没有结果。最后的企图又在第二年出击了一次，他想与荷兰国王打交道，在他的忧愤之中，可笑地说出了价格：七万法郎！他的朋友高提埃·提奥菲尔也被动员起来帮助他来办这买卖：

“我需要高提埃为我写一篇关于这两个福罗兰斯家具的文章。预备图片我们只有一星期的时间，我要把这图片的校样寄给荷兰国王。这会引起一个风波！”

这也并没有成为事实。这个柜子和写字台，他始终没能处理好，幸好，后来在杜鲁奥旅馆中拍卖这两件东西所收的价钱是怎样的可怜，他也没有来得及知道。

家具和瓷器、篮子和柜子，这些堆积在一起的破烂，是瞒过债权人的尖锐的眼睛。现在是时候了，应该用德·韩斯迦夫人的名义买一座房子来躲避公债人的追逐了。开始的时候，巴尔扎克照例小规模地进行，因为他在巴黎要和她过一种“十分简朴的生活”，虽然他们每年至少得花费四万法郎。他说，这已不能够再便宜了，因为雨果花了两万法郎而只过着“一个老鼠一般的生活。”

对巴尔扎克说，买房子并非仅仅是找一个居住的场所而已。这还应该是一笔好买卖：

“这三年来，买一所好房子的念头不断在我脑中出现，而这大部分是考虑经济的结果。无论怎么说，买房子是个有利的买卖，毕竟是一个最自然的想法。”

他又到处物色，看到任何有可能的房子，他就感兴趣。巴士有一所价值十万法郎的房子。他在这房子上没法只花了六万法郎：

“他们要筑一条通过巴士的新路，免得通过山岭，房子的地基底下十二尺左右就是这条路。政府还要向我们购买一些土地，人家告诉我，政府可以再给我们一万法郎的补偿。除此之外，佛兰克林街的土地我们还可卖他这么三万法郎。”

十二月的时期，他为了勘查房子的地势而到了莫索一次：

“我们的资本可以无疑的加倍增加。”

最后，他就在蒙巴尔拿斯街发现了一所房屋：

“这房屋像手套似的对我们合适。”

其中必须加以考虑的只有一件小事情：

“必须拆下一部分。”

内部要进行完全的改造，这又要花费两万法郎。不过，这可以很简单轻松地恢复这笔费，只要简简单单的进行购买其他可以转售获利的基地。这种老方法就像当年那样购买一所印刷所去使他的出版公司立住脚，又买一个铸字所去防阻他的印刷所破产。

春天的日子里，他把目光放到乡下，他们不但可以无需花销地生活在那里，同时又可安闲地过平静的日子，直至地价涨高为止。他们需要的只是等待，不久之后就有金钱落到他们袋中。生活是如此的简单啊！

“芜夫利的一块葡萄园可以生产我们足够花销的利润，而且只值两万或两万五千法郎左右。”

然而买这个葡萄园，在他们拥有杜尔兰的那个带葡萄园、果子树、土台和眺望罗瓦尔河的风景区的别宫时，实在是一桩傻事。的确这也值两三万法郎，但巴尔扎克却计算这不会花费他们一个子儿：

“你一定在我告诉这件事给你后高兴的跳起来！是出售蒙刚杜尔的时候了！我所怀抱了三十年的美梦就要实现了，至少应当可以实现了。”

其实，最多也不过付出八万法郎的现钱，但是可以出售一部分零星的土地：

“光这地产上的葡萄园——按照十年的平均产量来加以正确的估计——就可以担保出产资本的百分之五的利润。如果我们卖掉十亩葡萄田，我们就可以弄到四五万法郎。这么一来，全部购买本钱我们就可以赚回。”

最后结束这封信他用了抒情诗的词藻：

“你还回忆得起在罗瓦尔河中映托出两只小塔楼的小别宫蒙刚杜尔吗？它可以俯瞰整个杜尔兰……”

替他办理交涉的是一位从前学校的同学，但巴尔扎克又觉得这计划似乎太小了，可是又设想了一个理由，他认为地产越大，价钱越是便宜：

“小康之家太多了，因此小地产荒谬的贵。要想干真正的一笔大买卖，你就要选择一块大地产。”

为何不买圣葛拉田别宫呢？这是已经破产的德·方斯丁先生的产业，巴尔扎克也曾为约尔地破产：

“他在圣葛拉田上花费了三十万法郎，但是他告诉我，第一个来客他准备以十五万法郎价格卖出……最后，他的地产总要卖掉的。”

但是德·古斯丁先生可不是巴尔扎克，他的别宫他似乎不想送给别人。

巴尔扎克继续物色，他所寻觅的房子终于在一八四六年秋天找到。这是幸福街的保庄楼，是一座革命之前的十八世纪属于一个富有国家佃农的房屋。他把他所有的奢华的家具，珍贵的瓷器，霍尔拜因和鲁易斯达尔的图画，他的铜烛台等等都搬到这所新居里面。这房子等待着变成巴尔扎克博物馆，他的私人罗佛尔王宫，他技巧的无中生有的创作出艺术杰作的纪念碑。后来高提埃看了这房子后大声惊呼巴尔扎克一定已是百万富翁了，但是巴尔扎克却痛苦地说：“不，朋友，什么时候我也没这么穷过。我对这些奢华的东西不拥有一丝所有权，我的身份只是这公馆的看门人和管理人罢了。”

他并没有立刻住进保庄楼里面。为提防债权人的搜寻，他暂时还住在巴士街的小寓所里面，保守在他的书桌上。其实我们看起来，真正的巴尔扎克博物院还应该是这所小房子，而不是那满是地毯、铜烛和瓷器的保庄楼。

和他们真正的成就相比无足轻重的特点就是最伟大的天才家们也是愿意让人崇拜的，这的确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定律。作为这个定律的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巴尔扎克这个奇怪的收藏家。

第六章 伟业者

第一节 对小说的最后告别

在两三个没有间息的年头中，巴尔扎克最少暂时地损失了排除干扰集中全力创造的基本力量。他成了一个收藏家，这并不是从本义来看，而是它的引申义。他不但聚集他那些拿来布置新房子的奢华适宜的家俱，并且他要体验他向来未体验过的生活——跟心爱的女人一起散步，长期的闲逸，在怪异的地方度过恋爱的夜晚，并且不受到她丈夫来自背后的威胁。创作的方式改变了方向，从专一发展一个虚构的图景 变为他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寻觅一个愉快的结尾。

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出这种效果来。紧挨着这一篇生活的短章之前几年，他曾出版了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一桩可怕的事》，活生地描绘政治阴谋；用近代的眼光去看性问题，他写了《打水姑娘》，又写了最后的一部，《幻灭》。随着这些卓越作品之后，《妓女盛衰史》问世了，把财政界和文学界联系了起来。芜特冷又回到场景上，早期小说的主旨全结合在一块，变成一个大全景。虽然此书侵入了侦探小说的范围，偶然间渗进一些官僚主义的色彩，但此书却比别的任何书都要成功地处置了巴黎和巴黎社会的精神。但是他却无法完成《农民》。这是试图研究社会问题和城乡斗争的小说。这种城乡斗争在巴黎只被当作股票和市场的一桩事或是一个文学题材，却在乡间保留着原始的形式。并非看不见摸不着，而是每一块看得见大小的土地。巴尔扎克觉得这部书应当是《人间喜剧》中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书，他花了好几年的工夫去写。他常常回过头来写，甚至于把第一部印了出来，如此地压着他去完成它。但他又不得不放下它。他在写一些无足轻重的作品。小说《柏阿特里克斯》只有开头八章有一些文学价值，痴情主义导致缺少人生的真谛，他又写出一些不重要的作品，如《夫妻生活的悲剧》，其实是他细细地切割了他的旧作《婚姻生理学》，虽然掺杂有一些魔力和机智。《谦虚的米昂》是由德·韩斯迦夫人供给他题材的，（于是此书便题上献词献给她），这个作品若说是有人模仿他写的也未尝不可。其中并没有多少雄健的笔力。他曾说过一个艺术家离开工作不论我久都要花相当的时间来恢复他的手艺。巴尔扎克在寻觅古董时已经忘记他的工作时间太久了。在这段时期的信件中都没找到他提出所要写的书或写书的计划。

他清楚自己的变化。他知道当他放纵自己去“懒洋洋地享受生活”时，他已损失了工作的乐趣和他的手艺。一八四六年一月，他给当时居留在拿破仑的德·韩斯迦夫人写信说：

“我的脑筋不灵活了……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厌腻并烦琐。”

他并未因未能继续《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的写作而觉得烦闷。他仅仅为了债务而写作，人们也渐渐地发觉他对艺术失去了兴趣。三月时，他突然放弃了一切，跑到罗马去了。

回巴黎时，他给德·韩斯迦夫人前后连续地写了很多信，依旧地发誓他将怎样地《大规模地写作》。他再次地相信，假如他日夜地工作，“毫不停

顿，最多让我们的婚礼推迟两星期而已”却写了三个月的话，他一定能够偿还他所有的债务——现今他只欠六万法郎了。但是其间并未提到艺术的灵感问题。但是，最后，在六月一日他告诉她道：

“这四年来，我筋疲力竭地工作着……”

六月十二日，他又报告说：

“我正计划写《农民》，另外，外构思了一部新短篇小说的布局。”

六月十四日，他竟然能够宣布两部新小说后写作计划了：

“我将着手写这些东西。第一，《可怜的亲戚们的故事》包括《蓬斯好好先生》可占上三四页《人间喜剧》的篇幅，和《从妹贝特》则可以占十六页之多。第二，《一个检察官的罪行》。”

他在两天之前提到的一部短篇小说现在却变成两部短篇小说，可是这两篇短篇小说的深度和广度连他自己也并不清楚。他只想把它们写成短篇小说，却不是长篇小说，他仅仅关心小说的长短，那是说他只关心他的报酬。但是，他以前的野心又突然地萌发了。当他写草稿时，他感觉到小说的潜能，并且创造的快乐又转回到他的身上来。六月十六日，他划明了他的工作范围：

“现在，上帝对我的要求是让我写两三部一流作品，可推翻那种虚伪的文学作品的神明，同时指出我比任何时期都更新鲜，伟大和年轻。《老音乐家》是被恶运所摧残的“可怜的亲戚”，一个心灵纯洁的人物。《从妹贝特》是女性的“可怜的亲戚”，也受到不幸的迫害。她把她的生活消磨在三四所不同的家庭中，并报复了她的所有痛苦。”

当他饶舌于地产的投机，金钱的事情，瓷制的饭具，铁路的股票和别的所有东西以后，又能见到他觉悟过来去创造艺术产品，实在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当然，他依旧固执地在他的书稿写出之前便和出版商可怜地谈判他那报酬，但处理好一切之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创作。他保持了旧习惯，把黑夜当成白昼，在他的书札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段参考资格，可以证明他怎样为日常生活激动和分散精力，特别是古董商的代办人到来时，对他的一个烦恼的干扰：

“我愿望打开所有的篮子，快点结束它。我急于知道如何送来这些美丽的物品，它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特别是当我现在被灵感的火光所困扰并不能安睡的特别激动的情况之下。如果我能像今晚一样一点钟起床的话，我希望在星期一写完《老音乐家》。你可以看出来的，我又执行以前的时刻表了。”

这部小说即是巴尔扎克用他所讲的很特别的速度完成的，可以发现他在六月二十日用少有的方式批评自己道：“我十分满意我的《老音乐家》。”

以后，我们又可以听说受了伤的图画如何地交给他，或买铜器时上了当，并提到他裁缝和债务。六月二十八日，他放出几年来人们从未从他口中听到的一声雀跃的欢呼：

“亲爱的宝贝！我刚写完一部叫《寄生虫》的书，这是我为《老音乐家》和《蓬斯好好先生》等的书稿作的最后的书名。最少从我看来，这是全部包含整个人心的最简洁的一部作品。它和《杜尔的教士》一样地伟大，一样地读了令人荡气迴肠，甚至更加透彻。我要马上把校样给你寄去，我十分兴奋。”

“我现在开始写《从妹贝特》，这是一部冷酷到惊人地步的小说，主要人物用我的母亲，你的姨母罗沙利和德斯保尔特—发尔摩尔夫人的特点综合而成的。这是属于整套家族的历史的书。”

他和德·韩斯迦夫人早期的非法爱情见证人莉勒黛的命运和他对他母亲的愤怒感觉，都要从《从妹贝特》中反映出来。当他写这部书时，同时又忙于校对《从兄蓬斯》，按他的习惯来讲，校对实际上是重写。商人的急躁加上艺术家的急性子，令他没空去赞颂上帝使他如此一个天才短期内写作了如此伟大的杰作，并去叹息他进步的缓慢：

“现在已经是七月十五日了，嗨！……我全凭我的血和汗来写完《可怜的亲戚们》。包括出书在内，这差不多可以给我带来一万法郎的收入。”

他并没有在规定日期内完稿，直到八月底，虽然一月二十四日那天他不止写了二十四页，但这部书仍未完成。好不容易写完了，校对的辛苦工作又接着开始，他的身体上的正如他自己记载的整个疲劳状态惊动了他的医生：

“不论他或他的任何一个医学同道都难以承认一个人的大脑经得起如此过度的压力。他总是用忧愁的口气重复告诉我如此下来的结果会变成有害的。他看到我花费不仅六周的时间去从事《从妹贝特》的紧张工作时，大为惊惧，他恳求我至少得暂时中止这种‘过度地使用大脑’。他说：‘结果必是一个惨剧。’我的确感觉到我身上有引起不对劲。我聊天时必须得设法寻找字眼，并且有时要费很大的劲。的确是我该休息的时候了。”

九月，还在校正稿子时，他出发到维斯巴登德·韩斯迦夫人那儿换换新鲜空气。因为当年夏季他写出了最伟大的杰出作品，所以他有资格去休息。从他最早的腹稿《可怜的亲戚们》中蜕变出来的两部小说《从妹贝特》和《从兄蓬斯》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他在他的壮年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他的手艺从未如此老道，他的思想从未如此深刻，他的写法也从未如此地尖刻。在长时期的休息之后，他写出了这两部不带任何腻人的痴情色彩或虚假的理想主义的痕迹的两部书。它们反映了实际生活的苦涩，和对于世界的真实认识。他不再片面重奢华的表现或外表的成功，他的眼睛上架的彩色眼镜已被抛弃掉了。他已在《幻灭》和《高里奥老伯》中表现出和莎士比亚描写《李尔王》的失望的同样能力，他的最后两部小说都有了《苛里奥兰诺斯》的所有锋芒。

他没有考虑到去迎合读者的口味，站在时代上去创造绝对的价值，他就达到了最伟大的地步了。《从妹贝特》和《从兄蓬斯》取景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巴黎社会倒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其实它也可以转到现在的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或美国，移到任何的时代和任何的国家中去，巴尔扎克在此处注重的是基本的感情。他那带有固定观念的人物展示室中由于有了收藏家和痴情的雨洛男爵而更加丰富多彩了。在《妓女盛衰史》中描写了一个富有戏剧因素的妓女铎尔皮尔，在可以让茶花女适合巴黎的超级趣味的堕落少妇以后，他又描绘了一个天生卖淫的，出卖给任何一个来自中产阶级的妇女的巴尔纳夫夫人的肖像。相反地，他创造了一个转移到魔鬼地面上来的莉勒黛，无可比拟的从妹贝特，只羡慕别人却不从生活中吸取健全的感受，给不正当的爱情做中间人去寻找怪异快乐的老处女。“可怜的亲戚们”的惨剧可以从从兄蓬斯中（他只有在还保留往昔的光彩时才被宽容）看得出，我们也可以从看房人西保身上看见贪婪的源泉。他也指给我们看一些浪子，他们的目的即是弄钱，欺骗心地善良的人。这些晚期的小说的紧凑的戏剧性使得早期小说中的芜特冷显得有些过分。这些小说的现实主义，原始感情的分析，感觉的逼真真是别的法兰西文学难以超越的。

这是他对他的艺术的伟大告别，从中我们可以衡量《人间喜剧》所能达到的高度，若是他还能有十年或五年的成熟的成就。他在《农民》中表现城

乡的最后对立，他不是拿自然简单的儿童居住的卢梭式芬香的风景区，而是拿反映巴黎实情的方式去表现农民的实际状况。他在《战争》和其他军旅生活中的故事中描写战争的残酷，来和他在《乡下医生》中对拿破仑的颂词相比较。他在《一桩可怕的事情》中超越所有历史传说的观念，假如命运可怜他的话，他将会去完成描绘学术界，外交界，戏剧界和政界的图景。他在一八四五年开列的书单中有五十部他未来得及完成。戏剧方面，他曾效法拙劣的模型，并发现他陷入了俗戏的沼泽中，最终他站在坚实的土地上。后改称《梅尔迦特的阴谋家》是一部描写债务人胜过债权人的剧本，这是他首部戏剧作品。这部剧本的成功没有后来的任何一部可以比得上。他的力量聚集在巅峰上，他感到他在戏剧主面也和小说方面对他这个天才来讲所负的责任。但是，不管精神或是肉体，他都需要一个终止。他感觉到他有必要再一次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完全地，治疗地休息。这是他的正当权力，于是他离开巴黎，旅行到千山万水之外的乌克兰，到维埃曹尼亚，到德·韩斯迦夫人那儿去——正像他自己说的，横跨了四分之一的地球。

第二节 乌克兰的冬天

一八四六年秋，巴尔扎克好像终于走进他渴望休息的港湾中一段时间。德·韩斯迦夫人再也不能推避他们的婚礼了。她曾坚定地说了她可爱的女儿安稳地结了婚之后，她不会想到自己的婚姻的；但女儿的新婚大礼已在十月十三在维斯巴登举行过。巴尔扎克亲自参加盛典，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他的预先计谋搞得很漂亮，他冒称和请求十字勋级会的裁定一起请求，自己弄到了公民结婚所需的个人文件，又广为准备，要让他婚礼在梅野秘密举行，他和德·韩斯迦夫人在那儿好像都没有熟人。他接触的梅冶市长了解他的计划，婚礼尽量地不公开，只在法兰西有效的公民结婚仪式在市政厅中黑漆漆的屋顶之下举行。两位见证人，医生拿克迦尔的儿子和他的另一位朋友，得从巴黎赶来，但德·韩斯迦夫人必须留在德意志的国土萨尔布律肯直到指定的日子的夜里才可来到梅冶。以后他们可以在德意志补办宗教仪式。巴士的牧师或梅冶的主教可以为他们来举行婚礼。如此复杂步骤的目的便是避免他们的结婚消息传入俄罗斯官府的耳朵中。巴尔扎克要求她立即同意：

“我正等待你的下一次来信。每在的每一个钟头我都只在你身上活着。这句话包含着双重的意义。”

因为婚礼前好几周他们在意大利一起渡过的日子并不是没有结果，环境也加重了迫切的必要。虽然德·韩斯迦夫人又是四十五岁的女人了，却仍然怀了孕。巴尔扎克的早熟的乐观天性令他相信这肯定是一个男孩，他并且决定为这个孩子取名：奥瑙利·维克多。

但是，德·韩斯迦夫人仍打不定主意。她克服不了不愿离开女儿的心情，她没有去参加婚礼，反而陪那对新夫妇去度蜜月。巴尔扎克只好把他费尽努力搞到的文件放进皮包，放弃了巧妙安排的秘密婚礼计划，回到巴黎。他该去校改《从妹贝特》和《从兄蓬斯》的稿样了。不论别人对于德·韩斯迦夫人是否真地爱上了巴尔扎克的问题有何意见，最终必须下定决心的话，不论是女儿安娜或她自己的婚事丝毫不会影响她们母女间的亲切关系。她们都用一种冷淡，甚至于轻蔑的目光对待丈夫或者情人。

第二年二月，德·韩斯迦夫人决定去巴黎，巴尔扎克必须去福尔巴哈迎接她。只须她请他去陪她，他必须服从。他的工作可以等他。无论她在何处，他总是抛下一切，急匆匆地跑去见她。她只要向他示意，他就得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去，不耐烦地屈指计算他的每一分钟，日夜消磨在急驰的邮车中，一直到他见到她的时候为止。

她第二次居住在巴黎并非是天人知晓的秘密。她的孩子不是小产，就是生下不久就死掉了。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是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孩子是个女婴。但巴尔扎克带着做父亲的天真粗鲁，写信说他的悲哀已经平息了：

“我渴望得到一个奥瑙利·维克多。一个维克多绝不会舍弃他的母亲。他可以陪我们二十五年，我们可以希望彼此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就这么多。”

但是德·韩斯迦夫人并没有准备好去出海。不断地她找出很多借口拖延时日，以致于让我们认为他对他的认识越亲切，她更加不愿那里人这样无可挽救的结合中去。这次，她说她必须回去维埃曹尼亚去顾她的事情，而他也十分顺从地陪她去福尔巴哈。接着，他便又一次地坐在他巴黎的书桌边工作

了。

他希望稍为晚些时间再陪她去。只要他完成《农民》，再写一出剧本，让他可以偿清他欠老朋友维斯冈底夫妇的一万五千法郎的债务，但是健康的破坏使他停了下来。他的医生曾警告他不要过度工作，他的自信失去了，他的编辑和出版商也渐渐感到不安。《新闻报》编辑基拉丁曾两次在报纸上用分段连载的方式去刊印《农民》，他相信巴尔扎克的在全巴黎闻名的工作能力。巴尔扎克从未让出版商或编辑陷入困境，即使到了最没办法的时候，他也总有一些东西去代替他的文稿。当基拉尔丁坚持要拿得整个稿件才同意第三次登布这篇小说时，他可说是到绝境了，生平中第一次他投降了。第一次他放下笔说道：“我不能够！”为了自欺欺人，他设法找到足够的金钱去偿还他从基拉尔丁手中拿到的预支。这是赎身钱，赎回自由让他可以去维埃曹尼亚，从那里带回他的新娘进入新房。

为了排除这目前的唯一困难，他必须和他十分厌恶的母亲和解。虽然他在书信中说到他的母亲最为刻薄，但是这位七十岁高龄的女人却时当他离家时给他依靠，并替他看守珍贵财产的唯一人物，就像他在逃离卡西尼街的家时曾托她照应一切一样。她是一个严厉的管家，只要他需要什么去信托，他便求助于他的母亲。他给她留下的指示念起来就像一段小说的摘要，十分古怪。他说她随时都会恐吓仆人们，说是德·巴尔扎克先生过两三天便会回来。每个礼拜都这样做。“这可以有益于叫他们做事敏捷麻利。”她必须瞪着眼睛，盯着贮藏他的所有财宝的“小房子”。因为，正像他给他妹妹信中所写到的：

“德·韩斯迦夫人十分关心这储存有很多宝贝的屋子。这是花了六年的时间聚集起来的。那里也许会发生抢劫或其他的什么不幸的事。”

在这种时候，他清楚地知道只有他母亲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在他所有的事托付给她之后，他便出发去乌克兰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当时去维埃曹尼亚去旅行对他来说简直是一次探险。

“我横跨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假如我多走了一倍这么远的路，我将发现我自己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了。”

平常的旅行至少需要两个星期的工夫，但巴尔扎克一直不间断地走，仅用了一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便到达了目的地。因为通知的信过了十天之后才到达维埃曹尼亚，所以他的突然出现是别人没有料到的。

他的第一个感觉便是万分的快乐。他的热情总是容易燃烧的。可是除了外表财富的标记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德·韩斯迦夫人的富庶是不用怀疑的。现在他已亲眼看到他的朋友的王公一般的华丽生活了。千千万万的巨厦在他眼中简直可以和罗浮宫相比美了。地产不是平常的地产，简直和法兰西的一个省份一样大小。他羡慕乌克兰的富饶的土地（不用施肥便可种植五谷），德·韩斯迦一家所拥有的一大群仆从和广大的森林。巴尔扎克看到这一切后十分快乐地描写那些仆人：

“走到一个人的跟前，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在地上磕两三个头，吻别人的脚。只有在东方，他们才知道卑躬屈膝的真正涵义。只有在那儿，‘权力’二字才有真正的解释。”

他注视着分丰富的瓷器和银器，并觉得这些被如此奢华的东西所包围的人物对什么东西都毫不在意。他们的祖先曾领有过法兰西一半大的土地。梅尼齐伯爵地产上的农奴不止四千个，但若要垦植他整个土地的话，则需要十

倍的数目。贵族地主的生活就和自然界一样地丰富而奢侈。这符合巴尔扎克梦想中的生活规模，他在德·韩斯迦夫人家中就和在自己家中的感觉一样。

生平中第一次他不用为金钱发愁。人爱提供给他所有的东西——住房，膳食，仆人，车辆，马匹和书籍。没有债权人来这里搅乱他清静的生活，人家也给他转来少量的书信。但一个人总不能把自己的皮脱掉，他很难不用金钱的眼光来思索。就像一个谱曲的人把感情转化成音乐一样，他也把他所看见的一切归入经济中去计算。他还保留着死也改不掉的投机者的品性。即使在到达维埃曹尼亚，在地产里的森林中穿行时，他使用经济的眼光去看这些森林的主人会获多少的利益。他忘却了以前暴富计划的失败，便马上向梅尼齐伯爵交上一份开发无穷的木材使之变为金钱的计划。那时，国境上正在修建一条不久便可把俄罗斯和法兰西连接起来的铁路。他不厌其烦地拿起笔在纸上画出了一条连接罗埃曹尼亚的森林和法兰西锯木厂的线：

“现在法兰西急需大量的橡木去制造铁路的枕木，但却没有着落。我知道橡木的价格会加一倍，一方面是建筑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细木工匠的需要。”

接着，他便开始计算损失和利润。他必须考虑从葛拉高到布隆迪的运费。从葛拉高开始便有铁路一直通往巴黎，虽然其中有很多中断的地方，由于阿尔伯河在马格德堡或莱茵河在科隆都未造好铁桥。因此乌克兰的枕木必须设法渡过这两条河。“六万株大木头的运输并非一桩小事，”会增加很多的运费，但他们可以去说明铁路公司的经理会减少运费，可以努力使银行家们注意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证明这对他们是有利的。那使每一株仅有五法郎的利润的话，即使扣除一切费用以后，他们仍可净挣几十万法郎。“这件事值得考虑。”

也许我们用不着记载他投机天才的最后一个苗头胎死腹中的情况了。

在维埃曹尼亚渡过的几个月时间中，巴尔扎克放纵自己去享受。在他叙述他和女人们同去基辅的一段文字中，他告诉我们他怎样在乌克兰的首都受到人们的注意。那儿有一个俄罗斯富人，每星期都点烛焚香祈祷，并答应送德·韩斯迦夫人的仆人们一大笔礼物，假如他们通知他巴尔扎克何时有意回去，让他有机会见到这伟大的作家，在房子中，别人分给他使用的是：

“一个幽静雅致的房子，带有一个书房，一个客厅，一间卧房，书房刷着粉红色的灰水，其中有超级地毯，一只壁炉，舒适的家具。窗户用透明的大玻璃板做成，我能够从四处见到风景。”

他计划再去高加索和克里米亚进行长途旅行，但却不幸没有成行。在工作上，他实际上没有写出一个字。由于他得陪德·韩斯迦夫人，他已经变成她的女儿和女婿的“玩艺儿”，能够帮助他们解闷的滑稽伙伴，在最后的几年中，他总不能安心地坐下来严肃地写作。和马尔冈夫妇与卡罗夫妇在一起时，除了他要陪他们以外，大家总因为他的天才而敬重他，不侵占他的时间，总让他自由。所以那时他住他们家中，他总能够写作。但在维埃曹尼亚，情况则大不相同了。在这些从未动过手指来生存的懒隋腐败的女人身边，空气之中总有某此东西使他难以集中精力创作。

正月的时候，俄罗斯的酷冬使地上冻到二十八度时，他突然动身回了巴黎，大概是为了贴补铁路股票跌价的亏空的缘故。可能他对他的新房子有点放心不下了。不用说德·韩斯迦夫人肯定是让他一个人走了。他并没有提到订婚或结婚之类的事了。她的犹豫似乎因为更加了解他而有所增长。她可以

在无忧无虑的乌克兰平静地生活着、也许她得出了结论，知道和一个她清楚了解的有着夸张的生活方式和赌博本能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将难以在巴黎寻找到平静的生涯了。她于是没有多少犹豫便让他这样一个带着病的人回去，仅仅在告别时，在他肩上披上一件御寒的俄罗斯厚皮衣。

不论巴尔扎克离家多长或多久才回来，他总习惯于在没进家门之前得到新的困难的消息。这次也不例外，不过这次的困难并非他自己惹出来的。他好不容易才踏上法兰西的土地，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便爆发了。君主政权被推翻，由于他曾公开发表过正流派保王党的意见，所以他任何投身政治生涯的机会随着君主政权一同失踪了。他的确曾在三月十八日的《宪政报》上假如别人要求的话，他将准备当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但他却没受到正式邀请。唯一肯把巴尔扎克的姓名列入候选人名单的巴黎的政治派别就只有“兄弟会”组织，条件则是他必须坦白他的政治信仰。但就对于这个条件他骄傲拒绝了，说是要选他去议院当代表的人们应当已从他的全集中归纳得出他的政治信仰。他有个典型的性格，即当他写作时，他总是非常清晰地看出将会发生的社会变化，并且十分精细地描写这个变化的不可避免的环境，即使在政局变动时，他却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的地位上，就像在企业方面总是这样的失败一样。

令他失望的事接连而来。戏院并不对他比以前更厚恩，他的铁路股票又跌价了。虽然他未如约地交出他的剧《迦太林和彼得》，但是他却从俄罗斯带回另一本“新爱的剧本”叫做《继母》，在五月二十五日于历史剧院中上演。由于巴黎仍在政治纠纷的搅扰之下，这部作品并没有引起特殊的注意。他最重要的剧本《梅尔迦特》已经被法兰西剧院的审查委员会“全体”接收了，但是演出却不得不暂时延期。我们很少听致关于他在此时期之内的小说或他的小说计划，他好像完全地致力于戏剧。他的一个建设便是去组织一个杰出的戏剧家和联合会，让大家来一起写作剧本，去充实和丰富法兰西舞台。

但是，他的脑筋也并不可能真正地注意这些事情。他已失去了对文学雄心的感应。他感觉唯一兴趣的东西就是房子。离开家之前，人家已替他做下了不少的事情。他这总比没有这些准备的好。他的穷困和他要这个房子配备的奢华之间的对比是异常的。他没有新的书稿提供给出版商，出版商也把钱包握得紧紧地，并且出版商苏微连还约束他。新闻记者们的敌视着他，有时他也感到读者们忘记了他。动身去俄罗斯之前他曾还了基拉尔丁一笔钱，只差七百二十一法郎仍未还清，基拉尔丁听说他回来便立刻向他索债。两周之后他向法院控诉巴尔扎克欠债不还，法院也支持他的请求。巴尔扎克每行文稿要价六十生丁的时光已不复存在了。他的短篇小说《初涉人世》只好贱价卖给《家庭博物院》杂志，维持他的生计。他比别的任何时候都穷。长期的旅居使他的一切收入来源断绝了。

某种虚荣心和羞愧感阻止他在浪费金钱去装饰幸福街的房子时向别人去借钱。这房子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块金色的大马色布，并且门上嵌上或是镌刻上象牙。仅仅一个书架和一块嵌上金甲的家俱，便费去他一万五千法郎。在杜鲁奥旅馆拍卖时，甚至都不容易找到一个肯出五百法郎去买此家具的人。楼梯上铺了贵重的地毯，任何空的地方都填上孔雀石的盆子和中国瓷瓶。但是他最得意的是“宽大的画廊”，也正因如此，他才选择了这所特殊的房子。保庄楼的地面布置得十分笨拙，画廊是一个长方形玻璃顶的屋子，墙上有金色和白色的油漆。各种的古董都陈列在紫檀的橱子里，十四个雕像围成

一个圆形，显而易见的假古董和真正的艺术品渗杂在一起。墙上挂着组成巴尔扎克收藏物的六十六幅图画，包括他自称的毕恩宽诺·色巴斯提安诺的画，一张他毫不怀疑的称之为杜勒尔作品的画像，和更可怀疑的霍柏玛的山水画。

个人的贫穷和愚蠢的奢侈之间的对照是家庭烦恼的来历。他常常找到新的理由去解释德·韩斯迦夫人和他婚礼不断延期的原因，从来不说实话。一次，他说他已直接写信给沙皇，却遭到沙皇的拒绝。或者说因为诉讼纠纷而妨碍德·韩斯迦夫人离开俄罗斯。他总伪造说她有严重经济困难，开始说因为她把自己的财产指定送给她的女儿，因此也就自己管不了了，后来就说她的收获受了火灾，烧毁了。他的目的就是在家中人的眼里降低他自己和德·韩斯迦夫人之间地位上的差异。事实上，彼此双方的家庭都不同意。德·韩斯迦夫人的亲戚以罗沙利姨母为首，不断地设法劝阻外甥女不要嫁给那个法兰西作家，不要和那个不可信托的败家子来往，因为他结果只会连累她把她一家的财产扔进臭水沟中。老巴尔扎克夫人和女儿则认为他未来的新娘只是一个冷酷自私的，自夸的傲慢的贵妇，只会把他留在身边，让他在半个欧洲奔波，却不考虑他的健康状况。

虽然巴尔扎克的母亲很克制地做了幸福街的看门狗，这需要老妇人的一切毅力和勇力以及无情，她并未幻想在家中安排停当，一对新婚夫妇舒适地住进新居后她能得到了什么报酬。她清楚地知道在保庄楼的繁华世界中并没有她的一个地位，她会和最后一粒尘土一样被扫地出门。她甚至没有希望有权利去门口迎接新婚夫妇——并且时候一到，她的怀疑是不会出错的。德·韩斯迦夫人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从未写过一行问候她的客套，也从未写过一个字感谢她的操劳。因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得到她对未来儿媳的憎恨是否与日俱增。她总是不断地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她能否从幸福街坐车去苏尔斯纳斯去看望她的女儿。正当她监督别人为那个女人花费几万法郎时，两个苏丽开销地她个人的预算中已经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巴尔扎克尚未还清他欠母亲的钱，他和德·韩斯迦夫人都没有想到为她预备一笔养老金来尽他的义务。他的胡乱的理由显然瞒不了她韩斯迦夫人并不愿意和他结婚，她认为这是他骄傲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希望德·韩斯迦夫人会多愉快地等待着去巴黎，去和巴尔扎克的妹妹和母亲接触，更不用说到她其他中产阶级的亲戚了。巴尔扎克的浪费金钱的奢华的新居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享受。

所有巴尔扎克在这几个月中所想的就是：一旦房子准备好之后德·韩斯迦夫的头脑中总会有一个急速的转变，这种希望现在却被她无意于这种结合的愿望所阻挡，她也丝毫没有表示她要拿维埃曹尼亚的温雅去交换保庄楼的虚无缥缈的美景的意图。反正他在九月中再次去俄罗斯，并要在严冷的冬天到来之前动身返回，因为这一年的一月当他从乌克兰回巴黎的途中已尝到过寒冷的痛楚了。他必须亲自拜访，再次地劝说他的执拗的情妇陪着他走上祭坛。

出发以前，他又企图去碰碰运气，希望能够进入法兰西研究院。因为夏都勃里昂和别的一个已无人知晓的“不朽的人”的死空出了两个席位，于是巴尔扎克宣布他要成为研究院的评议员。依惯例，他要逐家地拜访三十八个剩下的评议员，要求他们的支持，但他却没去，因为他必须在冬天以前去维埃曹尼亚，于是他便听天由命了。结果《人间喜剧》的作者只得了两票。饰

有棕叶勋章和神圣的座席被德·诺伊埃公爵和另外一个绅士所得，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却早被后世忘记了。我们应该赞扬巴尔扎克，因为他从容自若地接受了第三次挫败。他只让朋友去调查那两个支持他的人，因此他可以去向他们致谢。

十月间，他又去了维埃曹尼亚，但这次，他的心情明显很低落。那里已不是天堂而是“沙漠”了。他写信给他母亲说：

“噢，假如你来这里过两个星期，你将会发现幸福街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他十分痛苦地重点讲叙人家是怎样地热烈地欢迎他，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那种诚惶诚恐的口吻：

“这里和我住在一起的人对我都很热情，但我到底只是一个麻烦来招待的客人和一个表面上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家中所有的人，并且特别关怀那些围困我的种种忧愁，但是这对不可能的事又有什么帮助呢？”

德·韩斯迦好像允许有一个母亲和妹妹生活的事实得到承认，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大公开的文字中看出维埃曹尼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他所指的“不可能的事”大概是从德·韩斯迦夫人痛恨他为了她也许永远也不会去住的房子而浪费了如此发狂的钱中所推理出的结论。她的态度并非不对，巴尔扎克开始批判他自己的任性。他写信给他母亲：

“我如此说就足够了，那就是一个人即便愿意去牺牲也是有限度的，再说也不能所烦恼和劳累毫无理由地加在那怕是他最亲近的人身上。为了这幢房子而招来的无穷的久债也并非没有得到不好的印象，假如还有别的随之而来的困难，我的一生前途将会在某种情况之下发生了问题，”

德·韩斯迦不是那样会隐瞒烦恼的人：

“她为我花费了如此一大笔而恼恨。”

她又得到了一个教训，必须控制巴尔扎克的投机计算。他开始估计那房子只花费十万法郎，但现在他却已花了三倍的钱，即使是德·韩斯迦如此一个富裕的女人也不能不感到不安。维埃曹尼亚的紧张空气带上了一种传染性。巴尔扎克用不耐烦的口气往家中写信，她母亲也以同样的笔调回信给他。当她的一封信落入德·韩斯迦夫人手中时，发生了一场风波，结果巴尔扎克就设法把责备不能实现他的结婚计划的责任推到他家庭的肩上。人家都已经说到出卖幸福街的房子的事了：

“她是一个被人敬爱的富裕的女人，她不需要任何东西，因此，她讨厌拿她的好环境去交换一个只能让她看到债务，烦恼，花钱和生面孔的环境。连她的孩子都在为她发抖。”

巴尔扎克也渐渐地变得焦虑了，他也深深地感到节俭的必要。他忽然命令他母亲解雇一个女仆，由于他不能供给她食物和薪水。她仅能留下他的仆人弗兰苏看守他的财宝。甚至他走到了令人发笑的极端，给在苏尔巴纳斯的妹妹写信，询问她是否可以在他回巴黎后每个星期一都派她的厨子去他家，因而可以给他和仆人预备下肉，吃到第二个星期。他把预算降低到很低的数字：

“我仅剩下了二百法郎，这些钱用完之后，除写剧本的可能收入以外，我将没有别的来源。即使在戏剧方面，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赚不到钱的。”

这种沮丧我们从未在巴尔扎克的身上见到过，表明他的自信心已毁灭了。他已不是他自己了。他大大地减弱了活力。他的身体也在他所久经的紧

张生活之下崩溃了。他忽视警告的承诺，一直到他的身体搞到再恶化一点便要完蛋的地步了。即使第二次去维埃曹尼亚的旅行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一个杜尔兰的儿子并不能习惯于俄罗斯那残酷的冬季。支气管炎袭击了他的心脏，这是七年以前曾让他的医生摇头的那一种情形。即使他终于可以起床时，他也感到不能行动自由。他即使是说话都很吃力，他走一步便要喘一次气。他变成“和一八一九年一样的瘦弱”，他的病使他“和儿童一样的脆弱”，他已不敢想象去坐着写作。“我一年完全没有挣一文钱”。甚至他把他那和僧袍一样的袍子放在一边，这真是一个象征：

“我生病时换上一件便装——这衣服现在将永远地代替了我的迦尔苏辛白袍子了。”

即使是去基辅和莫斯科的计划都必须放弃，他没有想到在俄罗斯的冬季中回到巴黎来。他被两个德意志的医生克诺兹大夫父子来照顾的，因为他们设法进行柠檬治疗术，他们的治疗意见好像超过了他们的时代了。这只能暂时解除他的痛苦，由于很多身体器官受了影响。他的体温高了起来，他的眼睛又生了毛病，肺炎又复发了。

虽然没多少的记载证实德·韩斯迦夫人在巴尔扎克病中是如何行动的，但是有一件事总是肯定的，以前她热烈致敬的作家，曾拿爱慕之情来奉承他的虚荣心的著名作家仅变成一个好玩的伴侣了。当他不能再用笑话来取悦她时，这个作家便只是一个累赘了。两个喜欢游玩的母女俩——八个月以来等待去观看其辅一年一度的大集市。她们已于城市租了房子，并派仆人送家俱和行李去了，她们为这一重大社交重新订制她们的皮袍。由于巴尔扎克的病，她们必须推迟她们的计划，虽然道路难走也是她们失望的原因中的一部分，她们和他的唯一欢乐也只是穿上新的衣服来让他躺在床上看一下而已。

在他写的信中，他们仍用热情的笔调描绘他的神圣的夏桂和她思想简单的女儿，他肯定感到一种孤单的压迫的凄凉的空气。他肯定感到他和这些只想到自私快乐的女人们一起住在一个异国的环境中，因为他突然开始回忆他的老朋友们。德·韩斯迦夫人几年以来占据了她的思想的最大地位。他差点停止给他所归心的最突出的最忠实的女人卡罗·朱尔玛写信，一旦他躺在病床上，他便想到她如何在他需要帮助时去看望他，回想她多情的挂念。她好久已不存在于他的大脑中，甚至于他对她习惯称呼的“亲爱的”都不易于出现他的笔下，于是他便把书信的开头写成“我的仁慈而亲切的朱尔玛夫人”，似乎往日的恩情已变成了冷淡的平常友谊。但是没有一会儿他又使用以往知己的口吻，但他给她报告幻想和希望的文字中都沾染了一种悲哀的色调：

“我从我妹妹和外甥女处两次得知你痛苦的信息，假如我没有写信的话，那是由于我不能再提笔了。我快要死了……这是我十五年中的过度工作导致的心脏病。以来的八个月，我由一个医生来照护，一直住在这里。令人惊愕的是，在乌克兰的旷野中竟然找到这样的医生。他和我住的房子的主人很有交情，他是一个伟大的医生。因为一种可怕的“摩尔达维热病”，他给我的治疗中断了。这种病发源于多瑙河的沼泽地，散播到敖德萨并风行于亚欧之间有荒原。我得的是叫做间歇脑炎的热病，已经两个月了。我复原到可以继续治疗我的心脏病的地步，仅用了个礼拜时间。

“前天我收到外甥女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亲爱的朱尔玛，希望可以保留你在弗拉柏斯罗的房子，虽然您在那儿出售你的土地。‘卡罗夫人’

和“弗拉柏斯罗”引起了我最强烈的所有回忆，虽然别人禁止我操劳，也包括写信，我要解释为何自从去年二月以后除了一些事务的通信以外我没有给你写信。我必须告诉您不要以为您的朋友已把你忘记，我愿让您知道我从未停止过爱您，思念您，甚至于在这儿说到你，在这儿他们从一八三三年便知道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保尔之处！……“站在五十岁高龄去观察人生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又如何经常地觉得离目的地很遥远啊！您还记得我如何送德斯洛勒斯长眠于弗拉柏斯罗吗？自那次之后，我又送了不少人去那儿安息。但自从那以后，我曾放弃了多少的幻想啊！我除了对你的感情还在增长之外，已没有什么进步了。恶运是如何迅速地展开的啊！有多少幸福道上的绊脚石啊！的确，生活给人家注满了多少的迅变啊！我费了三年时间为自己筑了一个巢。这已花费了我相当的财富——但这对占据巢的鸳鸯在哪里呢？他们何时才能进去安住呢？时光流逝了，我们也变老了，一切的东西开始凋零了，甚至我的巢中的家俱。亲爱的，您瞧得见即使那些表面生活在富裕环境中的人们的方面，也不是一切的东西都是玫瑰色的……”

他也常给帮他还债的，他却没有正当表示过谢意的德兰诺瓦夫写信，似乎一个下意识的欲望在作怪，要求他不要太晚去表达他的情意和感恩戴德。也许，他也感觉到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了。

第三节 秘密婚礼

不论巴尔扎克有没有觉察到自己病情的严重，他的医生们都认为他绝不可能恢复健康，我们也可以假设他们已经把意见转告了德·韩斯迦夫人。当确实地知道他们的婚姻生活只会有短促的时间时，她于是决定答应这个追求了她多年的人的最后的欲求了。他已没有纵容他的败家子的天性和放纵他的赌博本能的危险了。‘好巴尔扎克’已变成“可怜的巴尔扎克”了，她也受某种礼贤下士的同情心所驱使，就像一个伟大的贵妇人会去同情一个为她效忠并变衰老的门客一样。结婚典礼订在一八五 三月间举行。

这个婚礼将在最近的城市柏尔第契夫举行。接着，他们动身去巴黎，去居住一切已预备齐全的等待着他们到来的保庄楼。没有比巴尔扎克的详细急躁地指挥他母亲准备一切去迎接他的新娘进入她的新家庭中更为典型的了：

“您可以在客厅隔壁第一个房间最高一层的棕色橱子上的中国瓷盆中找到一个仓细莉茜街的花商的地址。他曾在一八四八年来拜访过我，说到如何用花点缀房子，一次大约耗费两个礼，并且告诉我每年定购花多少钱。大概每年六七百法郎。我离开巴黎时、把这个方案搁置了起来，这为只有等我有钱，等和这位有关的贵妇人情愿同意时才考虑的。我知道她喜欢鲜花。一旦这个商人来负责装饰的话，你跟他交涉时便会有个底的。您必须让他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注意他提供的确实是好看的漂亮的花。

“您必须想办法搞定下面几种装饰。首先，第一个房间中的一张花桌；其次，有圆顶的那间房子中的两个花架子；再次，日式客厅中的一张花桌，接着，楼梯顶上的两个大花瓶；然后，屋顶下的那个灰色房间的壁炉上的一些非洲木的小花池；最后，弗兹尔在两个盆子中布置的木制小花插子。”

这是巴尔扎克在他结婚之前下达的命令，是在他希望可以在跨入新房之前的几个星期发出的。虽然他生看病，却和从前一样记忆性很强，他的记忆保留着一种摄影术一样的特征，以致于他可以追思一切的细节。每一个花瓶，每一个家具，每一个花架子都映在他脑子里。他也清楚地知道每个东西的具体位置。归家的长途旅行和婚礼还要等待。但他的思想已振动了翅膀，他却已在清醒的梦境中安居在幸福街了。

巴尔扎克和德·韩斯迦夫人在三月十四日于乌克兰柏尔第契夫城的圣芭芭拉礼拜堂举行了婚礼。历为他们不愿引起别人的注意，典礼因此十分秘密。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客人。这是早晨天色还带灰黑天色的七点钟时。预备来证婚的齐社米尔主教仍未到来，但巴尔扎克至少也很满意有一个查鲁伯斯伯爵和一个贵族教士，来参加庄严神圣的婚典。教士的一个亲属和梅尼齐克伯爵是唯一的证人，而伯爵现在已成为了巴尔扎克的女婿，典礼结束以后，这一对夫妇就马上回维埃曹尼亚，并在当天晚上十二点钟筋疲力尽地到达。

两三天以后，巴尔扎克便坐下来写最大的最后的胜利的公告。幸福好像恢复了他的健康，他便给他的母亲，妹妹，拿克加尔大夫和卡罗·朱尔玛写信。他并且向朱尔玛保证：“当别人问到我从前的老朋友时，您总是我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接着用下面的话报告他已结婚的喜讯：

“三天之前，我和我所爱的唯一女人，我要比任何时候都爱的女人，我要继续爱到死的女人结婚了。我相信这一次的結合是上帝保留给我的赏赐，

用来补偿我多年的磨难，我所遭受却经过我的克服的这么多年的困苦。我的童年并不幸福，我的春天并没有用花朵来点缀，但我现在要收获一个灿烂的夏季和一个丰收的秋天。从这个观点看来，也许我的幸福的婚姻可以带给您一点安慰，因为这桩婚姻向您证明在长期的困苦以后，上帝的确会把宝库藏起来，等待最终的赐予。”

寄出这些信以后，他头脑只有一个意念——尽可能地和他们会合时，走进他的家门去。他却仍不可以在信上附上一段他妻子的问候，因为即使现在，他仍不能说服他的妻了对他的母亲表示一点小小的礼貌，他只好吞吐吐地搪塞：

“我的妻子想在信后加上几句话，可是信差总在等待，但她却起不了床。由于她的手因湿气肿了起来。她将会在我的第二封信中向您致敬。”

巴尔扎克必须为他新得的快乐付出代价。那时，道路积雪很深，交通断绝，因此，他也不能动身回巴黎。即使没有这些障碍，他也不能在目前的健康状况下长途旅行。他给幸福街的房子订购的花太早了。他那脆弱的身体必须经受别的考验：

“我的肺炎和心脏病又严重地复发了。以前的治疗好像令我有相当的进步，但我现在却损失了当中的一大部分。……我的眼睛被一块黑帘所遮挡，总不肯散去，挡住了所有的东西，令我不能写字……自从晴天霹雳之后，今天我第一次提起了笔。”

现在起码可以希冀他的妻子利用这机会给他的母亲写几行信，平息她对儿子的忧虑，但巴尔扎克却机敏地加上一句：

“我的妻子没有一瞬间自由的时间，除了她的手如此可怕的肿胀之外。这是潮湿的结果……”

四月十五日，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努力地写信给他母亲：

“我的眼睛事实上已到了阻止我阅读和写字的状态。我写字的时候根本难以辨别字母。”

他又必须给病在床上由老母亲照护的妹妹假造一个支吾的理由，虽然他也附带地说他的妻子请他“向您致敬”。他说到他自己的情况：

“我并不很好。我的肺部和心脏都患了病。我每走一步都要喘一下气，我说不的话。”

最终，他们决定出发了。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旅行。在过波兰国境一个叫布罗第的地方，巴尔扎克疲惫不堪了。他出了过多的汗，不想吃饭，他的力气更加弱减了。那时见到他的老朋友差点认不出他了。五月十一日，他从德勒斯登报告：

“平时只要走六天，这次我们却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才到达这里。我的生命不只是一次，而是一百次地遇到危险。我们经常需要十五六个人来帮助，拿东西把我们从一直埋到车窗的泥坑中拉出来。但我们到底到达了这里，并且都活着，虽然我们生病了，疲乏了。这样的旅行让了老了十年。您可以想得到老是害怕我们中的一个会死在另一个人的怀抱中是怎样的味道——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地相互深爱的时候。”

在一半失明和万分疲劳的状态下，他设法一直坚持着到了德勒斯登。他爬不动台阶了，开始怀疑他到底是否有力量继续去巴黎。

“我的状况太险恶了……这惊险的旅行令我的病更加恶化了。”

虽然他已双目失明，他还得亲手地写这封信，他又替他的妻子解说：

“她十分高兴您在信中所讲到她的一切地方，但是她的肿的手却还没有让她提笔亲自给您写信。”

令人奇怪的是，她的风湿病却并没有阻止她去德勒斯登的珠宝店，她在那里花二万五千法郎买了一只漂亮的珠宝项链，但是她的肿胀的手指却并未妨碍她用清晰的圆润的笔迹写信给她的女儿，详细叙述她购买珠宝的情形。当巴尔扎克躺卧在旅馆的床上时，她竟然能把思想集中在珠宝项链上，只能表明她的无情，但她在信中称他为“这位亲爱的朋友”，也是很特殊的。她忍受着他的负担，因为她知道他不会再麻烦她多少时间了。

我们仅能猜测他们在住在德勒斯登时一定闹了意见，但是巴尔扎克必须坚持到底。他指示他的妹妹说：

“我只有依靠您了。您一定要设法让母亲知道我到来之时她不要留在幸福街。”

他十分害怕地想到两个女人碰面时的情况，他用拙劣的借口解释说：

“假如母亲在场，帮助我们提行李时，她的自尊必定会受到损伤的。”

老妇人的担心不仅仅是对的。几个月来，她随时睁眼看守着他们的财宝，照顾平常事务，监督家中的人员，虽然她肯定俄罗斯的高傲贵妇希望他们在他们到来之前离开这房子。她还有一件事要去办。一旦安排好一切花朵去迎接这对新婚夫妇时，除了轻悄地在背后关上门以外，她将别无事情可做了。弗兰苏可以站在门后，引导他的新主妇进入这王宫。进阶和各房间的灯火都应当起来，以便去迎接新娘，但老母亲知道那里没有她插足的余地，办完事情，她便去了苏尔纳斯。

即使在归家时，剩下的苦命也没有释放巴尔扎克，掉在命运上的一一点一滴都要向他盘剥勒索。还有一个项目等着加在他的幻灭的总数之上，因为他回到幸福街的保庄楼中正好遇上一个值得他花费笔墨去描写的可怕的一幕。坐火车是最后的一段旅行，但是火车误点了。深夜时分他们的马车才赶到家门口。巴尔扎克急于察看灯火和花朵是否照他的指示安排结束，弗兰苏是否站在门口，手中拿着一个分枝的烛台。

最后，马车停了下来。弗兰苏听从了他的吩咐。全屋从上到下灯火通明。巴尔扎克拉了门铃，却没有人来开门。他多次地拉铃，但房子中却依旧在明亮的窗户后保持寂静。几个邻居聚集过来。巴尔扎克向他们询问，却没有人能答复他。他的妻子仍然端坐在马车里，车夫于是急忙去找锁匠。房门终于打开了，一幕惨像暴露在他面前。

他的仆人弗兰苏藏在他的一间房子里——完全发疯了。命运选好了主人归家时来剥夺他的理性，人家在午夜时分将他送进疯人院中。当发疯的弗兰苏被人强制带走时，巴尔扎克正好引导他的新娘跨进了他为她特意预备的家。

第四节 永远安息的灵魂

约束巴尔扎克的定律是自始至终产生效力的。他的梦想不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事实，只能在他的著作中实现。他用了悲痛的牺牲，不可言传的烦恼和炽烈的热望去准备一所可以让他和那位终于屈从了他的追逐的妻子消磨最后“二十五年”的房子。他在一切准备齐全之后搬了进去——却进去等死。他已经给自己准备一个完美的书房让他去完成他的《人间喜剧》，他已计划了另外五十部书的内容，却一行也未写出来。他双目完全失明，我们看到的唯一一封从幸福街写给高提埃·提奥菲尔的信其实是他妻子的笔迹，只在信后让巴尔扎克勉力潦草地写了一行：“我已经不能阅读或写字了。”

他已布置好了一间美丽的图书室，但他却从未来翻开一本书。他的客厅挂有金色的大马色布，准备去招待巴黎社会，他却从未招待过。当人们看到他能搜集一个无比的收藏时，他那可爱的画廊应该轰动全巴黎，他应当把藏书排列起来，一件件地向作家们，艺术家们或朋友们去解释，但当雨果到来时，他却得请求他的妻子去向他的朋友说明和指示。他曾梦想过一座王宫，但这王宫却变成了监狱。他孤单地一个人躺在大房子中，然后他母亲害怕得像鬼怪一样地飞进房中去照顾他。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的妻子表现和他们从维埃曹尼亚回来，停留在德勒斯登时同样的残忍而漠不关心，同样的缺乏纯正的忧虑。

她的态度可以从她那时写给女儿的家书中难以否认地证实。她快乐天真地闲读珠宝，花边或衣服，我们很难从那里找到一行对她快死的表示真诚恳切的焦虑的话语。即使到了现在她还用他拿笑话来取悦她一家人时人家给他加上的绰号来指称他：

“玩艺儿到达这里的时候比任何时候身体都要糟糕，他已经不能走路，却发出衰弱的痉挛了。”

见到他的人们都确信他的死期临近了，他自己却拒绝相信。别的人只看到死的必然性，但他那乐观主义却认为有复原的希望。他习惯于嘲笑困难，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他并未放弃他的挣扎。他偶然嗓音有些好转时，他便聚集他衰减的力量，和一位客人谈话，表示他有信心不久便可再次走路，讨论政治问题，正如说服自己一样去说服别人，他还保留着他老当益壮的精力。最终，以前的精神的火焰甚至随时有可能迸发出来。

仲夏以前，医生们公布了他们的诊断书。路易大夫，拿克加尔大夫，卢大夫和福基埃大夫四个医生联合诊断的报告书详细清晰地说明现在他们只能设法缓解他的痛苦，偶尔地给他加一点轻微的麻醉剂。至于别的方面，他们都似乎觉得毫无希望了。巴尔扎克自己也开始发愁了。他悲痛不能完成《人间喜剧》，又讲他死后他的著作将会发生的情况。他逼迫拿克加尔大夫明确地告诉他他还能活多久，并从他老朋友的脸上得到了答案。有人曾传播过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是真的，据说当他思想混乱时，他曾呼换过他在《人间喜剧》中用来说明科学奇迹的毕安仓·霍拉斯的名字：“假如毕安仓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救我的！”

死亡的程序飞快行进着。维克多·雨果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他最后一次访问将死时巴尔扎克的情形：

“月光透出了云块。我拉响了门铃。街上没有一个人。没人应门，于是

我第二次拉响了门铃。门开了，一个手中拿着一枝蜡烛的女仆走了出来。‘您要看谁呀，先生？’她在哭泣。我报上了姓名，他便带我走进了客厅，那儿有德·安几尔·大卫雕刻的云母石的巴尔扎克的大半身像，放在壁炉对面的支柱上面。在房子中央的一张装饰富丽的桌子上点着一盏灯，桌子的腿是六只包金的趣味高雅的小雕像。另外一个同样哭泣的妇人进来说道：‘他快要死了。太太已经回房休息去了。从昨天开始，大夫们就不管他了。他左腿上受了伤，伤口上都生了蛆。大夫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说水肿令他的心脏变成脂肪，他的肌肉和皮肤都变成了脂肪，因此没有办法钻孔放水。一个月之前，他碰在一个家具的突出的修饰物上，……今天早上九点钟开始，他就没有讲过话。太太派人去请了位牧师来给他举行临终涂油仪式。他做了一个头势，表示他知道了。一个钟头以后，他向他的妹妹德·苏维尔夫人伸出了手。十一点开始，他的喉咙开始发出一种急切的响声。恐怕他活不过晚上了。假如你要的话，我给你找德·苏维尔先生来。他还没有睡觉呢。’那妇人走开了，于是我等了一会儿。微弱的光线照在客厅的家具和挂在墙上的霍尔邦恩和波尔布斯的图书。云母石的半身像发出光亮，似乎是这位将死的人的灵魂。一种除臭似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屋子。德·苏维尔先生的到来，证明了女仆告诉我的所有的话。

“我们沿着走廊走过去，踏上一只饰着丰富的艺术品，花瓶，雕像，图书和珧琅的盆子，铺有红色地毯的楼梯，经过了另外一个走廊，我注意到有一扇开着的门。我听到一阵不祥的，响亮的，急切的声音。我们来到巴尔扎克的卧室。他的病床在房子正中。那是桃花心木做成的床，床头床脚有预备移动病人的皮带和横棍。他躺在床上，头靠在枕头堆上，这堆中还有从睡椅上拿来的大马色布的垫子。他的面孔是紫色的，甚至可能说是黑色的，向着右边斜去。他没有刮胡须，头发是灰色的，并剃短了。他睁眼凝视着。我只看到他的侧面，他很像是皇帝。一个老妇人（他的母亲），一个护士和一个仆人站在床的两边，门边的柜子上点着一盏灯，床后的桌子上点着另一盏灯。一对银杯放在茶几上。护士和仆人惊恐地站着倾听他那急切的临死的声响。床边的明亮灯火照着挂在壁炉附近的一个含笑的面容活泼的青年人的画像。床上吹来一股强烈的催人欲呕的气味。我翻开被窝，抓了他的手。他满手的汗珠。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但他并未握我的手。……”

“护士告诉我：‘他天一亮就会死。’我下楼时，大脑中已带走了一幅活生生的图像。穿过客厅时，我又看到那只没有感觉的，静立不动的精制的半身像，并从那里放出空泛的光辉，对于这我难以不在死和不朽之间作个比较。”

巴尔扎克在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七日夜里十点半钟与世长辞。他的妻子早已回到她自己的房中去了，只有她母亲是唯一在场的人。他的死是很凄凉，很孤单的。

葬礼定于同月二十二日，纪念仪式则在圣鲁尔·菲力礼拜堂举行。他的尸体在倾盆大雨中被送往墓地。当然他的妻子并不了解他的内心，因为除雨果之外，还有亚历山大·仲马，巴洛兹部长和圣提一柏夫来执绋。巴尔扎克并没有和这三个人中任何一个有过亲切的友谊。圣提一柏夫曾是他最恶意的敌人，是他所真正怀恨的唯一的敌人。墓地选在巴尔扎克喜欢的地方拉齐士

皇帝，此处指拿破仑。

墓园。他的拉斯迪额（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从那里窥探都城，向巴黎挑战。正如别人所说的，唯一可以躲避债权人，寻找最后安息的家族，这就是巴尔扎克最后的归宿。

维克多·雨果在他墓边宣读了他的悼词：

“我们刚刚下葬在墓地中的这个人是一个举国哀悼的伟人……从此之后，人们的眼睛不会向着统治者的面孔看去，却要向着思想家的面孔望去，并且整个国家也将因为这个人的死亡而颤慄。今天，人民哀悼一个才子的死，国家悲痛一个天才的陨落。巴尔扎克的姓名将会结合在我们这个时代流传给后世的一条光亮的足迹之中……

“巴黎由于他的逝去已经昏倒了。他是在回到法兰西以后没有几个月便死了的。他感觉到将不久于人世，就像长途旅行的前夜，一个要来拥抱母亲的人一样想要重新一次见到他的祖国。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这生命却是丰富多彩的。这在工作方面要比在生活方面更为丰富。唉！这位勤奋的，惊人的工作狂，这位思想家，这位哲学家，这位诗人，他曾在活着的时候经验到一切伟人所有的充满斗争和风涛的生活。今天他已经安静地休息了。现在他已经远离了仇恨和冲突。他在进入坟墓的时候，同样地登上了名声的殿堂。自此以后，他将在远离我们头顶上聚集的乌云之上，在我们地上明星之间，发射光辉。你们所有站在这里的人，你们不都很羡慕他吗？但是，不管我们如何地为这个损失悲痛，都让我们接受这不幸的遭遇。让我们接受这不幸和不幸的所有的悲惨残酷的意义。在像我们这样的时代中，伟大人物之死常常会引起宗教的情绪穿过我们那消蚀于怀疑主义之中的精神，这也许是一桩必要的事，也许是一件好事。上帝知道他所做的事，当他用高超的神秘如此地冒犯一个民族，并且促使她去思考一下‘死亡’的归宿，在这里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当一个崇高的精神如此尊严地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久在人民之上用肉眼所能看见的天才的翅膀而翱翔的人物，突然伸出另一只翅膀飞入一个不可知的境界中去时，在我们心中只会产生真诚和严肃的思想。不！这并未不可知的境界！就像我以前曾经在同样悲痛的机遇中所说的，就像我不厌其烦地说的——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结局，而是开端。这也不是虚无，而是永生。你们听我说话的一切人，我不是说了真理了吗？像这一类的坟墓才是‘不朽’的明证。”

这是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从未有人这样说过他的。就像他小说中的主角一样，他要从拉齐士墓园中出发去征服巴黎。

